

操控 媒體

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
國際學術研討會

Manipulating the Media:
News and “Fake News”
in China since Early Modern Times



會議時間：2018年6月7日（四）至8日（五）

Conference date: 7-8 June, 2018

會議地點：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

Conference venu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主辦單位 / Organizer: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第三場次

- 166 妖人妖言：明代中期的訊息傳播與政治操作
/ 王鴻泰
- 167 日治時期檢閱及取次制度下《臺灣民報》的
發行與流通（1920-1932）/ 莊勝全
- 201 國共兩黨黨營媒體所報徐蚌會戰之勝敗
/ 王文隆

妖人妖言：明代成化朝的訊息掌控與政治操作

Sorcerer's Heresy: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id-Ming

王鴻泰 Wang Hung-tai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曾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現任：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副所長。研究領域為：明清社會文化史、明清城市史。重要著作有：《《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由張裴「律注表」管窺其律學理念之承繼與延續〉、〈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閒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錯雜〉、〈明清文人的女色品賞與美人意象的塑造〉。

前言

《醉醒石》第八回〈假虎威古玩流殃 奮鷹擊書生仗義〉敘述奴僕出身的王臣，機緣巧合，靠著書畫技藝，得到宮中太監的賞識，成了錦衣衛千戶，後來以奉旨采買書畫玩器的名目回到其出身地江南，狐假虎威大肆嚇詐當地士紳，並藉勢要脅羞辱其前主，江南士紳飽受壓榨之餘，編造歌謠嘲諷他，為了報復，王臣強迫在學生員抄寫古書，且苛虐之，因此激起生員的憤怒，群起而攻之，大批秀才包圍其官署，王臣上訴巡撫，欲藉以鎮壓士變，深悉原由的王巡撫卻反而上疏奏報王臣惡行，結果「衛中上本，參送法司。刑部依律，擬他打死平民，激變地方，定了個斬罪。倒是聖上英明，既批了個著即會官處決，還傳首江南。」這個故事在敘述中頗著墨於江南的文雅風尚，即有謂：「有那強脫俗子弟，畢竟結納些才人墨客，談詩論古，學文墨。收納些篋片陪堂，談琴格物，學清致。……這王大戶，也是個學文墨，學清致，學風流的。見這王勤（即王臣），人兒標致，言語伶俐，舉動活變，就收在書房中。叫他烹茶洗硯，閑時叫他習字摹帖，服事書房往來朋友清客。到十四五，面首兒好，也充了嬖童之數。」王臣即由此習得文人技藝，因此惹禍，因此受賞識，也因此成為欽差，卻又因此與江南文人起衝突。「古玩流殃」之回目即已揭示此故事之背景與基調。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這篇小說是文人雅文化風行下的嘲諷之作，而王臣是江南文人雅士培養出來的變種文人，他的發跡與落難都出自文化技藝，可謂通曉文藝而起，侮辱斯文而敗。然而，這個故事所本的「歷史事實」卻未必如此，至少當時人不是如此解讀，王臣的形象不是假文人，而是妖人。時代不同，對事情的表述與理解，也因時而異，此中更涉及訊息的掌控、詮釋與傳播之差異。

上述小說大概撰寫於明末之時，而其事實則發生於成化年間，是當時動人聽聞的妖人事件，《憲宗實錄》有載：

（成化 19 年 9 月）誅妖人王臣傳首江南示眾。臣任錦衣衛千戶，以妖術為太監王敬所信任，

敬奉使蘇常等府，奏請臣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以從，所至陵轢官吏，毒害良善，詐傳詔旨，括取奇玩之物，皆出臣所為，臣又多取美女因為淫亂。既還京，為太監尚銘發其事，下都察院鞫治得實，獄上，上曰：「民情常患于不能上達，王臣等在外矯詐為奸惡，使東南赤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之，罪狀既露，非重戮不足以謝天下。」亟斬之，仍梟首於被害州縣，王敬充南京孝陵衛淨軍種菜，王完等發原肅州二衛充軍，家屬隨住。

《實錄》的記載多少有為皇帝隱惡的意味，似乎一切過錯都出自王臣，皇帝本身乃為所矇蔽，不知其惡，而此惡行之揭發乃出自太監尚銘。這是翰林所撰的「皇家」版本，除此，另有士大夫傳述此事——黃瑜在《雙槐歲鈔》記道：

語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成化閒儉邪雜進左道亂政，然賴有六臣焉。……妖人王臣嘗為姦盜，被楚傷脛，號王癩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內豎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寶，痛箠吏民，吳越大被其害。嘗覓金蜈蚣，拷訊無有，里胥通賄乃喜，令置酒遊山，酒半，燐燐樹閒皆此物也，其幻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輩忿欲擊之，走匿以免，敬方其奏，適王公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攫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詔竄敬僂臣於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

黃瑜廣東人成化初年任官長樂知縣，王臣事件發生時，大概已退休歸隱鄉里，他不在現場，也未直接參與其事，卻屬同時之人，此處所記「事實」應是他收集整理相關人等的輾轉口述所建構出來，這算是當時人的認知，而當中也隱含具經世理想之儒臣群體的見識。在此私人筆記的記述中，王臣的「妖人」形象更為顯著，其與江南生員之衝突更與抄錄妖書有關，而制止此妖人惡行者，則是端正的儒臣巡撫王恕，由開頭的浮雲蔽日之說可見，正邪對立正是其敘述基調。

王臣事件在當時就是一件傳播效應極大，造成中央與地方，官員與民眾，都大感興趣而紛紛口耳相傳的事件，也因此，有與王臣同名的翰林，在妖人王臣惡名昭彰之際，也備感壓力，竟然因此申請改名，結果被彈劾「煩瀆聖聰」，差點被治罪。另外受害的江南地區有關王臣的惡行，更廣為傳揚，在朝為官的太倉人陸容在所撰之《菽園雜記》中也述及此事，稱王臣「以幻術游貴戚之門」，肆虐江南後「事發棄市，傳首梟於蘇州等處。」長洲人王錡（1433-1499）更在所著《寓圃雜記》中，列有〈妖人王臣〉篇章，對王臣之妖術有更詳細的描述，說他可以妖術操控木人，在江南「以妖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而王恕派去逮捕王臣的兵卒「裸其體，遍以狗血塗之，復囊以狗皮以破其術。」王錡本身是江南人，博覽群書而終身不仕，隱居故里，事件發生時，他或許未曾親眼目睹，不過應該很快就耳聞許多相關訊息。故其記載應該很能反映當時江南人的觀感。可想而知，王臣的所作所為在江南也是傳說紛紜，且充滿傳奇色彩，大家在傳述過程中往往更樂於對其妖術加油添醋。也因此，在這種偏屬於民間性的敘述中，王臣的妖人形象更為鮮明而具體，而王恕之逮捕王臣也就有了鬥法的趣味。王錡是個意在撰寫史傳的學者，然而在民間傳說的氛圍中，也不免在妖異事跡上多所著墨，讓王臣更增妖邪之能。

此妖人案不只是轟動一時而已，往後也不斷流傳，不少筆記都繼續傳播此事。如郎瑛的《七修類稿》中記及〈天竺觀音〉時也說此寶物「乃成化間為奸人王臣取去」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述釋道時，亦提及王臣「用方術見幸，自云能立成黃金，上信之，拜錦衣千戶，命同太監王敬下江南採諸藥，以備點化。」明末時余象斗所編之《皇明諸司公案》中有〈王尚書判斷妖人〉之回目，更強調王恕與王臣之間的正邪對立。入清之後，江南人龔煒所撰之《巢林筆談》猶記及此

事，而謂江南秀才攻擊王臣，乃一大快事。這個發生於成化年間的事件，在當時即已廣為傳播，日後又餘波盪漾，成為歷史記憶，不時被提起，踵事增華，乃至重新詮釋。

王臣肆虐江南的惡行固然深植人心，而其妖人形象也在不同記載中相異其趣，此濫權案件的流傳就反應出訊息的傳播是一個不斷「創造故事」的過程。然則，更溯本追源地考察事由，深思其成因，則需回到當時的政治環境，仔細地觀察訊息掌控與權力操作的關係，如此才能理解王臣的「妖人」形象究竟是在何種語境中被突顯出來。事實上，王臣這個妖人惡行的遏止，究竟是由皇帝親信的宦官或者端正經世的儒臣，其背後也就隱含著訊息的操控權力的爭奪問題。事實上，此類妖人事件在之前已多有事例，尤其成化朝中期更有轟動一時且影響極大的妖人事件，以至於王臣可說是受此影響才被強調乃至套上「妖人」形象，再擴大而言，妖人亦單一現象，它往往與「妖言」的傳播密切關聯，乃至涉及諸多妖異事件的傳播，而這當中涉及相當複雜的「妖」的定義與詮釋問題，其背後又有極為複雜的訊息掌控與政治操作的過程，尤其特務系統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獵妖」活動微妙且關鍵地牽動政治情勢的發展。這一切早在王臣事件之前已經曲折而完整地演出，所以妖人妖言的故事還得從成化初年說起，對此現象的考察，應可對明代政治的幽微部分有更具體而細緻的體認。

一般學者認為明代後期出版市場高度發達，也帶動訊息傳播的發展，各種大報、小報，揭帖、刊本，乃至戲劇、小說（時事劇與時事小說）四處流傳，形成一個雜然紛呈又相互交織的訊息傳播網絡。然則，關於明代訊息傳播的討論大多集中於明代後期已然興盛之景況，對於發明代中期之發展過程，卻少見論及，這是明代政治史與社會史研究的一個重大缺漏。蓋未能由訊息傳播之角度來思考，則明代中期之諸多政治轉變，難以清楚理解，而朝廷與士大夫階層，乃至社會大眾的互動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問題，也無從確實掌握，無法深入討論。事實上，明代中期的政治操作已經相當複雜，而且其中之要項即在於訊息的掌控，此由明代廠衛之備受倚重，且成政爭要點，略可想見一斑。只是，以往的研究往往只見政爭之表面，而未深悉其內涵，本文試由訊息掌控角度切入，嘗試分析訊息傳播與政治操作之關係，藉此為明代政治發展別開理解之生面。

一、緝訪事情，蒐求幽隱

一般論者認為明朝之君主獨裁更勝以往，乃專制體制更上層樓之朝代。就體制而言，洪武 13 年廢相，由皇帝直接統領行政系統，確可視為專制獨裁之新指標。除此，重法以待大臣，設特務機構以監控挾持內外，更為人詬病。《明史刑法志》有言：「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歎也。」是可見，廠衛之類特務機構之凌駕於國家法律系統，更是大明王朝在中國政治史上特別突出者，而此朝代特色也正足以作為皇帝獨裁專制的表徵。事實上，皇帝之獨裁與廠衛之重用可說是互為因果，有意專制獨裁之皇帝往往刻意利用廠衛作為心腹，《明史·兵志》亦有言：「（洪武）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衛。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所隸有將軍、力士、校尉，掌直駕侍衛、巡察緝捕。……永樂中，置五軍、三千營。……惟掌錦衣衛將軍及叉刀手者，每日侍，尤嚴收捕之令。……太祖之設錦衣也，專司鹵簿。是時，方用重刑，有罪者往往下錦衣衛鞫實，本衛參刑獄自此始。文皇入立，倚錦衣為心腹。……凡問刑、奏請皆自達，不關白衛帥。用法深刻，為禍甚烈，……又錦衣緝民間情偽，以印官奉敕領官校。東廠太監緝事，別領官校，亦從本衛撥給，因是恒與中官相表裏。」顯然，太祖與成祖是明代廠衛制度

的始作俑者，朱元璋始用錦衣衛，乃意圖以重刑挾制官員，因而用此以「巡察緝捕」，希望藉此徹底掌握文武官員之作為，將不法者重刑侍候，唯其晚年已預見其弊而加以廢除。成祖靖難位後，心知人心不服，多有非議，疑心生鬼，因此重設錦衣衛，且更倚為心腹，又變本加厲地設立東廠，廠衛合作，嚴密監控天下。大體而言，明朝開國之君的重用廠衛，主要目的即在於「巡察緝捕」，探知全國上下之種種可能動向。進一步究其根本存心則可謂，積極掌控訊息，用以作為政治操作之出發，正是專制君主切切關心且致力實踐者。大明王朝專制獨裁之發端，可在訊息掌控上概見端倪，所謂特務統治，勿寧只是其表象而已。

從另一角度來看，自太祖廢相而獨裁體制形成後，其後繼當權者，乃不得不陷入訊息掌控之緊張狀態中，蓋君主已成政治操作之最終點，而無相可倚情勢下，最後決策者必得積極掌控各種相關訊息，且於居心叵測之君臣與紛紜莫定之訊息中明辨真偽，斯能成為英明果斷之君。明英宗經過宮廷政變而復辟之後，即已深悉掌握訊息的重要，卻也因此重用，乃至縱容錦衣衛，《國朝憲章類編》曾載：

天順元年正月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百戶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先一日石亨引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此二人者何人？」亨對曰：「臣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如迎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至四千餘人，錦衣之濫自此始。

石亨，等軍人發動奪門之變使英宗重居皇位，這個政變的過程應該有不少機密之事在暗中進行，而專司巡察的錦衣衛在這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故此處石亨所謂合謀機密「其功實多」應是實情，只是此後恃功邀賞，乃不乏冒功之事，以至「錦衣之濫自此始」。不過，這也透露英宗經奪門之變後，深知訊息掌握之重要，以致錦衣衛備受重用——《明史》有言：「是時英宗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可見英宗已非昔比，「錦衣之濫」與其認為是石亨之流者矇蔽無知皇帝導致錦衣衛冒功浮濫或濫竽充數，不如說是皇帝刻意利用錦衣衛，藉以刺探深訊，掌握群臣動向，而在皇帝的倚重下，錦衣衛也更積極於「巡察緝捕」，尋求立功的機會。錦衣衛的備受重用與積極作為也激起儒臣的緊張：

錦衣衛官校差出者取財擾民，內閣臣李賢言於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曰：「錦衣衛官校是也。」因備述其故，且曰：「今後被告者非有謀逆重情不差官校，此害庶幾少恩。」上疑賢言過實，密令指揮達杲訪之，果然有一人得銀三四千兩者，上召管衛事指揮門達戒之曰：「今後差官校如有似前求索者，一體重罪不饒。」

英宗童齡即位懵懵懂懂，唯王振之言是聽，致有土木堡之變，歷經事變重掌大權後，深知訊息掌握之重要。他曾經親自對內閣大學士李賢說：「朕每得章奏，無不親閱，左右或以為萬機至繁，一一親覽，未免勞神，恐非養生之道。朕諭之曰：『身負荷天下之重，而圖自安逸，可乎？勞一身以安兆民，予所欲也。』左右乃不敢復言。」可見他已深知掌握訊息即掌握權力的道理，積極致力於此，顯然已非昔之懵懂少年矣。事實上此後他也已深悉訊息掌控與權力操作之道矣。由此實錄之記載可見，在皇帝的重用下，錦衣衛極為活躍，也多有藉機斂財之為，且他們的偵察範圍也已不限於政府官員，而已擴及一般平民，以致成為「天下百姓」之害。皇帝聽了最為親近且信任之內閣大學士李賢的控訴後，即內心生疑，而其作法則是密令另一錦衣衛指揮達杲暗中調查，證實李賢所言不虛後，他才加以處置，警告錦衣衛領導門達收斂行為。在此可以看出來，英宗皇

帝已經相當擅長利用偵察系統以掌控訊息，不止是在儒臣與錦衣衛之間對比訊息，甚至極為靈巧地在錦衣衛內部製造間隙，插手其間，左右操控。遼杲即其藉以制衡門達者，乃至及於石亨等以奪門邀功者。《明史》其本傳載：「（杲）以捕妖賊功，進副千戶。又用曹吉祥薦，擢指揮僉事。帝以杲強鷙，委任之，杲乃撫羣臣細故以稱帝旨。……石亨恃寵不法，帝漸惡之，杲即伺其陰事。……明年復奏亨怨望，懷不軌，亨下獄死。」石亨原來利用錦衣衛刺探機密，發動政變，助英宗重掌大權，也藉此邀功，後來卻又為英宗所制，利用錦衣衛嚴密監控偵察，最後將之置於死地。如是除可謂因果報應外，更可見明王朝至此政治權力的操作已與訊息掌控糾結甚深，歷經大變的英宗皇帝即從中歷練已然成為個中好手，其後代大明皇帝之權力操作都未能離乎此，訊息之鑰即權力之柄。

天順八年正月 22 日明英宗離開人世，憲宗登基，新朝開始不到一個月，錦衣衛的最高首領門達就被問罪論斬。《實錄》評議其所為道：「建遣官校分行中外，緝訪事情，蒐求幽隱，索取貨賄，內外官僚重足而立，由是詭服詐冒者接迹于途，天下騷然不安。」這與其說是門達之過惡，不如說是天順年間英宗汲汲於掌控訊息，有意縱容，過度操作特務系統的結果。這種作為引發官僚集團的不安，故英宗過逝，儒臣乃群起而攻之，在此情勢下，門達終於在權力交替之際，被置之死地。門達被論斬約一個月後，錦衣衛在城西的獄舍也被毀，因「御史呂洪建言，此非朝廷明刑慎罰之意，故命毀之。」看來似乎特務肆虐的時代已經結束，然而，這只是權力更迭之際，文臣們把握時機將已然失去靠山的舊勢力順勢推倒罷了。事實上，就在此權力過度時期，朝廷之中已然暗潮洶湧，流言四起，文臣之首的李賢，就飽受匿名文書攻擊，因而向新皇帝上奏請求離職，其謂：

今皇上即位大赦天下，賞罰明信，紀綱振舉，中外臣民無不歡忻感戴，豈意貪利之徒見朝廷法度清正，屏除奸弊，不得遂其所欲，卻歸怨於臣，往往投匿名文書，欲中傷臣，意在惑亂朝廷。臣往時屢經危險，懇辭退休，先帝不允，今又聞此，憾恨之言實自不安，決宜退避。

實際上匿名文書攻擊的恐怕不只是李賢一人，最多他只是首當其衝罷了，整體而言，此時新政權正面臨訊息混亂的局面。差不多就在摧毀錦衣衛獄舍之時，皇帝諭示都察院：

朝廷行事一遵祖宗成法，除奸革弊，悉從公道，不逞之徒不便已私，往往造言生謗，甚至寫匿名帖子揭於內府及京城內外，指其姓名，明言傷害，沮撓朝政，敗壞風俗，莫此為甚。爾都察院即出榜嚴加禁約，如有不改前非，仍投匿名文書者，許諸人首出緝拏赴官，皆處以死。首者緝拏者視捉獲強盜事例升賞。

由此可見，權力交替之際，各種意圖或勢力，乃乘此情況未明時機，積極投射出各種訊息，意圖影響這個正在除舊佈新的政權。從權力鬥爭的角度來看，這當然有可能是各種遭致整肅的舊勢力，或者企望卻失望於新朝之求權爭位者，乃對以李賢為首的當權派心生不滿——正如賢所言「不得遂其所欲，卻歸怨於臣」。然則，從體制變換的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說，門達被論罪問斬造成英宗時積極建立的巡察監控系統遭致瓦解，訊息管制乃隨之失控，於是各方勢力就乘此空檔積極活動，由所謂「寫匿名帖子揭於內府及京城內外」可見其已非暗鬥，而是明爭，意圖將其訊息公開展示，訴諸公議，以致當權者認為足以「敗壞風俗」，就此而言，可以說這已經是略具雛形的訊息戰爭了。如此，甫登權力寶座之皇帝，即刻面臨訊息混亂的局面。此時，他大概在李賢等儒臣的引導下，試圖啟動文官系統中負責糾核的都察院來處置，「出榜嚴加禁約」。然而，文官出身的御史足以勝任此巡察工作嗎？或者，皇帝願意將訊息掌控的工作，全然託付於儒臣嗎？

二、時方重妖言之禁

憲宗登基初期，除了直接感到訊息的混亂外，外在社會，尤其京城附近的動態也讓人憂心。天順八年三月上皇太后尊號大典告成後的恤典中就提到：「在京在外有遊手好閒，不務生業者，所在有司即便記其姓名，省令各務生業，如不改者重加懲治，其孤者殘疾不能生業者，即便收入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毋令叫街乞食，違者罪之。」這透露社會上流民問題已相當嚴重，京城街頭也已乞丐充斥，成為礙眼的街景。更嚴重的是，兵部尚書馬昂在奏疏中所言：「近良鄉、涿州、真定、保定、天津、武清等處直抵南京一帶，水陸二路，盜賊成群，夜則明火持杖劫掠居民財物，晝則阻截路道，肆為強劫，商旅不通，甚至殺傷人命無所忌憚，所在巡捕官略不加意緝捕，禁令廢弛，莫此為甚。」首都周遭乃至兩京之間，竟然有成群的盜賊公然強劫，而維持治安的巡捕官員也無法發揮作用，看來整個國家的安全系統都已出了問題，病症就顯示在帝國核心地帶。除了現實上的流民與治安問題外，也有一些令人心理不安的不祥徵兆，天順八年五月初五，北京城內突然「大雨電風雷交作，飄瓦拔木。」郊壇殿脊也遭損壞，吏部尚書因此奏言要皇帝「凜然加省」，特別應留意「左右近幸」，「毋得一毫與褻，亦無得入其引誘而假以寵用。」登基未久的皇帝也從善如流地表示：「自即位以來天災屢見，近於是月初五日風雹大作，飄瓦拔木，此乃上天垂戒之嚴，朕深懼焉。」君臣都應心生警惕，「自今各宜恐懼修省，恪恭乃事。」在皇帝自省省人的告誡下，位高權重的文武官員首領李賢與會昌侯孫繼宗上書表示：此不祥之兆「皆臣等不能修職所致，乞將臣等罷歸田里，別選賢能以匡治道，庶可以回天意。」皇帝最終並未准辭。這一幕天災示警，君臣修省的演出，皇帝大抵都循儒臣之導引，行禮如儀地演出。但其內心的恐懼是否真能因此消除，恐怕不無疑問。而其是否真心相信修省可以回應天意示警，從而解決災變造成的心理壓力，更令人懷疑。

大明君主之所以重用廠衛，除了用以監控臣僚之可能不法外，另一個重要的考慮是偵測社會上潛在的叛亂跡象，這具體反映在對於「妖言」的查禁上，成化初年雖然整肅了錦衣衛的過度放肆，但妖言的查禁卻未見鬆緩：

妖人趙春、張仲威伏誅。春，寧夏中護衛軍餘游食山東及京畿間，自稱宋後，與景州人張仲威等倡造妖言，眾頗信之，久而事覺，至是誅於市，梟其首示眾。時方重妖言之禁，緝捕者例得官賞，蓋自是犯者多矣。

所謂「時方重妖言之禁」這很可能是延續英宗朝的政策，前所謂門達領導下，錦衣衛「緝訪事情，蒐求幽隱」造成「天下騷然不安」，其工作重點應該就是有關妖言的追查。這樣的政策並沒隨著特務頭子門達的倒台而宣告終止，成化朝對此依然毫不鬆弛，而且，因為政權積極獎勵追查，此類案件也不斷出現。所謂「緝捕者例得官賞，蓋自是犯者多矣」其實暗示當中不無羅織罪名，成案邀賞之可能。事實上，成化元年十二月《實錄》中即有簡短記載：「直隸丹陽縣為民典史孟浩捏造妖言誣陷人罪。上命即誅之，不必覆奏。」此案不是直接為錦衣衛巡察所得，不過，也由此可見此偵防系統一旦佈展開來，則風行草偃，多獎賞則多舉報，為獎賞不惜誣陷人罪，或借刀殺人用此法網以報私仇。再者，如此重刑事件，竟然如此簡捷的處置與記載，這可能反映類此之事為數不少，不勝其煩，故迅速處理且一筆帶過。無論如何，在成化朝這個訊息掌控系統，並沒有因權力的更迭，主持人的撤換而真正的癱瘓瓦解。至高權力者皇帝所戒慎恐懼，用以對應帝國與

內心危機之道，也絕非只是如儒臣所議之誠心修省和遠離佞倖而已，甚至藉用門達之流者為鷹犬，被認為是更具實效之方。

在強力的訊息控制下，「妖言」的認定可以有相當大的彈性，有時可能認定極寬，而造成強力的訊息管制作用。《明憲宗實錄》中有載：

河南磁州民奏，廣西右參政羅綺前任刑部侍郎，鎮守松潘，貪圖貨物不計其數，比回京調副都御史，因糾劾降參政，延住原籍磁州，誑言不久復職，本州同知龍約公幹自京還，告綺云：「當今又寵宦官，用香木鑿已死太監王振形葬之。」綺聞之微笑因云：「朝廷失政，徇吉祥、張軌、石亨佞言，降出吾輩。」詔執綺約至京，法司奉詔鞫，依造妖言惑眾律斬。上曰：「羅綺貪利壞法，卻怨謗朝廷，與龍約造言惑人，情罪深重，法司其固禁之。」仍命陳所籍綺贓物於文華門前示百官。

羅綺的案件背後涉及相當複雜的政治鬥爭，且他刺及英宗痛處，故被處以重刑，不過，此案最後以「依造妖言惑眾律」論處，由此可窺見所謂的妖言，實屬強力的訊息控制手段，而在政治情勢緊張之際，在政治勢力的操作下，這個控制網可以開張甚廣，而收羅甚緊，造成強烈的社會緊張感，乃至深入人心，使之處於戒嚴狀態下，敏感於諸多訊息且作強烈反應。且不論此中之個人恩怨，此案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乃由羅綺之同鄉民眾所舉報，羅綺與龍約之對話，只是私下的言談，或許他們也不以為意在鄉間流傳，而竟然讓「有心」而敏感的民眾向上舉報，以致被羅織成妖言罪。如此，妖言管控的操作已經成了控制訊息的天羅地網，此網且滲透及於社會層面，甚且深植民心。由此案之成立，亦可見，英宗復辟後，複雜的政治情勢，加上皇帝的蓄意作為，天順初年此網已然打造完成，得以君臨天下，甚而操控人心，使之自動配合。

憲宗繼承皇權後，羅綺案採寬大處理，「綺繫獄者八年，至是遇赦，錦衣衛官奏請如赦例為民，綺因引詔書有抄提人口律，不該載放免之條，具奏乞免。都察院以聞，命給還人口房屋。」然而，這恐怕只能說是政治糾葛已事過境遷故得寬解，而非此訊息控制與政治操作羅網已然撤除。事實上，成化初期的「重妖言之禁」，應該就是承襲天順初期的政治遺產——網羅天下的訊息偵測系統——所致。成化6年2月，皇帝要求六部三法司等官員作政務檢討，六部高層官員會議後，列舉諸多改善事項上奏，其中有言：

在京巡邏官校訪察陰事，間有報復私讐，中以飛語，亦有為人誣連被掠首服者，法司因而罪之，乞自今一一詳覆，務得其情，庶幾冤抑得伸。

據此看來，成化朝初期其訊息偵測網仍然相當有效地運作，以至仍不時有人藉此以誣陷報仇，造成司法冤案。另外，成化10年12月《憲宗實錄》又載：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等奏，錦衣衛鎮撫司累問妖言罪人，所追妖書圖本舉皆妄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愚民咸知此等書籍決無証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

這更可見錦衣衛仍然積極於巡察工作，且成果頗豐，不時查獲妖書，以致都察院官員為免不教而殺，要求政府公布禁書名單，以免一般民眾無意間陷於偵察網，誤犯妖言罪。都察院的這個奏疏附上一長串的「妖書」名目，從訊息傳播的角度來看，這也反映出此時民間社會已產生許多文本，用來傳播其思想理念，一般學者認為成化年間，出版業尚未興起，推測這些文本有可能是抄本的

形式，它們可能名目繁多也為數不少，有一定廣度地在民間社會中流傳，不時與官方的訊息管控系統相碰撞，也因此除了直接遭致偵察系統的舉報逮捕外，也引起儒臣的關注，而嘗試對之進行清理，列冊管制，並「榜示天下」，公開批駁。此種作為可說是更積極的訊息管控，甚至可謂此中隱然已是兩個知識系統的交鋒對決矣。

由上述兩則文官的相關報告大略可見，成化初期訊息偵察網並未癱瘓，仍然運轉如此，在平常時刻監看著一般百姓所言所行。只是領導人沒有刻意生事，也尚無重大案件發生。大體而言，這個階段錦衣衛的偵察活動還算低調，不致造成文官群體的緊張，可以說因為政治情勢還未出現緊張情勢，皇帝本身也還未直接而強烈感覺其權威或安全遭受威脅，所以沒有積極地動員這個訊息偵測網。

三、今妖物傷人 無一人敢言

成化前期的訊息掌握系統大抵維持低調而如常地運作的狀態，直到成化十二年暴發妖異黑眚與妖人李子龍事件，激起皇帝的危機感與敏感神經，使之「振作」起來，促使訊息掌控系統重新上緊發條，且更求強化。《明史》有關汪直的傳記道：「成化十二年，黑眚見宮中，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直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這個敘述太過簡略，以致相關事件籠統一起，不過也言簡意賅地指出至成化十二年時，一連串的妖人妖事，激發皇帝強烈的危機感，以至對既有的偵察系統有所不滿，而另外建立巡察監視管道，汪直及其日後所建立西廠即因此而起。

黑眚的傳說由來甚久，明代更是不乏相關記載，成化之前也有一些相關事例。莫可名狀的妖物在黑夜中作祟傷人，卻又來去無蹤，形狀不一，也因此所謂「妖眚」，往往成為一種流傳一時的謠言，造成恐慌，這種謠傳與恐慌具有高度的感染力。傳統史書多將此類事件，歸類為災祥妖異之屬，此類災異事件難以實證究之，與其說是真有其物造成其事，勿寧將之視為一種謠言造成集體恐慌的社會心理事件。實則，黑眚究屬何物，已難究明，此事在當時即眾說紛紜，人人莫名所以，卻又人人自危，恐懼與謠言交相作用，傳聞造成恐懼，恐懼又增生謠言，相互循環下，謠言如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整個京城陷入恐懼的陰霾中。當時正在京城的尹直親身所歷，記道：

成化丙申（12年，1476）秋七月初旬，京師黑眚見。時方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見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各操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予始不信，一夕二鼓時，予家後賃房者王二之幼子啼哭，其夫婦大喊：「救人！」予驚起，隔牆呵叱問之，答云：「有人。」且云：「取火取刀來。」少頃乃息。次日使人審其詳，云一物坐其婦胸上，冰冷，婦驚起，乃被奪其提孩，力與互爭。其夫慌忙覓刀，不得，乃啟門得鄰居火，怪始棄去。初此怪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訴於該城兵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聞，止云：「不知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蓋不啻二十餘枚，兼旬始息。

尹直這則記載可能是最接近事件的記錄，他直接處身於此恐懼的氛圍中，實際感受當時的人心動盪，乃至付諸行動的混亂局面。甚至，他與黑眚傷人事件只一牆之隔，直接聽聞受害人的喊叫，並與之對話，不過，他也沒有真正目睹或接觸到這個「怪物」。他大概是特別關心此事，而刻意

想要追究真相的人，因此在鄰居遭受攻擊的次日，即「使人審其詳」然而，詳審下還是不得其詳，因為被攻擊的婦人，在黑暗中雖與此怪有身體的接觸，甚至與之爭奪孩兒，卻也未看清來者何物。尹直這則筆記有關黑眚的記錄，最寫實的部分大概就是這個親耳聽聞的部分。在此前後的相關描述，大概都是更為間接的傳聞。所謂「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應該都是在城市中口耳相傳的不確定訊息。甚至可以說，這個怪物的形象，就是在此傳聞過程中，逐漸被「塑造」出來的。所謂「一物負黑氣一片」可說就是在黑夜中，難以辨識其形，甚至有無實際形體也難以確定，只是感覺隱約有物。這大概是最初的傳說，之後，一傳再傳，漸漸描身繪形，形象日益具體，以致有犬狸之形象出來。事實上，自始至終，黑眚沒有真正受到逮捕，公開亮相，一切都只在恐慌人群的口頭間傳說。可以確定的是有些人受到莫名的襲擊並留下創傷，這些被傷者的存在應該黑眚傳聞持續延燒的重要憑藉。只是襲擊者究係何物卻無法究明，負責京城治安的巡城御史找來被傷者檢驗之後，只能判定「不知被何物所傷」。要之，此事只能確定黑夜中有莫名的襲擊者，來去迅速，以致無從追蹤，然而當大家的驚覺性提高後，此攻擊事件也就消失了。所以，究其事實這原本只是連續性的黑夜攻擊事件。然而在恐慌心理下，卻滾雪球般地發展成怪物作祟的謠言。當然，這也可能是有心人刻意製造的群眾恐慌事件。從政府的立場來看，這可以說就是一起「妖言」事件，或者可以說傳播這樣的事件是有可能被政府以妖言律來處理的。這個莫名的襲擊事件，也就是在大家心懷恐懼下，私下暗中傳述，議論紛紛，但是在政府的訊息控管下，不敢太過聲張，以免誤觸妖言律，然而此暗中口傳，可能更讓訊息不明確，更易胡亂滋生，加油添醋且胡亂附會，所有神秘難解的現象都與此聯結，不明所以的受傷也都歸諸於此，同時，對此莫名之物，也不免胡亂猜測，描聲繪影，黑眚的內容或形象，也在私下流傳中逐漸醞釀成形，恐懼感也逐漸增長。

尹直是個飽讀詩書深白事理的士大夫，在妖物傷人傳言四起的氛圍下，也不免捲入「黑眚」的共同想像中，初時不信後則聽信鄰居所言，認定此類攻擊行為是黑眚物怪所為。此亦可見黑眚謠言已經發展成形，在京城傳播極廣，且深入人心，自市井小民以至士大夫都籠罩在黑眚陰影下，以致這種恐懼與傳聞後來終於傳入宮中，皇帝也為所驚嚇——王鏊《震澤長語》中記道：

成化中京師黑眚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嚙人手足，一夜數十發，或在城東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訛言相驚不已。一日，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

這應該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私下流傳，莫名襲擊的恐懼逐漸醞釀成形，以致讓「黑眚」有了具體的形象，而後謠言也公開化，更廣泛傳播，宮廷也為所滲透，侍衛已淪陷其中，信有黑眚妖物，且對之深感恐懼。因此稍有類似跡象即方寸大亂，驚擾不已。最後皇帝也不免遭此恐懼之突襲，為之震動不安。事實上，驚嚇到皇帝的「黑眚」突襲宮廷事件，應該只是虛驚一場，由此敘述看來，自始至終並未見真正的怪物出現，也沒有發生任何攻擊情況。王鏊以「訛言相驚不已」來形容黑眚現象的發展，確屬洞見，推衍此言，則可說這是由一連串的錯誤訊息造就出來的恐怖影像，而此恐怖形像又造成大家的驚恐。這也真可說是一場影響廣大的「妖言惑眾」事件，連朝廷侍衛文武官員都已陷入「妖言」的魔咒中，稍為感覺有類似跡象即自動聯想怪物來襲，瞬間所有在場者都進入集體恐慌情境中，以致連最為權威的皇帝也難以自持。雖然皇帝在英明的太監的護持下，勉強維持威儀。但這則妖言是一場對帝國權威的挑戰，也確實對之造成動搖。本來皇帝在奉天門

的視朝，除了議政之實務外，也是皇帝與帝國威儀的展現，如今竟然在妖言的傳播下，出現侍衛驚擾官員喧亂，帝國的威儀已然動搖，此事非同小可。知書達理的儒臣們，自覺茲事體大，不能不有所論說，而憲宗皇帝也在震驚之餘，另有因應之道。只是兩者各行其是，竟成扞格。

從訊息傳播的角度來看，此黑眚擾亂京城事件，朝廷態度頗為曖昧，其微妙之處相當值得玩味。關於此《憲宗實錄》成化十二年七月九日記道：

京師西城有物夜出傷人，其色黑，眾蹤跡之，竟不可得。巡城御史及兵馬司以聞，命設法捕之，仍戒人毋得虛傳自相驚疑。

這是實錄中有關前述黑眚事件的全部記錄，這個預定存諸青史的官方紀錄，竟然如此簡略，其隱匿部分事實之意圖已不言可喻。首先，關於黑眚驚擾朝會，皇帝受驚欲走之事，就不見記載，這應該是修實錄之史官的刻意隱諱。然而除了後來撰史者的筆削外，在當時朝廷，尤其是皇帝本身，就有意管制此妖異訊息的擴散，由此記錄看來，當時訊息在北京城中揚揚沸沸地傳開後，京城管理衙門介入調查，卻無所獲，黑眚傳言更囂塵上，城管無力消彌事態惡化，只好再向上呈報，高層的決策除命之加強搜捕外，更意圖控制訊息傳播。如此戒令固可說是為了避免「自相驚疑」，以致群眾越傳越怕，讓恐怖氛圍更加凝聚不散。然則，觀諸後續發展，皇帝所慮恐怕不止如此，此中更有管制議論發展的政治考量。事實上，當時深受皇帝愛重的內閣大學士劉珣就上奏〈開言路疏〉強調應廣開言路，不該管制相關訊息，其中有言：

即今妖物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刃晝眠夜作。說者曰：「此陰盛之狀」又曰：「此胡虜將來寇邊之兆」。延今半月之久，無一人敢言，豈非顧望箝結于平時哉？設若有甚于此，亦孰敢言，或得禍亂不言可知矣。伏望皇上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詔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及一應官吏軍民人等，明言致災之由，殄災之策，不復忌諱。……如是則言路開，君子進小人退矣。萬事何憂不理，災害何憂不息哉。

這應該是事件還在發展過程中的建言，由此可見所謂的「戒人毋得虛傳」並非虛言，而確實是個有效的禁令，京城民眾在極度恐慌中已經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作息，然而在此巨大的騷動下，卻又顧忌陷於妖言律法，不敢光明正大地交換相關訊息，尤其官府也在禁令下，不能透明化這些訊息，乃至成為整合訊息的平台，公開澄清相關事件。因此在不得傳播的禁制下，相關傳言更處於混沌未明狀態中，且在私下流傳中越趨混亂，隨著莫名傷人事件的一再發生，各種謠言更是日益滋生，除傳述受傷情形或描繪妖物形狀外，也開始衍生出各種解釋，甚而升級至於國家安危問題，認為這是外患來襲的先兆，在此社會極度不安的情況下，官員們也都保持緘默。處於權心核心且深受皇帝信任的劉珣乃挺身而出，撰此「開言路」疏。劉大學士很清楚情況，深知禁制訊息的公開傳播只會讓問題更嚴重，唯有解除禁令，無所忌諱地公開討論，始能讓事情得到釐清，獲得解決。這大抵是儒臣們對於訊息傳播的基本態度，劉氏只是首倡其義，此後乃多有儒臣持此立場，持續要求解除訊息管制開放討論。然而，皇帝之態度卻不見得與此合拍，乃至越愈背離於此。

邱濬修撰《憲宗實錄》確實多所隱諱，劉珣這篇〈開言路疏〉，在當時即為人稱頌，後來又被收入《經世文編》，竟然在《實錄》中無任何記載。倒是當時人黃榆之《雙槐歲杪》抄錄部分疏文，且強調：黑眚騷亂京城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開言路，上嘉納之。」因為此疏不見載於《實錄》所以難以確定其上奏日期，不過，《實錄》成化12年7月22日有載：「癸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商輅等言：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發災變以譴告之，甚者出妖孽

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循省過咎，以修德政，轉危為安也。皇上嗣位以來純仁大孝，昭假上下，弘恩霽澤，覃被海宇宜其嘉祥至而景貺臻然數年之間災變迭見。今又妖物頓興，是實天心仁愛之至，假此譴告示警，欲躋斯世於平康之域也。」由此推知此〈開言路疏〉應是在此之前。在劉翊與商輅先後上奏兩天後，皇帝打破沉默，對此有所反應——《實錄》7月24日載：

乙丑，上於禁中祭告天地，其祝文曰：臣以菲薄之資，撫盈成之運，顧政事之多缺，致災異之荐臻。茲者京城內外有物夜出，殘害軍民，驚動閭巷。夫變不虛生，必有所自意者。或用度不節，致傷民財歟？或土工繁興，過勞民力歟？或忠言不聞，下情無由上達歟？或仁政不施，實惠未能下究歟？夙夜兢惕，罔知所措。伏惟大造垂慈，曲賜矜憫，赦過宥罪，轉禍為祥，俾奴物潛消，居人安妥。臣當祇謹天戒，循省愆尤，期維新于政令，以圖報于大恩，不勝惓惓懇禱之至。

顯然皇帝的祭告天地的祝文大抵可視為對劉商兩位大臣奏疏的回應，所謂「變不虛生，必有所自意者」這是對應商輅的「發災變以譴告之」，而「用度不節」也在其中，而「下情無由上達」的問題更是劉翊與商輅所共同強調的重點。事實上，這個祝文充滿反省意味，完全合乎儒家天人感應與修省補過之理論，在基調上就與儒臣理念若合符節，所以舉行於禁中的祭告文，如此冠冕堂皇，也可以說對全體官員，乃至百姓的昭告。畢竟黑眚事件是發生於朝會之上，文武官員都已共同面對此「災異」，且已有重臣正式上奏，皇帝能不有所表白。因此皇帝就遵循儒家理路，行禮如儀祭告天地，且撰寫光明正大之祝文，對天地臣民表態。然而，這會不是只是表面文章呢？皇帝是否別有想法或作為呢？

從時間的先後順序及內容的對應關係，大抵可以推知皇帝充滿修省意味的祭告天地文，是對重要儒臣一再上奏要求公開討論妖異事件的回應。這此中恐怕多有應付意味，乃至有違其初衷。事實上，在此之前皇帝已有所動作：

辛酉，遣太常寺少卿劉岌致祭于京都城隍之神，曰：自七月初九日以來妖物夜出四散齧人，城中軍民驚駭不安。茲固朕德政有缺所致，然於爾神不能無責，且神血食茲土，惟人所依，人之禍福惟神是降，今居人罹災，朕惕然憂懼，神獨愀然無動於心乎？是用遣祭以伸虔禱，惟神大振威靈，殄此妖物，俾京城安靖無復驚疑，庶神之責以盡，而朕之心少寧矣。

這個祭告城隍之舉大概是皇帝受到驚嚇後的第一個反應，這反應其心中最為直捷應對之道是訴諸神明，雖然其中也略提及「茲固朕德政有缺所致」，儒家的天警修省理念斯非重點，祈求神明「大振威靈，殄此妖物」更是皇帝關心所在。7月20日的這個祭城隍神活動在商輅上奏前兩天，由此所謂「自七月初九日以來妖物夜出四散齧人……」云云，推測這應該是七月九日黑眚驚擾朝會後，朝廷首次有所動作。也就是說在此之前以皇帝意志為導向的朝廷，對於已經在京城紛紛擾擾的怪異傷人事件，一直是沉默以對，也禁止公開討論，相關訊息只能在暗中流傳。直到黑眚直接震撼朝會，又再事隔11天後，皇帝才以半公開的方式求神滅妖，如此反應更讓儒臣難以接受。於是劉翊與商輅乃先後上疏要求開放討論此事，且避免陷於怪力亂神之中，而依儒家的修省之道來應對此事。如此，皇帝是先祭城隍再祭天地，這多少反應其私心乃以神明力量為要，相對而言，祭天之舉與修省之辭勿寧為是表面演出，此種差別在此或許還不甚明顯，日後卻謬以千里，君臣間漸行漸遠。

黑眚擾亂京城乃至朝會之事，對皇帝及大臣都造成極大的心理衝擊，只是在訊息管制下雙方都一度勉強壓抑，無所舉措，保持沉默，之後劉翊打破沉默，要求公開訊息，而皇帝求神滅妖，

更激起儒臣大發修省應變之讜論，皇帝雖表面迎合，卻意不在此。7月24日皇帝祭天修省後，相隔不到一個月，8月15日商輅又再上一〈災異疏〉：

夫何近年以來，災變實多？去歲宮門火災，秋大雨水，一冬無雪。今春嚴寒，河冰重結。郊祀之際，大風怒號。二月朔望，日月連蝕。南京地震，陝西天鳴，即目又有妖物害人之異。此皆陰盛陽微，非常之變也。夫天道不遠，感召在人。……此誠皇上側身修行之時，所宜深省遠慮，以安宗社為念，增修德政，講求缺失，疎遠私昵，節省冗費，以回天意可也。

臣等又惟人君應天以實，不以文事神，以誠不以物。……邇者傳聞皇上推廣敬天之心，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祭服、祭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神降之日舉行祀禮。……

臣等伏望聖明將前項神祠停罷，……凡內廷一應齋醮之事，悉且停止。……庶幾天心照鑒，可以變災而為祥，轉禍而為福。

由此奏疏看來君臣雙方對於災異的應對之道，差異越來越大，已經到了幾乎互不相容的地步。這個出自機要重臣的奏疏透露，皇帝面對災異，尤其直接驚嚇到他的妖物，心中的不安殊非儒家天警修省之說所能解，循道教的途徑，祈求具威靈之力的神明還是他比較相信的方式，京都城隍威靈不足，則更進以求諸玉皇。對於皇帝的作為，儒臣之首的商輅甚不以為然，不假辭色地提出糾正，強調變災為祥之道在於回歸儒家的感應說，體天意修德政。如此，君臣間在信念上已經涇渭分明，各有主張，雙方的對立局勢也已清楚浮現出來。從儒臣的觀點看來，皇帝越來越背離儒學正統，而日漸沉淪於旁門左道中。

黃瑜景泰七舉人，成化時任地方官，雖非京官，卻頗關心朝政，且有心撰史，其私撰《雙槐歲鈔》頗具史識，其中〈六臣忠讜〉所記黑眚事件，廣為後人徵引，而此篇開頭即論道：「語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成化閒儉邪雜進，左道亂政，然賴有六臣焉。內閣商公輅、劉公瑄、都臺王公恕、鄭公時、府丞楊公守隨、刑曹林公俊，忠讜格君，其何傷日月之明哉。」這可說是站在儒家觀點，極具史識的見解，而成化朝「正邪」的分歧點，正是由黑眚事件開始——黃瑜此條之史事記載也確實首記此事。可以說黑眚事件君臣間，面對心態、處置方式及相關議論的展開，初時實若即若離，往後則日益分歧，漸行漸遠，終至判然二分，而儒家觀點下，乃視如正邪之分殊。事實上，這個是一個政治操作與論述開展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除宗教態度的歧異與選擇外，訊息的掌控方式更是政治操作與議論的重點。關於此，君臣間的歧異更為鮮明，自始即立場相對，往後更各走極端，互相攻防，以至成為政治鬥爭的主戰場。這一切就在妖物事件才告一段落，緊接著妖人事件又起，兩事相乘，訊息掌控乃趨於嚴格，政治風暴亦相隨而來。

四、妖人事發，銳欲知外事

成化12年7月擾亂京城的黑眚謠言，最後擴及朝廷，驚動文武官員與皇帝，以致演變成重要的政治事件，觸動皇帝與大臣的連鎖反應與相應議論。追究此事背後之觸動機制，概可謂訊息傳播的失控與掌控斯屬關鍵。妖物傷人本屬真相難明之事，也因此引發各種謠傳，不確定的訊息在傳播過程更讓真相難明，而官府的管制訊息傳播卻讓訊息在曖昧中畸形滋長，從而衍生出更為妖異的故事，相互循環下，真相更難以明白，恐懼則日益增長。所以，推動此事件發展者，與其說是實體之黑眚傷人，勿寧說是謠言之自我成長，從而滋長恐懼。也就是說，「假新聞」的傳播，



更是事件發展的推動力量與關鍵所在。除事件自身之發展與訊息傳播循環相生外，政治力量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且與事件發展關係複雜。首先，由於法本有妖言之律，而實際上政治力量也很快介入其中，意圖管控訊息傳播，卻讓訊息傳播更趨複雜，且回過頭來與政治力量相互糾結，甚至夾纏不清，最後謠言侵入最高層之政治領域，觸發其諸多舉措，引發議論，乃至使之產生各種衝突矛盾。所以，對政權而言，這個事件本身就是訊息管控的問題，它也確實觸發政權訊息管控措施的爭議與新的作為。黑胛謠言事件的暫時落幕是另一場訊息管控戰爭的開始，尤其，經歷妖物震撼教育的皇帝，接著又來一場妖人李子龍事件，更讓他對訊息管控手段走向極端化。

李子龍事件在當時應是相當震撼人心的大案件，以致明人所撰之諸多筆記都曾記載，尹直（1431—1511）的《謇齋瑣綴錄》、黃瑜的《雙槐歲抄》、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朱國禎的《湧幢小品》、《國朝憲章類編》……等都有篇章記及此事，且此事件也常成為有相關奏疏或士大夫引以議論的事例。更有趣的是，此一事件也成了小說題材，《醉醒石》第十二回〈狂和尚妄思大寶 愚術士空設逆謀〉即是以此案為本撰成的小說，《醉醒石》小說集中有兩篇標明為成化朝，而選來鋪陳的正是李子龍與王臣兩個「妖人」作為主角，這也多少反映成化朝的妖人案特別令人印象深刻。

傳述李子龍事件之諸多文本中，《實錄》的記載應該還是比較接近事件的記錄，因其成立乃是作者閱讀相關檔案才將之編成「史實」，而《憲宗實錄》也對此案有相當詳細的記載，將李子龍的經歷與作為作了相當清楚的報導，首先是敘述李子龍的出身背景與入京前的經歷：

子龍本侯姓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為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遊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後當極貴」，又遇道人田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以與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者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

此敘述本身極具小說手法，這可說是為案情作鋪陳，重點在說明主角李子龍如何成為「妖人」的過程。在此敘述下，李子龍在遊方的過程中，逐漸接觸各種訊息與暗示，讓他越來越走上妖邪的道路。由此「妖人的養成」過程可見，民間社會中有各種道人術士者流，他們藉諸口頭或文本，相當活躍地傳播各種訊息與知識，而閱聽者則在其循循善誘下，建立其人生想像。李子龍就是在此情況下，一步一步走上「妖邪」人生。由所謂「交結不逞之徒」，也可見李子龍在「知識成長」信念形成的過程中，也逐漸建立起漸趨複雜的人際關係，其後乃在人際關係的牽引下進入京城，展開其「妖人」作為：

先是道仙有偽朝章、勘合并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夤緣出入內府。石忠等皆為所誑，敬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石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亮等，日久情稔，往還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設饌具以待，每入內府，石忠等稱為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為禮，勢日張大。既而為錦衣衛官校所發，執得權等下獄。

這可說是李子龍「知識實踐」的過程。由此可見，進京後，他已由知識的接受者，轉為知識的傳授者，知識養成後，李子龍已經成為一個具有人格魅力的知識傳播者，吸引來一些人的追隨聽從，

並為之推廣宣傳，在信徒面前他也成了權威者。如此，他在天子腳下，成立了一個略具規模的崇拜團體。也因此，終於引來訊息偵察系統的注意，落入錦衣衛手中，被逮成案。其實，李子龍並沒有具體的叛亂事跡，只是落入錦衣衛手中，就成了妖言案，主角也被就定型為「妖人」，再無迴轉餘地。在某種角度下，這也可以說是不同類型的知識傳播，卻在帝國的訊息掌控系統下，被定義為妖邪罪行，以致遭受最嚴厲懲罰。

李子龍被錦衣衛逮捕定罪事在成化 12 年 9 月初，和黑眚驚動朝會相隔差不多兩個月，此妖人之在京活動可能妖物騷動京城的时间可能有重疊，而妖人案事發時，大概黑眚事件已經落幕。沒有資料可以檢驗這兩起事件是否有所關連，從記載最詳的《實錄》看來，李子龍的活動，並未涉及黑眚謠言。他只是宣稱熟悉法術，藉此與幾位宮廷中的軍人、宦官私下往來，或許他曾向其信徒吹噓其道術，卻無意藉此大事張揚來擴大聲名，博取更大的利益，或營求晉身之階。所以他也有可能只是個志向不大的江湖術士，在宮廷中的活動，也只是貪圖一時之樂。究竟李子龍之志向如何，實難究明，尹直在此事發生時正在京城，任職任禮部右侍郎，關於此案他自稱「得其詳於御史郭瑞」，然他在《謇齋瑣綴錄》中記述此案時，卻有諸多令人難解之處，據其言：李子龍進京之前，和一些道流術士交往，而相信一些不經的讖語，卻也不過「所至誑惑，意本求食」，似乎也只是行走江湖，騙吃騙喝而已。至少看不出來曾經參與任何組織性的活動。反而是入京後，和一些內廷宦侍交往後，這些「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頗有非分之冀」似乎其野心是受到這些不得志的內侍所引起的，這人究竟只是心有不平，牢騷之餘胡思亂想，隨便說說，還是真有不軌之心，意圖遠大，實在可疑。後來錦衣衛風聞其行跡可疑而滲透其中，「漸聞約束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往真定府舉事。」於是向上呈報，上層乃請令搜捕，結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器」，這成了最直接，可能也是唯一的造反物證，至於預訂舉事的真定府究竟有什麼組織人力物資以為支應，卻沒有任何蛛絲馬跡，了無訊息。據此看來，實際上這只是一場「口頭革命」，從頭到尾除了幾個心懷不平的內侍，或許口出妄言，或許果真收藏了幾件表徵皇帝專用的衣帽外（滲透其間的錦衣衛要裁賊嫁禍也易如反掌），根本沒有任何組織動員——若有，錦衣衛豈有不追查清楚，追究到底之理。《實錄》對李子龍的身世與交往，紀錄詳細，乃至猶如小說情節，但對其造反之犯案實情與證據，卻一筆帶過，遠不如尹直所記詳細，然《謇齋瑣綴錄》所記卻也有疑點重重，其犯罪證據實在相當薄弱。而且有趣的是，據載李子龍被逮後，「甘心就死，自謂享用過分。」似乎也不是承認意圖造反，而是不守本分，違制在內廷玩樂太過，罪在過分享受。再者，據《實錄》載，此案判決後，有刑科給事中上書表示判決太輕，五人判死外，餘黨九人只判充軍，太過縱容，應該改判誅死，然而皇帝卻反應冷淡：「以事既行，不聽。」這也不禁令人懷疑，果真是危於國家帝位的造反案，且由宮中發動，皇帝豈能如此淡漠。要之，這個哄動一時，且為後世不斷傳述的妖人案，不無可能是被製造出來的謀反案。

究實而言，李子龍的造反意圖與行動事實，並不明顯，他可能只是一個好吹噓，圖取一時享用的江湖術士，然而，他在京城活動的時機與內容太過敏感，他所傳播近乎妖言的宗教知識，並藉此與內侍交結，雖然他的宣傳活動與黑眚無涉，甚至特別警覺地和黑眚妖言保持距離，但在黑眚驚動朝廷之後的敏感時刻，他堪稱低調的內廷交結活動，卻讓負責偵查妖言，卻在黑眚事件中深受挫折，已經繃緊神經的錦衣衛驚覺有異，因而積極布局，張網羅致，將之辦成一件大案，成就一場轟動的功績。然則，細究此謀反大案的具體人物與作為，未免讓人覺得「名不符實」。李子龍的「造反團體」，也不過十幾個內侍而已，他們行動力也極有限，實際上也沒真正做出什麼「造

反」行為來。所以，李子龍案與其說是個精心策劃的造反事件，勿寧說是個被刻意誇大，乃至製造出來的「假新聞」，這個新聞正是在黑眚事件後的敏感時機，極度引人注目，喧騰一時，引發極大的效應，在傳播過程中，相關事實與議論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而且兩起本不相干之事卻很快地就被聯結在一起，相提並論，共同成為當時被熱門的政治議題，從而掀起另一番訊息掌控的政治角力。

李子龍本人雖無涉黑眚事件，且有意避免牽連其事，然其案情發展卻間接受此牽連，其術士行為與交結活動在當時即觸動訊息掌控系統的敏感神經，以致為特務系統所網羅——或亦可謂乃被羅織入罪，以補其訊息掌控之失職。更重要的是，成化12年7月至9月連續兩件「妖異」事件——妖物騷動京城與妖人惑亂內廷，且兩者都逼臨皇帝眼前，這激起朝廷上下的高度緊張，如何應對這種莫名難測的妖物妖人，成了訊息掌控的難題，也引發了不同思考立場與處置方式的爭端。成化帝在強烈的不安下，更加積極地發動訊息掌控網絡，乃至對之重加組織。《雙槐歲鈔》：「丙申七月黑眚傷人，京城騷動，……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子侯得權詭姓名李子龍謀入內為逆伏誅，乃開西廠靈濟宮前，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品以上擅自抄札，內外恟恟。」《明史·汪直傳》也說成化12年先後發生黑眚與李子龍案，以致「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因此派汪直外出秘察。如此敘述都將接連發生的妖物傷人與妖人謀逆相提併論，共同視為皇帝設立西廠的動因。事實上，這當中還有個發展的過程，《實錄》中有形象相當鮮明的記載：

汪直昭德宮內使也，年幼，最得寵，陞御馬監太監，去歲九月因黑眚之異、侯得權之誅，命出外訶察物議。初出布衣小帽，時乘驢或騾，往來京城內外，人皆不之重，至是得瑛執轡以取信於上，且謗及諸大臣。上益委任之，遂權寵赫奕，都人側目。

這種敘事觀點與《雙槐歲鈔》相似，都認為皇帝是因為黑眚與李子龍事件，而意圖更積極地掌握訊息，所以派汪直出外探查。此處《實錄》的記載有更清楚的細節，據此看來，皇帝是在成化12年9月李子龍案發被誅後，就派寵信的太監出宮進行秘密調查。為何這兩件事會引起皇帝如此反應呢？《實錄》沒有任何解釋，而《明史》則語焉不詳地說這兩件事，讓皇帝「心惡之」，以致積極地想瞭解「外事」，這也有些令人不解。黑眚之異大概容易理解，此事件中，整個調查系統明顯失職，始終無法查出四處傷人的妖物究係何物，這當然讓皇帝深感不滿，覺得他們不可信任，因此嘗試另覓親信以精確掌控訊息。另一可能則是，此事之漫延顯示，在訊息的傳播上，皇帝可能居於末端，相關謠言已經在京城內揚揚沸沸地喧騰許久了，皇帝卻一無所知，以致朝會的驚擾，突如其來地襲擊皇帝，讓他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驚慌失措。如此，受驚的皇帝當然對負責訊息掌控的錦衣衛深感「惡之」，以致有意以所寵代職所惡。至於李子龍事件，錦衣衛雖然最後積極有為地滲透其中，從而證實他們心懷不軌，在舉事前將他們逮捕定罪。然而李子龍及其信徒，在皇帝身旁形成獨特的團體，而一個來歷不明的人，隨意進出大內，這個維安上的大漏洞必然讓皇帝深感不安。對錦衣衛之未能防患未然，可能也有所不滿。甚至，不無可能其心中對錦衣衛的調查結果也有所懷疑。再者，李子龍這個妖人江湖經歷相當豐富，宮廷內侍為他所迷惑，皇帝本身大概也不免對此感到好奇。活躍於外在的江湖世界，卻輕易滲入宮廷，這是威脅也是迷惑，皇帝出於安全與好奇，「銳欲知」之，然此「外事」，恐怕不便託諸已然官僚化之錦衣衛。事實上，成化帝本人對於鬼神深感好奇，日後極度寵信李孜省之流的術士，而其委任汪直統領之特務系統也將妖言之偵察列為重點，乃至因此製造假案以爭取功績。

五、近日伺察太繁，刑網太密

成化 12 年 9 月，妖物與妖人事件暴發後，皇帝對既有的訊息偵測系統——東廠與錦衣衛，已經不太信任。因此立即委任寵信的宦官汪直外出進行秘密調查工作，由《實錄》的鮮明描述看來，汪直的作為就是裝扮成毫不引人注意的平民，隱藏在平民百姓中，行蹤飄忽，神秘莫測，而市井民眾的街頭巷議，蜚短流長，概在其網羅偵測中——即所謂的「詞察物議」。他是個隱形人，聽聞一切，不存在而無所不在。他是皇帝的親信耳目，皇帝透過他耳聞目者宮廷與百官外的世界。汪直最初是皇帝特派的情報員，情輕騎簡從，四處偵察，可說是個新型的特務，是成化帝頗具創意巧思的訊息掌控方式的嘗試。這個實驗進行了大概三個月，皇帝覺得汪直的情報工作成效不錯，因此在成化 13 年正月就新設西廠，由汪直統領，西廠成立一個多月，更有重大成果。此即前引《實錄》成化 13 年 2 月 8 日所載，牽涉甚廣的楊彙案，建寧衛指揮楊曄為仇家所告潛逃入京，透過關係找錦衣百戶韋瑛求解，瑛為汪直心腹，因此對之通報此訊，汪直乃以殘酷手段查辦楊家，且擴大偵察，嚴懲受牽連多名官員，不乏含冤者。經此一案，汪直更受皇帝信任，由他統領這個新的特務系統，成化朝的訊息掌控方式由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此後訊息掌控充滿封閉性與隱秘性，也蒙上陰謀猜測與恐怖刑求的陰影。

西廠的成立可說是成化朝訊息掌控方式的更趨嚴格，這反應在訊息擴大搜羅與限制流通上，即西廠更積極主動且無限擴大的訊息搜集網羅，卻又對訊息傳播大加限制——《憲宗實錄》載：

（成化 13 年閏 2 月 7 日）乙巳，禁通報旨意。故事章奏既得旨，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傳報，使知朝政，至是錦衣衛千戶吳綬以為漏泄機密，宜嚴禁之。詔可。

這個禁令的提出與確定，距西廠的設立差不多一個月，事出同理，都是意圖嚴格掌控訊息。事實上，提案的吳綬本有意迎合汪直與皇帝，後來也成為汪直的重要黨羽。這個建議是相當強勢的訊息控制手段，在此禁令下官員與官員、官員與朝廷之間的訊息流通管道都遭切斷，章奏不得傳報，則政治意見難以發生，政令的施行流程不再透明，朝廷不再是一個可以開放參觀，乃至交流互通的平台，行政命令只能由上而下地專斷獨行，朝政不可知後，成了只是權力的貫徹，議論的空間趨於狹窄，乃至將近封閉。如此，在嚴禁「漏泄機密」的考慮下，訊息被封閉在黑暗渠道中，政治操作成了黑箱作業，而朝廷成了神秘難測的存在，皇帝及其心腹隱藏在禁區的核心操縱一切。甚至，真正站在第一線，卻又藏在幕後的西廠，掌控了訊息，也操縱一切，皇帝只是站在幕前的權力表徵而已。

汪直深悉訊息掌控之道，成化 12 年 9 月皇帝任之秘密刺探外事，三個月後更獲寵信，13 年 1 月設立西廠。汪直統領下的西廠極度活躍，四出偵察訊息，積極主動地搜羅情報：「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鬪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事實上，西廠成立不到三個月，已經成效驚人，除辦成幾個大案，株連甚多外，在妖言的追查上，更競爭搶功，不擇手段——《實錄》13 年 3 月 8 日載：

錦衣衛旗校捕寧晉縣人王鳳等，謂與瞽者康文秀於臨清縣人于源家謀逆，拜受妖書偽職，以緣事知縣薛方、致仕通判曹鼎與鳳同縣有連預其謀，發隸卒圍其家，搜檢無驗，榜掠誣伏。……時西廠行事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藉者多為贗書誘愚民，而後以情告，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無敢言者。

約略同時，另有案情——《實錄》13年3月16日載：

分守懷來奉御廖禮信部下軍餘妄報妖言，因及平人，收繫甚眾。時巡撫都御史殷謙、參將都督僉事周賢、巡按御史何鑑，并鎮守太監弓勝、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清、副總兵都督僉事周玉、指揮僉事周隆、尹昇亦皆扶同奏報。事下都察院，問擬妄報者坐斬，併請治禮等罪。

這兩起事件時間如此相近，而且都牽連甚廣，從官員到士紳，以至於平民，可見妖言追查之緊迫可想見一斑。這兩起案件乃個別發生，卻都可歸功於西廠，可說都是其嚴密苛察的延續效應。汪直所領西廠建立起來一個極度敏感的訊息控制網，其成員積極有為，相互競爭，奮力追求績效，在此情況下，已經帶動社會效應，任何稍有可疑的訊息，都遭舉報，且被嚴重處理，以至部分貪求獎賞者，乃「妄報妖言」，製造假訊息以相投合，如此這個訊息控制系統成了隨時可以捕捉無辜者的天羅地網，甚至可能主動出擊，誘人入罪。這網羅已經形成令人畏懼的恐怖氣氛，文武官員也警覺到這是一個威脅到正常法治系統，以及一般官民安全的邪惡勢力。因此祭出重典，要扼止這個妄報歪風。都察院這個妄報妖言坐斬的重法，實有劍指西廠的意味，因為這個亂源正是出於西廠的過激「捕妖」活動。這也是一場訊息傳播的政治鬥爭的開始。

西廠成立將近半年時，忍無可忍的內閣大學士，終於團結一致地對汪直的特務系統宣戰，他們在奏疏中對西廠的種種作為提出嚴厲批評，請求將之罷除。此疏中直言：

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拘執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腹目者也，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小。

這份奏疏應該是由內閣大學士商輅起草，而另外三名閣臣共同署名上奏。此奏歷數汪直所領西廠之濫權亂法，甚至直斥皇帝為此亂源之端，如此明確的指控讓皇帝極為憤怒，因此又派太監至內閣質問此奏起意何人，閣臣表示此為其共識，閣臣的同心力挺讓皇帝低頭表示「汪直壞事朕實不知」，承認疏中控訴無誤。由此陳述可見西廠的搜查妖言行動極為激進，這個情報網過度敏感，稍有風聞即徑行搜捕，且獵捕範圍無所不包，上至朝廷大小官員，下及商賈庶民。所謂「伺察太繁」、「刑網太密」正點出西廠成立不到半年，已經建立起來一個極為嚴密的訊息掌控網羅，極其操切地運轉，以致於已經造成朝廷上下，乃至社會大眾的恐怖不安，而這一切正歸結於皇帝本人，其委任的特務系統，搜羅、壟斷並詮釋、裁決各種訊息，所有人只能生活在「疑畏」之中。這些位居機要樞秘且代表儒臣的內閣大學士，基本上認定皇帝委汪直所立之西廠的訊息控制系統，已將帝國推入「恐怖統治」。

這份奏疏一方面可說是西廠作為與影響的實況報告，另一方面這也代表儒臣對皇帝及其心腹所為的批判，其中根本問題還是在於訊息掌控的態度。此疏條陳之首即言：「今西廠搜尋細故，凡街市鬪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加捶楚，或煩瀆聖德置于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這顯示儒臣對皇帝設西廠，激切於訊息搜羅，極度不滿。商輅原稿中更歷數西廠情治系統對官民的危害：京營管軍頭目「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繫令人跟緝鈴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各處鎮守總兵等官「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各布政司及所在王府「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司驚疑，各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不測。」

各河道「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間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凡此種種概皆可見西訊息管控之無所不在，以致造成嚴重問題，天羅地網下文武官員商民百姓，人人驚疑退縮。除了廠衛人員的專權自恣，違法亂紀外，這種訊息的控管導致行動乃至思想上自我限制，更是儒臣們心中最深層的憂慮。大體而言，訊息開放是儒臣們的基本立場，妖言事件發生時，儒臣們就有開言路以消災的主張，此際即可能與皇帝有理念上的出入，後來更漸行漸遠，最後皇帝更激進地採取相對的作法：利用特務主動搜羅訊息，並使之趨於壟斷、封閉，以至於汪直領西廠布置成天羅地網，箝制官民，儒臣乃至於斯可忍孰不可忍之地步，與皇帝特務徹底站在對立面。據《實錄》載閣臣共同上疏後，「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奏，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顯示此反西廠政爭，參與面甚廣，可謂中央官員都站在同一陣線，共同批判皇帝的特務系統。至此，文臣與特務已然壁壘分明，勢成水火，將近半年的箝制與恐怖威脅，一旦發難大臣隨即同仇敵愾，決心放手一搏。然則，妖言事件可說就是這個決裂的開始，此妖物亦促使儒臣發展出不同的政治論述，用以對抗皇帝的訊息控制。

成化 13 年 5 月這場儒臣請廢西廠的重大政治事件，《實錄》將商輅等閣臣的奏疏內容完整地抄錄下來，對於事件的過程也有相當戲劇性的描繪，以小說般的筆法，描述皇帝另遣重要太監質問威脅諸閣臣，而閣臣一一表白力挺，且敘及有帶泣表白者，甚至也對主其事之商輅的內心思慮有所剖析。然則，如此看來巨細彌遺的實錄記載，卻還是有所隱匿。《雙槐歲鈔》對此記道：「商公疏直十罪以聞，上不省，劉公復疏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震怒，再此申瀆。上使懷恩詰責，二公力辯始詔革去。」據此看來，在閣臣的共同上書之後，緊接著劉珣又再上疏，劉珣之《古直先生文集》卷 6 也確實收有〈遵舊制以安人心疏〉，部分文字確與《雙槐歲鈔》吻合，且其末言：「臣已與同官論奏，未荷俞允，故不避震怒，再此申瀆。」可見劉珣確有另行上疏之舉，卻為邱濬所掩，其用意究係如何，頗值追究（此容後再論）。劉珣此疏中特言道：

近日京城妖狐夜出，人心驚惶，皇上特設西廠官校，暫令太監汪直提督緝訪，用戒不虞以安人心。臣聞自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人心反至不安，其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

黑言事件發生時，劉珣即首先打破沉默上〈開言路疏〉，主張應該「明言致災之由，殄災之策，不復忌諱。」疏中且標舉理想政治為：「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天下」、「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這大抵可視為儒臣的基本共識，所以接著上奏的商輅，條陳中也有「開言路」項言「伏望明詔在廷文武群臣，凡致災之由，弭災之策，悉陳以聞，則言路開而下情達矣」。這些如出一轍的言論，正反映儒臣們有共識，都具訊息開放之理念。此種理念正與皇帝之意圖忌諱妖言（避諱公開談論妖異）本有出入，何況皇帝竟又派遣特務秘密搜羅訊息，乃至設西廠更變本加厲地操控訊息，甚而假藉追查妖言而專權濫搜，多有冤錯假案。如此對於訊息的開放與查封之異趨態度，相去日遠，乃至背道而馳，終於尖銳對立，演成政治鬥爭。劉珣此〈遵舊制以安人心疏〉即秉持開放訊息之理念，而批判皇帝用特務意圖強力控制之作為，導致結果適得其反。他認為設立西廠是為緝訪妖物妖言，藉此掌控訊息讓人安心，然而當此情報系統擁有特權，得以任意操作訊息，反而治絲益棼，更讓人不安。這可以說是對西廠之作為與影響的現實觀察，卻也可說是其與皇帝之訊息掌控態度有所不同，由其開放立場出發所展開的論述，用以對封閉訊息之作為的批

判。

劉珣站在開放訊息的立場，主張國家安全應該建立在訊息的開放與開誠布公的議論，由此批判皇帝對黑書事件的操作方向錯誤，導致求安反而不安。這可說是出於現實觀察的直接表述，除此另有「非現實」的論述。儒臣向來習慣用來規勸皇帝的天意示警說，也在此反西廠的政爭中，發展成另一種論述。商輅主筆的閣臣共疏中也提及黑書事件：

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立西廠，驚動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豫先示儆，不可不慮。

這是從天道示警的邏輯發展出來的論述，如前所言，黑書事件發展期間，商輅的〈災異疏〉已言：「此皆陰盛陽微，非常之變也。夫天道不遠，感召在人。」以此感應說來要求皇帝修省，然皇帝不此之圖，先是求諸鬼神，再而派遣特務，如此行徑與此天道論述也漸行漸遠，在此情勢下，商輅等儒臣也相對地進一步發揮其感應論述，竟將西廠的作為「一如妖物傷人」，這一方面是「污名化」西廠，為之貼「妖物」標識，另一方面又藉此再申天警，要求皇帝改變作法。如此，從妖物傷人到西廠肆虐，串連成具有一貫性的天道顯示。所謂西廠如妖物之說，大概不是商輅等人所獨創，王鏊之《震澤長語》中也記黑書後汪直受重用「使偵外事，……或往南京或往北，威權赫奕，倏忽往來不測，人以為黑之應也。」這種說法可能是流行於社會上的傳言，或是痛恨西廠惡行者的刻意造謠詆毀，商輅奏疏乃借力使力搭乘此謠傳風潮，再藉題發揮，將之附會於其素所強調的天警理論，用來嚴重警告皇帝。這可說是另一種對訊息的掌控與政治操作。

成化 13 年 5 月內閣與六部官員集體奏請皇帝廢除西廠的政爭，顯示儒臣群體與特務系統在訊息掌控上已經壁壘分明，且水火不容，終於正面對決。在此對決中，儒臣們本其訊息開放原則一方面批判皇帝利用特務控制訊息，卻在實際操作上適得其反，未能治安反成亂源。另一方面則持續發展天意示警論，將西廠視如妖物，要求政策改弦更張，將之廢除。就其立場而言，這可是一場訊息掌控政策的路線之爭，而從論爭方式來看也可說其本身也是一場訊息戰。西廠旗校無所不在地搜羅訊息，藉之以箝制官民；儒臣則歷數其搜羅情報形成禍亂之種種罪狀，甚而製造天警之謠傳，將之類比為妖物。如此，雙方的政治鬥爭至此已旗幟鮮明且武器齊備，也終於公開對決。13 年 5 月這場交鋒，最後皇帝認錯，承諾罷廢西廠，此戰儒臣獲得勝利。然而這只是個開始，大明王朝訊息掌控的攻防戰才正要大規模展開。成化朝儒臣群體與廠衛特務的鬥爭是個序幕，明朝往後政治發展的精采大戲，這當中系統訊息掌控與政治操控的複雜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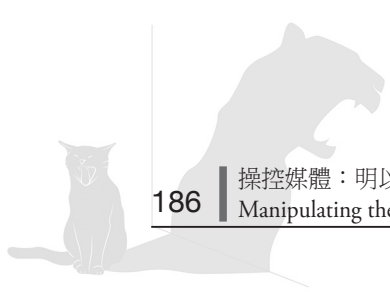
成化 13 年 5 月廢西廠的政爭，儒臣們逼使皇帝認錯，答解散此特務機構。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勝利。皇帝依然「銳欲知外事」，依然信任汪直，依然暗中讓汪直為之搜集情報——《實錄》載：「時西廠雖革，上猶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而汪直也動員其情報網，暗中佈署，拉攏同伴，分化對手，儒臣集團已有為其收編者，之前他與兵部尚書項忠結怨，乃「日掇拾其事」，被劾解散西廠後，卻還能提供訊息，唆使文武官員構陷項忠，忠因此被削籍。之後，更有御史為汪直美言，請求恢復西廠，皇帝樂允所請。約只相隔一個月，汪直又再領西廠，商輅及一些重要官員，紛紛求去。《明史紀事本末》載：「尚書薛遠、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時越附汪直，曠御史馮瑾排諸大臣。輅既致仕，遠等相繼自陳去。」如此，商輅等儒臣與汪直的

對決，在短時間內大逆轉，政局隨之徹底翻盤，汪直勢力更勝以往，儒臣亦不少附和者，而附者獲要職，不合者或退休或退縮。《明史·商輅傳》論道：「輅既去，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敢與抗者矣。」這當中最令人感慨的閣臣劉珝的變節，5月閣臣共疏罷西廠時，面對皇帝的嚴厲質問，他奮然泣下力挺商輅，事隔不久，他竟然投靠汪黨。《實錄》成化13年11月3日：「是時都御史王越、尚書尹旻及戴縉、吳綬皆為直心腹，而學士劉珝為越所誘，亦與直通，數人者凡有謀議直徑達於上，輒見施行，人皆畏懼。」此事實在令人不解，王越如何引誘劉珝，竟使之立場丕變，失節投奸，此中詳情已難追查。推想其因恐怕不在利誘而是威脅，蓋劉已至閣臣，與直通後，亦未獲重用，可見升官應非誘因。而劉珝最後被迫致仕，乃因有人投匿名文書，謂其私德敗壞。汪直本擅於搜羅情報，用以要脅官員，而劉珝乃其重要政敵，持其陰事以為把柄，恐嚇威脅乃至迫使投合，亦屬常情。要之，訊息即權力，秘密即資源，而權力讓人扭曲變心，秘密讓人失足失節。恐怖統治讓人失去自我。

明代政治到成化時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訊息的掌控與政治的操控密切結合，且複雜地糾結，而這也是人性的大考驗。明代士大夫由此進入一個波譎雲詭的政治舞台，其中謠言充斥，妖言時起，秘密暗傳，疑雲密布，陰謀羅織。稍有不慎即受傷失節。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明代中期的政治操作進入一個更為複雜的情勢，除了表面的主張論述與職權的分配外，如何掌控訊息更屬要義，在政治場合中，如何搜集、利用訊息，乃至加以詮釋，展開論述，或者編造羅織，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技藝。事實上，成化朝之後，王朝的政治鬥爭中，確實充斥各種「政治妖言」事件，常有人刻意製造傳播各種訊息，藉此刺激、牽動政治的發展。

《典故紀聞》中有載：「故事，章奏既得旨，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傳報，使知朝政。自成化時汪直用事，其黨千戶吳綬以為漏洩機密，請禁之。後之奸人恐不便己私，遂往往禁諸傳報者，然卒未有不傳，亦可笑矣。」余繼登這則筆記深具歷史感，點出一個歷史的關鍵：成化朝設立西廠意圖控制訊息，是一個歷史新局的開始，大明王朝的訊息掌控戰爭由此展開，往後正邪之間的鬥爭就反應在訊息的掌控上，禁制與流傳之間攻防不已。事實上，余繼登這則筆記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政治意義的訊息傳播，此記內容原本只該存諸內閣秘府，將它編成故事，或者宣之於口，或者寫成筆記，四處傳播，嚴格來講，已經干犯「妖言」之律。然而，明代士大夫乃至一般士人，卻多有熱衷於此類訊息傳播者，本文所引之筆記，如尹直、王鏊、黃榆諸人之所作，大抵可說都是有意而為，就是他們記述傳播讓「禁諸傳報者，然卒未有不傳」。這種刻意傳播朝政訊息，在某種角度上可以說正與「開言路」的理念相應合，也多少有意藉以譏笑嚴禁傳播者。此種特意傳播訊息的態度與風氣大抵是在明成化年間形成，往後則越演越烈，尤其在出版市場發達，印刷方便乃至有利可圖之明代後期，更明顯可見各種時事小說戲曲的大量出現，且對政治發生重要影響，對此訊息傳播與政治操作之發展溯本追源，成化朝妖人妖言之紛擾與因應，及往後複雜發展，可說正是傳播政治史的濫觴。

一般認為明朝之特務政治，始於太祖之設錦衣衛及成祖之設東廠，往後則延續此制，而受寵宦官乃藉此整肅異己。似乎廠衛乃一成不變之惡政，或因人而異為惡程度有差，然則，究竟此情治系統如何在政治場域發生、發展其發揮作用，其如何因應現實而變化，則多不甚了了。本文嘗試由訊息掌控角度切入，考察情治與政治之關係，由以上討論大抵可見，明朝自正統以來，政治情勢的發展實與訊息的掌控關係極度密切，尤其進入成化朝後，訊息的流動與掌控更是極度敏感地牽動政局的發展，皇帝委任親信建立情報偵察系統，且有意強力控制訊息的流通，儒臣群體則



傾向於傳播訊息，對之公開討論，藉以製造輿論，因此訊息的傳播與控制也成了不同權位者的角力，政治鬥爭的攻防要地，乃至可以說政治操作的重要戰場就在訊息的掌控上。這種政治操作與訊息傳播交相作用的情況，在明代中後期，繼續延續，且越演越烈，至萬曆時，更達到高峰，《憂危竝議》之類的妖書案的出現且成為政爭焦點可見一斑，至明末時，訊息傳播更與出版市場相結合，朝廷大事往往演成小說戲曲，在民間社會廣為流傳，乃至形成輿論，影響朝政。凡此種種蓋皆可見，訊息傳播與政治操作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且牽涉層面甚廣，內容更是複雜，詳細考察此中之複雜關係，將可對明代之政治發展有深入的認識，尤其對士大夫階層與宮廷勢力的博弈，乃至民間社會之如何參與國家大事，可以作更透徹的觀察。

日治時期檢閱及取次制度下《臺灣民報》的發行與流通 (1920-1932)

The Publishing and Circulation of the *Taiwan Minpao* under the System of Censorship and Agency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1920-1932)

莊勝全 Chuang Sheng-chuan

東吳大學歷史系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現任：東吳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文化史、日治時期臺灣報刊媒體史、臺灣日記研究。重要著作有：《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紅塵中有閒日月：1920年代黃旺成的社會觀察、政治參與及思想資源〉、〈在小廟修成正果：論廖添丁形象的塑造與轉變〉。

摘要

日治臺灣殖民地統治的媒體政策之確立，本乎於「兒玉—後藤體制」下，為了穩固統治而立下了規範新聞紙的基調，針對於島內發行的新聞紙採取須經臺灣總督同意的「許可主義」，迥異於日本內地施行的「屆出（報備）主義」。且為了防堵日本內地的發行報備制成為突破臺灣島內發行許可制的法律缺口，針對於島外發行的「移入紙」，再以「檢閱制度」與「取次制度」加以約束，即獲准許可在臺灣銷售的新聞報刊，必須在正式流通前納本審查，並透過總督府許可的取次人（特定經銷人）始得以販售。本文的目的即在於以標榜「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臺灣民報》系列報刊為個案，具體說明其從島外發行的移入紙，發展至成為島內唯一純臺灣人資本營運的日刊紙之歷史過程中，依循法律制度納本檢閱的始末，以及在取次制度下如何佈建銷售管道以流通的概況，並進而闡述殖民地的新聞紙法規對於《臺灣民報》內部的新聞編輯、社務經營制度與報導的影響力等諸般面向上，所產生的具體影響和歷史意義。

一、前言

每日（除日曜日）九點鐘以前，皆是工人與事務員出勤的時間，來往之人，非常擁擠。在此擁擠的車中，或坐的或立的，總有七折以上之人，手執新聞紙在那裏看，英人幾無一人不識字，幾無一人不讀新聞，故其國民皆略能洞悉世界大勢，比他國民較為進步，未始不是能讀新聞之賜也。故凡欲知其一國國民的智識程度之高低，試先查其能否讀新聞的人數之多寡，然後判斷其智識程度之高低，諒當不至大謬也。¹

1927年7月，林獻堂在為期一年餘的環球之旅途中，於倫敦的地鐵上發出如上的感嘆。他的觀察其實點出了當時殖民地臺灣在智識環境上的雙重困境，一方面，以實業教育為主軸的殖民地教育體制，不僅教育內容偏重較簡易的知識技能，各個階段的教育設施亦明顯不足，甚至連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都尚在籌設和辯論階段，因而臺灣民眾的識字率不高；²另一方面，在臺灣總督府嚴密的新聞紙統治政策與法律規範下，任何與統治者立場對立的報刊無法在島內取得發行許可，且對於在島外發行並欲輸入島內販售的途徑，也藉由檢閱體制嚴加防範，因而臺灣民眾可謂在重重的限制之下，才得以接觸到官方立場以外的報刊。林獻堂長期以來出資襄贊並擔任股東，同時也是他最早以〈環球遊記〉為名刊登其旅途見聞的媒介《臺灣民報》系列報刊，便是在如此背景下，打著「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旗號，企圖走出一條官方立場之外的言論渠道。然而橫亙在新聞言論與臺灣讀者之間的，則是殖民者所樹立專責書報審查的檢閱體制這道高牆。

相對於帝國日本與殖民地朝鮮在檢閱制度的研究上，已從近代國家的情報統制及言論控制的角度，闡釋「檢閱」、「統制」與文化的「再生產」之間的關係，並對於檢閱制度的擴張、搖擺與變動移轉，及其對於性別和身體觀的影響，乃至於與認同政治和宣傳之間的關係，抑或是檢閱制度對媒體環境及文學領域帶來的衝擊等，已積累出系列的研究成果，並展開跨國際、跨領域的交流討論，³殖民地臺灣有關檢閱制度的變遷及其歷史效應，以及殖民統治下媒體環境的探討等相關議題仍處於起步階段，並以河原功、鄭根埴與李承機著力較深。

河原功透過報紙、雜誌與出版品的取締法規《臺灣新聞紙令》（1917）與《臺灣出版規則》（1900），以及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所出版的《臺灣出版警察報》之分析，指陳臺灣所執行的檢閱體制看似與日本差異不大，然而實際執行的層面上則遠較嚴苛，並加上了層層的把關體制，藉以阻斷文學會培養與傳播「危險思想」的可能性；⁴鄭根埴以「檢閱標準」為參

1 林獻堂，〈環球遊記（十七）英國見聞錄〉，《臺灣民報》198（1928年3月4日），頁7。

2 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看台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於氏著，《台灣近代史研究》（新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149-175。

3 紅野謙介等編，《檢閱の帝国：文化の統制と再生産》（東京：新曜社，2014）。鈴木登美等編，《檢閱・メディア・文学：江戸から戦後まで》（東京：新曜社，2012）。紅野謙介，《檢閱と文学：1920年代の攻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9）。韓基亨著，陳允元譯，〈文化政治期的檢閱政策與殖民地媒體〉、〈近代詩歌的「不穩性」與殖民地檢閱—《諺文新聞詩歌》（1931年）之分析〉、〈「法域」與「文域」：帝國內部的表現力差異與殖民地文本〉，《台灣文學學報》21（2012年12月），頁173-204、205-226、227-250。

4 河原功，〈日治時期台灣「審查」的實際狀況〉，收於氏著，張文薰、林蔚儒、鄒易儒譯，《被擺布的台灣文學：審查與抵抗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頁261-311。另見河原功，〈三省堂與台灣一戰前台灣日本書籍流通〉，收於氏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臺北：全華圖書，2004），頁239-242。河原功，〈解說『臺灣出版警察報』〉，收於《『臺灣出版警察報』解說・發禁圖書新聞リスト》（東京：不二出版，2001），頁5-24。

照基準，考察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圖書課所出版的《新聞紙要覽》、《新聞紙出版物要項》、《朝鮮出版物概要》等出版警察年報的刊物，及長年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安全課圖書檢閱室任職的鈴木清一郎所著《臺灣出版關係法令釋義》，說明 1920 年代至戰爭爆發前，朝鮮與臺灣檢閱標準的變化，再與日本的《出版警察概觀》進行比較後，指陳採「申告主義」的日本與採「許可主義」的朝鮮與臺灣，表面上就檢閱基準而言似乎無法比較，然而實際上日本內部標準的變化卻能反映在殖民地檢閱的「禁止標準」的確立過程上，而呈現體系化與帝國化；⁵ 李承機則是在系列探究殖民地臺灣的媒體發展史時，細緻地追溯臺灣媒體政策與檢閱法規，之所以在「兒玉一後藤體制」下奠基確立的歷史背景，也進一步比較了在日本與臺灣所執行的新聞紙取締法令的差異，除了「申告主義」與「許可主義」寬嚴有別的精神外，關於印刷報刊禁止販售的取締，殖民地臺灣在手段上無疑是走在帝國之前，當日本的《新聞紙條例》（1897）尚採取曠日廢時的「司法處分」時，臺灣無論是《臺灣新聞紙條例》（1900）或《臺灣新聞紙令》，早已率先採取由臺灣總督雷厲風行的「行政處分」，而日本須到重新頒訂《新聞紙法》（1909）時，才改由內務大臣裁示行政處分。⁶

惟上述研究雖然透過法律架構及行政手段，細緻描繪了檢閱制度的輪廓，然而有關檢閱具體執行的歷史過程，以及以臺灣為主要銷售市場的報刊在面對檢閱的重重難關時，所採行的應對策略與作為，甚至檢閱體制所架構的出來的媒體環境對於殖民地報刊的具體影響，仍無法清楚交代而留下許多進一步探究的空間。職是之故，本文擬以 1920 至 1930 年代政治社會運動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臺灣民報》為具體個案，嘗試說明立場對立的統治者與殖民地報刊，依著檢閱體制展開媒體攻防的具體過程和歷史意義。

二、「移入紙」時期的檢閱攻防

（一）《臺灣青年》與《臺灣》時期：「發賣頒布禁止」的高壓檢閱

日治臺灣殖民地體制的媒體政策之確立，本乎於「兒玉一後藤體制」下，為了穩固統治而立下了規範新聞紙的基調，即扶植以《臺灣日日新報》為首的「御用報紙」來主導新聞言論，並在 1900 年以律令第三號發布施行比日本內地統治色彩更加鮮明的《臺灣新聞紙條例》，其主要的精神在於無論是島內發行或自島外輸入的報刊，都必須要在發行前通過檢閱始得以流通，且一旦未通過檢閱，臺灣總督即可下達禁止販售的行政命令。1917 年，臺灣總督府再以律令第二號頒行《臺灣新聞紙令》，惟兩者的基本精神並無二致，只是更以「取次人許可制度」加強對境外輸入的「移入紙」的限制。與日本 1897 年的《新聞紙條例》及 1909 年的《新聞紙法》相較，《臺灣新聞紙令》的特異性在於：其一，島內發行新聞紙採須經臺灣總督同意的許可制，而非日本的申請制。其二，對於島外發行的新聞紙有移入限制，未取得取次人（特定經銷人）許可的報刊，不得在島內販售。其三，新聞紙必須在發行前納本審查，較日本發行時同時納本審查要更加嚴苛。其四，臺灣總督

5 鄭根埴著，金泰植譯，〈殖民地檢閱と「檢閱標準」〉，收於紅野謙介等編，《檢閱の帝国：文化の統制と再生産》，頁 16-39。

6 李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殖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頁 21-40。

具有禁止新聞紙登載外交、軍事及其他秘密事項之權。⁷

《臺灣民報》（以下簡稱《民報》）最早的前身，即 1920 年 7 月於東京發軔的《臺灣青年》，自然要被以「移入紙」的身分，去符應《臺灣新聞紙令》之規定，始能與臺灣的讀者見面。首先，必須依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島外發行之新聞紙欲在島內以發售頒布為目的，須獲得臺灣總督之准許，因而《臺灣青年》於 8 月 13 日以蔡培火擔任發行人之名義，成為總督田健治郎許可之移入紙。⁸ 其次，再依第六條規定，發行人在新聞紙發行前，向所轄官廳繳納壹千圓的保證金，臺灣青年雜誌社最初僅募得三千圓的資金，扣除壹千圓的保證金，可充作流通資本的僅存兩千圓，約運作三個月的經費。⁹ 後續，又依第十條規定，發行人在每期新聞紙發行前，須繳納兩份予臺灣總督府，及各繳納一份予所轄州廳及管轄地方法院檢查局，即所謂的「納本」。相對於日本新聞紙法第十一條「與新聞紙發行之同時，繳納兩份予內務省，各一份予管轄地方官廳、地方裁判所檢事局及區裁判所檢事局」的規定，臺灣總督府所擁有的「檢閱時間」，無疑是殖民政府祭出「發賣頒布禁止」，甚至必要時執行「差押（查封）處分命令」之利器。這也使得《臺灣青年》、《臺灣》與《民報》在身為移入紙的時期，必須經歷雙重檢閱—在東京已經檢查而准許發售者，一旦移入臺灣又要重新受審查，非經審查通過不准發行—始得以販售流通。¹⁰

媒體的容許與檢閱的強化，乃一體兩面的連動關係，¹¹《臺灣青年》在發刊四個月後（第 1 卷第 4 期），即迎來頭一回的「發賣頒布禁止」，然而被禁止的原因不明。¹² 未及半載，第 2 卷第 3 期又被以些許辭句不妥而停止在臺發售：

讀者諸君鈞鑑：本誌第二卷第三號，於客月二十九日，不幸以些少辭句之關係，又為當局所禁，不得踐約頒布，大負在臺各位之尊望，本社諸同人，殊深抱歉。然于每號編輯則極苦心，務以平和堅實為主旨，蓋係有鑒於我島之現狀耳。而同胞中多責本社無骨氣，疊載無心之論，豈料刊行只九閱月，禁命已兩下已，本社苦衷之所在，惟祈賢察垂諒之焉。茲僅將第三號改訂，再添「請設臺灣議會之管見」、「關於法律第卅一號改正案之議論」兩文附版，當作四月之號。敬此奉聞，即請春安。¹³

針對第二次查禁，雜誌社採取的應對措施為將全部內容重新登載，並增添〈臺灣議會設置請願に關する管見〉、〈玉山俱樂部の創設〉、〈請設置臺灣議會之管見〉、〈關於法律第卅一號改正案之議論〉四篇新文章為「訂正版」。揆諸被禁原版與訂正版之內容，為當局所忌者乃石如恆與石煥長各以〈新論語〉及〈新大學〉為題，諷刺 1921 年 1 月帝國議會將三一法改正為法三號，

7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27-40。鈴木清一郎，〈臺灣出版關係法令釋義〉（臺北：杉田書店，1937），頁 3-6。

8 〈告示〉，《府報》2790（1920 年 8 月 13 日），頁 47。

9 蔡培火，〈創業五週年和發刊壹萬部所感〉，《臺灣民報》67（1925 年 8 月 26 日），頁 39。

10 鈴木清一郎，〈臺灣出版關係法令釋義〉，頁 54-55。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吳三連、葉榮鐘合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 360。

11 韓基亨著，陳允元譯，〈文化政治期的檢閱政策與殖民地媒體〉，頁 182-187。韓基亨於文中也指出日本通過媒體讓殖民地人民進行近代自我的確認，同時藉由媒體來抑制過渡自覺到的現實，此即檢閱體制所帶來的雙重矛盾。而被殖民地媒體也會對檢閱體制進行反擊，針對其不當性進行攻擊。

12 〈社告〉，《臺灣青年》3：6（1921 年 12 月 15 日），無頁碼。

13 〈社告〉，《臺灣青年》2：3 訂正版（1921 年 4 月 15 日），無頁碼。

而引發「六三問題」的議論。如〈新論語〉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臺謀。而不忠乎。與六三戰。而不勇乎。行不健乎。」〈新大學備旨〉「盖日本天皇陛下。為國之元首。對法律制定上。不過僅具有裁可權而已。尚不得已天皇之意思。而獨自制定法律。而總督之權限。更在天皇之上。反有制定律令。以代法律之權。不亦奇乎。」兩者在訂正版被刪改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臺謀。而不忠乎。○○○○。而不勇乎。行不健乎。」〈新大學備旨〉「盖日本天皇陛下。為國之元首。對法律制定上。不過僅具有裁可權而已。尚不得已天皇之意思。而獨自制定法律。而○○之權限。更在○○之上。反有制定律令。以代法律之權。不亦奇乎。」¹⁴ 面對臺灣總督府之查禁，臺灣青年雜誌社的做法並非將被認為有不妥辭句的文章撤掉，而是把遭檢閱的文字挖空，仍舊全文照刊，留待各界公評。

此舉好似點燃衝突的引信一般，《臺灣青年》與總督府檢閱制度在 1921 年下半年全面開戰，自 9 月至 12 月接連四期（第 3 卷第 3 期至第 6 期），接連被處禁止在臺販售或刪除內容（不只挖字而是整段塗黑）後方得以發售，這一連串的阻礙促使當時「雜誌社唯一的保護者」東京臺灣青年會，於 12 月發表一篇〈決議文〉，決議「反對臺灣當局之過酷壓迫民論，以要求島民之立憲的言論自由」、「最近數次臺灣當局之處置臺灣青年雜誌，認為不當」，理由為：

於茲吾等在京之臺灣青年，感時代之推移，鑑帝國之地位，顧臺灣島內言論閉塞、民心萎縮，自知職責之重且大。蒙內地臺灣諸有識人士之同情及援助之下，昨年在東京始刊臺灣青年雜誌，欲以促進臺灣文化之向上及表明公正之民意，冀或為當局施政參考之資。不料臺灣當局不諒吾人之忱，屢加不當之取締，殊如最近九月、十月、十一月所發行之雜誌，曾經內務省及在京臺灣總督府出張所檢閱清楚，許以發賣頒布，不料一到臺灣，而臺灣當局復又禁止其全部，或截取其一部，以壓迫吾人之正當言論。此雖只關於一雜誌，若因此致文化有遲滯、使臺灣臨於闇黑之狀，是不但一般島民所不能忍，為臺灣前途計，吾人決不能默過者也。是以本會於臨時總會，以滿場一致決議前記之件。¹⁵

東京臺灣青年會的運作，確實讓東京中央政界對於臺灣總督府在言論上的過份干涉提出質疑。1922 年 1 月，總督田健治郎接到眾議院要求出席議會的電話，而趕赴議場接受無黨籍議員安藤正純之質詢：

臨議場，安藤正純（無所屬代議士）標榜思想問題，蕩蕩論難言論壓迫之不當，遂論及新領地新聞取締，頻批難新聞紙許可之制限及《臺灣青年》雜誌發賣停止之嚴酷。高橋首相為大體答辨〔辯〕之後，予登壇說明新領土與內地文化智識，尚未免有大逕庭。去年以法律第三號設置立法的特別法制，為之也，從而行政上取締，又不得與內地同一，新聞紙實行認可主義而制限之，亦當然之歸結也。到青年誌，近來頗傾過激，而臺灣以為新附之民之故，苟言之涉慫恿離叛本國（一）、離間內地人與臺灣人（二）、急激使動搖臺灣民心（三）之意趣者，斷不許移入之於臺灣也。若夫到現今臺灣有識階級，大部分其思想概在尊奉孔孟之教，以忠

14 石如恆、石煥長，〈新論語〉、〈新大學〉，《臺灣青年》2：3（1921年3月26日），「漢文之部」頁29-34。石如恆、石煥長，〈新論語〉、〈新大學〉，《臺灣青年》2：3訂正版，「漢文之部」頁39-45。

15 〈決議文〉，《臺灣青年》3：6，和文之部頁47-48。

孝仁義為道德最高標準。對之，急激欲注入共產主義、公妻主義、階級打破主義，其攪亂民心、破壞秩序之虞頗大矣，予斷然不可不採其防遏手段也云云。¹⁶

《臺灣青年》也特別以〈衆議院思想政策之質問〉為題，轉錄《官報》號外上所記錄的議會質詢及答辯內容。然而無論是刊登東京臺灣青年會的〈決議文〉，或是議會質詢內容的號次，最後在臺灣均遭判處發賣頒布禁止。¹⁷ 由此可見總督府態度之強硬，而從田總督的發言亦未見有絲毫退讓之意。

1922年4月改名為《臺灣》後，1923年3月號為了宣揚第三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而在內容上特別配合宣傳，歌詞歌譜、實況寫真照片、報導、政論等各色文類齊發，因而再度引來總督府嚴厲檢閱並禁止販售，包括〈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歌〉、〈第三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安部磯雄、衫森孝次郎、佐野學三位早稻田大學教授對議會設置運動的評論，以及雲洲生批評戶稅、保甲與嘉南大圳的文章，都在被禁之列。因而在東京的臺灣青年學生聚集召開「在京臺灣人大會」，並再度做成〈決議文〉拜訪首相，再將「臺灣禁止號」化為「內地宣傳號」，贈呈千餘名朝野人士與各新聞雜誌社以為宣傳，因而在東京青年間熱賣。¹⁸

此後《臺灣》尚有第4年第7號、第8號接連兩期被禁止，惟理由不明，而震災後復刊的第5年第1號中布施辰治〈臺灣統治所感〉一文，也無法在臺灣發表。¹⁹ 總計1920年至1924年間共計出版38期之《臺灣青年》與《臺灣》中，遭臺灣總督府檢閱後禁止發售與刪改內容的號次便達12次，可見《民報》系列報刊的問世，確實讓臺灣總督府的殖民地媒體管控政策如臨大敵。²⁰

面對總督府一連串高壓粗暴的檢閱手段，雜誌社也試圖運用諸般手段展開反擊。首先，即如上述透過東京臺灣青年會與在京臺灣人大會等團體，以政治管道尋求中央政界向總督府質問與施壓。其次，不斷測試檢閱的底線與標準，並試圖反將一軍。除了將被禁止販售該期的內容，在後續期號再度刊載，而遭刪塗的部分亦予以完整呈現，如《臺灣青年》第3卷第6期的〈卷頭辭〉，便細數自第3期被禁止發行後，社內如何與總督府交手的過程：

特別奇怪的是，關於漢文部之論文題目〈就臺灣文化協會而言〉的取締。該論文曾揭載於第三卷第三號，第三號被禁止發表時，吾人曾質問當局遭致禁止原因之論文為何，當局曾說是關於臺灣教育的根本主張及其他二題。即漢文部的論文〈就臺灣文化協會而言〉與禁止發表無關，於是再刊於第四號。但意外地，臺灣當局卻對本社表示，該文〈就臺灣文化協會而言〉

16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頁458-459。

17 記者，〈衆議院思想政策之質問〉，《臺灣青年》4：2（1922年2月15日），漢文之部頁24-34。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120-121。

18 〈編輯室〉，《臺灣》4：4（1923年4月10日），和文之部頁82。〈編輯餘話〉，《臺灣民報》1：1（1923年4月15日），頁30。

19 〈編輯後記〉，《臺灣》4：8（1923年8月20日），頁100。〈編輯後記〉，《臺灣》5：2（1924年5月10日），頁100。〈編輯餘話〉，《臺灣民報》1：5（1923年8月1日），頁16。〈編輯後記〉，《臺灣民報》1：8（1923年10月15日），頁32。

20 針對「發賣頒布禁止」與「記事削除」的《臺灣青年》與《臺灣》之內容，李承機已整理出一份詳實之表格，見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120。不過當中只列出10筆，而未將《臺灣青年》第2卷3號訂正版中被挖空註銷的內容納入，第5年第1號《臺灣》布施辰治被禁止刊登的文章亦未列出。

不可刊載，而被命割捨。其後，該論曾投稿《臺南新報》與《臺灣新聞》，兩報紙俱見揭載。如此看來總督府當局的取締，可謂為前後矛盾，自家撞著太甚，對本社的態度又豈非太過感情化？吾人篤求當局的反省。²¹

復次，尋求與東亞各民族留學生與知識人共組言論戰線。1922年5月，由朝鮮知識分子柳泰慶於東京所創辦，標榜「人類主義」並雜揉中文、日文、韓文的月刊《亞細亞公論》問世，在創刊號上不僅刊登臺灣青年雜誌社主幹蔡培火的〈極東の平和果して如何〉，及林呈祿主筆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另有一篇署名「臺灣青年」的文章〈臺灣に於ける言論壓迫を内地朝野諸賢に訴ふ〉，娓娓道出《臺灣青年》所遭逢雙重檢閱的困境、臺灣當局言論壓迫的苛酷，與御用新聞的言論偏見與離間報導，也將前引〈就臺灣文化協會而言〉一文如何歷經檢閱後由通過變為查禁，卻又得以刊登在親官方立場的《臺灣新聞》上《臺南新報》上，凸顯檢閱體制的反覆性與矛盾性的交鋒過程，詳盡訴諸於殖民地朝鮮與東亞知識圈。²²

最後，雜誌社內部為了通過檢閱，亦建立出一套自創的初審機制，《臺灣青年》第3卷第6期的〈卷頭辭〉亦同時言及其流程：

本社的發刊《臺灣青年》雜誌，與普通的雜誌經營有異，甚為困難。《臺灣青年》不只經內務省檢閱，欲發送給臺灣的讀者諸賢，更必須經總督府當局的嚴格檢閱。關門多重，發刊誠不自由。第三卷第三號遭發表禁止之後，本社嚴格審查原稿，若認定苟為總督府當局所不喜者，悉數除卻，另一方面，還經東京的總督府出張所檢閱一次後，才開始印刷，在可能範圍內盡力做到赤誠與最善，雖然如此，當局卻是更加嚴格取締，如第四號、第五號尚且禁止其中的一部分，本社苦衷，仰賴諸位賢察。

意即在付梓前，先經社內名為「原稿審查會」的機關，採行舉世罕見的「合議制編輯法」商議選出合適的原稿，²³再送交總督府出張所初審後，才會交付印刷，而後才正式歷經內務省與總督府之檢閱。換言之，《臺灣青年》與《臺灣》在出刊前，不只經歷官方的雙重檢閱，而實為一道重層檢閱的過程。

（二）《臺灣民報》時期：「檢閱未了」下的細緻檢閱

1923年4月，臺灣雜誌社決定於政論性質為主的《臺灣》之外，增刊時事報導取向的《臺灣民報》。但由於《民報》不似《臺灣》乃直接由《臺灣青年》改題而成，須再次循「移入紙」的法規，取得臺灣總督之許可後始得以在臺販售流通。²⁴而《民報》發刊初期在檢閱上，同樣獲得總督府不友善的對待，1923年度第1卷共發行14號，當中有3號（第1卷第4、6、9號）被處發賣禁止，

21 〈卷頭辭〉，《臺灣青年》3:6，和文之部頁1。內容為日文，此處中譯參閱自吳密察、吳瑞雲編譯，《臺灣民報社論》（臺北：稻鄉出版社，1992），頁29-30。

22 臺灣青年，〈臺灣に於ける言論壓迫を内地朝野諸賢に訴ふ〉，《亞細亞公論》創刊號（1922年5月1日），頁76-81。

23 蔡培火，〈創業五週年和發刊壹萬部所感〉，《臺灣民報》67，頁39。〈編輯室〉，《臺灣》3:2（1922年5月11日），和文之部頁71。

24 《府報》2647（1922年5月6日），頁21。《府報》2933（1923年5月4日），頁15。然而《臺灣》在1923年9月的東京大地震後曾一度停刊，因而1924年4月復刊時，欲在臺重新發售就必須再取得總督許可。見《府報》3220（1924年4月29日），頁114。

²⁵ 頻率仍高：

歲暮已經到了。本報自四月十五日發刊以來，至本號計共有十四號，內在台灣被發賣禁止有三號，而在內地皆全部通過，居內地及中國的讀者，已經全部配付了。然在台灣只可配付十一號而已。論內中的記事關於文化很多，而批評現政治的記事甚少，同人雖十分注意編輯，還未得當局的諒解，報裡內容實在是貧弱，辜負讀者諸君的盛情很多，祈為見諒。²⁶

值得注意的是，自 1924 年起至移臺發行為止，除了第 2 卷第 2 號曾被處以發賣禁止之外，²⁷ 此般粗暴的檢閱手段再不復見，取而代之的，為只要將各號檢閱未通過的文章或報導刪除，便能流通販售無虞。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與下述兩個原因有關。一者，社內特別為了應付總督府的檢閱制度而成立的「原稿審查會」效果十分有限，縱使透過「合議制編輯法」在編輯上小心再小心，仍然無法順利通過審查，還得付出讓刊登品質相對貧弱的代價。且每月一次將審查委員聚集討論的編輯方式，²⁸ 在月刊時期《臺灣青年》與《臺灣》尚且可行，然而對出刊週期縮短為半月刊、旬刊甚至週刊的《民報》而言，無疑緩不濟急。又加上治警事件後，臺灣雜誌社內部已有停刊《臺灣》、專心經營《民報》之討論，1924 年 5 月《臺灣》確定停刊後，遂將編輯部由東京本社移轉至臺灣支局，在臺灣編輯完成後，再寄往東京印刷。因而此前由原稿審查會編輯後又送往總督府出張所初審的作法，轉往臺灣編輯後實可直接與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溝通交流，無須再間接「揣摩上意」，使得檢閱通過率得以提高。

二者，是政治氛圍的轉變。自《臺灣青年》創刊至《民報》第二卷發行治警事件第一審公判特別號前，是由對殖民地統治採取較高壓手段的政友會出身之田健治郎與內田嘉吉擔任總督，因而不僅在政治運動上爆發治警事件的大規模搜捕行動，在言論與媒體的管控上，更是將認可主義發揮到極致，一經檢閱後認為對攪亂民心、破壞秩序有影響的《民報》系列報刊內容，不惜祭出發賣頒布禁止的手段。這樣的情勢要待較重視民意的加藤高明內閣成立，並由憲政會系的伊澤多喜男接任總督後才轉為和緩，《民報》亦在此後疾呼言論自由的善政，要求將許可主義改為申報主義，移臺發行的申請也露出曙光。

一如林呈祿於 1924 年 12 月前往總督府出張所拜訪伊澤總督「陳述從前言論取締之過酷、地方自治之缺點、內臺人不融合之病因」，伊澤的回應為：

你們若有關於過去施政上缺點之實例，儘可隨時指摘，以供予為參考，至於此去予之各般施政，由你們觀察，若認為善政可取之處，望你們不吝筆舌報道，使一般民眾周知，若認為不善要改革之處，亦不妨用筆舌批評警告，以供當局為參考。²⁹

25 〈編輯餘話〉，《臺灣民報》1：5（1923 年 8 月 1 日），頁 16。〈編輯餘話〉，《臺灣民報》1：7（1923 年 9 月 1 日），頁 16。〈編輯餘話〉，《臺灣民報》1：8（1923 年 10 月 15 日），頁 20。〈編輯餘話〉，《臺灣民報》1：11（1923 年 11 月 21 日），頁 10。

26 〈編輯餘話〉，《臺灣民報》1：14（1923 年 12 月 21 日），頁 10。

27 〈編輯餘話〉，《臺灣民報》2：4（1924 年 3 月 11 日），頁 16。

28 蔡培火，〈創業五週年和發刊壹萬部所感〉，《臺灣民報》67，頁 39。

29 〈編輯餘話〉，《臺灣民報》3：1，頁 22。

伊澤以如是的施政與言論取締之基本態度，取代此前高壓對抗的檢閱方法。是以在 1925 年 9 月，林呈祿再度前往出張所拜會總督時，伊澤一開口就道「聽說你們臺灣民報近來很好了」，並進一步提出：

臺灣民報所登載的種々不平記事大体我也信是有事實的，很可給我們做參考，但是只載壞話一方面，也不是你們的公平作法，所以若有好事的材料，也希望你們一並登載出來，一來可表明你們公平報導，二來也可獎勵世人做些好事。³⁰

於如此言論控管的方針下，1926 年 7 月上山滿之進接任總督時，亦言「我的治臺方針是政策不變人事不動」，延長伊澤時代的基本原則，³¹ 此實為及至移臺發行前，全冊禁止販售流通的處分方式全然被摒除之主因。

即令如此，卻不表示《民報》的發行與流通得以一帆風順。一方面，總督府的檢閱制度仍持續運作，檢閱未過的文字雖不至於整號被禁止發行，卻會將「不穩」的頁面給裁去，「因此而其背面無受禁止之文，也被牽連截去」，導致內容七零八落。然而諸如此類的問題尚無傷大雅，運用附錄等方式便可將受牽連的部分再傳達給讀者。³² 另一方面，總督府不再粗暴地運用檢閱機制，而是反其道而行，對於受審內容採取細緻檢閱，反而對於《民報》在販售流通上造成莫大阻礙。這個困擾約莫開始浮現於「創立五週年、發行一萬部」紀念號（第 67 號）發行期間，原本預計在 7 月 16 日發行的五週年紀念號，由於投稿過多、印刷能力有限已將發行日移至 8 月下旬，未料又耗費十九日於檢閱過程上，因而真正發送到臺灣讀者手上，已遲至 10 月中旬。³³ 而這個檢閱日程還不是歷時最久的一次，尚有費時二十一日（第 74、80 號）、二十六日（第 81 號），甚至長達三十餘日者（第 82 號）。對於總督府使出這樣的手段，報社只能對臺灣讀者致歉並傾吐苦水：

我們民報在東京是每禮拜日定期發行、決無延誤的，而送至臺灣支局最遲也不過是緩一週日而已，因何送至臺灣讀者諸君之處，雖最快的也要經過半個多月，其中甚而有緩至月餘者，這全是因為臺灣官憲藉「檢閱未了」為名，而阻止我民報發送的緣故所致的。唉！此中苦無可言，真是現代世界文明人所百思而不得其一解的奇怪現象了。我島內同胞諸君處在此特別的天地，徒作明目之盲、聰耳之聾，視東京遠若歐美，聽民聲遙比天外，我們在京的民報子，對於同胞的如此黑闇境遇，真不得不抱無量的歎氣！擁無限的傷心！³⁴

而針對總督府以「檢閱未了」為名而擾亂《民報》發售的狀況，報社亦曾派遣記者（應為林呈祿）赴出張所質問伊澤總督：

30 〈編輯餘話〉，《臺灣民報》73（1925 年 10 月 4 日），頁 16。

31 〈餘錄〉，《臺灣民報》115（1926 年 7 月 25 日），頁 16。

32 〈餘錄〉，《臺灣民報》102（1926 年 4 月 25 日），頁 16。

33 〈特別啟事〉，《臺灣民報》64（1925 年 8 月 9 日），頁 16。〈編輯餘話〉，《臺灣民報》74（1925 年 10 月 11 日），頁 16。

34 〈社告〉，《臺灣民報》88（1926 年 1 月 17 日），頁 16。另可見〈編輯餘話〉，《臺灣民報》79（1925 年 11 月 15 日），頁 16。據蔡培火等人之回憶，耗時最久的檢閱記錄更長達 44 天，見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吳三連、葉榮鐘合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 554。

至責問為何阻止民報一個多月才准發賣的理由，他也不知其故，只認不是而已。他倒反問記者說，「警務局有對你們說什麼理由？」唉！真是尾大不掉。但他有叮嚀一句說「我的部下很多，却不能保其中沒有抱謬見的人，總是對於有做錯誤的部下，也不是可以任意就罷免其職的，你們要直諒解這點才是」忙裡的閒談一點半多鐘，結局也不過如此如此。³⁵

此回溝通的結果無疑是令人失望的，因而也無法實質解決「檢閱未了」所帶來的問題。事實上，此後直到移臺發行前，《民報》超過發行日一週以上才得以發售配送的情況仍時有所聞。³⁶

在伊澤多喜男與上山滿之進兩位總督任內，雖然停止了田健治郎和內田嘉吉前兩任文官總督所施行的強硬檢閱方法，然而在看似言路大開的背後，卻另透過細緻的檢閱並以「檢閱未了」的方式來阻撓《民報》的發送節奏，既不指摘應予以塗銷的部分，亦不予放行，令致讀者同樣無法準確、即時地更新與掌握島內的「新聞」及「輿情」，藉以限縮《民報》實際的社會影響力，因而兩者在目的上並無二致，差別只在於手腕上剛柔有別。

三、移臺發行之後：「標準檢閱」下的「自我檢閱」

在移入紙時雖然有雙重檢閱、跨海銷售等限制，以致於在臺灣的發售時間常常無法與發行時間一致等不便之處，卻因為各號次經內務省檢閱後，得以先行於日本販售完整的版本，因而縱使在臺灣未經過總督府檢閱而遭停售或塗銷內容，目前都還可以回頭查覆被禁止的內容。然而這一點在雙重檢閱體制下意外獲得的些許「好處」，在 1927 年 7 月《民報》獲准得以直接在臺灣島內發行後便無以為繼，在直接經由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的檢閱後才得以發行的情況下，要追索遭「開天窗」內容無疑困難重重。

於此方面，正如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圖書課為了避免沒有標準化的「不穩性」而削弱檢閱的客觀性，藉由《諺文新聞詩歌》的編訂豎立殖民地詩歌文學之「檢閱標準」，³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亦進行了《臺灣出版警察報》的編纂，訂立出版物與新聞紙的檢閱標準與記錄，而得以追溯出一些《民報》被禁止報導的內容。據〈臺灣新聞紙令〉第 14 條規定，島內外發行的新聞紙或移入紙揭載的內容若有紊亂安寧秩序與妨害風俗之處，臺灣總督得以下達禁止發賣頒布、對發行人戒告、發行許可取消與發行停止的行政處分，因而《臺灣出版警察報》的檢閱內容據此分為「安寧之部」與「風俗之部」兩部分。又 1931 年至 1937 年曾實際於警務局保安課從事圖書檢閱的鈴木清一郎指出，由於法規有關檢閱標準的說明僅單純用紊亂安寧秩序與敗壞風俗的字眼，因而除了褻瀆皇室的尊嚴國體的新聞內容是絕對禁止之外，其餘內容並沒有明確特定的檢閱標準，而是由總督依著不同的民族、政治組織及社會情勢的變化，對新聞報導的效果及影響力進行評估，其界線無疑是變動不居的。³⁸

由目前所得見 1930 年 1 月至 1932 年 6 月，共計 30 號（第 6 至 35 號）的《臺灣出版警察報》

35 〈餘錄〉，《臺灣民報》99（1926 年 4 月 4 日），頁 16。

36 如 1926 年 9 月 12 日發行的「二林事件公判號」（第 122 號），也是在發刊日三個星期後才發送。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 341。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頁 24、92、212、227。

37 韓基亨著，陳允元譯，〈近代詩歌的「不穩性」與殖民地檢閱—《諺文新聞詩歌》（1931 年）之分析〉，頁 211。

38 鈴木清一郎，《臺灣出版關係法令釋義》，頁 101-106。

之檢閱內容觀之，《民報》與《新民報》的發行已無「檢閱未了」的干預，報社通常會在發行前二至三日將納本送審，而警務局保安課通常會在發行前一天，或最遲在發行當天完成檢閱。在這段期間，《民報》與《新民報》遭檢閱的部分均屬「安寧之部」之範疇，相關內容如下表所示：

表 1 《臺灣出版警察報》中《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檢閱一覽表

| 號次 | 發行日期 | 禁止日期 | 檢閱內容 | 禁止方式 |
|------------|------------|------------|---|--------|
| 《民報》第292號 | 1929.12.22 | 1929.12.21 | 〈台灣新進婦人への公開狀〉 | 發賣頒布禁止 |
| 《民報》第295號 | 1930.1.11 | 1930.1.10 | 「關於阿片再特許反對記事」之社說與報導數處 | 發賣頒布禁止 |
| 《民報》第296號 | 1930.1.18 | 1930.1.17 | 〈全印度国民会議決議完全独立〉 〈英帝國統治下の印度人の反抗事件〉 〈完全な独立へ全印国民会議の努力〉 | 發賣頒布禁止 |
| 《民報》第300號 | 1930.2.15 | 1930.2.15 | 不詳 | 發賣頒布禁止 |
| 《新民報》第306號 | 1930.3.29 | 1930.3.28 | 〈教員の俸給引下就職寵兒よ早く醒める〉 | 發賣頒布禁止 |
| 《新民報》第311號 | 1930.5.3 | 1930.5.3 | 〈フィリッピン独立運動概觀〉 | 發賣頒布禁止 |
| 《新民報》第314號 | 1930.5.24 | 1930.5.24 | 不詳 | 發賣頒布禁止 |
| 《新民報》第315號 | 1930.5.31 | 1930.5.30 | 不詳 | 發賣頒布禁止 |
| 《新民報》第318號 | 1930.6.21 | 1930.6.20 | 廢止始政紀念日相關報導 | 發賣頒布禁止 |
| 《新民報》第321號 | 1930.7.12 | 1930.7.12 | 〈民衆党の評議会反対聲明書を各方面に發送して反対表示〉 | 發賣頒布禁止 |
| 《新民報》第324號 | 1930.8.2 | 1930.8.2 | 社說〈内地本位的産業調査会〉 | 發賣頒布禁止 |
| 《新民報》第327號 | 1930.8.23 | 1930.8.23 | 〈熟睡中刑事入室嘍喲一声立即變化云云〉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宣言〉中三處字句 | 說諭注意警告 |
| 《新民報》第332號 | 1930.9.27 | 1930.9.27 | 〈流离曲〉 | 說諭注意警告 |
| 《新民報》第334號 | 1930.10.11 | 1930.10.11 | 〈吾等のこころ誰か知る〉 〈赤炭流彈〉一部分 | 說諭注意警告 |
| 《新民報》第336號 | 1930.10.25 | 1930.10.25 | 〈台湾人の現状〉一部分 〈寄問故郷〉 | 說諭注意警告 |
| 《新民報》第338號 | 1930.11.8 | 1930.11.8 | 霧社事件相關報導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339號 | 1930.11.15 | 1930.11.15 | 霧社事件相關報導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340號 | 1930.11.22 | 1930.11.22 | 霧社事件相關報導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342號 | 1930.12.6 | 1930.12.6 | 四處削除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343號 | 1930.12.13 | 1930.12.13 | 五處削除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344號 | 1930.12.20 | 1930.12.20 | 二處削除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346號 | 1931.1.10 | 1931.1.10 | 〈失業者にパンを與へえろ〉一部分 〈霧社事件を何と見る？〉一部分 〈殺人犯昇給か〉 〈此の不景氣に此の苛政を見る〉一部分 | 下刷檢閱 |



| | | | | |
|------------|-----------|-----------|--|------|
| | | | 〈參謀總長來台〉 〈滅らず口〉一部分 | |
| 《新民報》第347號 | 1931.1.17 | 1931.1.17 | 〈霧社事件を何と見る?〉一部分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48號 | 1931.1.24 | 1931.1.24 | 〈小言〉「總督御迎の受負者」 〈文協的領袖林張二君的奇禍〉一部分 〈冷語〉二處削除 〈滅らず口〉一部分 〈拷問水責の方法で犯人を製造する警察〉一部分 〈官憲と共謀か白晝に森林盜伐〉一部分 〈霧社事件を何と見る?〉一部分 〈民衆黨の綱領修改案〉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49號 | 1931.1.31 | 1931.1.31 | 〈愚民政策敢行苗栗郡下公學校の學級減少を企てる〉一部分 〈巡查四人からで苦力を毆打する〉一部分 〈霧社事件を何と見る?〉一部分 社説〈新總督蒞任 我們已見慣 官憲送留多忙〉一部分 〈台南警察界的疑獄〉 〈赤崁流彈〉一部分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50號 | 1931.2.7 | 1931.2.7 | 社説〈治台の根本義は究竟那邊に在るか〉 〈中洲噴水〉一部分 〈中国駐台的袁副領事到任〉一部分 〈苦力毆打事件警察側の揉消運動〉一部分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51號 | 1931.2.14 | 1931.2.14 | 〈會社と職工の爭議に警察が職工を大檢擧〉一部分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52號 | 1931.2.21 | 1931.2.21 | 〈小言〉「自由乎死乎」 〈オフセットの爭議的「聲明書」〉 〈難産だつた地主會が誕生す〉一部分 〈榮座の擬國會〉一部分 〈高砂寮問題に就き〉 〈紙上議會〉一部分 〈警察官吏の暴行〉一部分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53號 | 1931.2.28 | 1931.2.28 | 〈臺灣は官吏の天國〉一部分 〈舊民衆黨員よ! 卿等は何處へ往く〉的「聲明書」 〈結社禁止に対し共同聲明書を發す〉 〈禁止前の民衆黨(中)〉政策部分削除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54號 | 1931.3.7 | 1931.3.7 | 〈滅らず口〉二處削除 〈笛吹かざるに躍る(上)〉「支配階級の目算」 〈中洲噴水〉「埔里警察の不法拷問」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55號 | 1931.3.14 | 1931.3.14 | 〈小言〉「印度不亡」 〈島都瑣聞〉「万事顛倒セレ台湾人」 〈滅らず口〉「三月は革命」及其他一部分 | 下刷檢閲 |

| | | | | |
|------------|-----------|-----------|--|------|
| | | | <p>〈笛吹かざるに躍る〉</p> <p>〈能高郡警察の暴行事件重大化す〉一部分</p> <p>〈民族的差別の齒科醫師會〉一部分</p> <p>〈高官の故を以て發車時間を延はす〉一部分</p> <p>〈東勢警官の暴行〉一部分</p> <p>〈對民眾黨禁止後的短評的短評〉三處削除</p> | |
| 《新民報》第356號 | 1931.3.21 | 1931.3.21 | <p>〈小言〉「警人的蕃變風声」</p> <p>〈高校怪文書檢舉學生四名〉一部分</p> <p>〈旗山郡の道路品評會〉一部分</p> <p>〈日月潭工事の復興〉一部分</p> <p>〈頻々と起る警吏の暴行〉</p>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57號 | 1931.3.28 | 1931.3.28 | <p>社説〈警察寄附を強迫し人民連日苦を呼び〉</p> <p>〈紙上議會〉一部分</p>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58號 | 1931.4.4 | 1931.4.4 | <p>社説〈無視民意 教育問題 道路問題〉</p> <p>〈汐止街ノ盜難事件四嫌疑者ノ撲ラレタルハ可愛相ダ檢察官無罪ヲ宣告ス〉</p> <p>〈滅らず口〉二處削除</p> <p>〈臺灣政府ノ漢文科輕視政策〉四處削除</p> <p>〈民意ヲ無視シタ鶯歌ノ道路問題〉一處削除</p> <p>〈差別待遇撤廢戰 我等ノ武器ハ團結 精神労働者ニ立テ！〉</p> <p>〈紙上議會〉一部分</p>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59號 | 1931.4.11 | 1931.4.11 | <p>社説</p> <p>〈人權擁護座談會〉大部分</p> <p>〈官用自動車シテ女郎屋通ヒノ高官 人民ハ其ノ為メニ税金ヲ拂ヒヤセヌ〉</p> <p>〈下村校長ノ訓示〉一部分</p> <p>〈暴慢な臺北市役所〉二處削除</p> <p>〈法文學會ノ組織〉一處削除</p> <p>〈赤島社ノ洋畫展〉一處削除</p> <p>〈差別待遇ノ為ニ齒科醫師會混乱ス〉一部分</p> <p>〈有邪無邪ニ葬ル警察官ノ暴行事件〉三處削除</p>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60號 | 1931.4.18 | 1931.4.18 | <p>〈密偵政策效ヲ奏ス 農組幹部檢舉サル 潛行運動巧妙 警察努力一網打盡〉</p> <p>〈若槻內閣ノ成立〉一部分</p> <p>〈滅らず口〉一部分</p> <p>〈不良警官ノ處分〉</p> <p>〈紙上議會〉一部分</p>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61號 | 1931.4.25 | 1931.4.25 | <p>〈滅らず口〉</p>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62號 | 1931.5.2 | 1931.5.2 | <p>社説〈官權ノ肆虐ヲ制セント欲セバ民意ノ表示ニ努力徹底ヲ要ス〉</p> <p>〈小言〉「御用寮ノ貢獻」</p> <p>〈冷語〉關於霧社蕃四處削除</p> | 下刷檢閲 |

| | | | | |
|------------|-----------|-----------|--|------|
| | | | <p>〈中洲噴水〉關於霧社蕃一處削除 〈放屎百姓全部 誅求苛劍〉 〈南國哀歌（下）〉大部分 〈第二霧社事件疑問の數々目的は何か〉一部分 〈内地に於ける左翼戦線の宗教撲滅運動〉一部分 〈紙上議會〉 〈納稅宣傳よりか減稅斷行が必要〉一部分</p> | |
| 《新民報》第363號 | 1931.5.9 | 1931.5.9 | <p>社説〈警察勿激 民心惡化〉第一段 〈可憐ナル彼レハ死セリ〉一部分 〈日月潭ノ多債行悩ハ勿怪ノ幸ダ〉一部分 〈暴压裡ノメーデー〉 〈南投街民ニ寄ス〉一部分</p>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64號 | 1931.5.16 | 1931.5.16 | <p>〈可憐ナル彼レハ死セリ〉一部分</p>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65號 | 1931.5.23 | 1931.5.23 | <p>〈旅券撤廢要求的聲浪中 華領館徵收查照料〉一部分 〈冷語〉後段一項關於霧社蕃內容 〈拘留所生活狀況ハ台北南北二署日ニ拘スルモノ一百余人〉 〈讀者信箱〉一部分 〈橫暴極まる製糖會社保護ノ土地收用規則制〉 〈運輸組合ノ實權〉二處削除 〈肩書ニ執着スル内地人齒科醫師〉二處削除</p>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66號 | 1931.5.30 | 1931.5.30 | <p>社説〈官吏思想惡化〉 〈冷語〉一部分 〈赤炭流彈〉一部分 〈減俸及ビ加俸半減ハ賛成カ反對カ〉一部分 〈地主會カ土地規則ニ反對各地方モ動搖内閣ニ打電ス〉</p>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67號 | 1931.6.6 | 1931.6.6 | <p>〈賀陽宮殿下駕台ニ警務局嚴重警戒 島都大檢束大檢査〉 〈土地被強制買收住民將起爭議〉一部分</p>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68號 | 1931.6.13 | 1931.6.13 | <p>〈高雄海嘯〉關於賀陽宮殿下警衛及檢束部分 〈鬭爭〉 〈加俸爭議ノ代表九日ノ船デ上京ス〉五處削除</p>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69號 | 1931.6.20 | 1931.6.20 | <p>社説〈官吏總辭職 優越階級自ラ墓穴ヲ掘ス〉 〈小言〉一部分 〈島都瑣聞〉批評始政紀念日部分 〈高雄海嘯〉關於加俸減額運動部分 〈社會寫真〉 〈台湾官吏ノ團體的運動〉一處削除 〈自治聯盟ガ加俸問題デ内閣及前總督ニ打電〉一部分</p> | 下刷檢閲 |

| | | | | |
|------------|------------|------------|--|------|
| 《新民報》第370號 | 1931.6.27 | 1931.6.27 | 社説〈臺灣要有真正輿論〉一處削除 〈內台差別？屏東街役場的暴舉〉一部分 〈陳其昌氏北署長ヲ告訴ス〉 〈冷語〉關於加俸減額部分 〈豐原デ濫費シテ慰勞宴ヲ開ク 街民煩言アリ〉 〈被檢束者釈放〉 〈減らず口〉批評始政紀念日部分 〈若キ学徒ハ訴フ〉一部分 | 下刷檢閲 |
| | | | 〈昭和製糖会社ノ従業員ガ同盟罷業〉一部分 | |
| 《新民報》第371號 | 1931.7.4 | 1931.7.4 | 〈島都瑣聞〉外五處報導被抹削 〈高雄州被檢束者 知事ニ向ワテ抗議文ヲ提出ス〉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72號 | 1931.7.11 | 1931.7.11 | 「社説」外包括〈高雄州被檢束者 知事ニ向ワテ抗議文ヲ提出ス〉在內九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73號 | 1931.7.18 | 1931.7.18 | 社説〈日月潭工事將ニ着手セントス 工事ノ振興ハ是レ福カ禍カ〉一部分 另有十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74號 | 1931.7.25 | 1931.7.25 | 「社説」外五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76號 | 1931.8.8 | 1931.8.8 | 包括〈配達夫〉的新詩在內十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77號 | 1931.8.15 | 1931.8.15 | 九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78號 | 1931.8.22 | 1931.8.22 | 包括〈陳友仁赴日使命〉在內十三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79號 | 1931.8.29 | 1931.8.29 | 四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80號 | 1931.9.7 | 1931.9.7 | 十一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81號 | 1931.9.12 | 1931.9.12 | 五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82號 | 1931.9.19 | 1931.9.19 | 五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83號 | 1931.9.26 | 1931.9.26 | 八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84號 | 1931.10.3 | 1931.10.3 | 十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85號 | 1931.10.10 | 1931.10.10 | 七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86號 | 1931.10.17 | 1931.10.17 | 〈内地の労働者から爭議資金陸續と来る〉一部分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87號 | 1931.10.24 | 1931.10.24 | 八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88號 | 1931.10.31 | 1931.10.31 | 五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89號 | 1931.11.7 | 1931.11.7 | 〈寄附金の強要〉一處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90號 | 1931.11.14 | 1931.11.14 | 四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91號 | 1931.11.21 | 1931.11.21 | 七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92號 | 1931.11.28 | 1931.11.28 | 四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93號 | 1931.12.5 | 1931.12.5 | 〈中洲噴水〉一處削除外一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94號 | 1931.12.12 | 1931.12.12 | 〈素晴らしい馬占山の援助實況〉外十二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新民報》第395號 | 1931.12.19 | 1931.12.19 | 〈臺灣農民組合運動小史〉二處被抹削 | 下刷檢閲 |

| | | | | |
|------------|-----------|-----------|---|------|
| 《新民報》第396號 | 1932.1.1 | 1932.1.1 | 〈戰禍近きつつあり 反戦と文學の任務 反帝戦とは何か〉外七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397號 | 1932.1.9 | 1932.1.9 | 〈戰爭の損失〉外二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398號 | 1932.1.16 | 1932.1.16 | 〈臺灣農民組合運動小史〉外五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399號 | 1932.1.23 | 1932.1.23 | 〈印度よ獨立自主の道へ?〉外三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400號 | 1932.1.30 | 1932.1.30 | 〈學生抗日會担棺遊行示威〉外一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401號 | 1932.2.6 | 1932.2.6 | 〈冷語〉嘲諷日本對滿政策部分 〈今日言者滿天下試問幾人能實踐〉 〈學生問ニ暗雲ガ漂フ云々台北第二師範学生ニ干スル内台融和ヲ害スルモノ〉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402號 | 1932.2.13 | 1932.2.13 | 〈信中誤時局 被檢束還被搜查〉 〈廈門歸來客談〉 〈上海日華兩軍啟釁〉一部分 〈共學精神に悖る幼稚園規則を改め〉一部分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403號 | 1932.2.20 | 1932.2.20 | 〈戰爭の巷上海便り〉一部分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404號 | 1932.2.27 | 1932.2.27 | 〈土地收用規則請願發阻止命令〉一部分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406號 | 1932.3.12 | 1932.3.12 | 〈文化戰線ニ於ケルふあつしよ化ノ氾濫〉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407號 | 1932.3.19 | 1932.3.19 | 三則報導抹削：馬占山依日本要求抹消排日教科書、與屏東信用組合有關危害内台融和的報導、上海日本軍的上陸狀況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408號 | 1932.3.26 | 1932.3.26 | 抗日煽動的記事抹消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409號 | 1932.4.2 | 1932.4.2 | 社說〈内臺怎樣纔能融和〉一處削除外一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閱 |
| 《新民報》第410號 | 1932.4.9 | 1932.4.9 | 〈新竹理髮同業組合内台人各門戶を立てんとす〉四處削除外一處報導被抹削 | 下刷檢閱 |

資料來源：筆者據 1930 年 1 月至 1932 年 5 月出版的《臺灣出版警察報》（第 6 號至第 34 號）記錄並查對《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製成。

由《民報》及《新民報》被檢閱查禁、註銷的內容觀之，遭當局所忌的報導約有以下數端。其一，即隨著社會情勢變化的重大時事，如兩次霧社事件的爆發、鴉片特許與加俸減額爭議的內容，均被認為因誤解統治政策而曲筆，甚或危害總督府的統治之虞，致招查禁。³⁹其二，為挑戰總督府統治體制與統治正當性的內容，包括廢止始政紀念日與總督評議會而引來當局不滿，⁴⁰如第 318 號《新民報》由於全紙內容均針對始政紀念日的議題，而引來禁止販售流通的重懲，成為《新民報》在週刊時期唯一無法面世的號次。其三，為具唆使臺灣人民族意識內涵之報導，亦在取締之列，特別是印度與菲律賓獨立運動的報導，被當局認為暗示帝國對殖民地的壓迫統治及唆使民

3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7（1930年2月），頁14。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17（1930年12月），頁15。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19（1931年2月），頁12-13。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23（1931年6月），頁12、37-38。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24（1931年7月），頁14-17。

4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12（1930年7月），頁14。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13（1930年8月），頁10。

族獨立運動之嫌。⁴¹ 其四，為臺灣民眾黨、農民組合與地方自治聯盟等政治社會運動相關團體，發展歷史、綱領宣言及政策或被檢束解散的報導等，⁴² 其五，為施政上的差別待遇，由於此類情事最容易彰顯殖民統治的剝削本質與挑戰總督府「內臺融合」的宣稱，大至日月潭水利工程、產業調查會，小至地方同業公會與共學問題等諸般議題都成為討論焦點，因而也是被檢閱最大宗的內容。⁴³

再從檢閱後的禁止方式看來，《民報》及《新民報》前後依序歷經了「發賣頒布禁止」、「說諭注意警告」及「下刷檢閱」三個階段。如前所述，「發賣頒布禁止」乃依〈臺灣新聞紙令〉規定，經檢閱後認定報刊內容有違反安寧秩序與危害風俗之內容，處以禁止販售流通的行政處分；至於「說諭注意警告」與「下刷檢閱」，則是在報刊納本檢閱到正式付梓發行前，檢閱官發現應禁止的報導內容時，對發行人提出該處應予以刪除，不得刊登之警告，此即「削除處分」或「注意處分」，乃是異於〈臺灣新聞紙令〉之行政處分的便宜處分，而根據被警告的內容，又分為「示達」（若刊登該內容，多數情況會被處以發賣頒布禁止的處分）、「警告」（若刊登該內容，依社會情勢與報導樣態可能會遭發禁處分）、「懇談」（若刊登該內容，雖不會被處以發禁處分，但仍向新聞社訴諸德義，望其不要刊登）三類情形。⁴⁴ 在這個階段，《民報》及《新民報》雖然遭到檢閱未通過的頻率極高，⁴⁵ 然而絕大多數都被處以「說諭注意警告」與「下刷檢閱」，且實際上，就算是被處以「發賣頒布禁止」的號次，也同樣將檢閱未過的內容刪塗註銷便能順利發售，當中唯有第 318 號《新民報》因批評始政紀念日而真正被禁止刊行。⁴⁶ 透過下刷檢閱的方式，用「開天窗」將內容刪除留白的處分方式來替代發禁處分，可說是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累積長期的檢閱經驗後，逐漸摸索出殖民地檢閱體制與殖民地媒體間的一種共存模式，一方面減少報社的損失，另一方面總督府亦得以迴避言論壓迫的謗議。⁴⁷

類似這樣尋求對立又不進入危險狀態的平衡點之舉措者不僅總督府，民報社亦在檢閱過程中

4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7，頁 14。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11（1930 年 6 月），頁 19。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16（1930 年 11 月），頁 11。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21（1931 年 4 月），頁 9。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31（1932 年 2 月），頁 28。

4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14（1930 年 9 月），頁 6。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19，頁 13。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20（1931 年 3 月），頁 12。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21，頁 9。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30（1932 年 1 月），頁 37。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31（1931 年 3 月），頁 28。

4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14，頁 10-11。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20，頁 10。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21，頁 9。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22（1931 年 5 月），頁 9-10。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24，頁 17。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25（1931 年 8 月），頁 18。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32（1932 年 3 月），頁 19。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編，《臺灣出版警察報》34（1932 年 5 月），頁 17。

44 河原功，〈解說『臺灣出版警察報』〉，收於《『臺灣出版警察報』解說・発禁図書新聞リスト》（東京：不二出版，2001），頁 13-14。

45 自 1930 年 1 月至 1932 年 5 月的《臺灣出版警察報》（第 6 號至第 34 號）中，共檢閱了日刊發行前的第 292 號《臺灣民報》至第 410 號《臺灣新民報》，總計發行 119 期的週刊中，受發禁處分或削除處分的號次便達 84 期，比率超過七成。

46 然而根據黃旺成的說法，第 318 號《新民報》被禁止發售的理由乃與電燈問題有關：「午前十時頃朝霖、定錦、陳記三人坐タクシー來，取出他們昨天由北携歸被禁止的此期《民報》異議關於解決電燈問題的記事，與予大討論至十二時，似了解、似不了解而去」。參見黃旺成，〈黃旺成日記〉（未刊稿），1930 年 6 月 23 日。

47 河原功，〈解說『臺灣出版警察報』〉，頁 13-14。韓基亨著，陳允元譯，〈文化政治期的檢閱政策與殖民地媒體〉，頁 187-194。鈴木清一郎，《臺灣出版關係法令釋義》，頁 156-158。

不斷摸索能順利通過檢閱的方法，前述組織「原稿審查會」採取「合議制編輯法」的方式即為例證。質言之，在統治者操作檢閱制度下，被檢閱者會因著體制的規範而運作出一套「自我檢閱」的機制，並隨著檢閱事例的累積，開始建構出一套「經驗性的檢閱標準」。⁴⁸甚且除了檢閱制度外，統治當局尚有其他手段可資運用，在《民報》的案例上，由於移臺發行後的目標就是要發行日刊，總督府便在報社申請與爭取的過程中，巧妙運用裁決權迫使報社在編輯過程中，進行自我言論管控，如1928年成立「日報發起人會」開始募集股份以發行《新民報》後，《民報》專責採訪新竹州報導的記者暨通信部負責人黃旺成，就曾在日記寫下被提醒要注意報導的寫法：

晚飯前彭與逢源來，注意《新民報》未許可前寫法要退卻一點，予主張當改則改，不可以功利主利〔義〕而有一二其行為。⁴⁹

日後臺灣新民報社成立，《新民報》取代《民報》並朝發行日刊的目標邁進時，在警務局運用權力關係的壓迫下，報社專務羅萬俤亦親自和黃旺成討論《民報》的寫法。又如1931年年底《新民報》在等待日刊許可的關鍵時刻，黃旺成又再度被叮嚀：

呈祿信至，謂「冷語」之關於滿洲事雖極中肯，但處我們現在的地位實以不談為妙，要求再寫過，午飯後即着手寫就寄去。⁵⁰

在檢閱體制與日刊申請的雙管齊下而形成的自我檢閱下，《民報》與《新民報》的言論已在無形中被總督府所掌握，亦可以說明為何在日刊申請的階段，警務局保安課的檢閱僅至多處以「下刷檢閱」，而不再祭出「發賣頒布禁止」的雷霆手段之原因。

四、取次制度與銷售網絡

（一）移入紙取次人許可制度

根據《臺灣新聞紙令》第十六條規定，臺灣總督對於在島外發行，以在島內發賣頒布為目的之新聞紙，基於取締上的必要，未取得取次人（特定經銷人）許可者，禁止輸入或移入島內，並在第十七條說明新聞紙取次人的許可手續，須填寫〈告示新聞紙取次人許可願〉，並註明取次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職業與住所（須在本島有住所者才可登記為取次人），及取次人所在地，再附上與發行人締結的契約條項，始得以向總督申請登記為取次人，此即「取次人許可制度」。

經總督府許可的取次人，須負責納本的義務，在新聞紙發賣頒布前，繳納兩部予臺灣總督府、各一部予所轄官廳及管轄地方法院檢察局進行檢閱，而出刊後的新聞紙亦須在取次人經手並蓋上取次人印鑑後，才能發送給讀者，不得由島外的發行所逕自配送。如此細緻的規定發賣頒布的手續及取次人制度，目的在於防杜日本內地的發行報備制成為突破臺灣島內發行許可制的法律缺口。⁵¹

48 韓基亨著，陳允元譯，〈近代詩歌的「不穩性」與殖民地檢閱—《諺文新聞詩歌》（1931年）之分析〉，頁214-223。

49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註，《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五）一九二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頁392、400。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六）一九二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6），頁2。

5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八）一九三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7），頁382-383。

51 鈴木清一郎，《臺灣出版關係法令釋義》（臺北：杉田書店，1937），頁142-148。〈治安警察法與新聞紙法〉，《臺



圖 1 《臺灣民報》發送實況

圖片來源與說明：取自蔣朝根編著，《蔣渭水留真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6），頁 92-93。原刊於《臺灣民報》3：7（1925 年 3 月 1 日），頁 12。由於〈臺灣新聞紙令〉規定島外輸入的「移入紙」不得由島外的發行所逕自配送予購讀者，而須由臺灣的代表取次人經手、納本檢閱後始得以販售流通，因而《臺灣民報》最初以臺灣支局所在地的大安醫院為最初《臺灣民報》的代表取次所及總批發處，此即這張著名的照片所反映的歷史場景。後排左一、二、四、六分別為蔣渭水（編輯部記者）、吳清波（營業部社員）、施至善（營業部主任）、王敏川（臺灣支局主任）。

1920 年 7 月《臺灣青年》初始發行時，雖然依法提出設置取次人的許可願，卻因為所轄官廳手續不及，因而仍處於未設置取次人的法律狀態下，遭總督府處以禁止輸入的處分，因而前兩號無法順利在臺銷售。直到第三號發行前的 9 月 8 日，由臺北市艋舺人徐慶祥擔任取次人的許可正式發下後，才得以販售、購讀無虞。然而警方卻仍持續盤查雜誌的購買者，並以發刊當時禁止在臺販售為由特別針對創刊號之持有者，並在坊間散播《臺灣青年》是違法刊物的風聲：⁵²

讀者諸兄鑒：本誌係依據內地新聞紙法所出版發行者，而在臺灣則遵照臺灣新聞紙令第十七條之法定手續，設置取次所於臺北州臺北市艋舺大厝口街四十三番戶徐慶祥氏處，每月可以依法頒布寄呈，是故本誌在社會上可謂為光明正大之言論機關，在法律上又可謂為完全合法之文化事業，具有正式公認之能力，毫無暗險違法之嫌疑，望請放心閱讀，勿為謠言所惑、勿被巷語所欺，倘有敢以故意欲行干涉各位之購讀，或妨阻本誌之頒行者，煩即將其事實內容，一一詳示，是所禱幸。⁵³

徐慶祥與雜誌社內許多成員同樣具有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學緣」，1910 年畢業後又通過普通文官試驗，原本擔任數年教員等公職後到東京從事實業，《臺灣青年》創刊後，徐慶祥毅然接下

《臺灣民報》85（1925 年 12 月 27 日），頁 10。李承機，〈日本殖民地統治下「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苦闘」—日刊《臺灣新民報》創始初期史料題解〉，收於李承機主編，《日刊臺灣新民報創始初期（1932.4.15-5.31）》數位光碟（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頁 3-6。

52 《府報》2179（1920 年 8 月 13 日），頁 47。《府報》2196（1920 年 9 月 11 日），頁 9。〈臺灣當局並に內臺有識人士に訴ふ〉，《臺灣青年》1：3（1920 年 9 月 15 日），無頁碼（封底）。

53 〈社告〉，《臺灣青年》1：3，無頁碼（目次頁前）。

臺灣代表取次人一職，不僅擔當取次所一切事務，也一概負擔費用及郵送費，及至改名《臺灣》後仍是如此，卻因而積勞成疾於 1922 年 5 月病逝東京，年僅三十四歲。⁵⁴



圖 2 徐慶祥任《臺灣青年》取次人使用印

圖片來源：《府報》2210（1920 年 9 月 29 日），頁 75。

1922 年 4 月，《臺灣青年》改名《臺灣》後，增設了臺灣支局，並決定進一步籌組株式會社，遂以蔡培火為支局主任主負其事，因而在徐慶祥去世後，《臺灣》的代表取次人一職直接由蔡培火接下，取次所亦改為臺灣支局所在地的大安醫院（臺北市太平町三丁目二十八番地）。⁵⁵ 1923 年 4 月，半月刊《臺灣民報》創刊時，又再次面臨《臺灣青年》初始的窘境，由於同樣以蔡培火擔任代表取次人的申請遲遲未能獲准，因而在前三號（4 月 15 日、5 月 1 日、5 月 15 日）無法在臺灣銷售的情況下不得不暫時停刊，待 6 月 15 日取次人許可通過後，第 4 號終於在 7 月 15 日發刊，卻又因沒有通過總督府檢閱被處以「發賣頒布禁止」，是以臺灣讀者首度閱讀到的《民報》為 8 月 1 日發行的第 5 號，距《民報》創刊早已逾三個半月以上。⁵⁶



圖 3 蔡培火任《臺灣》、《臺灣民報》取次人使用印

圖片來源：《府報》2670（1922 年 6 月 1 日），頁 1。《府報》2971（1923 年 6 月 20 日），頁 55。

1923 年 6 月，株式會社臺灣雜誌社籌組完成，蔡培火完成募集股份的階段性任務後，轉往臺灣文化協會任專務理事推行羅馬字、文化演劇等新事業，其卸下的臺灣支局主任職務改由王敏川

54 《臺灣》3：2（1922 年 5 月 11 日），漢文之部頁 72。林慈舟（林呈祿），〈懷舊譚〉，《臺灣民報》67（1925 年 8 月 26 日），頁 49。

55 《府報》2667（1922 年 5 月 28 日），頁 128。

56 〈謹告！！〉，《臺灣》4：6（1923 年 6 月 10 日），無頁碼（目次頁前）。〈謹告！！〉、〈編輯後記〉，《臺灣》4：7（1923 年 7 月 10 日），無頁碼（目次頁前）、頁 104。《府報》2933（1923 年 5 月 4 日），頁 15。《府報》2968（1923 年 6 月 16 日），頁 43。〈編輯餘話〉，《臺灣民報》1：4（1923 年 7 月 15 日），頁 15。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122。

接手，因而《臺灣》與《民報》的代表取次人亦變更為王敏川。惟好景不長，東京大地震後《臺灣》雖然力圖復刊，又再度向總督府申請移入許可與取次許可，卻僅勉強在 1924 年 4、5 月間發行最後兩期，事實上，當時島內的讀者亦無緣在第一時間捧讀這最後兩期的《臺灣》，因為王敏川的取次申請要直到 5 月底才通過許可，其時社內早已經取締役會決議，將《臺灣》斷炊休刊。1925 年 9 月，專營《民報》的株式會社臺灣雜誌社正名為株式會社臺灣民報社，並向總督府提出《臺灣》取次人的廢止申請。⁵⁷



圖 4 王敏川任《臺灣》、《臺灣民報》取次人使用印

圖片來源：《府報》3095（1923 年 11 月 20 日），頁 46。

1927 年 1 月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後，民報社內包括王敏川在內的左翼人士亦掛冠求去，臺灣支局主任由蔡培火回鍋擔任，展開與總督府警務局局長小林光政有關移臺發行之交涉，然而《民報》的代表取次人卻不是由蔡培火回任，而是轉由蔣渭水接手，同時取次店地址亦改為 1926 年 6 月支局新搬遷的位址（下奎府町二丁目二十六番地）。之所以由蔣渭水擔任取次人，或許與此時期他正好將原支局舊址的大安醫院處改辦文化書局，恰可藉由其通路推銷《民報》，令蔡培火能專心致力於支局整頓與移臺事宜。7 月 16 日，臺灣總督府終於通過《民報》移臺發行的申請，於是蔣渭水也在 18 日提出《民報》取次廢止的申請（至第 166 號為止），他也成為《民報》在移入紙時期最後一任的代表取次人。⁵⁸



圖 5 蔣渭水任《臺灣民報》取次人使用印

圖片來源：蔣朝根編著，《蔣渭水留真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6），頁 105。

（二）取次制度下銷售據點的佈建

在通過「取次人許可制度」的申請，而得以以移入紙的身分，在主要讀者群所在的臺灣島內

57 《府報》3088（1923 年 11 月 11 日），頁 27。《府報》3247（1924 年 5 月 30 日），頁 88。《府報》3250（1923 年 6 月 3 日），頁 5。《府報》3616（1925 年 9 月 18 日），頁 27。

58 〈餘錄〉，《臺灣民報》156（1927 年 5 月 8 日），頁 16。《府報》163（1927 年 7 月 29 日），頁 85。

販售、流通後，後續就是雜誌費／報費收繳，及增加訂閱量的問題。最初《臺灣青年》之所以創刊，乃在東京澀谷蔡惠如寓所舉行的「新民會」創立大會上決議創辦雜誌後，蔡惠如在前往北京前，於東京車站交予林呈祿 1500 元充作發刊費用，再經幹部募款的結果，獲得辜顯榮（3000 元）、林獻堂（1000 元）、林熊徵（1000 元）、顏雲年（1000 元）、翁俊明（500 元）、林子瑾（200 元）、李瑞雲（200 元）等富商殷戶捐款，而得以開辦發展。⁵⁹ 在依著寄附金起步下，為了吸引更多《臺灣青年》的讀者，社內決議僅用帳戶匯款繳費的方式向讀者徵收印刷費用（40 錢），至於雜誌社一切開銷全仰仗在各處募得的捐款來維持：

蓋以本誌之趣旨，非在營利，而在促進我島之文化，實一種之社會的事業者也。既得篤志家多額之寄附，原應廣贈閱讀，不宜徵收誌款，乃顧念寄附有限、誌刊無窮，恐難維持長久，故法取折衷，僅收印刷實費，其他一切費用，概以寄附金充之。⁶⁰

此般天真而顯得不切實際的經營方式，顯示一方面社內確實欠缺創辦雜誌與實務經驗的人才，另一方面也還沒有長遠經營的把握。因而雖然躲過前民政長官下村宏短命的「三號雜誌」的預言，卻也旋即在 1920 年年終結算期迫近時，面臨雜誌費短收而必須向讀者催繳匯款的問題。⁶¹ 這個問題到了 1921 年 6、7 月年中結算期時仍然存在，因而此回不僅止於被動請求未繳費的讀者儘速匯款，更加上「集金郵便」的方式，由集金員主動前往收費。⁶² 除了諸多未繳納雜誌費的經費問題外，身為移入紙的《臺灣青年》由於受取次制度規範之故，也導致東京本社與臺北取次所（徐慶祥住處）在訂購與收費的聯繫上有誤差，而衍生「送本不足」與「二重請求」的問題：

本誌創刊至今已滿一週年，其間直接間接受各位援助得有今日，洵深感謝。然從來雜誌代未納者甚多，故以集金郵便請求，千祈方便交該集金人，或以振替付東京五三三六三番亦可。然從來因臺北取次所之收金簿及發送簿與本社尚未統一的之聯絡，遂生送本不足二重請求之事，實深遺憾。今方帳簿整理中，務期無此種遺憾，以後若有此事，千祈至急賜信陳明，以便調查，切勿隱抱異存致互生猜疑也，幸甚。⁶³

即有些讀者收不到訂閱的《臺灣青年》，而有些訂購者被重複收費。無論如何，以臺北取次所為據點，以「集金郵便」派出集金員化被動為主動的收費方式，雖然未能完全解決雜誌費欠繳的問題，但還是能多追回一些損失，因而逐漸成為主要的收費方式，縱使如此，仍會發生讀者「本人不在」、「拒絕不納」等，使集金員無功而返的狀況。⁶⁴

59 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吳三連、葉榮鐘合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 545-546。〈本誌維持金寄附者芳名〉，《臺灣青年》1：4（1920 年 10 月 15 日），版權頁。

60 〈社告〉，《臺灣青年》1：2（1920 年 8 月 15 日），無頁碼（目次頁前）。

61 〈社告〉，《臺灣青年》1：5（1920 年 12 月 15 日），無頁碼（目次頁前）。

62 〈社告〉，《臺灣青年》2：5（1921 年 6 月 15 日），無頁碼（目次頁前）。

63 〈社告〉，《臺灣青年》3：1（1921 年 7 月 15 日），無頁碼（目次頁前）。

64 〈社告〉，《臺灣青年》3：5（1921 年 11 月 15 日），無頁碼（目次頁前）、頁 48。〈社告〉，《臺灣青年》3：6（1921 年 12 月 15 日），無頁碼（目次頁前）。〈社告〉，《臺灣青年》4：1（1922 年 1 月 20 日），無頁碼（目次頁前）。

改為發行《臺灣》後，「祇以經營出版，用費多端，仰有限的之收入，供永續之刊行，雖荷仁人樂助而學子獻身，終亦必不得不賴誌費以彌補者也」，即意識到必須仰仗雜誌販售的費用收入來支撐社務開銷，而非依靠一時樂助的義捐金，才是一份刊物得以永續經營的方式，因而為了消化《臺灣青年》未收的舊帳與收取新誌的購讀費，仍將以「集金郵便」的方式，年分7月、11月、3月三期向讀者收費，「以防參差重複，而圖彼此兩便焉」。⁶⁵

然而此般收費方式的成效依然有限，據霧峰林家頂厝所收藏，一份記錄至1923年4月《民報》方正式發行不久的〈臺灣雜誌社經費豫算科目表、臺灣雜誌社財產目錄〉及〈臺灣雜誌社收款登記〉手稿顯示，此時《臺灣》每期的銷售量約1600冊（月刊，全年共19200冊），而《民報》每期銷售量約3150冊（半月刊，全年共75600冊），然而雜誌社尚未收到的雜誌費與報費高達5091.9元，包括已退訂的舊讀者所積欠的購讀費為1973.4元，現有訂戶未繳的金額為3118.5元。據李承機精細的統計，未繳費的購讀者數達2166名，其中已退訂者689名，而現有未繳費的訂戶為1477名，當中日本內地及外國訂戶僅141名，其餘1336名則來自臺灣島內，又臺灣人訂戶佔了1155名之多（其餘為120名日本人，及其他61名機關團體）。⁶⁶由是可見，購讀費積欠的問題不可謂不嚴重。

這兩份手稿應該是臺灣雜誌社為了在1923年6月，組織株式會社並向東京區裁判所申請登記，所整理的經費概覽、財產清單與帳目登記。⁶⁷轉型為株式會社後，為了避免長久以來因一海之隔導致東京本社與臺灣支局間的聯繫上的落差，「注文『臺灣』和『民報』的諸兄弟，此後凡要注文之時，請直向臺北支局較為利便，以免重複或長途失落，內中住所姓名必要記明，是最拜託的」，⁶⁸亦即由接下取次事務的臺灣支局取代本社，直接負責訂閱與收費事宜。如本文第二章所述，自社內決議停刊《臺灣》專辦《民報》後，1924年7月起，東京本社便將內容編輯與報費徵收的業務陸續移交臺灣支局辦理，並將「民報編輯部」、「雜誌及民報購讀申込所」、「雜誌費及民報費徵收部」移至支局，同時報費的匯款帳戶也改為臺灣支局的戶頭。⁶⁹換言之，此後支局內部增設了兩個部門，其一為編輯部（負責編輯上之通信或投稿）外，其二為購讀申込所與報費徵收部所隸屬的營業部（關於住所變更、注文、中止、納金等營業上相關事務），而報費徵收

65 〈講讀者諸君均鑒〉，《臺灣》3：2，無頁碼（目次頁前）。《臺灣》3：4（1922年7月10日），版權頁。〈本社徵收誌費啟事〉，《臺灣》3：5（1922年8月8日），無頁碼（目次頁前）。〈謹告〉，《臺灣》3：8（1922年11月4日），無頁碼（目次頁前）。

66 〈臺灣雜誌社經費豫算科目表、臺灣雜誌社財產目錄〉、〈臺灣雜誌社收款登記〉，「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編號：LIN022、LIN023。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150-151。

67 株式會社臺灣雜誌社於1923年6月24日成立，並於8月1日在東京完成登記。見〈社告〉，《臺灣民報》1：6（1923年8月15日），頁16。

68 〈編輯餘話〉，《臺灣民報》1：5（1923年8月1日），頁16。至於住所或寄送地址變更，同樣也向臺灣支局聲明，見〈社告〉，《臺灣民報》2：12（1924年7月1日），頁14。

69 〈社告〉，《臺灣民報》2：16（1924年9月1日），頁22。〈編輯餘話〉，《臺灣民報》2：21（1924年10月21日），頁16。

部的業務乃委由出身彰化的特派社員吳清波主其事。⁷⁰

臺灣支局接掌營業部的業務後，在經營上銳意革新，首先，於 1924 年 12 月提出新的廣告收費方式：

本報讀者蒸蒸日上，日來民報已暢銷加倍，本島之山陬海角，以及中國各處各有購讀。在本島報界中，可推為首屈一指之言論機關，其銷數之多、銷路之廣，實為諸君欲刊登廣告之一大好機具也。諸君有登刊及賀新禧等等，即請從速投下，以便彙集，其刊載之價目，因近來物價即貴，生活程度增高，另訂于下，以便察閱。⁷¹

如第四章所述，在 1924 年 9 月、11 月所發行兩冊治警事件第一審、第二審法庭公判特別號的氣勢帶動下，《民報》的銷售量首度破萬，因而在此「暢銷加倍」之際，趁勢招徠廣告買主以增加社務營收，並一改此前的廣告收費方式，並以「物價即貴，生活程度增高」為由調漲廣告刊登費用。⁷²

其次，自 1925 年起，以身為代表取次所的臺灣支局為首，在全臺各地尋覓合適的取次人（特定經銷人），與之簽訂契約成立取次店，逐步架構出島內販售流通的網絡。4 月間，《民報》公布第一波取次店區域名單，爾後或新設、或解約取消，或更替取次人，至 1927 年 8 月《民報》在臺灣發行前，島內取次店配置情況如下表所示：

表 2 《臺灣民報》移臺發行前設立取次店一覽表（1925.1-1927.8）

| 行政區劃 | 經銷範圍 | 取次人 | 成立時間 | 備註 |
|------|-------|--------|---------|-----------------------------|
| 臺北州 | 臺北市北區 | 王萬得 | 1925年4月 | |
| | 臺北市南區 | 潘欽德 | 1925年4月 | 1925年7月解約 |
| | 基隆市 | 周宗德 | 1925年4月 | 1925年7月解約，改由邱魁辦理，之後又改由吳金發辦理 |
| | 宜蘭街 | 新德成問屋部 | 1925年4月 | |
| | 羅東街 | 藍廷槐 | 1925年4月 | |

70 吳清波原為繼承家業的靴商，在彰化成立靴商購買組合並任組合長，同時在多年間前往日本、廣東、香港、廈門、汕頭等地視察商況。1924 年將靴商廢業後，於 5 月加入株式會社臺灣雜誌社，自此長期擔任到臺灣各處徵集報費的工作。〈社告〉，《臺灣民報》2:9（1924 年 6 月 1 日），頁 16。〈社告〉，《臺灣民報》2:10（1924 年 6 月 11 日），頁 15。〈編後餘話〉，《臺灣民報》2:17（1924 年 9 月 11 日），頁 16。〈編輯餘話〉，《臺灣民報》3:11（1925 年 4 月 11 日），頁 16。〈社告〉，《臺灣民報》3:14（1925 年 5 月 11 日），頁 16。〈原本社外務主任吳清波氏逝世〉，《臺灣民報》236（1928 年 11 月 25 日），頁 4。

71 〈社告〉，《臺灣民報》2:25（1924 年 12 月 1 日），頁 16。

72 此前要在《民報》上刊登廣告只有全頁（二十元）、半頁（十元）兩種選擇，此時（1924 年 12 月）雖仍以廣告所佔頁面面積為標準，但提供全頁（三十元）、三分之二（二十元）、半頁（十五元）、三分之一（十元）、六分之一（六元）、十二分之一（三元）六種規格以供選擇。又如第四章所述，至 1927 年 8 月移臺發行前，《民報》的廣告收費方式另有兩次變動：一次為 1925 年 7 月由旬刊改為發行週刊時（第 60 號起），同樣以頁面面積計費，但價格調漲為全頁（六拾元）、三分之二（四拾元）、半頁（三拾元）、三分之一（貳拾元）、六分之一（拾元）、十二分之一（五元）；另一次為自 1926 年新年號起，將頁面由三段改為四段，廣告收費亦更易為「以行計費」方式，「五號十四字每一行份金六拾錢」。見〈特別啟事〉，《臺灣民報》59（1925 年 7 月 1 日），頁 16。〈餘錄〉，《臺灣民報》86（1926 年 1 月 1 日），頁 16。至於《民報》移臺發行後，至 1932 年 4 月發行日刊《臺灣新民報》前，無論是七段頁面或 1930 年 8 月後改版為八段頁面，廣告的收費標準均維持「普通五號一行五拾錢，特別指定廣告八拾錢」。見《臺灣民報》167（1927 年 8 月 1 日），頁 1。《臺灣新民報》410（1932 年 4 月 9 日），頁 1。

| | | | | |
|------|--------|-----|---------|-----------------------|
| 新竹州 | 苗栗郡 | 鄭匏仔 | 1925年7月 | |
| | 竹南郡 | 李傳興 | 1925年7月 | |
| | 竹東郡 | 彭塘萼 | 1925年7月 | |
| | 新竹街 | 吳廷輝 | 1925年7月 | |
| 臺中州 | 臺中市 | 魏朝昌 | 1925年4月 | 1925年10月解約，改由本社直營 |
| | 清水街 | 蔡清恭 | 1925年4月 | 解約時間不詳，1927年3月由蔡儒興辦理 |
| | 大甲街 | 黃清波 | 1925年4月 | |
| | 北斗街 | 胡丞生 | 1925年7月 | |
| | 員林街 | 蔡海 | 1925年7月 | |
| | 彰化街 | 吳石麟 | 1925年7月 | |
| | 豐原街 | 廖進平 | 1925年7月 | |
| | 東勢郡 | 劉德風 | 1925年7月 | |
| | 竹山郡竹山庄 | 陳景三 | 1926年6月 | |
| | 竹山郡鹿谷庄 | 黃伯虎 | 1926年6月 | |
| 南投郡 | 洪應用 | 不詳 | | |
| 臺南州 | 嘉義街 | 林萬定 | 1925年4月 | 1925年10月解約，改由王甘棠辦理 |
| | 臺南市 | 黃泉 | 1925年7月 | |
| | 嘉義郡 | 林見財 | 1925年7月 | |
| | 斗六街 | 高石海 | 1925年7月 | |
| | 東石郡 | 謝賴登 | 不詳 | 1926年6月解約，改由林燦玉、林見財辦理 |
| 高雄州 | 高雄州 | 謝賴登 | 1925年4月 | |
| 花蓮港廳 | 花蓮港廳 | 林仲謨 | 1927年7月 | |

資料來源：〈社告〉，《臺灣民報》3：10（1925年4月1日），頁16。〈社告〉，《臺灣民報》59（1925年7月1日），頁16。〈社告〉，《臺灣民報》76（1925年10月25日），頁16。〈社告〉，《臺灣民報》109（1926年6月13日），頁16。〈餘錄〉，《臺灣民報》148（1927年3月13日），頁16。〈餘錄〉，《臺灣民報》166（1927年7月22日），頁16。

在五州二廳的行政區劃下，除了臺東廳之外，各州、廳均有設置取次據點，並以臺北、新竹、臺中、臺南四州為主，當中多數的取次店成立時，負責各州輿情報導與拓展《民報》銷量任務的各支局前身，甚至都還沒有成立（臺南通信部1925年6月、臺中出張所1925年12月、新竹通信部1926年12月），必須由這些取次店擔任報社業務的先鋒。

然而，取次人如何與臺灣雜誌社（1925年9月改名為株式會社臺灣民報社）簽訂取次店契約呢？以新竹街取次店為例，取次人吳廷輝原為木匠，雖然僅公學校畢業卻對政治社會運動抱有熱忱，1925年3月黃旺成結束在臺中蔡蓮舫家族擔任家庭教師與資產債務經理人的工作回到新竹後，吳廷輝知道黃旺成因為蔡家緣故與林獻堂素有往來，乃委請黃旺成寫信予林獻堂，討論將臺灣文化協會的活動引進新竹，又文化協會自1921年成立以來，也從未在新竹舉辦過文化講演會等相關活動，此回正好藉由黃旺成斡旋，將文化運動的風潮導入新竹，不僅盛大舉辦的演講活動，也在新竹設立支部交由吳廷輝負責。而臺灣雜誌社也趁此機緣，與吳廷輝訂立於新竹街東門成立取次店之契約，1925年5月11日，王敏川（臺灣支局主任）、施至善（營業部主任）、吳清波（營

業部社員) 專程南下簽約, 而吳廷輝又再請黃旺成幫忙斟酌號召購讀《民報》的廣告文案。⁷³

至於取次店肩負的主要任務, 約有以下三端: 其一, 持蓋有「臺灣雜誌社(臺灣民報社)支局」及經辦人之雙印鑑為憑的「領收證」, 向購讀者收取《民報》報費, 或欠繳的《臺灣》雜誌費。其二, 在經銷範圍內擴張《民報》的購讀者, 並在新的廣告收費方式下, 尋找廣告買主暨向刊登廣告者收取廣告費用。⁷⁴ 其三, 取次店同時也是《民報》批發所,⁷⁵ 在東京印刷完成的報刊運送至臺灣支局後, 經代表取次人納本至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檢閱, 通過後再由支局分送至各地的取次店後, 始能送交到購讀者的手上。



圖 6 高雄州鳳山街取次店《臺灣民報》販賣擴張之實況
 圖片來源：《臺灣民報》66 (1925 年 8 月 23 日), 頁 16。

然而, 民報社透過在各地成立取次店以佈建銷售網絡的經營模式, 仍不免橫生出一些枝節。一方面, 是基層警力對於取次人集金與《民報》購讀者的干預。如 1926 年 9 月下旬, 基隆市取次

73 黃旺成著, 許雪姬編註, 《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3), 頁 156。王世慶, 〈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 收於黃富三、陳俐甫編, 《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臺北: 林本源基金會, 1991), 頁 86-87。葉榮鐘, 〈杖履追隨四十年〉, 收入葉榮鐘著、葉芸芸主編, 《葉榮鐘全集 2: 臺灣人物群像》(臺中: 晨星出版社, 2000), 頁 42-46。

74 〈社告〉, 《臺灣民報》3: 6 (1925 年 2 月 21 日), 頁 16。

75 如吳廷輝的頭銜為「《臺灣民報》新竹批發所取次人」, 見門新太郎編, 《新竹州下產業統計商工業者案内》(新竹: 新竹商工名簿錄發行所, 1925), 頁 41。而日刊新聞社的取次店, 甚至僱傭數名配達夫(送報員)分送報紙, 而每人每月的酬勞不到十元。見〈某日刊紙取次店突然解雇配達夫六名〉, 《臺灣新民報》401 (1932 年 2 月 6 日), 頁 3。

人吳金發前往羅東郡土場營林所收取報費時，被當地巡查以沒有申請入蕃界的護照為由，強制要求出境並遭羅東分室罰金二十元，而前往繳納報費的訂戶亦遭巡查拳腳相向；再如 1927 年 1 月上旬，南投郡取次人洪應用前往新高郡魚池庄，赴庄役場向庄長收費時恰逢警察在場，因而庄長不敢承認購讀《民報》並拒絕繳納報費，日後洪應用更被新高郡警察告發強迫民眾購買《民報》而觸犯違警例，遭草屯郡分室偵訊。⁷⁶ 來自警方的干預與施壓，或許是某些取次人在簽約數個月後就草草解約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則是不法之徒假冒為報社取次人或外務員，向訂戶收金訛騙報費或廣告費：

近來有不法之徒，假冒本社名義，騙取讀者前金，濫出虛偽之領收証，此不僅有妨害本社之營業，誠有污辱同胞之體面，願諸位深加注意，如遇有不法無恥之徒，須嚴重究責勿被騙取為幸，特此急告。

此即為何《民報》要向讀者叮嚀，須認明具支局及經辦人雙印鑑的領收證，同時在報上重複叮嚀讀者勿受詐欺。⁷⁷ 如此雖然表示臺灣支局接掌營業部後，透過取次店招徠讀者、廣告及收費的方式漸收成效，卻也因為銷量日增使得《民報》的購讀費成為有心人圖利的目標，造成社務經營與報費收取上的妨害，令集金業務的困難度提高。反映在營業損益的統計數字上（表 3），1925 年在設置取次店的銷售網絡後，當期利益金即由前一年的損失 5730.1 元（應為株式會社臺灣雜誌社承接臺灣雜誌社之虧損）成長為 2600.11 元，至 1926 年中再增為 3567.64 元，直到 1927 年受文協左右分裂的巨變影響，才縮減為 28.4 元。同時，隨著《民報》銷售量的提高，未收回的購讀費（包含《臺灣》在內）亦與日俱增，從《民報》發行之初的 5091.9 元，到移臺發行前已暴增五倍達 25501.25 元之多，成為民報社經營上最大的隱憂與負擔。

表 3 移臺發行前《臺灣民報》各期利益金、未收金與銷售量一覽表

| 社名 | 臺灣雜誌社 | 株式會社臺灣雜誌社 | | 株式會社臺灣民報社 | |
|-------|-----------|-----------|-----------|-----------|-----------|
| 結算日期 | 1923.4.15 | 1924.6.30 | 1925.6.30 | 1926.6.30 | 1927.6.30 |
| 當期利益金 | 12.00 | -5730.1 | 2600.11 | 3567.64 | 28.4 |
| 未收金 | 5091.9 | 8910.62 | 17187.45 | 21535.03 | 25501.25 |
| 每期銷售量 | 約3150冊 | 約3500冊 | 約7000冊 | 約8271冊 | |

資料來源：〈臺灣雜誌社經費豫算科目表、臺灣雜誌社財產目錄〉、〈臺灣雜誌社收款登記〉，「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編號：LIN022、LIN023。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頁 152、154。〈本社第貳回決算公告〉，《臺灣民報》72（1925 年 9 月 27 日），頁 16。〈本會社第三回決算公告〉，《臺灣民報》123（1926 年 9 月 19 日），頁 15。〈當會社第四回決算公告〉，《臺灣民報》171（1927

76 〈干涉民報讀者的怪聞〉，《臺灣民報》126（1926 年 10 月 10 日），頁 7-8。〈濫用違警例罰集金人〉，《臺灣民報》149（1927 年 3 月 20 日），頁 9。

77 民報社同時也向警方報案處理，但效果不佳。〈社告〉，《臺灣民報》3：6，頁 16。〈急告〉，《臺灣民報》60（1925 年 7 月 12 日），頁 16。〈餘錄〉，《臺灣民報》161（1927 年 6 月 12 日），頁 16。〈警察萬能偏倒無能〉、〈社告〉，《臺灣民報》167（1927 年 8 月 1 日），頁 7、8。

年 8 月 28 日），頁 12。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三十一統計書（昭和二年）》（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9），頁 120、122。

（三）從「外務員集金制度」到「通信員兼取次人制度」

如上所述，在各地成立取次店是臺灣雜誌社／民報社尚未在五州的行政架構下，設置完整的新聞據點之前，透過取次制度延伸出來的收費策略與銷售管道。然而，隨著臺南通信部、臺中出張所與新竹通信部陸續開張，社內也開始尋覓合適的外務員以配合通信部及出張所的業務，並支援臺南、臺中及新竹的集金任務。例如新竹通信部成立後，報社原本指派李友三擔任新竹地區的外務員以販售《民報》，然而由於李友三於 1927 年 2 月，被檢舉參與王詩琅、周和成、吳滄洲所組成的秘密結社「臺灣黑色青年聯盟」而遭檢舉逮捕（《民報》高雄地區取次人，同時是鳳山農民組成員的謝賴登，亦被指控涉及散發不當宣傳歌和藏有聯盟宣言書。又臺北市北區取次人王萬得，嘉義、東石取次人林見財亦牽涉其中），⁷⁸因而在 4、5 月間，吳清波與黃旺成商議新的集金員人選，原屬意由友人曾瑞堯承此職缺，也和支局主任蔡培火討論過「瑞堯君要收民報代的事」。⁷⁹惟不知何故，最後並無人遞補此外務員缺額，是以新竹通信部的業務僅由黃旺成單兵作戰，而集金事務仍歸新竹街取次店負責，只是取次人已由吳廷輝改為蔡清池，8 月間《民報》移臺發行時在報上所刊登的祝賀紀念廣告，便是由蔡清池招募後，轉託交黃旺成送到臺北本社。⁸⁰

由新竹通信部尋覓接替李友三的新外務員之案例，已可約略嗅出民報社開始計畫以各地的新聞據點為基礎，下領外務員集金的方式進行報社業務推展之端倪，即以「外務員集金制度」⁸¹漸次取代「取次制度」。民報社務移轉至臺灣後，臺南通信部與臺中出張所順勢升格為支局，新竹通信部雖未升格但仍持續運作，而本社營業部下亦將業務析分為總務係、計算係、發送係及外務係，其中外務係即由長期負責集金收費業務的吳清波擔任主任，在臺北本社與地方支局的搭配串連下，令外務員集金的營運方式更添制度化之基礎。

因而雖然移臺發行初期，專務林呈祿與營業部部長謝春木商議後，仍決定與移臺前合作的取次店簽訂新合約，故取次店的配置與數量與先前大致相仿，⁸²但在 1928 年前後民報社開始積極改

7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南天書局，1995），頁 888-890。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 64-66。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4），頁 72。

7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 164-166、172。

8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 254、258。蔡清池共招募到四則新竹在地商人贊助的廣告，分別為北門的永星商店、南門的批發商李玉書、新復珍商行、東門的火土自轉車店，見《臺灣民報》168（1927 年 8 月 7 日），頁 14。

81 「外務員集金制度」的說法乃參考自李承機之先行研究，惟該文並未介紹此制度的來龍去脈，使本文在此尚有發揮的空間。見李承機，〈日本殖民地統治下「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苦鬪」—日刊《臺灣新民報》創始初期史料題解〉，頁 3-16。

8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 284。然而同時也與某些取次店解約，並將其業務專交其他取次人（如基隆取次人由吳金發改為簡傳），甚至由民報社直接辦理（如與豐原取次店廖進平、臺東取次店鍾阿金解約）。見〈社告〉，《臺灣民報》190（1928 年 1 月 8 日），頁 9。

行「外務員集金制度」後，取次店數量遂大幅縮減，不出兩年即由 20 處減為 3 處。取而代之者，乃臺北本社與臺中、臺南兩支局配置的外務員（見表 4）。其中，地方支局的外務員多負責各州的集金收費事務，並輔助支局業務，而本社的外務員除了亦有安排的集金區域外，亦有專責擔負此前由取次人負責的全島廣告與讀者募集事務之人選。⁸³

表 4 1928 年至 1930 年《臺灣民報》取次店與外務員配置概況

| 1928年 | 1929年 | 1930年 |
|---|---|---|
| 取次店 (20) | 取次店 (7) | 取次店 (3) |
| 臺北、基隆—簡傳 新竹街—蔡清池 桃園街—林阿鍾 通霄庄—邱光輝 大甲街—黃清波 彰化街—林添 清水街—蔡儒興 鹿谷庄—黃伯虎 竹山庄—陳景三 草屯庄—吳奚 員林街—蔡海 埔里街—羅銀漢、廖阿訓 斗六街—高石海 北斗街—許炳華 嘉義街—林燦玉 北港街—蔡少庭 臺南港町—蔡嘉培 高雄街—黃賜 鳳山街—謝賴登 旗山街—許德源 花蓮港街—林仲謨 宜蘭街—蕭阿乖 | 彰化街—林添 竹山庄—陳景三 埔里街—羅銀漢、廖阿訓 北斗街—許炳華 北港街—蔡少庭 旗山街—許德源 花蓮港、臺東—林仲謨 | 埔里街—羅銀漢、廖阿訓 花蓮港、臺東—林仲謨 旗山街—許德源 |
| | 外務員 (10) | 外務員 (10) |
| | 謝賴登、林燦玉、林皆得、王滿、 周德輝、黃炳輝、張阿茂、何泉 吳家煜（臺中支局） 林培嶽（臺南支局） | 謝賴登、林燦玉、王滿、周德輝、 黃炳輝、何泉、龐朝旺、張春生 吳家煜（臺中支局） 林培嶽（臺南支局） |

資料來源：〈恭賀新年〉，《臺灣民報》189（1928年1月1日），頁16。〈餘錄〉，《臺灣民報》191（1928年1月15日），頁9。〈謹賀新年〉，《臺灣民報》241（1929年1月1日），頁16。〈謹賀新年〉，《臺灣民報》294（1930年1月1日），頁24。

為何移臺發行後，民報社會捨「取次制度」而就「外務員集金制度」？原因或出於以下三端。一者，取次制度不僅無法解決讀者積欠報費的沈痾，甚至讓問題益發嚴重，如上所論，移臺發行前尚未回收的購讀費已逾 25000 元，而株式會社臺灣民報社的資本額亦不過 25000 元。二者，不似外務員為社內職員，與報社相互間為從屬關係而受本社或支局節制，取次店與民報社間則屬契約關係，雖然在業務上會與本社或支局相互配合，卻無法透過職務來管轄，是以地方支局的負責人無從如監督外務員般掌握取次店的收金狀況，導致取次店亦會發生欠費不繳的問題，如林煥清曾向黃旺成訴苦吳廷輝在新竹街取次店解約後，還積欠民報社的帳項近 200 元。⁸⁴ 三者，不只不法之徒會冒用民報社的領收證，有時取次人貪圖一時之便，不待換發新的領收證就私自更改內容，

83 〈社告〉，《臺灣民報》305（1930年3月22日），頁5。

84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註，《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五）一九二八年》，頁264。

難免發生舞弊之事，如謝春木曾南下高雄調查謝賴登三度更改領收證的情況，⁸⁵ 此同樣凸顯取次店難以管理的問題。

「外務員集金制度」是《民報》時期最主要的收費方式，然而及至《新民報》發行後，經營方式又再度革新。1930年3月新舊民報社正式合併後，在《新民報》發行前，社內召集諸取締役、編輯營業兩部的記者與幹部，召開「編輯營業聯席會議」，除了訂定內規及服務規程外，也商議「讀者擴張、廣告募集、舊欠回收」等營業諸事。7月盛大舉行創刊十週年的紀念活動後，二度召開聯席會議，不只幹部、記者與會，「編輯、營業兩部通信員、外務員皆集」。這次會議對於《新民報》的走向影響甚鉅，一方面在編輯上決議擴增紙面、內容刷新外，另一方面也決計改採「（通信員兼）取次人制度」的經銷方式：⁸⁶

本社因於這回改善營業方法，改向來的外務員集金制度為取次人制度，割定區域置專任的取次人負責辦理，就中既定的取次人亦已不尠，然未契約的尚有左列各區域，故如有希望取次者，請即直接向本社營業部接洽一切為盼。⁸⁷

將臺灣島內連同中國的上海、廈門、福州（第23、24、25區）在內，共劃分為二十五個區域，並公告徵求第2區（基隆郡）、第3區（臺北市、七星郡、淡水郡、文山郡）、第4區（海山郡、新莊郡）、第10區（南投郡、新高郡）、第15區（新營郡、北港郡、東石郡）、第16區（臺南市、新豐俊）、第17區（新化郡、曾文郡、北門郡）、第18區（高雄市、岡山郡、澎湖廳）、第19區（屏東郡、東港郡、潮州郡、恆春郡）的取次人。

至於所謂「就中既定的取次人亦已不尠」，其中一類既定人選即為由1929年起，報社為了「地方通信」欄位而增設的「通信員」來兼任，而成為「通信員兼取次人」，如豐原的廖進平與嘉義的林燦玉（他們此前也有擔任過取次人或外務員的經驗）；另一類人選為此前負責集金事務，瞭解地方狀況的外務員，如黃旺成曾詢問長期在新竹通信部／支局下，擔任外務員的何泉是否有轉任取次人的意願，並說明「會見煥清所議取次店設置顛末，並告以對在來的外務員若有意引受，當為特別酌衷條件」，惟當時何泉已決議離開報社轉就他職，因而報社轉與黃旺成的友人姚明簽立取次店合約，而何泉離職後的外務員職務，轉由黃旺成妻妹夫翁石頭接續。⁸⁸ 又如長期擔任本社及臺南支局外務員的王滿和林培嶽，在此回新民報社改易經營方式下，得以優先轉任為彰化及臺南的取次人。⁸⁹ 由是可見，這套新的「通信員兼取次人制度」，乃兼採過往的「取次制度」與「外務員集金制度」，並串連編輯與營業兩部業務而成，同時，在報社內仍保留通信員與外務員的職位。因而在新制施行下，《新民報》及至發行日刊前的取次店、外務員及通信員的配置概況如下

8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290。

86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96。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七）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7），頁116、296-297。

87 〈取次人招募！！〉，《臺灣新民報》332（1930年9月27日），頁14。〈取次人招募！！〉，《臺灣新民報》334（1930年10月11日），頁9。同時，新民報社同時也招募彰化以南的「廣告募集員」，見〈廣告募集員招募〉，《臺灣新民報》332，頁14。

8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七）一九三〇年》，頁334、336-338、342、346-347、350。

89 〈社告〉，《臺灣新民報》337（1930年11月1日），頁9。

表所示：

表 5 1931 年至 1932 年《臺灣新民報》取次店、外務員及通信員配置概況

| 1931年 | 1932年 |
|---|--|
| 通信員兼取次人 (8) | 通信員兼取次人 (8) |
| 臺北－吳鴻爐 豐原－廖進平 草屯－洪右 清水－丁碩渝 員林－高平儒 嘉義－林燦玉 花蓮港－林仲謀 臺東－余阿德 | 桃園－林水火 豐原－廖進平 草屯－洪右 清水－丁碩渝 員林－高平儒 花蓮港－林仲謀 埔里－廖阿訓 西螺－郭聯坤 |
| 取次人 (10) | 取次人 (9) |
| 宜蘭－莊金英 基隆(兼)－周德輝 大溪－江明標 新竹－姚明 臺中－陳玉 彰化－王滿 埔里－羅銀漢 新營－吳新欽 臺南－林培嶽 羅東－邱春榮 | 宜蘭－莊金英 新竹－姚明 臺中－陳玉 彰化－王滿 埔里－羅銀漢 新營－吳新欽 楠梓－吳龍 臺南－林培嶽 高雄－王天賞 |
| 外務員 (4) | 外務員 (4) |
| 施至興、周德輝、陳啟清、張崑生 | 施至興、周德輝、張春生、張崑生 |
| 通信員 (3) | 通信員 (3) |
| 臺北－張晴川 桃園－黃師樵 埔里－蔡添丁 | 嘉義－林燦玉 埔里－廖阿訓 廈門－張晴川 |

資料來源：〈恭賀新年〉，《臺灣新民報》345（1931年1月1日），頁28。〈恭賀新年〉，《臺灣新民報》396（1932年1月1日），頁24。

此外，新民報社的「取次人制度」還有另一個特色，即取次店得以透過募股集資的方式來運作。根據黃旺成的日記記錄，1930年9月，林煥清前往新竹向決議離職的外務員何泉回收領收證及現金後，往赴姚明家簽訂取次店契約，爾後黃旺成不僅和姚明斟酌取次店經營的種種辦法，也招募新竹在地友人出資加入取次店的股份，而黃旺成本人亦出資100元，最後總計募得數百元的股金。雖然日記並未明載取次店資金運用的方式及盈虧損益為何，然而從姚明在經營一年後未多加考慮便與新民報社續約看來，在股金的挹注下新竹取次店的運作應該還算順利。⁹⁰又取次店亦可聘請外務員協助業務，如嘉義取次人林燦玉為了「擴張業務並便利於本報愛讀者」，於是聘僱張武露為取次店外務員。⁹¹

9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七）一九三〇年》，頁349、351、356、358-359、364-365、366、373、389、401、405-406。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八）一九三一年》，頁52、55、60、290。

91 〈社告〉，《臺灣新民報》363（1931年5月9日），頁11。

而新民報社之所以再以「通信員兼取次人制度」取代「外務員集金制度」，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舊欠回收」的成績依舊欠佳，在新民報社接手時，未收金早已突破 30000 元（參見表 6）。同時，外務員制度雖然讓報社較易於管理與掌握集金狀況，卻喪失了取次制度可結合派報販賣與報費收取的便利性，而須由不同的管理系統來負責，⁹² 結果導致《民報》的每期的平均銷售量由 1928 年逾 11000 冊的高峰，至 1929 年迅速跌落至 7200 冊左右（參見表 7）。

表 6 移臺發行後《臺灣（新）民報》各期利益金、未收金一覽表

| 社名 | 株式會社臺灣民報社 | 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 | | |
|-------|-----------|------------|------------|------------|
| 結算日期 | 1928.6.30 | 1929.12.31 | 1930.12.31 | 1931.12.31 |
| 當期利益金 | 3.14 | 816.20 | -7549.53 | -15347.13 |
| 未收金 | 30157.71 | X | 37338.58 | 42706.98 |

資料來源：〈第五回決算公告〉，《臺灣民報》223（1928年8月26日），頁12。〈第一回決算報告〉，《臺灣民報》299（1930年2月8日），頁5。〈第二回決算公告〉，《臺灣新民報》350（1931年2月7日），頁14。〈第三回決算公告〉，《臺灣新民報》402（1932年2月13日），頁9。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 大 院 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頁154。

表 7 1927-1931 年《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銷售量一覽表

| 年份 | 1927年 | 1928年 | 1929年 | 1930年 | 1931年 |
|------------|----------------------|----------------------|----------------------|----------------------|----------------------|
| 臺灣島內(各州最多) | 407617 (臺中129970) | 564382 (臺中158927) | 368757 (臺中108353) | 371937 (臺中116259) | 352131 (臺中110271) |
| 日本(東京銷售量) | 6895(3500) | 12132(5400) | 8221(5435) | 6708(3120) | 8246(4661) |
| 其他殖民地 | 638 | 219 | 208 | 208 | 981 |
| 外國(中國銷售量) | 6661(4930) | 9058(6465) | 6056(3872) | 5980(2340) | 16816(8110) |
| 總銷售量 | 421822 | 585791 | 383242 | 384833 | 378174 |
| 平均每期銷售量 | 8271 | 11265 | 7231 | 7546 | 7415 |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三十一統計書（昭和二年）》，頁120、122。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三十二統計書（昭和三年）》（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0），頁126、128。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三十三統計書（昭和四年）》（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1），頁128、130。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三十四統計書（昭和五年）》（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2），頁132、134。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三十五統計書（昭和六年）》（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3），頁132、134、136。

92 李承機，〈日本殖民地統治下「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苦闘」—日刊《臺灣新民報》創始初期史料題解〉，頁3-16。

事實上，到了新民報社採行「通信員兼取次人制度」的時期，舊欠回收和銷售量欠佳的問題依然未解，至發行日刊前，未收金已累積超過 42000 元，同時社務經營也處於連年虧損的狀態，而《新民報》的銷售量也只有持平，維持平均每期 7500 冊上下的數量。然而新民報社仍然打算將這套可靈活調度人力，又串連編輯、營業事務，且兼顧派報販賣和收取報費的經營模式，在《新民報》發行日刊後仍延續沿用，甚至以此制度的適用性為公開徵才的採擇標準：

本報的日刊，豫定最近發行，現實正在忙於種々の施設。就中對於通信員及取次人的設置，已經決定了方針。原則上每郡各置一人，但斟酌地方事情，範圍儘可伸縮。如取次人能兼辦通信，更為歡迎。希望通信員者可將履歷書及試作原稿（關於地方時事限二百字以內），取次人要豫定區域內的責任部數及履歷書，至急送到本社，以便取捨。⁹³

五、結論

日治臺灣殖民地統治的媒體政策之確立，本乎於「兒玉一後藤體制」下，為了穩固統治而立下了規範新聞紙的基調，針對於島內發行的新聞紙採取須經臺灣總督同意的「許可主義」，迥異於日本內地施行的「申告主義」。且為了防堵日本內地的發行報備制成為突破臺灣島內發行許可制的法律缺口，針對島外發行的「移入紙」，再以「檢閱制度」與「移入紙取次人許可制度」加以約束，即獲准許可在臺灣發售的新聞報刊，必須在正式流通前透過總督府認可的代表取次人（特定經銷人）納本檢閱，而審查通過後的印刷成品也須由取次人經手後始得以販售。在檢閱及取次的規範配套下，不僅《民報》需要經過檢閱的篩選挑剔，才能正式決定它的樣貌，也因為讀者在入手捧讀之前，有太多外在因素如「發賣頒布禁止」、「檢閱未了」、取次人的許可申請核准等行政手段，足以影響報導文本的「時效性」與「熱度」，從而抑制《民報》所企求的時事報導真正的影響力。此外，《民報》也必須在這套機制底下去布建其銷售網絡，是以前後歷經了「取次制度」和「外務員集金制度」的嘗試，最終發展出「通信員兼取次人制度」做為日刊後經營模式的基礎。

而此般的媒體環境，除了影響報導文本的產出與意義及報刊的流通渠道外，竟也導致《民報》的體質產生變化。在移入紙時期，打著「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招牌的《民報》系列報刊，面臨總督府以檢閱之名祭出「發賣頒布禁止」的顛預手法，或是「檢閱未了」的拖延戰術，社內會採取透過運動團體訴諸中央政界以質疑總督府的言論政策、將被禁內容贈呈朝野人士與新聞機關以為宣傳、多方投稿挑戰檢閱的底線與標準、尋求與東亞各界留學生和知識分子共組言論戰線、直接向臺灣總督陳情與溝通，並在報上列出紀錄、出言諷刺以留待讀者公評等各種手段，來捍衛自身的「言論」立場。然而在移臺發行後，《民報》不只放棄純漢文報刊的立場增闢日文欄，也在爭取新民報社的成立許可與發行日刊《新民報》的過程中，在言論上漸趨與握有裁決權總督府妥協，報社內部因著體制的規範而運作出一套「自我檢閱」的機制，並隨著檢閱事例的累積，開始建構出一套「經驗性的檢閱標準」，且對於總督府的檢閱與報上遭檢閱「開天窗」的部分，亦

93 〈社告〉，《臺灣新民報》400（1932年1月30日），頁3。另可見〈通信員及取次人募集啟事〉，《臺灣新民報》402（1932年2月13日），頁4。

不再積極爭取其言論的正當性。此前在《臺灣青年》與《臺灣》時期，社內也曾組織「原稿審查會」採取「合議制編輯法」，雖然同樣具有自我檢閱的性質，然而這是一種在嚴厲的檢閱下尋求言論的突破與出口的方法，與移臺發行後為了報社的經營與發展，透過自我檢閱小心翼翼尋求對立又不進入危險狀態的平衡點，而與檢閱體制妥協的目的截然不同。

換言之，《民報》在邁向日刊的過程中，相較於在與總督府談判的過程中，對於經營權上保有純臺灣人資本與董、監事席次的堅持，而決意不與總督府日、臺人各半的條件妥協之決心，⁹⁴在言論立場上可說早已漸次棄守，而服膺於檢閱體制下。就此而言，《民報》的體質已歷經了由守護「言論」到守護「機關」的重大轉折，為了在官方主導的媒體市場上保有一席之地，《民報》的選擇是延續「機關」的形式而不是堅持「言論」的立場，一如日刊後擔任新民報社經濟部長兼論說委員的陳逢源所坦言，對比屢遭檢閱伏字的《民報》激烈言論，日刊《新民報》的言論已轉趨緩和。⁹⁵

94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215、228、295、345、392。

95 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收於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141。

國共兩黨黨營媒體所報徐蚌會戰之勝敗

The Reports Related to the Battle of Hsupeng by the KMT and CCP Newspapers

王文隆 Wang Wen-lung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現職：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中華民國外交史、中華民國教育史、應用史學。重要著作有：《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重慶當局對戰後寮國的規畫與實踐》、《近代中國的中外衝突與肆應：以衝突、糾紛為觀察視角聚焦剖析晚清以降》、《天津事件與中國人犯之管轄權問題》、《中華民國經貿外交之研究(1949-1979)》、《從個人意識到「國家政策」：反共抗俄的塑造(1945-1952)》。

摘要

內戰勝敗關乎政權輪替，交戰雙方莫不動用所有資源力搏，不僅投注大量軍事資源，也必須關照後勤、氣勢與資源調度。其中，情報與資訊的掌握，屬於軍機，虛虛實實都有影響判斷的可能，是故除了透過情報網絡採集消息外，也有透過媒體刻意放話、隱敗揚勝以塑造氣勢，爭取民心。徐蚌會戰為國共內戰期間的三大戰役之一，也是中共決心一統江山，不接受劃江而治之建議的關鍵。該戰役在中國國民黨與中共所轄報刊中所報導出來的過程與結果，雙方對該戰役我帶來的影響與詮釋，殊堪玩味。本文將以中國國民黨所屬《中央日報》與中國共產黨所屬《人民日報》為主要材料，搭配檔案管理局所藏國軍檔案、國史館所藏蔣中正總統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中央宣傳部資料，對照實際戰場情況與國共雙方見諸報刊的文字，觀察透過政黨所發的新聞或是假新聞，是如何詮釋與操作的。

前言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裡，除了最原始的口語傳播外，透過各式各樣不同的電子載體、傳播媒體，以及社群軟體等，訊息量能多到目不暇給，間雜著虛虛實實的消息，似假似真，經常難以查證與判斷，但也或許根本來不及證實，很快地新的訊息又蜂擁而來，有時是一部分論題的持續延燒，有時又很快地將一部份話題給淹沒。1940年代的東亞，充斥著烽火，在尚未出現諸多電子載體的此時，人們獲取資訊的方式，多是透過口耳相傳、眼見為憑、書信來往，以及報刊、廣播等不同的渠道，藉以取得資訊、篩選訊息，或是在真實與虛假的資訊中找尋蛛絲馬跡，藉此判斷當前局面，感知眼前的情勢，進而決斷未來的下一步。

對日抗戰結束，國共內戰隨之而起，這是國共間的生死決鬥，規模更大、範圍更廣、衝擊更強，國共雙方莫不使出全力，動用所有可以運用的資源投入戰爭。現代化戰爭拚搏的是總體戰，除了戰場之外，後勤補給、情報傳遞、心戰宣傳在在都影響戰爭的勝敗，不可輕忽。情報與資訊的掌握，屬於軍機，虛虛實實都有影響判斷的可能，是故除了透過情報網絡採集消息外，也會透過媒體刻意放話、隱敗揚勝以塑造氣勢，爭取民心。戰火紛呈，消息紊亂，在在影響眾人的判斷。

時人所依賴的情報來源，且能存留至今的，或許就屬報刊的留存最是完整，公營、黨營與民營報刊皆有。而在資訊管道有限的情況之下，透過報刊或其他傳媒所傳遞的內容，是否有刻意強調、忽略的部分？尤其是當國共內戰戰爭遍地，前線的消息透過報刊的視角，所呈現的是如何的戰爭樣貌？對於戰爭的勝敗又是如分析與看待？對於戰爭之下的局勢又是如何報導？想要呈現如何面貌給他的閱聽人知悉？

民國時期報刊數量眾多，筆者無法全部閱覽，因而僅挑選最具有黨派色彩的兩份報紙作為樣本，一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中央日報》，一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以往對於國共內戰期間媒體、輿論與政策間的互動，在國內要屬輔仁大學歷史系高郁雅教授最具代表性，除了她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的《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的變局》一書外，亦發表了〈戰後國民黨新聞機構的企業化嘗試（1945-1949）〉、〈戰後中國報界的紙荒問題——以上海為中心（1945-1949）〉、〈1949年中國報界的政治轉向——以大公報為中心〉等論文，對筆者了解與認識1945到1949年間，中國報界及中國國民黨辦報的情況有相當大的助益。然而，高教授的研究並不多涉及國共兩黨黨報的比較，因此本文還有能發揮的空間，對報導與事實間的落差加以探索。本文以此兩份黨派立場歧異，政治對立的報紙，對同一戰爭的報導加以分析，所挑選的為徐蚌會戰。此為國共內戰期間的三大戰役之一，也是中共決心一統江山，不接受劃江而治之建議的關鍵。該戰役在中國國民黨與中共所轄報刊中所報導出來的過程與結果，對照實際戰場情況與國共雙方見諸報刊的文字，觀察透過政黨所發的新聞或是「假新聞」。

一、中央日報與人民日報

在此先對兩份報刊的成立背景稍作介紹。

(一) 中央日報

清末革命運動蜂起，革命黨人為了宣傳革命，除以傳統的口耳相傳外，多透過報刊的發行，以紙張為載體，傳遞革命思潮。革命團體最早的宣傳刊物，或許要屬《中國日報》，這是陳少白

奉孫中山之命籌畫，於 1900 年 12 月在香港正式出刊的報紙，可說是革命團體中最早的機關報。¹ 同盟會於 1905 年在東京創立後，整合海內外革命團體，也接辦華興會做為機關刊物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將其改名為《民報》，作為同盟會之機關報。此外，諸如《楚報》、《商務日報》、《大江報》等，都曾經是黨營機關報刊，用於革命宣傳。民國建成之後，中國國民黨仍籌辦包括《民國日報》、《廣州民國日報》等刊物。中國國民黨所辦報刊，種類繁多，管理各異，重點在宣傳而非營利，因此經常沒有章法，透過主事者自行判斷，經營多不長久。²

《中央日報》成立於 1928 年 2 月的上海，最初由孫科掛名董事長，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丁惟汾為社長，總編輯為彭學沛。何應欽為中央日報出刊所撰的〈本報的責任〉一文中，稱中央日報為中國國民黨之言論機關報，一切言論應以主義政策為依據，這或許表達了黨內對該報的一般看法與期盼。³ 同年 6 月，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設置黨報條例草案》，訂立各級黨報設置的規範，按中央、省市、地方等不同層級，由各級宣傳部負責，各級黨報依此紛紛成立。《中央日報》歸中央宣傳部節制，為層級最高的機關報。⁴ 為便於指揮，1929 年 2 月，中央日報社遷往首都南京，由中央宣傳部部長葉楚傖擔任委員會主席，下設經理部與編輯部，由嚴慎予擔任總編輯。⁵ 爾後，因抗戰軍興，在南京的中央日報社隨政府西遷重慶，也因而衍生地方版《中央日報》，但其為中國國民黨之機關報的地位不變，不僅刊載諸多黨務、政務消息，也是黨部發布消息、闢謠的權威紙媒，與音聲為主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廣播無線電臺（簡稱：中央廣播電臺），為當時最重要的黨營媒體。

抗戰結束後，政府為推動憲政，必須一改原本「以黨領政」的訓政結構，中央日報轉變其形態，組織董事會，改採企業化經營，在此期間便有了「追求新聞自由」與「聽從黨意指揮」的衝突。追求新聞自由與企業化，使中央日報一度變了風格。⁶ 雖中央日報的從業人員多為黨校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生，當此期間卻報導了達官貴人紙醉金迷，對比於戰禍難民顛沛流離的新聞，以及孚中、揚子公司利用孔宋權勢貪汙外匯三億元的獨家，使得銷路大增。但或許因為衝過了頭，在黨內高層嚴重關切以及國共內戰漩渦的內外交逼下，中央日報追求新聞自由的空間受到壓縮，回到老成持重的狀態。⁷ 據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陸鏗回憶，1948 年初夏一次中央日報的社務會議中，中央日報總主筆兼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陶希聖扳起臉孔說：「先中央，後日報。」並接著說：「這是大局。」⁸ 由此或能窺見黨中央力量重入中央日報的力道。有些諷刺的是，1948 年 3 月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方才出版了《新聞自由論》一書，但在大局之下，理念只能暫擱一旁。⁹

既然曾屬中國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也是各級黨部及中央地方機構必訂的報刊，其供銷範圍以在 1947 年來看，發行人數已經超過 8.5 萬份，甚至一度衝破 10 萬份，在全國來說屬第四大

1 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94），頁 147-148。

2 高郁雅，《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1945-19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5），頁 17。

3 〈本報的責任〉，《中央日報》，1928 年 2 月 1 日，第四版。

4 〈請將上海中央日報移設首都案〉（1928 年 10 月），《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藏，檔案號：會 2.3/92.6。

5 〈設置黨報條例草案〉（1928 年 6 月 5 日），《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藏，檔案號：會 2.3/85.11.1。

6 除了風格的變化之外，中央日報也捲入黨內派系鬥爭，由 CC 派掌握的宣傳，與政學系等其他派系間的爭鬥，也使得中央日報在抗戰結束之後現於亂局。能參見：高郁雅，《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1945-1949）》，頁 66-73。

7 陳志昌，〈重起爐灶—遷臺初期的中央日報〉（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4），頁 36。

8 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頁 214。

9 馬星野，《新聞自由論》。南京：中央日報，1948。

報。¹⁰ 然而，或因身為新聞媒體，消息靈通，中央日報社在徐蚌會戰即將開打的時候，就已經著手遷臺準備，先是南京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藉參加臺灣省光復三週年活動於 1949 年 10 月來臺，接著總經理黎世芬也派臺籌備，爾後派駐臺灣的記者龔選舞伴著馬星野、黎世芬等高層眷屬，於同年 11 月間搭乘中興公司輪船抵達基隆。¹¹ 徐蚌會戰爆發的時候，中央日報其實也一邊忙著疏遷準備。

(二) 人民日報

國共內戰期間創立的《人民日報》則是另一個景象。

1946 年 2 月中，劉少奇致電中共中央，基於晉察冀和晉冀魯豫解放區連成一氣，建議合併。幾天後，毛澤東電覆同意，並指示成立華北局代之，另也討論成立大黨校、大軍校、大黨報等問題。¹² 3 月初，中央工委會議通過合併案，大黨報的提案也跟著提出。¹³ 同年 4 月，中共華北中央局決定創辦機關報，將太行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張磐石調任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總其責。¹⁴ 同年 5 月 15 日，《人民日報》創刊號出刊，出版地在邯鄲，晉冀魯豫邊區人民政府主席楊秀峰在該刊的祝辭中提到：「真正人民的報紙不僅是人民的喉舌，還應該是人民的司機和事業的組織者；在當前更應該成為邊區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一顆原子彈。」¹⁵ 就在中國國民黨之機關報《中央日報》改採企業化經營，並試著推展新聞自由的此時，一份作為黨的傳聲筒，緊跟著中共中央宣傳策略所辦的《人民日報》出現了。爾後隨著解放區的併合，在 1948 年 6 月，晉冀魯豫邊區與晉冀察邊區合併為華北解放區，1948 年 6 月 15 日，新版《人民日報》合併晉冀察邊區所辦的《晉冀察日報》重新出刊，刊頭重算，為中共華北局之機關報，其刊期為目前仍發行之《人民日報》所延續。¹⁶

人民日報社總部設在河北省平山縣地里庄，距離當時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約 30 餘公里，距離華北局及華北軍區司令部駐紮的煙保村約 2.5 公里，距離位在王子村的華北人民政府約 1.5 公里，仍由張磐石擔任社長兼總編輯，副總編輯為安崗，發行量有 4 萬份。¹⁷

以上大致將中央日報與人民日報的源流以及國共內戰期間的情況做了描述，或能看出，當「實施憲政」列上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時程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對於宣傳有著不同的規劃。中國國民黨試著將新聞傳媒回歸一般普世的「新聞自由」，並使中央日報社成為一般企業，不僅寄望她不需仰賴黨部經費支持，最好還能自負盈虧，獨立運作。或因新聞自由的旗號，以及必須自負盈虧使然，使得中央日報社在這段期間的經營相對來說比較商業化，但也因為報導上的擦槍走火，以及內戰局面惡化，使得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 1948 年年中之後，又再將中央日報社緊緊抓牢。不過中國共產黨與人民日報社的做法就不是如此，從《人民日報》創設之初的目的，

10 黨營文化事業編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二：中央日報》（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1972），頁 54。

11 龔選舞，《一九四九年國府垮臺前夕：龔選舞回憶錄》（臺北：衛城出版社，2011），頁 367-340。

12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前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 418。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 134, 137。

14 錢江，《晉冀魯豫《人民日報》紀實》（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頁 15。

15 楊秀峰，〈人民日報發刊志祝〉，《人民日報》，1946 年 5 月 15 日，第二版。

16 人民日報社網上報史館：<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124442/7377149.html>。

17 錢江，〈在戰火中誕生的黨中央機關報（連載十）〉，《人民日報》，2007 年 6 月 8 日，第四版。

就是為黨宣傳與服務，要作為黨機器的傳聲筒，用以帶領群眾、引導輿論。兩方黨報的媒體戰，在 1948 年年底，跟著三大戰役的烽火一同燃起。

二、徐蚌會戰前的國共布局

徐州為兵家必爭之地，雖地屬江蘇省轄，但實際上為四省通衢，北連山東、西連河南、南接安徽。基於「守江必守淮，守淮必守徐州」的考慮，而徐州為隴海鐵路與津浦鐵路交會點，戰略地位更顯重要。

抗戰結束後，徐州設有綏靖公署，由顧祝同擔任主任，1947 年 3 月，改為徐州指揮部。1948 年 6 月，為了因應即將爆發的徐蚌會戰，國軍統帥部原寄望統一華中、華東軍事指揮，並盼由華中剿匪總司令部長官白崇禧出面主持，但卻被白所婉拒，乃維持原有華中剿匪總司令部，另立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命劉峙擔任總司令，杜聿明擔任副總司令，下轄第二、六、七、十二、十三、十六等六個兵團，還有第一、第三、第四綏靖區所屬部隊，糜集約 75 萬兵員。¹⁸ 相應地，中共紅軍集結陳毅領導的華東野戰軍 16 個縱隊，以及劉伯承領導的中原野戰軍的 7 個縱隊，連同地方武裝 7 個旅，約 66 萬兵員。¹⁹ 戰場東起海州（連雲港），西至河南中部，南抵蚌埠、淮河，平原遼闊，幅面很大，國軍基本上沿著隴海與津浦兩條鐵路部署，實施內線作戰，欲利用鐵公路交通的便利加強機動性消滅共軍。共軍則自北往南，繞過交通線跟大城推進，並伺機伏擊城鎮據點。

杜聿明在戰前的評估認為，國軍在華東仍具優勢，應搶占機先，將陳毅所屬一部分共軍消滅，與此同時，華中剿總也出兵牽制河南省境由劉伯承指揮的共軍，鉗形作戰，北推反攻山東。作戰計畫原訂 1948 年 10 月中實施，然而隨著同年 9 月 24 日濟南淪陷，10 月中東北戰局逆轉轉惡，杜聿明奉命前往東北處理國軍後撤事宜，徐蚌地區的作戰計畫也就延宕下來。²⁰ 到了 11 月 3 日，統帥部修改策略，改以徐州為中心部署，主動放棄海州，以固守徐州為目標，鞏固運河以及津浦鐵路維持運補。²¹ 相應地，共軍佔領濟南之後，偵知國軍放棄北援，在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政委粟裕的規劃下，提出了淮海戰役的構想。戰役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進佔淮安與淮陰，接著控制寶應與高郵，第二階段進佔連雲港及整個海州。共軍鎖定的第一個目標是國軍黃伯韜的第七兵團。²²

徐蚌會戰開打之際，正是遼瀋會戰結束之時，瀋陽在 1948 年 11 月 2 日落入共軍之手。黃伯韜奉命從山東境內的臺兒莊南撤，退往徐州，但為了等待海州移撥過來的部隊，在運河邊等了兩天。限於運河上僅有鐵橋一座，大部隊渡河移動緩慢，又有疏遷的民眾與眷屬交雜，因而貽誤了軍機，加上駐紮徐州與運河間的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何基濂、張克俠（西北軍）於 11 月 8 日率眾投共，發起「賈汪起義」，使徐州週圍出現國軍防線的破口，黃伯韜的部隊於 11 月 11 日受到共軍包圍，

18 徐蚌戰場國軍兵員總數，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出版的《國民革命戰役史》中稱，國軍番號雖多但未滿編，所估為 55 萬人，就帳面上看來比共軍的 60 萬人還少。詳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一戡亂（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 77, 85。

19 田玄、林桶法，〈國共激戰與國軍全面撤退〉，收於：林桶法（編），《中華民國專題史：國共內戰》（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228-229。

20 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一戡亂（下）》，頁 86-87。

21 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一戡亂（下）》，頁 93-94。

22 田玄、林桶法，〈國共激戰與國軍全面撤退〉，收於：林桶法（編），《中華民國專題史：國共內戰》，頁 229。

只得以隴海鐵路線上的坯縣碾莊為核心部署，抵擋共軍猛擊並等待友軍救援。²³

何基澧、張克俠率眾投共，蔣中正在當天就收到第三綏靖區司令馮治安傳來的電報中得知²⁴而蔣中正也從黃伯韜所發電報，知道黃伯韜部所俘共軍透漏共軍首要目標為黃伯韜兵團的情報。²⁵為了將黃伯韜從包圍圈中救出，蔣中正命邱清泉、李彌抽調兵力趕往馳救。²⁶調兵遣將的情況，在檔案史料中頻繁出現，但在中央日報的報導上卻大幅掩蓋。

三、報導中的黃伯韜兵團

黃伯韜兵團被圍期間，《中央日報》上僅對徐州東北側的郟城、臨城地區有所報導，如1948年11月7日第二版登出一篇〈郟城西圍剿殘匪，臨城等地戰鬥中，陳匪部兩排長投誠〉，次日又登出〈徐州情勢安謐，郟城西已無股匪，臨淮關南匪東逃〉的新聞，並在報導中說道：「國軍刻以徐州為中心，佈置一十字架型陣地，以待共匪自來送死。」²⁷同月9日報導〈郟城碭山發生戰事韓莊犯匪已被擊退，浦口北上快車恢復間行〉對戰事的描述寥寥數語，但稱津浦路南段遭共軍以地雷破壞，現已修復通車云云。²⁸

中央日報對於徐蚌會戰的第一篇大篇幅的報導，是一則捷報。1948年11月10日，報導稱徐蚌會戰到了第五天，國軍主動放棄河南開封、鄭州、商邱、江蘇東海等據點，集中兵力於徐州，在徐州以東90華里一個名為黃口的村落及運河兩岸發生激戰，共軍遺屍萬餘，並稱國軍都到了預定位置，準備給共軍更大規模的打擊。²⁹次日，中央日報報導徐州市街「晴空萬里、鐵鳥肩飛，予人以愉快之感。徐浦交通恢復，更使人心振奮。市民為酬答將士勞績，已展開大規模勞軍。」同一天，上海也致電慶賀初捷。³⁰11月13日的報導中，更誇大地宣稱黃伯韜部大捷，「殲匪三萬七千人」，全國慰勞總會募集大量物資送往前線。³¹前前後後的報導都是捷報，連黃伯韜被圍在碾莊，都詮釋成是國軍主動挑選戰場以殲共軍的佈置。³²爾後更由官方的國防部發布訊息，稱徐州大捷，報端還發布邱清泉因剿匪戰功獲頒青天白日勳章的消息。³³最是奇妙的是，位於津浦鐵路上的重鎮宿縣，因防務空虛遭共軍襲奪，切斷了徐州南撤的退路，卻在報導中稱佔領宿縣的共軍遭國軍困在火車站附近，陷入重圍。³⁴

23 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一戡亂(下)》，頁101-102。

24 〈馮治安電蔣中正〉(1948年11月8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24-034。

25 〈黃伯韜電蔣中正〉(1948年11月1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300-00193-108。

26 〈李彌電蔣中正〉(1948年11月12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300-00193-132；〈邱清泉電蔣中正〉(1948年11月13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300-00193-139。

27 〈郟城西圍剿殘匪，臨城等地戰鬥中，陳匪部兩排長投誠〉，《中央日報》，1948年11月7日，第二版；〈徐州情勢安謐，郟城西已無股匪，臨淮關南匪東逃〉，《中央日報》，1948年11月8日，第二版。

28 〈郟城碭山發生戰事韓莊犯匪已被擊退，浦口北上快車恢復間行〉，《中央日報》，1948年11月9日，第二版。

29 〈徐州會戰初捷，斃傷匪軍萬餘，擊敗陳毅陳賡匪部，劉峙表示確有制勝把握〉，《中央日報》，1948年11月10日，第二版。

30 〈徐北國軍攻順利，兩翼敗匪整理未動，黃口西北擊潰陳毅兩縱隊〉，《中央日報》，1948年11月11日，第二版。

31 〈徐州東翼大捷，殲匪三萬七千，匪勢全線動搖，陣地工事內全炸毀，碾莊附近匪軍求降〉，《中央日報》，1948年11月13日，第二版。

32 〈陸空協剿續傳捷訊，徐東又殲匪五千，一小時內連克據點數處，策反收效匪三千餘投誠〉，《中央日報》，1948年11月14日，第二版。

33 〈總統撥百萬元，犒嘗會戰將士，邱清泉獲青天白日勳章〉，《中央日報》，1948年11月19日，第二版。

34 〈徐州會戰十日，殲滅匪逾十萬，邱黃會師反包圍匪，南路昨克十餘據點〉，《中央日報》，1948年11月16日，第二版。

蔣中正並非不知道前線情況，在他的日記中痛罵邱清泉帶的是老翁兵，往救進展有限。³⁵不過一般庶民在 11 月 20 日中央日報報導中卻只見：「徐州會戰勝利結束」，附帶報導稱邱清泉正率部追逐潰匪的消息。³⁶11 月 24 日報導還說黃伯韜已與邱清泉、李彌相互呼應，合擊共軍。然而實際上，碾莊已於 11 月 22 日遭共軍猛攻陷落，黃伯韜所部彈盡援絕，黃伯韜自戕身亡，此時僅能以「在天之靈」配合打擊共軍。

相對來說，《人民日報》的報導就比較實在一些，或因顧慮戰機，避免洩密，或是戰地與出刊地距離遙遠的關係，通常事件見報約晚二至三天。11 月 11 日，人民日報刊載共軍佔領海州的新聞，並提到解放淮海地區的戰役已經開始，但對於戰果的描述甚微，反而政治上的宣傳很多。³⁷首度提及戰果的，大概要是 11 月 12 日登載的報導，提到俘虜國軍 1,200 人。³⁸而提到 11 月 9 日馮治安部兩師投共，因而使徐州門戶大開的報導在 11 月 13 日。³⁹隔一天，才將這兩支部隊的番號與師長姓名公佈。⁴⁰爾後數日，關於戰場的報導堪稱平實，對於邱清泉兵團及李彌兵團往救被圍碾莊的黃伯韜兵團，稱每日僅約前進 5 里的報導也符合事實，斃敵數千的敘述也不致誇大。⁴¹嗣後統計稱，國軍的援軍在 11 天內遭到共軍強力阻撓，僅前進了 30 里的說法也與事實相近。⁴²11 月 25 日在人民日報中大篇幅報導了黃伯韜兵團覆沒經過，內容與真實戰爭經過相去不遠。在同年 12 月 3 日刊登了更詳盡的敘述，提到殲滅了黃伯韜兵團共十萬人的消息，或也因為人民日報記者看到了中央日報所發消息，在該報導中還戲謔地稱「蔣介石這次增援計劃的唯一產物，就是中央社所連日喧嚷的所謂“共匪總崩潰”，“國軍偉大勝利”等一連串的夢話。」⁴³

人民日報諷刺中央日報所報為夢話，但南京方面似乎還將這場夢演得真實，不僅南京各地湧入慰勞前線官兵的物資，還由張道藩領銜組團乘機前往徐州慰勞，隨行的有海內外記者，一行除了參觀之外，還向徐州剿總司令劉峙獻旗致賀，似乎煞有其事。⁴⁴中央日報附帶刊載了中外記者團前往邱清泉兵團訪問，隨軍考察國軍衝鋒情況，以及發布記者團前往二陳集目睹共軍屍首的照片。⁴⁵黃伯韜在 11 月底殉職的事情，在人民日報中早已揭露，在中央日報中直到 12 月 3 日的報導中，才簡單地以兩行文字帶過，稱黃伯韜兵團陣亡二萬，受傷三萬，一萬餘人突圍，黃伯韜本

35 〈蔣中正日記〉，1948 年 11 月 19 日。

36 徐南國軍攻克三堡，匪兩廣縱隊幾全殲，宿縣近郊匪正進退維谷〉，《中央日報》，1948 年 11 月 20 日，第二版。

37 〈全殲商邱敵一師，佔領海州新浦碭山〉，《人民日報》，1948 年 11 月 11 日，第一版。

38 〈徐州西線我軍續獲勝利 俘匪第五軍千餘人 一個輸送營全部向我投誠〉，《人民日報》，1948 年 11 月 12 日，第一版。

39 我向徐州四面合圍 馮治安部兩軍起義 敵第二第七兩兵團正被圍攻圍殲〉，《人民日報》，1948 年 11 月 13 日，第一版。

40 淮海解放戰爭進展迅速 北路大軍直迫徐州 東路殲敵一師一團 攻佔重要軍港連雲港〉，《人民日報》，1948 年 11 月 14 日，第一版。

41 〈徐州週邊我軍續獲大捷 殲敵一零七軍大部 四十四軍及一百軍已被殲殆盡〉，《人民日報》，1948 年 11 月 17 日，第一版。

42 〈我殲黃伯韜兵團戰役中 頑強阻擊邱李兵團 敵十一天只前進三十里〉，《人民日報》，1948 年 12 月 8 日，第一版。

43 〈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勝利結束 全殲黃伯韜兵團 戰役開始至此共殲敵十八個整師〉，《人民日報》，1948 年 11 月 25 日，第一版；〈碾莊大殲滅戰經過：迅速猛進分兵合圍 殲黃伯韜部十萬人〉，《人民日報》，1948 年 12 月 3 日，第一版。

44 〈京滬兩地慰勞團，今日飛徐州勞軍，居正廣播祝擴大勝利，張道藩呼籲響應勞軍〉，《中央日報》，1948 年 11 月 25 日，第二版；〈記者團今飛徐，參觀前線戰績〉，《中央日報》，1948 年 11 月 25 日，第二版。

45 〈中外記者團參觀二陳集匪屍〉，《中央日報》，1948 年 11 月 29 日，第二版；〈慰勞團參觀二陳集匪屍〉，《中央日報》，1948 年 11 月 29 日，第二版。

人下落不明。⁴⁶他的死訊，到了12月7日才上了中央日報，報導還不忘將黃將軍遺言附上，稱：「報答元首的知遇，維護革命軍人格」，並宣布戰果至少殲敵十萬，讚許他是履行任務而犧牲自己。⁴⁷

四、報導中的黃維兵團

就在南京組團派員宣慰時，位於津浦線上的宿縣周圍已經開打，共軍消滅了黃伯韜兵團之後，反過頭來包抄前去救援的黃維兵團，于1948年11月25日將其困在雙堆集；邱清泉兵團往救黃伯韜失敗之後，回防徐州。黃維兵團是蔣中正麾下的主力部隊之一，遭到圍困之後，一方面試著突圍，一方面蔣中正亦派兵要前往救援。然而，就在黃維策畫突圍行動時，卻遭其已為中共地下黨員的部屬110師師長廖運周率部投共所影響，突圍失敗。⁴⁸蔣中正獲報後心急不已，發電詢問黃維所部士氣情形。⁴⁹11月28日，劉峙轉往蚌埠指揮劉汝明兵團跟李延年兵團，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留在徐州督陣。杜聿明率領退守徐州的李彌、邱清泉與孫元良三個兵團，面對津浦路可能中斷的風險，乃決定要與駐防蚌埠的劉汝明兵團跟李延年兵團南北夾擊，向南突破。這些訊息都沒在中央日報中刊載，僅有徐州與蚌埠兩方合擊共軍的消息見諸報端。⁵⁰在中央日報的報導中稱，共軍被國軍南攻所迫，且國軍利用空軍轟炸，一日便擊斃共軍7,000名，所見都是捷報，稱共軍動搖。⁵¹實際上，黃維兵團此時已被共軍包圍，徐州守軍棄城沿著河南永城、安徽蒙城一線往南，然而蔣中正一心仍盼這批自徐州撤出的部隊能反過頭來與李延年部會同圍剿共軍之後，再向南撤退。⁵²到了12月4日，杜聿明所率大軍在陳官莊一帶被圍，12月6日孫元良部遭到殲滅。⁵³

報導中是另一個畫面。中央日報12月6日的報導中稱，宿蚌間爆發大殲滅戰，一次聚殲共軍三萬，並以此讚許機動策略成功。⁵⁴過幾天的報導中稱，永城一帶在杜聿明所率兵團的壓制下，一次殲滅共軍二萬之譜。⁵⁵隔天的報導又稱，宿蚌會戰殲敵近十萬，殘匪即將肅清，勝利在望。⁵⁶12月13日的報導刊登蔣中正嘉勉邱清泉兵團殲敵四萬的新聞，仿佛國軍的戰況大勝空前。⁵⁷而為了描繪共軍的殘暴，還報導了共軍驅使3,000名婦女為人牆，實施人海戰術的新聞。⁵⁸

黃維所部被圍，糧秣與彈藥仰仗空投，偶而天候不佳空軍無法出動，便只能困守。1948年12月15日，國防部命黃維兵團自受圍的雙堆集突圍，但全軍遭共軍消滅，黃維當天被俘。⁵⁹這一

46 〈徐州會戰，匪折廿萬〉，《中央日報》，1948年12月3日，第二版。

47 〈慷慨赴義，殺身成仁！黃百韜將軍壯烈殉職，血戰十晝夜殲匪逾十萬，所部犧牲殆盡以死報國〉，《中央日報》，1948年12月7日，第二版。

48 田玄、林桶法，〈國共激戰與國軍全面撤退〉，收於：林桶法（編），《中華民國專題史：國共內戰》，頁230。

49 〈蔣中正致黃維手令〉（1948年11月28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24-056；〈黃維致蔣中正電〉（1948年11月28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24-057。

50 〈徐蚌殲滅戰正展開，宿縣以東緊縮圍匪，南下孫兵團越曹村續進，蕭縣東北姚樓鎮已克復〉，《中央日報》，1948年12月1日，第二版。

51 〈宿縣近郊展開激戰，南下國軍兩路推進，孤山集紗帽山相繼收復〉，《中央日報》，1948年11月28日，第二版。

52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頁196-197。

53 就日後人民日報所報，包圍杜聿明是共軍急行軍下下拚出來的，詳見：〈不讓蔣匪跑掉一個 淮海我軍勇猛追殲逃敵〉，《人民日報》，1948年12月24日，第一版。

54 〈宿蚌大殲來戰，機動戰略成功，劉子清說明會戰態勢〉，《中央日報》，1948年12月6日，第二版。

55 〈永城東北殲匪兩萬，京滬慰勞團昨獻旗，劉總司令報告戰果〉，《中央日報》，1948年12月10日，第二版。

56 〈宿蚌會戰勝利在望，殲匪總數已近十萬，盱眙渡殘匪即肅清〉，《中央日報》，1948年12月11日，第二版。

57 〈總統嘉慰邱兵團，鏖戰旬日殲匪逾四萬〉，《中央日報》，1948年12月13日，第二版。

58 〈並郊匪暴行，驅使三千婦女，赴前線當砲灰〉，《中央日報》，1948年12月13日，第二版。

59 過了三天，蔣中正還不清楚黃維部突圍之後的情況，遲遲未能發現該軍主力。詳見：蔣中正日記，1948年12月18日。

天，中央日報登載，黃維兵團展開猛烈攻勢，半月來殲滅共軍逾 12 萬的新聞。⁶⁰ 更弔詭的是，12 月 17 日中央日報竟然刊登黃維兵團與李彌兵團會師的消息，冀圖安定民心。⁶¹ 次日更有李黃兵團一起突進的報導，彷彿黃維兵團依舊活躍。⁶² 而相對應的，是報端刊載共軍與土共火拼的一欄，讓閱聽人對於共軍分裂產生印象。⁶³ 然而，黃維突圍失敗的消息藏不住的，12 月 20 日人民日報揭露黃維遭俘的消息。⁶⁴ 整個兵團，除了胡璉帶傷突圍成功外，其餘軍長、師長多遭俘擄。

110 師師長廖運周在投共後，透過人民日報發表致黃維兵團公開信，以共軍包圍嚴謹，黃伯韜亦難逃被圍殲命運的前例，呼籲受圍雙堆集的國軍起義投共，⁶⁵ 還搭配了一些投共國軍官佐的訪談，提及撤退、被圍的苦境，說道遭圍後局面混亂、人馬雜沓，最後不堪一擊落敗的經過。⁶⁶ 透過所俘國軍之口，描述包圍圈內糧食短缺、牲畜吃光、爭搶空投物資的情況，大致也是不錯的。⁶⁷ 另引述其中一名軍官的說法：「我們都曉得共軍有三不打：第一吃虧不打，第二沒有把握不打，第三殲滅不了不打。我們見了共軍，就完全喪失了戰鬥勝利的信心。」⁶⁸ 此外，還以報導方式表現共軍對國軍俘虜的態度，諸如剽槍不殺、寬待俘虜等。⁶⁹ 偶而也有一些或許較為誇大的報導，如 1949 年 1 月刊登共軍某營於一村莊中阻擋陸空包夾，黃維所率四個師突圍的企圖，殲滅國軍千餘仍不退卻的事蹟。⁷⁰ 但基本上，人民日報的內容與事實確實比較接近。

五、報導中的杜聿明兵團

共軍將黃維兵團及孫元良兵團消滅之後，持續包圍杜聿明所率大軍，毛澤東於 1948 年 12 月 17 日親自起草一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交前線廣播，內容敘明近日共軍斬獲，並細數已經消滅及投誠各軍番號，告以黃伯韜、黃維、孫元良兵團都已經瓦解，南方的援軍也已經撤退，杜聿明所部作困獸之鬥撐不了多久，勸其速速投降。⁷¹ 當時天氣惡劣，空投運補受限於氣候常不得行，杜聿明只能跟著大軍圍困，飢寒受凍，蔣中正也僅能投以書信勉勵。⁷² 鑒於杜聿明的部隊或許是蔣中正最後一支嫡系隊伍，他力圖將此批部隊救出，不惜施放催淚瓦斯攻擊共軍，寫給杜聿明囑咐他突圍的信函裡，特別提到防毒面具的使用必須熟練，還要兵士能夠佩戴防毒面具作戰至少維持三個小時。⁷³ 這在人民日報的報導中似乎也能證實，國軍應有嘗試利用轟炸搭配催淚瓦斯，

60 〈李樓郭樓匪勢動搖，杜聿明大軍圍殲中，黃維兵團展開猛烈攻勢，半月來斃傷匪逾十二萬〉，《中央日報》，1948 年 12 月 15 日，第二版。

61 〈陸空戰車協力進擊，黃李兩兵團昨會師，南下兵團予匪重大打擊，蘇北高郵揚泰部署堅強〉，《中央日報》，1948 年 12 月 17 日，第二版。

62 〈李黃兵團續進，劉匪受創紛向宿縣敗逃，南下兵團連克據點十處〉，《中央日報》，1948 年 12 月 18 日，第二版。

63 〈劉匪土共火併，皖北匪軍大肆征糧，晉東強迫學生參軍〉，《中央日報》，1948 年 12 月 19 日，第二版。

64 〈殲滅蔣匪十二兵團戰役 我活捉匪首黃維〉，《人民日報》，1948 年 12 月 20 日，第一版。

65 〈廖運洲告黃維兵團官兵：放下武器才是生路〉，《人民日報》，1948 年 12 月 7 日，第一版。

66 〈蔣匪四十四軍被殲前 驚慌混亂拼命西逃結果還是全部覆滅〉，《人民日報》，1948 年 12 月 9 日，第二版。

67 〈徐州西南我軍繼續緊縮包圍 十天殲匪達八萬餘 饑餓正加速著匪黃維兵團的覆滅〉，《人民日報》，1948 年 12 月 15 日，第一版。

68 〈我強大華東後備兵團正源源涌向淮海前線〉，《人民日報》，1948 年 12 月 12 日，第一版。

69 〈淮海我軍進行火線喊話 對敵政攻收效很大〉，《人民日報》，1948 年 12 月 14 日，第一版。

70 〈小李莊阻擊戰 我一個營粉碎了敵四個主力師的突圍企圖〉，《人民日報》，1949 年 1 月 8 日，第三版。

71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1948 年 12 月 17 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81217.htm>

72 〈蔣中正致杜聿明電〉(1948 年 12 月 26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24-106。

73 〈蔣中正致杜聿明函〉(1948 年 12 月 28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590-005。

藉以突破共軍利用交錯的戰壕對杜聿明所部的包圍。⁷⁴ 然而，效果似乎不佳，自 1949 年 1 月 7 日至 9 日間，投擲的催淚瓦斯共 15 枚，才造成 1 人死亡，600 餘人中毒，對於突圍幫助甚微。⁷⁵ 最後，杜聿明及其所屬，幾乎是在飢寒交迫下被整個碾平的。⁷⁶

然而，在中央日報中所呈現的杜聿明，卻是另一副模樣。不僅報導杜聿明前進青龍集掃蕩共軍，並稱陳毅所部已經消耗殆盡，更特別的是劉伯承被空軍轟炸身亡的一連串消息，這或許不是一種「報導」，更像是一種「期望」。⁷⁷ 第一則劉伯承被炸死的新聞出現後，彷彿有套劇本在走，隔天剿總出面証實此事，並稱中共已經將其屍首移往宿縣安置，召開了追悼大會云云。⁷⁸ 爾後，中央日報刊載訪問空軍總司令王叔銘的報導，王叔銘在訪談中除了強調空軍的作用之外，還點明劉伯承之死，應是空軍的 C-24 轟炸機出擊的成果。⁷⁹ 國防部政工局長也出面闡釋，以「炸葬」二字顯其死亡之慘烈。⁸⁰ 實際上，杜聿明所率部隊不如中央日報所報那般戰無不克，更沒有殲敵 15 萬的豐碩成果，劉伯承也還好端端的在指揮共軍。⁸¹

淮海戰事的順利，使中共高層評估，約莫一年之後就能一統全國。⁸² 而隨著黃維兵團、孫元良兵團覆滅，杜聿明所部全遭包圍，平津戰事不斷推進的情況下，在人民日報中也逐漸顯露出樂觀的氣氛，更加確定統一全國的時程將大大縮短。⁸³ 此時，蔣中正亟於調撥白崇禧第二兵團的部隊沿江南下衛戍南京，卻遭拒絕，副總統李宗仁為首的桂系大有逼宮態勢，蔣中正也不得不藉著 1949 年的元旦文告對外宣示：「個人之進退出處絕不縈懷」。⁸⁴ 之後，中央日報出現大量擁護蔣中正元旦文告的報導，在蔣中正的嫡系部隊消滅殆盡時，與中共議和似乎也成為一個選項。

杜聿明兵團覆滅是早晚的事，徐蚌戰場也只剩下最後的清理工作，之後國共兩方的對壘，要以平津一帶為主。在中央日報的新聞中，似乎對於徐蚌戰場的結局也開始收尾，開始闡述徐蚌戰場已告尾聲，津浦鐵路南段情勢穩定，天津周圍的大戰準備展開等訊息。⁸⁵

1949 年 1 月 6 日，共軍對杜聿明所屬最後的據點陳官莊大舉出擊，國軍全線崩潰，杜聿明在

74 〈淮海前線司令部發言人 警告杜聿明放毒陰謀〉，《人民日報》，1948 年 12 月 27 日，第一版。

75 〈戰犯杜聿明放毒詳情〉，《人民日報》，1949 年 1 月 18 日，第一版。

76 〈被圍杜聿明匪部 不餓死也得凍死〉，《人民日報》，1948 年 12 月 28 日，第一版；〈被圍杜聿明匪部 三百官兵已遭餓死 紛紛衝破敵封鎖投向我軍〉，《人民日報》，1948 年 12 月 31 日，第一版。

77 〈淮北國軍冒雨兜剿，陳匪主力消耗殆盡，杜聿明兵團向青龍集掃蕩〉，《中央日報》，1948 年 12 月 22 日，第二版；〈傳劉匪被炸斃，在新縣集指揮作戰，遭毀滅轟炸斃命〉，《中央日報》，1948 年 12 月 22 日，第二版。

78 〈淮北線沉寂，劉匪殘部潰不成軍，陳匪已向宿縣逃竄，剿總證實劉伯承被炸斃〉，《中央日報》，1948 年 12 月 23 日，第二版。

79 〈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一席談，徐蚌戰中空軍發揮最大威力，強調全體將士挽救狂瀾決心〉，《中央日報》，1949 年 1 月 3 日，第二版。

80 〈鄭文儀向記者證實，匪首劉伯承炸葬，林匪主力調天津周圍，戰事重點將移至津郊〉，《中央日報》，1949 年 1 月 7 日，第二版。

81 〈來近郊匪主力潰退，津郊各線國軍反擊，蚌宿會戰共殲匪十五萬餘，十六日至廿二日一周戰況〉，《中央日報》，1948 年 12 月 24 日，第二版。

82 〈淮海戰役的發動和順利進展將使中國革命形勢飛速前進〉，《人民日報》，1948 年 11 月 18 日，第一版。

83 〈淮海戰役四十天 我軍殲敵四十萬 大大縮短戰爭最後勝利的過程〉，《人民日報》，1948 年 11 月 27 日，第一版。

84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1949 年 1 月 1 日)，收於：《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二書告》，頁 205-208。

85 〈津攻防戰序幕揭開，東南西北四面普遍接觸，匪調節器動頻繁大戰待展開〉，《中央日報》，1949 年 1 月 7 日，第二版；〈劉峙巡視淮南防務，來安北國軍克古城鎮，粟裕匪部老巢亦為國軍攻佔〉，《中央日報》，1949 年 1 月 7 日，第二版；〈津浦南段情勢穩定，藕塘西北掃蕩殘匪，豫南匪犯光山不逞北逸〉，《中央日報》，1949 年 1 月 10 日，第二版。

同月10日被俘。蔣中正聞訊，悲慟不已，不僅嫡系主力全失，也少了將領再起。⁸⁶爾後乃決心下野，另起爐灶。當高層都已經獲悉徐蚌會戰戰局時，在中央日報中的報導，卻依舊是正面而樂觀的。如杜聿明被俘後。1949年1月12日，中央日報還在報端刊載杜聿明部殲匪極眾的消息，並稱浦口到蚌埠間鐵路暢行無阻。⁸⁷直到同月13日，才有杜聿明兵團突圍的新聞，次日還稱突圍期間殲敵五萬，雖敗猶榮。⁸⁸

人民日報中所呈現的是另一個畫面，徐蚌戰場報導的比例跟數量變少了，增加的是華北戰場的新聞。捷報出現在1949年1月13日，報導稱杜聿明在10日拂曉突圍過程中，化妝為士兵遭俘，是中共宣布的43名頭等戰犯中被俘的第一人。⁸⁹杜聿明遭俘在幾天後，有一個更詳盡的故事，談到杜聿明是如何化妝、躲藏以及遭共軍識破的經過。⁹⁰關於杜聿明所屬整個覆滅的經過與相關統計數據，在人民日報的報導要到1月底才完整披露，並彙整徐蚌會戰的總成績，稱「自去年十一月六日至本月十日止，前後共歷時兩個月零五天，共軍一氣殲滅了一個『剿總』副總司令指揮部、一個綏署指揮部、五個兵團司令部，廿二個軍部，五十五個整師（內四個半師起義）等共約六十萬人。」⁹¹共軍在徐蚌戰後持續前進，準備渡江，沿路國軍多不戰即潰。

六、新聞與「假新聞」

事實的發生，透過媒體的轉述成為新聞，這期間已經添加了報導者自身的主觀篩擇，與事實產生距離，但如是報導者轉述錯誤，或刻意加油添醋、扭曲原貌，那新聞更可能成了「假新聞」，將錯誤的訊息向外散播。如是以刻意塑造、捏造的「假新聞」來看，或許能進一步問，其背後的目的與用意是如何？

戰報所重，或以戰果為要，戰場描述次之。以戰果論，在此以黃伯韜兵團遭圍期間中央日報所刊為例列表如下：

| 日期、版次 | 標題 | 敵方死傷數字 |
|--------------|--|--------|
| 1948.11.10 二 | 徐州會戰初捷，斃傷匪軍萬餘，擊敗陳毅陳賡匪部，劉峙表示確有制勝把握 | 遺屍萬餘 |
| 1948.11.12 二 | 徐東空軍助戰葬傷犯匪兩萬，井郊繼續痛殲犯匪 | 擊傷二萬餘 |
| 1948.11.13 二 | 徐州東翼大捷，殲匪三萬七千，匪勢全線動搖，陣地工事內全炸毀，碾莊附近匪軍求降 | 殲匪三萬七千 |
| 1948.11.14 二 | 陸空協剿續傳捷訊，徐東又殲匪五千，一小時內連克據點數處，策反收效匪三千餘投誠 | 殲匪五千 |
| 1948.11.15 二 | 邱黃兩兵團已會師，徐東展開大殲滅戰，強大空軍助戰匪受重創 | 斃匪五千餘 |

86 蔣中正日記，1949年1月10日。

87 〈浦蚌列車暢通無阻，杜聿明部殲匪極眾，空軍出擊匪運輸受嚴重威脅，豫南犯潢川匪受創分途潰竄〉，《中央日報》，1949年1月12日，第二版。

88 杜兵團突圍抵渦陽，匪軍披靡向亳縣潰退，津西郊激戰國軍再捷〉，《中央日報》，1949年1月13日，第二版；〈杜兵團苦戰突圍，殲匪五萬餘人〉，《中央日報》，1949年1月14日，第二版。

89 〈戰爭罪犯國民黨“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被我活捉 青島蔣軍千五百人起義〉，《人民日報》，1949年1月13日，第一版。

90 〈戰犯杜聿明落網記〉，《人民日報》，1949年1月25日，第一版。

91 〈淮海殲敵六十萬 僅歷兩月零五天〉，《人民日報》，1949年1月22日，第一版。

| | | |
|-------------|---|--------|
| 1948.11.16二 | 徐州會戰十日，殲滅匪逾十萬，邱黃會師反包圍匪，南路昨克十餘據點 | 殲滅匪逾十萬 |
| 1948.11.17二 | 宿縣外圍，斃匪五千 | 斃匪五千 |
| 1948.11.18二 | 陝東二次會戰捷，匪折逾萬向北潰逃，徐北國軍續追逃匪，外圍殘匪陸續遭殲 | 斃匪三千 |
| 1948.11.19二 | 徐南又捷殲敵兩萬，戰事進入追剿階段，戰鬥兩周匪折廿萬以上，黃兵團正向潰退匪追擊 | 殲敵兩萬 |
| 1948.11.20二 | 徐州會戰勝利結束 | 斃敵兩萬 |
| 1948.11.21二 | 徐東國軍越大許家，北上兵團渡過渦河，東南匪折萬西北激戰中 | 折萬 |

如以11月22日黃伯韜兵團覆滅來看，在此之前黃伯韜兵團在中央日報的新聞報導中所見，不僅黃伯韜兵團所採為主動，所向披靡，殺敵統計加總之後竟逾二十萬之譜。

人民日報在戰爭行進間，對於敵方死傷人數的估算並不大多，但對於敵方投降的人數卻有比較大篇幅的報導，如此方是或許數字比較能貼近真實。人民日報揭露大量國軍戰果的，要以1948年12月8日的報導為代表，該報導稱敵軍共損失正規軍：一個戰區總司令部，一個邊區司令部，四個兵團部，十二個軍部，三十六個整師，二個師部，三十一個整團，十一個整營。同以上折合方法，共計四十七個師又二個團三個營，或一百四十三個團又三個營；共四十八萬五千四百人。非正規軍：二個警備司令部，三個保安司令部，一個軍部，十三個整師，二十四個整團，十四個整營。共折合六十六個團又二個營。共計六萬三千一百人。總計敵軍正規與非正規部隊共損失一個戰區總司令部，一個邊區司令部，四個兵團部，二個警備司令部，三個保安司令部，十三個軍部，四十九個整師，二個師部，五十五個整團，廿五個整營，共折合二百一十個團又一個營，總計五十四萬八千五百人。

並附上俘虜及投誠國軍將校名單，包含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等190名上校以上軍官，並詳列各式戰利品的種類與數量，與摧毀的國軍飛機與重機械數目。⁹² 殲滅黃維兵團後，也有類似的詳報刊載於人民日報公開。⁹³ 或能從中查知，共軍對於戰情與戰果的掌握，其實遠超過於國軍。

除了戰況的平鋪直敘之外，人民日報還有關於國軍傷兵照護、國軍投降者的感言等報導，這似乎在傳遞著消息，要使頑抗者棄守。⁹⁴ 另外有一則闡釋共軍能以硬體不及國軍卻能贏得勝利的故事，稱共軍戰士張樹才攜帶炸藥，捨身衝向共軍無法突破的地堡自炸，共軍如此的英勇事蹟甚多，才能突破軍備不利的困境，邁向戰事的成功。⁹⁵ 人民日報中曾經在會戰期間彙整共軍能獲勝的關鍵，認為有四點。第一，共軍將領能徹底執行命令；第二、共軍步炮配合得當；第三，團連營各級密切配合；第四，生活上互讓互助，資源共享。⁹⁶ 這一方面或能鼓舞共區，一方面也能打擊南京。

92 〈人民共軍十月份勝利空前 消滅敵軍五十四萬 解放重要都市六座繳炮六千門 敵師級上校以上軍官投誠被俘共百九十名〉，《人民日報》，1948年12月8日，第一版。

93 〈我消滅黃李兵團詳細戰果 殲敵近十二萬〉，《人民日報》，1949年1月8日，第一版。

94 〈徐州完全解放 我軍刻正猛烈追殲逃敵 蚌埠前線敵三十九軍兩個團投降〉，《人民日報》，1948年12月4日，第一版。

95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張樹才捨身炸毀敵地堡 華野某部中共支部追認為模範黨員〉，《人民日報》，1948年12月6日，第一版。

96 〈淮海前線我軍獲勝重要因素之一：號令統一配合密切 各部發揮高度友愛〉，《人民日報》，1948年12月15日，第一版。

再則，人民日報在戰場的報導與宣傳，許多都是採集於當事人口中的，這包括共軍弟兄，以及被俘國軍，甚至還有「支前」群眾的報導，連民工都上了報。⁹⁷ 另外佔較多篇幅的，是共軍戰士的英勇故事。如 1948 年 11 月 28 日見諸報端的〈十人橋淮海戰役通訊〉，歌頌的士兵在宿遷西北 80 里的溪裡，頂著 11 月的寒風，以人為橋腿，協助其他共軍士兵過橋進前的故事。⁹⁸ 此外，也有藉共軍某團班長抓捕 100 軍副軍長楊詩雲的故事，在文中夾敘共軍寬待俘虜的情節。⁹⁹ 相對地，中央日報中經常出現的，是軍政官長的呼籲，以及對於戰情的解讀和研判。雖說以軍政長官的說詞為據，或許能有權威說法的感覺，但以當事人的「現身說法」或是故事，實際上更能吸引閱聽人的注意，也能增加說服力，拓增傳播的影響力。

那閱聽人對於中央日報的報導，又持如何態度呢？基於一般庶民百姓對於事件的記述有限，在此僅能挑選部分人物的日記對此問題加以探查。如以黨政高層的紀事來看，陶希聖在 1948 年 11 月 20 日的日記中寫道：「軍報謂徐州會報勝利結束，實則當在進行，不過匪軍曾大敗而後反攻，則為事實。」¹⁰⁰ 這一則紀事透露了中央日報報導與事實實有出入。過了約一個月，他又在 12 月 17 日的日記中寫道：「昨前線消息矛盾，國防部宣布黃維兵團於孤軍作戰二十日後與李延年兵團會師。中央社則謂蚌埠剿總後退滁縣，黃維兵團已經消滅（中央社消息未發表）。究竟如何，尚待詢問明白。」¹⁰¹ 能看到中央社報導中掩蓋國軍在前線潰敗實況的事實。

負責黃金遷臺的吳嵩慶，在他日記中，針對徐蚌會戰於 1948 年 12 月 8 日有一筆紀錄，稱「近日軍事仍處被動之勢，京滬站又漸擁擠，此次放棄徐州，爭取宿〔州穩〕固，以包圍敵軍主力，本可大勝，奈蚌埠兵力接濟不上，恐不能得預期之效耳。」¹⁰² 同月 11 日他又提到：「戰事消息，報上已由殲滅包圍而至相持，西報宣傳徐戰政府損失甚大。」¹⁰³ 次月 22 日的日記：「前線消息令人焦慮，繼兩黃兵團潰敗之後，邱李兵團能否安全殊不可必，此套本錢完後，將來不堪想像。」¹⁰⁴ 雖受命搬運黃金來臺，但他所獲的消息大概也多因中央日報報導的扭曲，而對國軍有初勝後衰的印象。

不在中央任職的人，似乎比較願意相信中央日報等官方所發出來的消息，如時任立委的顏惠慶在他的日記中，於 1948 年 11 月 18 日所記：「徐州戰役南京獲勝。」¹⁰⁵ 但隨著消息多方湧入，在南京的人們對於徐蚌的戰況似乎也難以樂觀，林獻堂在 1948 年 11 月 28 日日記中便提到：靈石亦同余等訪萬俤，他於兩日前纔返自南京，言是處人心不安，物價甚貴，共軍急攻徐州、蚌埠，南京恐不能守云云。¹⁰⁶

97 〈三大解放區數百萬民工支援淮海戰役功勳卓著〉，《人民日報》，1949 年 1 月 27 日，第一版。

98 〈十人橋 淮海戰役通訊〉，《人民日報》，1948 年 11 月 28 日，第一版。

99 〈淮海陝中我軍繼續擴展攻勢 克靈壁殲敵一個多師胡匪廿四師大部就殲〉，《人民日報》，1948 年 11 月 29 日，第一版。

100 陶晉生（編），《陶希聖日記（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頁 185。

101 陶晉生（編），《陶希聖日記（上）》，頁 192。

102 <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5%90%B3%E5%B5%A9%E6%85%B6%E6%97%A5%E8%A8%98/1948-12-08>

103 <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5%90%B3%E5%B5%A9%E6%85%B6%E6%97%A5%E8%A8%98/1948-12-11>

104 <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5%90%B3%E5%B5%A9%E6%85%B6%E6%97%A5%E8%A8%98/1948-12-22>

105 顏惠慶，《顏惠慶日記（第三卷）》（上海：上海市檔案館，1996），頁 1020。

106 <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7%81%8C%E5%9C%92%E5%85%88%E7%94%9F%E6%97%A5%E8%A8%98/1948-11-29>

結語

1948年11月17日，《中央日報》第二版，登出了一則新聞：「前線頻報捷，徐州結婚熱」。這個時點正是徐蚌會戰開打不久，黃伯韜兵團身陷包圍的時刻。這一份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所辦的最高層級黨報，在滿佈戰場報導的版面中突然冒出來的這則新聞，彷彿是希望給予閱聽人一種前景樂觀，平安穩定，因而結婚者眾的畫面。然而，如藉後見之明的優勢，回到當時時空去看，此時明明是國軍遭受共軍包圍初期，接連捱打的時候，哪有甚麼頻傳的捷報能使大家樂於結婚？這一則報導或許是刻意被創造出來的「假新聞」。

從中央日報及人民日報兩大黨報在徐蚌會戰期間報導來分析，或許能看出幾點透過政黨之手塑造新聞與「假新聞」的操作。

首先，新聞報導必須基於事實，但是針對事實能有多種不同的詮釋。在中央日報與人民日報的報導中，都能見到該方將士英勇殺敵的報導，對於戰爭發生的地點，基本上雙方的報導都屬真實，但是對於戰果敘述、戰略運用的解釋不大相同。中央日報對國軍的活動，基本以「正面主動」的陳述為主，或許期待給予閱聽人一種國軍屢勝共軍的印象，連稱大捷，即便實際上並未戰勝，在報導上也仍是雖敗猶榮的景象。徐蚌會戰時也正逢金圓券換兌，又是陳布雷自殺的時刻，這個寄望閱聽人閱報之後對政府安心的期盼，透過主編或是編輯的轉釋，顯現在報導上。記者是比較敏銳的，為了採訪前線，南京方面於1948年8月底組織勞軍團，由張鈺當任團長，隨行記者有中央日報、上海申報、和平、大剛、東南、正言等報刊，龔選舞為中央日報的代表，前往徐州剿總勞軍，就感受到整個氣氛並不對勁。¹⁰⁷ 陸鏗在其回憶錄中也承認這一點，因此他說他在1948年10月就從南京轉往香港。¹⁰⁸ 人民日報對此戰役的報導，也是比較正面的表述，到了戰爭態勢較為明朗之後，報導的數量才逐漸增加，部分戰場要到整個戰局都結束之後，才有相關的追述出現。這使得徐蚌會戰期間，人民日報的新聞內容要比中央日報來得貼近事實。

其次，報導既是要影響閱聽人的認知與判斷，就中央日報跟人民日報的新聞內容來看，中央日報的效果實際上不盡理想。民間對於前線的情況多有揣測，而前方傳來的消息與中央日報在報端揭露的有巨大落差，或許搭配其他報刊的新聞，就能猜測前線情況實際上對南京當局並不有利。而對於中共形象的描繪，基於中國國民黨中宣部於1947年7月15日發函要求中央通訊社、亞洲照片社及中央電影企業公司蒐集共黨暴行照片的指示，在此時發揮的效果似乎也不是那麼好。¹⁰⁹ 換言之，中央日報為了配合戰爭而產出的新聞或是「假新聞」，沒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不僅中華民國政府控制區的人民不盡安心，對於中央日報報導的公信力更有了質疑。

身處其中的記者如何反思這一段生產新聞的過程呢？被派往前線實地採訪的龔選舞，在他回憶錄跋詞中提到：「國軍攻克城池，固然調為大捷；即打成平手，剿匪未曾落敗，一樣號稱大勝，就在徐州快要失守之前，一度局部性地守住一塊陣地，還在大開祝捷之會！」由此來看，這些記者並非搞不清楚狀況，而是因為上意指示，才編纂出不合事實的「假新聞」魚目混珠，甚至招來人民日報記者嘲諷式地訕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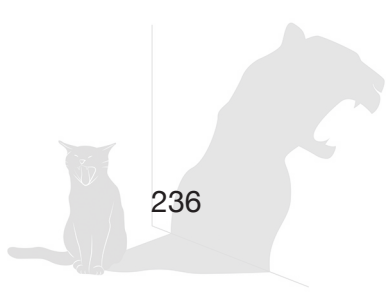
107 能參見：龔選舞，《國共內戰見聞錄：龔選舞回憶2》（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頁246-326。

108 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頁223。

109 《中宣部為加強反共宣傳給中央電影企業公司之公函和指令》，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711(6)，案卷號：110。

第四場次

- 216 Censorship and Publication Control in Early Post-war Taiwan: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 Táňa Dluhošová
- 217 假新聞：看不見的社會真實、偏見、與集體宣傳〈南海血書〉案例 / 蘇蘅
- 236 臺灣戒嚴時期的「假新聞」：〈南海血書〉案例 / 邱家宜



Censorship and Publication Control in Early Post-war Taiwan: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戰後初期臺灣審查制度：法規與實踐

Táňa Dluhošová 路丹妮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

捷克查理士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曾任：捷克馬薩理科大學中國學中心助教授，現任：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臺北中心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文學社會學、數位人文、文學史。曾參與「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臺灣研究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計畫」，發表會議論文：〈暗示——白先勇小說中的語義結構之構建單元〉。

Abstract

This presentation will explore how state agencies used their various means of exercising power and projecting authority in order to shape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the literary scene in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Adding to existing scholarship which investig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urges of high-profile intellectuals after the 2.28 Incident, the presentation shall probe deeper into the problem of censorship as a specific way of (a) exercising state control over published contents which challenged the KMT's ideology as well as (b) a means to limit the freedom of agents in the literary field. I will examine this problem from two complementary perspectives: Firstly, integrating the Taiwanese case into a broader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 the presentation is going to focus on the legal framework under which Republican-era censorship operated. Secondly, the presentation will analyze censo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and agency. The core questions will be, simply put: Who was banning what? What were the governmental and party institutions, on various levels, involv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w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Which concrete cases may illuminate the impact of censorship on various aspects of publishing? The answers will be sought among the archival files, especially of the Academia Historica's Taiwan Historica (Taiwan Guoshi guan, Wenxian guan 台灣國史館文獻館), which holds official documents from the both early post-war governments.

研討會論文，非正式出版品。未經同意，請勿引用。

Please note: Conference papers are not formal publications. Please do not cite them without permission.

1. Introduction

This article will investigate censorship and control of periodicals in early post-war Taiwan (1945–1949), a unique period in its history. It is delimited by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victory of the Allied forces over Japan, which translated into the retrocession of Taiwan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by the retreat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under Chiang Kai-shek to Taiwan. These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ub-periods. The first is defined by the rule of Governor Chen Yi (陳儀, 1883–1950), whose Taiwan Provincial Executive Administrative Office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hereafter TPEAO)—as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was called at that time—resembled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erms of its structure and activities. Rising dissatisfaction among the Taiwanese about how Taiwan was governed by Mainlanders, who allowed locals only limited control over their own affairs, triggered a mass revolt known as the Incident of February 28 (1947). Chen Yi and the leading representatives of TPEAO established a new social and cultural framework, an extension of norms current on the Mainland. As will be explained later, this framework was based in Republican legislation but exhibited some local particularities as well. Based on the existing *Publication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defined the main state and party organ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trol of publications and censorship, whose jurisdictions overlapped in these two years.

After the 2.28 Incident, Chen Yi's government was replaced by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台灣省政府). This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sub-period of the early post-war era. April 6, 1949, saw the arrest of many young Taiwanese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Lan 2000, 2001) In the same year, the majority of central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were moved to Taiwan to evade Communist troops. Furthermore, the declaration of Martial Law, which remained in force until July 1987,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White Terror. Within these two yea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reorganized, an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formation Office (新聞局), state organs were entrust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ensorship regulations. Excluding the organs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s (Kuomintang, KMT) from censorship was then reflected on the provincial level as well. The state, however, imposed tighter controls on members of editorial offices and used economic restrictions to control the publication industry.

The understanding of censorship and control of publication varies, depending on how they are contextualized. While some scholars may understand censorship in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with canon formation, as a crucial means of safeguarding the permanence of a body of authoritative writings (Assmann & Assmann 1987), the followers of the theory of the New Censorship see it as a set of immanent rules that structure the literary field at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moment (e.g., Bourdieu 1982), others perceive it through a model in which writers are oppressed by the powerful who use censorship as a tool to reinforce their favored social norms and worldviews. There are various degrees of control of expression exercised by those in power (be it the state, the church, the army, or an interest group), and censorship is one of them. Ulla Otto (1968: 109) reminds us that “any censorship should be perceived as an attempt at political integration with the negative 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lementation, censorship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pre-publication and post-publ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arget, there is direct censorship aiming at a concrete work or author, and indirect censorship targeting all works contravening

a given norm. In addition to censorship, those in power could also use propaganda, patronage and fostering elites who would implement ideological norms; they could prioritize certain types of materials or ideologies and suppress the other; and contro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prestige.” (Aulich 1988)

The study of literary censorship belongs to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Aulich (1988) sees “literature (as a social practice) and censorship (as a control of this practice) essentially connected to the meaning of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n a collective order and for this order.” Censorship, as a process and practice, is thus embedded in a certain sociocultural function which can, and should be, in Aulich’s view, analyzed either from a diachronic or synchronic perspective to elucidate the collective order of which it forms a part. Even changes in legislative frameworks can shed light on communicative structures within which the agents acted.

Censo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press can be viewed as separate procedures, but structurally they both represent external interventions to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Moreover, these processes are intertwined and should be viewed as a complex phenomenon. Aulich (1988) proposes an analytical model: censorship as control of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process targeting the author; censorship as the control of literary distribution targeting multiplier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publishers, editors, printers, etc.) who are obliged to follow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finally, censorship as the control of literary diffusion marginalizing heterogeneous worldviews in existing discourses (e.g., by ridiculing them). The Taiwanese case embodies the second type of censorship, in which the state first imposes its control over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o establish their own rules of the field, so that authors would eventually consciously adjust their production in order to get their work published. In addition to this typology, Aulich recognizes three categories of sociocultural norms which undergird any censorship: Constitutive norms prohibit any divergence from the prevailing ideological orthodoxy. Regulative norms allow some variation yet demand general adherence to the prevailing ideology. Finally, functional norms are subject to contingent situational requirements. Interestingly, the Taiwanese practice was not officially tied any ideology and represented the functional category of legitimization of the sociocultural norms.

Following Aulich’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political censorship from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irstly, integrating the Taiwanese case into a broader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egal regulations under which censorship operated. Secondly, it will analyze censorship and the control of public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practice and functions. It will outline the changing dynamics between the state and party organs, the main 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censorship, represented by member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These actors assumed their activities in Taiwanese publishing and politics under conditions of an in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KMT party state, mingling, interact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reshaping both the literary field and the field of power in the process. The case studies are drawn from among forty-three archival files of the Taiwan Historica (台灣文獻館), which holds official documents from both early post-war governments.¹ The archival material offers glimpses at the various motivations and help us understand the strategies of

1 The majority of all materials have been digitalized and are accessible after registration at <http://ds3.th.gov.tw/digital/digital.php>.

legitimizations of norms theorized by Aulich.

This study illuminates the sociocultural norms and structure of power in the period preceding the Martial Law era, contributing to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authoritarianism gradually took shape in Taiwan. The type of censorship in the following is typical of non-demo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is makes it possible to discuss post-war Taiwan within a more capacious comparative framework, together with other one-party regimes of the post-war period, such as the Soviet Union, Czechoslovakia, and Eastern Germany. This article does not aim at a detailed comparison between these regimes, but will occasionally point out pertinen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arly post-war censorship followed Republican laws and practices. Michel Hockx's monograph on the Republican-era literary field provides a summary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 (Hockx 2003: 222-251). Other studies mention censorship as a complex practice in which various state and party organs participated,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ir jurisdictions frequently coincided at different times. Probably the first author pointing out the complexity of the system was Lin Yutang (1936). He discussed how control varied in time, depending on individual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local warlords decided whether to sanction offending publishers and publications, but already in the 1930s more institutions became involved: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Executive Yuan, the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the Kuomintang's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This indicates overlapping, at times conflicting,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169-70, 174-75). MacKinnon (1997: 15-17) provides examples of state interference with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Yin (2014) offer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s dealing with propaganda and censorship the late 1920s and the 1930s, both in civil and military departments of government. (196-98, 207-208)

So far, not much has been written on censorship implemented in the post-war period while the Civil War was ongoing on the mainland, perhaps due to the political sensitivity of the topic. Censorship and a general hardening of state control are more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the 1950s, when the state asserted its grip on literar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new cultural policies. (E.g., Cai 2010) In their discussions of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scholars tend to focus on the first two years of Chen Yi's government. Huang (2007: 65-79) dedicates one chapter to the regulation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Executive Administrative Office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henceforth Propaganda Committee). He (1996, 1997) mentions a regulation which forced all periodicals to register with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in 1946, which I will discuss in more detail below. Cai (2005) is interested in state control of publications through enforced registration and investigat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ffects of state supervision on publishing. To complement these studies, I will describe censorship procedures and outl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ty and state organizations, two aspects which, so far, have been neglected.

2. Censo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Regulations

The *Publication Law* (出版法), which underwent various changes, provided regulations for any printed materials. The first *Publication Law* was introduced in December 1914 by the Peiping government. It was preceded by the more narrowly focused *Regulations for Newspapers* (報紙條例) in

April 1914 and followed by the *Regula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inting Industry* (管理印刷業條例) from 1919. In 1930,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issued a new *Publication Law* which defined various terms such as “printed material,” “author,” and “publisher.” (Shao 1930: 3) All periodicals had to be officially registered before going to press and were obliged to send two copies of each publication to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內政部). Applications were processed by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units (地方長官公署), a practice followed later as well.

The 1930 *Publication Law* indicated what sort of contents were not permitted: anything diverging from the KMT party line and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三民主義). Lin Yutang (1936: 175), referring to the Peiping Censorship Bureau, points out that censors were also supposed to suppress news items which were unfavorable to China’s interests, which could incite riots, or which touched upon military affairs. On July 8, 1937,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issued a new version of the *Publication Law, including the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施行細則). (Reprint PC-TPEAO, 1947) Article 8 stipulated to which institutions a copy of each publication should be sent: beside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se included the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of the Kuomintang’s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 hereafter KMT’s Propaganda Departm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National Library, and the Library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e last two institutions were probably to function as repositories for all printed material published in China. The first two institutions, by contrast,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 reviews. Neither the *Publication Law* itself nor the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however, stipulated which institution was responsible for what kind of review processes. The *Publication Law* was introduced in its mainland Chinese version from 1937 to Taiwan after the retrocession in 1945.

2.1 Publication and its Control in Taiwan in 1945–1947

The process of publication control was organized on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the first two years after the war,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rol of published material. The agenda of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was to guarantee “reporting of the truth” (報導真相) and the “harmonization of public sentiment” (調洽輿情). (Xia 1945a) Translated into practice, i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rol of media, both printed and broadcast, to ensure that they convey suitable information and implement cultural policies aiming at the sinization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harmonizing public sentiment”).² Within the ecology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are thu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On December 18, 1945, Xia Taosheng (夏濤聲, 1889–1968), the head of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published a proclamation in *Bulletin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Executive Administrative Office*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報告; hereafter: *Bulletin 1*). He ordered all periodicals active before November 25, 1945, to register within twenty days from the announcement with the city and county governments. The announcement also listed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n the application as stipulated in

2 For more on control of various media see Taiwan sheng Xingzheng zhangguan gongshu Xuanchuan weiyuanhui (1946: 29) and also Huang (2007: 69). For more on sinization Huang 1997, Chen 2002

Article 9 of the *Publication Law*.³ It also reprinted Article 36, threatening publishers contravening the registration order with a fine of up to hundred yuan. (Xia 1945b)

This was the first step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ublication Law*,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trol of printed material in post-war Taiwan and was, as such, in line with the typology of censorship as the control of literary distribution described by Aulich (1988). The regulation targeted primarily periodicals as the main means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In terms of its function, the procedure was meant to help survey the publication landscape in order to prepare future steps toward stricter control. Nonetheless, it also aimed at excluding certain people from the field (among others, those involved in the Japanese regime) and eventually at preventing certain contents from entering the public sphere.

Far from being restricted to Taiwan, the registration of periodicals was a nation-wide practice. Evidence of this can be found in the communications by central institutions. For instance, a telegram sent by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published in *Bulletin 1* on August 30, 1946 alerted all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gainst unregistered publishers, a pervasive phenomenon after the war. The Ministry brought the danger of unregistered periodicals spreading misinformation to the attention of subordinate institutions and called for them to be immediately closed down. (Announcement No. 3) In this respect, it seems, Taiwan was not subject to a stricter control than other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some local specificities. The most influential regulation with a wide impact on the readership was the permission temporarily to use Japanese, and its renunciation after one year (October 25, 1946). (Announcements no. 2, 4)

In addition to Xia Taosheng's appeal to register, *Bulletin 1* also carried a notice from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on December 18, 1945, reminding publishers of periodicals to submit the contents of both news and advertisements in advance. Additionally, the notice addressed some practical matters, demanding that publishers make four copies of the news contents and two copies of advertisements available to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before 4 p.m. one day before publication. (Xia 1945c: 7) This announcement confirms a practice of pre-publication censorship. It may also explain why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bigger cities. As Aulich (1988) shows through a different example, such technicalities could be an effective means of control, as they forced publishers to be located in larger cities, where the censors could operate more efficiently.

Up to March 1946 (Announcement no. 1), there was no clear definition as to what sort of content was prohibited. Banned topics fell into two groups and were meant mainly for books publish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war: Firstly,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previous Japanese regime, such as praise for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encouragements to participate in a Pan-Asian War, reports about the Japanese-occupied regions, and support for the Kōminka movement). Secondly, among banned topics belonged contents harming the contemporary regime under the KMT leadership. These included defamations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Party Director-general, misrepresentations of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contents detrimental to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propagation of methods for committing crimes or any act which obstructs public order). In the context of censorship as practiced previously and contemporaneously

3 The required items include: 1) the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2)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3) basic economic data about the publishing house, e.g. the starting capital; 4) publication frequency; 5) the address of both the publishing house and the printing company; 6) the name, ag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nd address of both the publisher and the editor.

on the mainland, this ban is not surprising, and there are telling parallels in other post-war regimes. For example, before the Communist Party seized power in 1948, post-war Czechoslovakia also suppressed the Nazi past and institutionalized a cultural orientation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the highest priority for the new Communist regime. (Dvořák 2016: 54) This phenomenon was, however, not specific to Czechoslovakia alone. Rather, it was pervasive in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t the time.

In Taiwan, books with suspicious contents had to be withdrawn by booksellers. (Chen 1946: 133; Taiwan sheng Xingzheng zhangguan gongshu Xuanchuan weiyuanhu 1946: 123–124) Members of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accompanied by policemen or military police, were supposed to collect confiscated materials from booksellers before March 10, 1946, to be burned later. Huang (2007: 78) mentions that by the end of 1946, 1,451 titles had been banned, amounting to 475,111 destroyed copies.

2.2 Publication and Its Control in 1947–1949

The situation in Taiwan changed dramatically after the 2.28 Incident.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was that Chen Yi was recalled and his government was replaced by a new provincial government headed by Wei Daoming (魏道明, 1899–1978). Moreover, on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level, in April 1947 the Executive Yuan (行政院) reorganized some institutions and created the Information Office, which took over the registration of KMT's Propaganda Department. Across the mainlan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ensorship was (at least formally) removed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arty and returned to the state. The reorganization also affected Taiwan, and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was renamed, first, as Information Desk (新聞室), which was still part of the TPEAO. Afterwards, in August 1947, it became the Information Directorate (新聞處) under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nouncement No. 8) In March 1948, Wei Daoming ordered that at each Secretariat (*Mishu shi* 秘書室) of local governments, one official should deal, among other things, with the content review. These officials were, however, part of the civil government and not of the party's line of command. (Announcement no. 13)

With the new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a system of tighter control emerged which focused on the editorial staff. In May 1947,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issued a new form for periodical registrations which required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personal background of the publisher, the editor-in-chief and, for the first time, also of the main editor.⁴ Such gather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esembled secret police practices and pushed what was originally a purely administrative routine procedure to a new level of invasiveness. It has to be noted, however, that this change also affected the mainland and not only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the regime was concerned about all regions which had been under Japanese control during the war and asked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journalists active in these regions, especially about their war-time activities and if they had been convicted for treason. (Announcement no. 10) The *Publication Law*, however, required only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blishers and editors-in-chief, so at this point journalists emerged as a new group of interest to the state. Points of particular concern

⁴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expressed a wish to learn more about local conditions and requested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1) the political ties of the journal; 2)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publishers and main editors; 3) the character of the publisher and the editors; 4) their predilections (嗜好); and 5) prior convictions of the editors and publishers. (Announcement no. 7)

comprised thei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prior arrests, and legal violations.⁵

Similar means of control were introduced by other post-war regimes. Czechoslovakia also prevented publishers and journalist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Nazi regime from continuing in publishing to sec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new state. (Dvořák 2016: 56)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se steps were not directed at literature *per se*, as the targets of control were the editorial offices. The Czechoslovak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officially approved editors and publishers helped to tacitly establish censorial norms and practices at the hear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same may have happened in Taiwan.

Judging from the stipulations about the workings of the Information Directorate in the official *Bulletin of Taiwanese Provincial Government* (臺灣省政府公報; hereafter *Bulletin 2*), the Information Directorate was less concerned with the periodical registrations.⁶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might have been that bo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shers had turned the registration into a routine procedure within the two years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The second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reviewing procedure and the number of institutions involved decreased. The third, eminent likely possibility is that there were only few new periodicals to register, for anyone who wished to establish one would do so by stealth, simply adding a new supplement to an existing newspaper to avoid bureaucratic complications (an increasingly common phenomenon after the summer of 1947).

After Martial Law was announced in Taiwan on March 20, 1949, the Rules for Administering Newspapers, Periodicals, and Books under Martial Law (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 were issued on May 28, 1949. It had a lasting impact on publishing for decades to come. As Cai (2010: 82) points out, the regulation targeted harbors and incoming visitors, to stop them from importing “revolutionary” books and periodicals to Taiwan.

I failed to locate any official announcement regarding changes to the *Publication Law* in the year 1949, but two files in the Archive of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suggest that there were some adjustments in September 1949. The first file contains a draft of a memorandum inquiring with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about changes from September 1949. The Information Directorate asked for clarification as to whether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could approve the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a periodical (which was previously the prerogative of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Directorate also inquired how long periods of inactivity had to last for periodicals to be considered inactive and thus obliged to announce their change of status to the local authorities. (ATPG, file no: 40710006786010)

The second file includes the reply,⁷ stating that the *Publication Law* in the version of August 1937 still applied in Taiwan, albeit with two changes. Firstly, the “Department for Propaganda of the Kuomintang’s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replaced by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Executive

5 Article 13 stipulates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editorial staff cannot continue in their positions: “1) [The person] does not live in the country; 2) [he is] a prohibited producer; 3) [he is] imprisoned or held in custody for over a month; 4) [he is] an offender against public laws.” Article 14 continued: “1) a person punished for violating Article 21” (i.e., someone promoting views against KMT-ideology or punished for corruption [TD]). (Announcement No. 10)

6 The Information Department seemed to be more oriented towards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should have primarily included facts about the realities of Taiwan to enabl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Announcement no. 11. For dissemination work see an instructive order by Wei Daoming in Announcement no. 13.

7 ATPG, file no. 40710006786006.

Yuan.” The change thus reflected the institutional reorganization from April 1947, which excluded the KMT’s Propaganda Department from the review process.

The second alteration concerned two phrases: (1) the stipulation regarding content that would “sabotage the Kuomintang” (破壞中國國民黨),⁸ and (2) the abolishment of all regulations regarding approvals by all levels of KMT branches (有關各級黨部會核之規定). The second change of the *Publication Law*, however, points to a much more profound change in censorship practices, because the KMT organs were completely removed from the process. As the next part of this article will show, it was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Committee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會; often abbreviated as 省黨部; hereafter: KMT Provincial Branch) which exercised censorship before. Excluding them from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most likely changed the dynamics of the review process as well.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however, also had other means to control the press. Bulletin 2 mentioned continuing paper shortages and that the page limits for each type of periodical were lowered as a consequence.⁹ As we know from other examples, manipul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aper was a successful strategy used, for example, by the Czechoslovak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to control the size, periodicity, and even the existence of periodical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Wögerbauer et al. 2015: 960) Furthermore,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started to closely monitor the capital of each publishing house. The minimum amount required to establish a periodical was raised. Publishing houses were forced to register as legal entities with the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建設廳)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¹⁰ All these additional regulations must have placed a heavy burden o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With respect to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more specifically, the first two years of Chen Yi’s government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period of “mapping” and “controlling.” In comparison to Czechoslovakia where, with an agreement of all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arties and cultural elites, all private periodicals in Bohemia were abolished as their they were believed to be source of the social disorder (Wögerbauer et al. 2015: 963), there was no such wide ban attached to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in Taiwan. The rath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blication Law* in Taiwan showed that Chen Yi’s government was well prepared and basically followed *The Outline of the Plan for the Take-Over of Taiwan* (臺灣接管計劃綱要), which he and his colleagues had already drafted in 1944.¹¹ There were, of course, procedural problems (Announcement No. 5), but it seems that there were problem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blication Law* in mainland as well.

In contrast to the previous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boundary between state and party institutions was blurred, the years from 1947 to the end of 1949 were characterized by a clearer division between the two. It expressed itself, on the central level,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formation Office and, on the local level, in the exclusion of the KMT branches from the review process.

8 This phrase appeared in the Twenty-first Article, Section One: Published materials shall not include any of the following discourses or propaganda writings: “1) those with an intention to destroy the Kuomintang, or violate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2) those with an intention to overtur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r to harm the benefit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3) those with an intention to obstruct public order.”

9 For the respective regulations, see Announcement No. 9 and 12.

10 For example, ATPG, files no. 0044820008564018, 0000039988, and 0000402399.

11 The whole plan is reprinted in Zheng Zi (1994: 265–274).

In general,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grew more complex, as publishers, editors-in-chief and even journalists had to submit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equired with pertinent documentation. The literary field reacted to this development by establishing various cultural supplements at province-wide newspapers which did not require separate registration. Supplements thus represented a structural niche for the literary field to sidestep the legal framework stipulated by the field of power and thus embodied the dynamics of the period.¹²

3. From the Back of the Archive: Censorship Practice in 1945–1947

As pointed out above, the registration of publications was the state’s first attempt to exercise control over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Publication Law* stipulated both formal and content requirements for all publications. The following part of the paper has two objectives. Firstly, it will reconstruct the review proces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espective tasks of each institution. Secondly, it will offer several case studies to discuss the functions of censorship and its motivations.

3.1 Censorship as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an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was to be reviewed at three levels: local, provincial, and central. At each of these levels, the respective KMT institutions should be consulted. Figure 2 shows how an application was forwarded from the local to the central level (red arrows) and when and how the KMT institutions participated in the proc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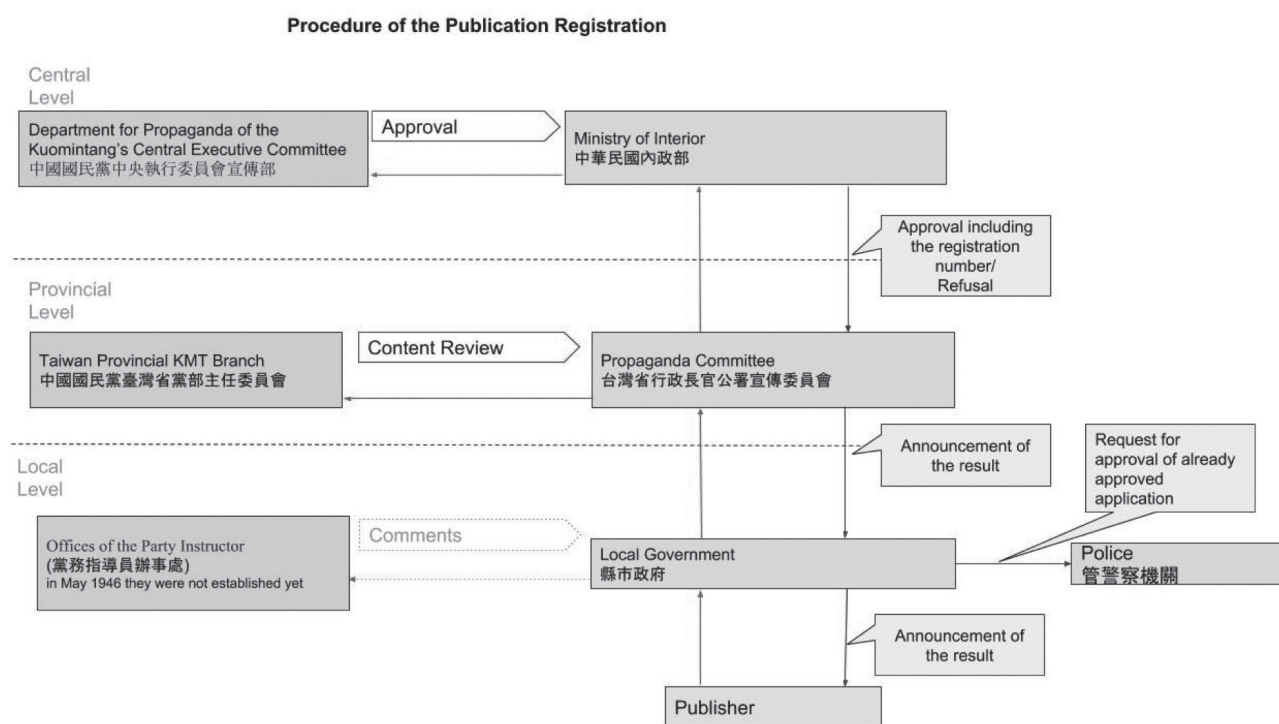


Figure 1: Organogram showing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12 For more about the supplements and literary discussions see Dluhošová (2010).

A publisher submitte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which checked for formal correctness. As shown in Figure 2,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n added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in the fields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entitled “Comments after review” (考察意見) and “Comments after the second review” (復核意見). The column for “Comments after review” usually contained a formulaic statement to the effect that all fields were filled in and there were no objections against the registration as well as a stamp of the reviewing department. The field “Comments after the second review” summarized the status of the periodical and stated that the application compli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ublication Law*; then the next steps in the process were recommended.

The organogram representing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show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have consulted with the local KMT institution. But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first year after the war differed from the idealized model. A file, dated on June 5, 1946, includes the draft of a memorandum to the Provincial KMT Branch in response to a complaint from the KMT’s Propaganda Department.¹³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pointed out that the applications of several periodicals they had reviewed were not sent to the local KMT offices.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the entire registration process, replied that there were no party instructors at the local level (縣市黨務指導員), so they could not fulfill the procedural steps as stipulated in the Articles 9–11 of the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 review was thus assumed by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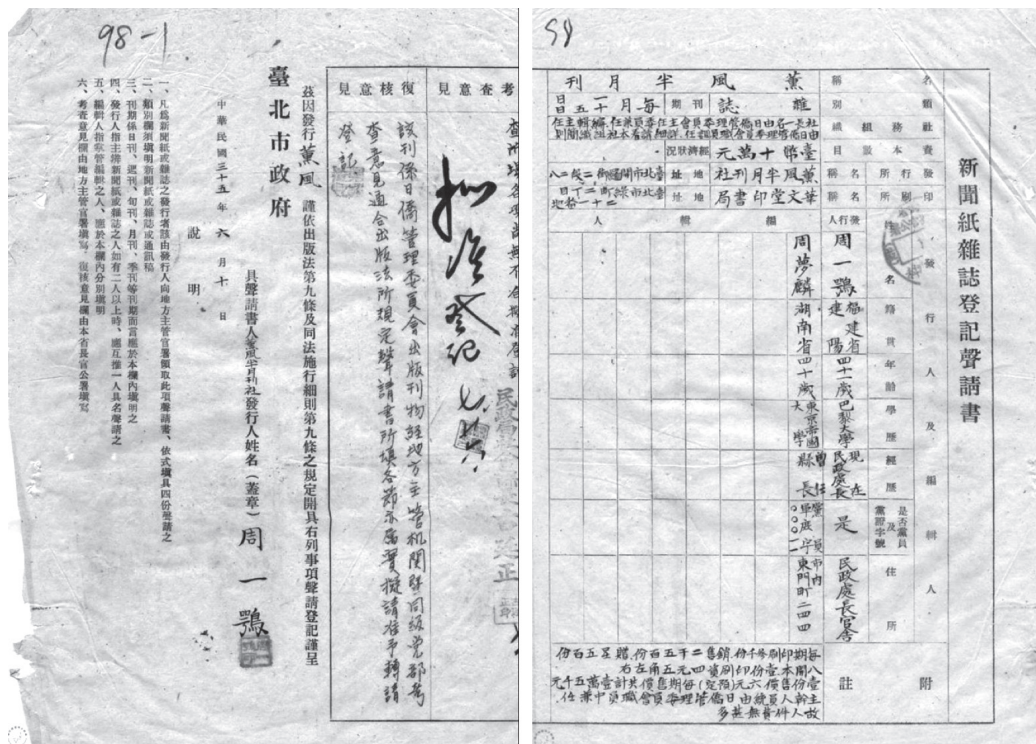


Figure 2: An example of a periodical registration form, in this case for the official journal Xunfeng banyue kan 薰風半月刊. (ATEAO, File no. 00313710015108)

13 ATEAO, file no. 00313710015016.

It seems, however, that not long after the complaint, the Offices of Party Instructors (黨務指導員辦事處) were established within the county and city governments in Taiwan (between June and August 1946).¹⁴ From August 1946 onwards, the archival records demonstrate that local governments were already in contact with the local KMT offices and forwarded them applications for approval.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organs were blurred, and it seems that the party instructors might have been regarded as higher-ranking than state representatives. The case of the periodical of the local Kuomintang Youth League (中國國民黨青年黨) from Hualian county can serve as an example.¹⁵ The name of the county magistrate (縣長) is mentioned on the cover letter on the second – the less prominent – position, after the name of the KMT party instructor.

The blurred boundary between state and party organizations tasked for censorship appeared in other authoritarian regimes as well. After the 1948 Czechoslovak coup d'état,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Enlightenment was in charge of censorship, but editors-in-chief, also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fulfilled the function of censors directly at the editorial offices. Moreover, in 1950, the state bureaucracy asserted its control by appointing the so-called “controlling editors” named by the secretar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Janoušek-Čornej 2008: 83) As the regime was tightening its control over society, state and party became ever more closely intertwined. In the Soviet Union, post-war censorship was reinforced by an official agency,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Military and State Secrets in the Press under the USSR Council of Ministers, later known under the acronym Glavlit. Glavlit was infamous for its coordination with the secret service, KGB (Dewhirst-Farrell 1973), a situation not found in the other regimes. In the model described by Darnton (2014: 149), censorship in the Eastern Germany befor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also comprised cooperation between a state organization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ts subordinate organizations) and the Party (The Cultural Division of the Ideological Secretaria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he Cultural Division had to approve all publication plans and also had the final say on censored content. Under one-party rule in the post-war era, there existed thus a range of dynamics between parties and state organs. It suggests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volvement of this relationship in the case of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When reviewing files connected to publishing in post-war Taiwan, one gets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which is often considered the main body exercising state control over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was not actually the main actor in the process. Its importance lay mainly in its unique position among the other actors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it coordinated al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including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locat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Drafts of the documents sent to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from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together with the application usually reproduce the original wording of comments made by

14 There is a file which includes a letter asking to help the Party instructors in Tainan, dated to June 29, 1946. (ATEAO, no. 00318200012254). On August 24, 1946, the Secretariat of the Taiwan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 Office, on the request of the Provincial KMT Branch, asked for housing for the employees of the Office of Party Instructors. (ATEAO, file no. 00301710200001)

15 ATEAO, file no. 00313710015049. The local KMT party instructor was trying to keep the journal in print even after the publisher who originally applied for the registration became a public servant. A similar case is discussed below. See also Announcement no. 6.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on a given application. From that we may conclude that KMT institutions had the main say in the formal and content review, whereas the civil government just executed the necessary procedural steps (i.e., collecting materials, forwarding application files, explaining policies to the public, etc.). Based on the comments from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also returned applications containing formal mistakes to the local governments for redrafting.

When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received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s approval, it sent two copies of the application—with the comments by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enclosed—to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he second copy was, in all likelihood, intended for the KMT’s Propaganda Department. Only upon receiving an approval from the KMT’s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s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uthorized to issue a registration to the publisher. The registration numbers were also publicly announced in Bulletin 1. Further, the *Implementation Instructions* required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send approved applications to the provincial Police Department. So far, however, I was unable to find any trace of this step in the files. Finally, the local governments would contact the publishers and further monitor content, publication frequency, and any other significant changes which would require amendments to the registration.

3.2 Reasons for Bans

Having addressed mainly formal issues so far, we may now move on to the contents. What topics alerted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Before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I have to point out that among the forty-three registrations I have reviewed, there were only four cases in which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or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commented on the content. Disregarding Japanese publications, which were subject to a blanket ban, the proportion of declined, as compared to approved, publications is low. This may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have publishing under tight control during the first two years after the war. At the current stage of research, we can only speculate why censorship appeared fairly non-invasive in individual cases. It might be because a fully-fledged system had not been established yet. There were also tensions between governmental and party institutions about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deological concerns were not so pressing immediately after the war. However, a more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source materials might result in a different assessment.

Imposing Academic Authorit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eaning and Form

The first case I want to discuss is a response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Mandarin Promotion Council (臺灣省國語委員會, henceforth the State Language Council) to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regarding an application to publish a book by a native scholar, Yang Ding (楊鼎), from Taizhong. He applied to the Taizhong City Government to gain permission to publish his three-volume work *Learning the Script Through the Four Books* (四書識字).¹⁶ The rationale of the book was to utilize knowled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Classics and Hokkien pronunciation to teach the new state language (*guoyu* 國語). The intention of the book overlapped with the aim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Mandarin Promotion Council

16 ATEAO, file no. 00313710015068.

which was to implement Chinese instruction not only in newly reformed schools, but to propagate Chinese more broadly in all spheres of society.

The State Language Council, represented both by Wei Jiangong 魏建功, the head of the Council) and He Rong (何容, Wei's deputy), refused to issue an approval. They attached an anonymous report of five pages in which the reviewer voiced appreciation for the author's efforts but, immediately afterwards, stated his conclusion that these efforts had not been successful. The rejection argues along academic lines and does not betray any obvious political or ideological undertones. It seems that the State Language Council, like an institution overseeing a modern academic peer-review process, acted foremost as an arbiter of good scholarship.

In my opinion, however, even the fact that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asked for such a review has some ideological undertones. One of the most urgent matters for the TPEAO was the cultural reintegration of Taiwan with the mainland, and promoting the state language was one of their priorities. Although linguists of that time were not sure how, in terms of its historical derivation, the Taiwanese language related to the state language, or how to promote the use of Mandarin in Taiwan, the language issue was very sensitive, and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reserved the right to arbitrate on linguistic standards.¹⁷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f a non-state agent interfered with the official language policy, state organs might have become suspicious, perhaps even considering this a danger to their cultural policies.

Such position resembles the argumentation of Aleida and Jan Assmann (1987: 11), who scrutinized the institutions of censorship vis-à-vis the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anon or tradition. In their opinion, the institution of censorship operated in tandem with the institutions of text maintenance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meaning maintenance. Censorship thus guarantees permanence of the form and of the meaning of the canon against "heretic" tendencies. Following the same logic, the Taiwan Provincial Mandarin Promotion Council thus retained the right to decide about the state language and its "correct" interpretation.

Technicalities and Their True Meaning

On October 5, 1946,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¹⁸ raised concerns regarding the publisher of Taiwan Review (*Taiwan pinglun* 台灣評論), Li Chunqing (李純青, 1908–1990), who did not reside in Taiwan.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requested clarification as to whether an absentee publisher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and expressed its reservations as to whether Li could fulfill his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editorial office. Furthermore, the KMT censor designated Li Chunqing's thought as "impure thinking" (思想不純正) without any elaboration. This sudden remark, however, stands out in an otherwise very technical report.

He (2013) points out that the journal was banned after four issues on the basis of an order from the

17 For the whole discourse propagated mainly by He Rong and Wei Jiangong see supplement Guoyu 國語 of the official newspaper *Taiwan Xincheng bao* 台灣新生報.

18 ATEAO, no. 00313710024012.

KMT's Propaganda Department and the stated reason was, indeed, that the publisher was not physically present at the editorial office. Based on the memoirs of Su Xin (蘇新, 1907–1981), the editor of *Taiwan Culture* (*Taiwan wenhua*, 台灣文化), and Li Yizhong (李翼中, 1896–1969), the director of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He confirme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banning the journal was the journal's strong left-wing orientation due to Li Chunqing's influence. Memoirs of contemporaries, then, confirm that the brief remark on Li Chunqing's worldview was indeed very important. This reveals a more general phenomenon: the authorities do not disclose the true reasons for banning the publication but, instead, rely on a legal pretext. We can only hypothesize the rationale behind such tactic. It could be that the authorities feared a backlash if they were too open about their ideological interference, especially because Taiwan had not been under their control for very long. It could also be that the authorities were aware that banning opinions was inherently problematic, even among those who did the banning.

The following case study shows similar features. It concerns *Taiwan Culture*, a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Taiwanese Culture (台灣文化協進會) with You Mijian (游彌堅, 1897–1971), the mayor of Taipei, as the publisher and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While reviewing the registration,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found out that You was acting as publisher while being employed as a public servant, which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considered problematic.¹⁹

The internal debate regarding *Taiwan Culture* is documented in several files.²⁰ The first one is the draft of a memo from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with the original application bearing You Minjian's mayoral seal, a feature which aptly symbolized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²¹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was the very authority which should have reviewed the application and continued to examine the journal's contents after it began its publication. The files I was able to review do not include the reply from the KMT's Propaganda Department, but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find out from elsewhere how the problem was resolved. On February 28, 1947,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published an order on behalf of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They informed all local governments about a recent legal clarification prohibiting all civil servants from acting as publishers (發行人) or directors of editorial offices (社長).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Judicial Yuan from December 30, 1932, exceptions were granted only to party personnel. But according to the legally bind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Judicial Yuan from May 24, 1934, exceptions could only be granted in the case of academic journals. (Announcement no. 7) So You Mijian did not break any rule when he applied for *Taiwan Culture*, because it was registered as an academic periodical.

The legal clarification prompted a reaction from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which asked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character of the journal was indeed academic. The file, opened on February 8, 1947, included a cover letter from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to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requesting that the journal be suspended, because according to the Member of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and head of the Section for News and Broadcasting, Fan Shaoxiang 樊紹項,

19 Some cases are documented in which public servants applied for periodical registrations, but each of these concerned a periodical connected to an official institution.

20 ATEAO, No. 00312310002001, 00313710003020, 00313710024003.

21 ATEAO, no. 00313710024003.

Taiwan Culture was a “journal about arts” and furthermore, the editorial office applied for the registration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issue.²² There was evidently a double standard at work—different people receive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While other periodicals, for example *Current Events* (*Shishi bao* 時事報),²³ were suspended because they published without registration, this apparently was not the case for *Taiwan Culture*. You Minjian’s influential position presumably helped to successfully navigate the administrative complications. As a result of these pressures, You Mijian stepped down as the publisher and the journal was re-registered as a journal about the arts. It was, however, not suspended during the procedures of evaluation.

A further observation concerns the active role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In all the other cases of which I have seen archival records, it was the Provincial KMT Branch Committee that conducted the review, whereas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only played a secondary role. The action taken by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against You Mijian in an otherwise unattested manner was, indeed, triggered by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The file includes a memo signed by Li Yizhong, the head of the KMT Provincial Branch, asking the TPEAO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journal was academic in character. This unusual procedure suggests that the review demanding suspension of the journal may have been a political intrigue or resulted from someone’s personal agenda.

Lastly, the file in question is also special for another reason. Unlike other files I have seen, it includes the censored material, marked up by the censors. Having such documentation at our disposal in the present case gives u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observe what sort of content raised red flags, and it also allows us to look over the censors’ shoulders, as it were. The file includes both issues of the second volume of *Taiwan Culture* in their entirety.

Sensitive content

Fan Shaoxiang from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mentioned in his report that some of the published content in *Taiwan Culture* “lacked appropriateness.” (言詞欠妥) What does that refer to? A “Note by the editors” (編輯後記) played with a popular, though offensive, saying: “The [Japanese] dogs left, the [Chinese] pigs came” (狗走了，豬來了) proclaiming the essential equivalence of two types of abusive alien rule. The critical tone toward the new rulers persists throughout the two issues. For example, Su Xin (writing under his pseudonym Su Sheng) smuggled veiled criticism of the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 into an article about the Taiwanese art scene.²⁴ In another passage he criticized censorship interfering with dramatic performances.²⁵ (Su 1947) The censor marked Yang Yunping’s (楊雲萍, 1906–2000) critical review of a play called 鄭成功 (Zheng Chenggong), which was performed by the Chinese Dramatic Society (中國劇社) on the invitation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Yang Yunping expressed dissatisfaction about the poor artistic performance and overpriced tickets. The censor also inspected

22 ATEAO, no. 00313710001045.

23 ATEAO, no. 00313710001061.

24 Su Sheng (1947); ATEAO, file no. 00313710001045.

25 Similar content as noted by the censor can be found in the second issue as well: Anonymous (1947a); Anonymous (1947b); ATEAO, file no. 00313710001045.

literary writings. He specifically pointed out a short-story by Lü Heruo (呂赫若) called “Winter Night” (Dong Ye, 冬夜), showing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e depiction of the main protagonist from the Mainland.²⁶ Furthermore, the censor underlined two other parables implying inappropriate behavior of the Mainlanders in Taiwan,²⁷ and he marked several passages from a short story called “Village Self-defense Unit” (nong cun zi wei dui, 農村自衛隊).²⁸ This short story touched upon many urgent problems besetting people’s life both in the countryside and in cities. In addition to these critical remarks towards the post-war situation, the KMT, and the new rulers, the story indirectly encouraged people to mobilize and protect themselves, because the state failed to do so.

The offensive language and critical content must have alerted the censo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attitude expressed in the underlined content did not display any particular left-wing or pro-communist leanings, but it was openly critical toward the new regime. Such content, published under the editorial oversight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yor of Taipei, was probably very displeasing. The censor might have felt the need to interfere with a public servant running such a subversive publication.

In sum, the controlling institutions were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issues they considered dangerous to their cultural policies, which shows how vital they were for the new regime. They were also sensitive to any potential damage to their image, which could have undermined the regime’s legitimacy (i.e., the parallel between “pigs” and “dogs”; criticism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instability of Taiwanese society). Communist thought—the most dangerous contender to the Nationalists’ ideology—might have been their most obvious target at the time, but apparently leftist leanings were not officially named as a reason to ban any journal. A preoccupation with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gime and its legitimacy may also explain why censors stated formal rather than ideological reasons for the suspension of the journal *Taiwan Review*. This conclusion is also supported by the case of the Mandarin textbook which was denied publication.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as representative of state power, utilized the Provincial Mandarin Promotion Council as an academic arbiter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status as the sole authority on matters of state language, one of the keystones of Chinese identity in Taiwan.

Another aspect should be also noted here. Even though the authors of many articles and literary works published in *Taiwan Culture* were known to the censors, censorship was not directed against the authors, but against the journal and its publisher. The function of this process was to control or influence the orientation of the journal as a whole, not merely to interfere with individual items published in its pages.

4.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is the result of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ensorship and the control of publishing in early post-war Taiwan. One of the objectives was to situate the control of publishing within a broader context of censorship practices in Republican China and to link it to contemporaneous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26 Lü Heruo (1947); ATEAO, file no. 00313710001045.

27 B.C. (1947); Ling Gen (1947), 29; ATEAO, file no. 00313710001045.

28 Qiu Pingtian (1947); ATEAO, file no. 00313710001045.

This paper has outlined the legal framework in force throughout all regions under KMT control.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drawn attention to regional specificities arising from the loca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national framework, paying especial attention to how publication regulations were announced and implemented by state and party institutions in the newly acquired province.

A close inspection of the rules and announcements has pointed to a tendency to gather increasing amount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ose involved in publishing. There was, furthermore, a tendency to urge local governments to take a more active role in monitoring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addition to mandatory registration, the state used other means to exert control. These comprised, for example, economic regulations raising the minimum amount of capital required, registration of publishers as legal bodies, and paper distribution.

In addition to the normative framework set down in laws and regulations, this paper has reconstructed the procedure of publication registration, revealing the vital role played by KMT organs at all levels in the content review processes. Archival materials register traces of the dynamics between civil and party institutions, indicating that, in the period under discussion, civil institutions were reliant on and subordinate to party organs.

From the materials I have inspected, censorship—or the control over published material in the most general sense—was mainly carried out within the formal framework stipulated by the *Publication Law and its Implementation Rules*, while substantive issues of content review are not pervasively documented in the archival records I have been able to consult. To the extent that we consider the documents discussed here representative of broader historical trends, we might speculate that since the law was new in Taiwan, the controlling organs were initially pre-occupied with formal issues and turned their attention only later to matters of ideology. Alternatively, the practice of banning publication for ideological reasons might have not been fully established yet, so state and party organs exploited formal mistakes to the same end. The regulations reveal that there was pre-publication censorship, yet few of the materials I have reviewed suggest the existence of comprehensive attempts to monitor existing publications (except for *Taiwan Culture*). Announcements published in official *Bulletins* did not specifically emphasize prohibited themes, suggesting that prescriptive censorship had not reached an advanced stage. At this point, it is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is is evidence of the absence of systematic censorship or a distorted impression due to an absence of evidence. Other institutions outside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in this case most likely KMT organs—may have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more extensive attempts at censorship. Only sustained efforts to locate more archival sources can help decide whether this was the case.

The archival material about *Taiwan Culture* revealed sensitive contents which alerted the controlling bodies. In general, state and party in post-war Taiwan were concerned to keep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rty-state complete and, thus, its legitimacy intact. Any attack on this symbolic image elicited reactions from the authorities. These were not, however, direct responses to the offending contents, but rather took the form of tortuous bureaucratic arm-twisting, sometimes aiming at the replacement of the publisher for formal reasons. Such a course of action may have had an educational func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ensoring institutions. Whenever officials equipped with bureaucratic means to grind down publishers' resistance to their interference, this would send out a warning to other publishers not to risk



their livelihood by attacking state or party symbols. The ultimate goal would have been to set up a socio-cultural framework of obedience, compelling every actor to express himself only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what is permitted – the sign of a culture of censorship deeply rooted in the literary field. (Bourdieu 2012: 52) At present, this conclusion is tempting, if speculative; it is certainly a hypothesis merit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unique archival materials this article has used do, however, have their limitations, and these need to be acknowledged. For some reason, only the Archive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Executive Administrative Office includes files on registrations and on censored content (and, notably, only in the case of *Taiwan Culture*). But the Archive of Provincial Institutions hardly includes any files on these matters. It seems that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other institutions involved in the review process after 1947. Further documentary evidence about censorship practices may then well be kept in other archiv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an only be expected to provide representative insights on the first two years after the war. But further archiv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will without doubt turn up new materials and provide valuable novel insights.

假新聞：看不見的社會真實、偏見、與集體宣傳

Fake News: Hidden Social Reality, Biased Message and Propaganda

蘇蘅 Su Heng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曾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傳播政策與法規、傳播媒體轉型、傳播研究方法、網路新聞學。重要著作有：《傳播研究調查法》、《不同世代的網路新聞分享與訊息可信度的關聯分析》、《新聞倫理教育的困境》、《公共衛生危機中政府與媒體如何共舞：檢視產生不實新聞的影響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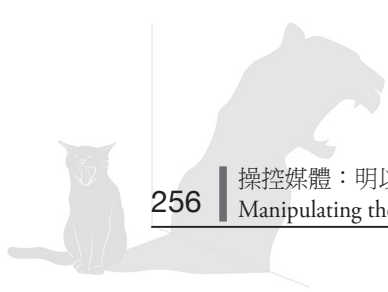
摘要 / Abstract

英國脫歐運動和美國川普勝選是兩個西方社會擾亂正常民主社會秩序的兩個最活躍的假消息例子，許多美英以外的民主國家近年也深受造假訊息流竄的困擾。本文主要探討假新聞種類、問題起源及其對民主政治的影響。

首先，本文將探討假新聞崛起原因，接著說明哪些假新聞在社會普遍流傳，以及為什麼。本研究以 Laclau 的浮動能指概念，選擇三個台灣案例，探討三個案例如何包裝在「新聞」背後，傳達什麼訊息；以理解假訊息的意圖為何，對應什麼社會真實，傳送什麼偏見，並析論「假新聞」作為社會控制工具的意義，以及政治操弄假訊息如何影響民主社會的正常運作。本文將以理論和實務兩條軸線，分析假新聞的發展脈絡、最後將提出假新聞對在地的意義及反思。

關鍵詞：假新聞、社會真實、政治傳播

Many democratic nations are experiencing increased levels of false information circulating through media and political websites that mimic journalism forma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fake new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truggles.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of 'fake new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term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floating signifier': a signifier lodged in-between different hegemonic projects seeking to provide an image of how society is and ought to be structured. The author uses three cases to investigate the political party's discursive strategies and the news media. The first example selected in this article is the President Tsai Ing-wen's dish washing photos circulated on social media. The second one is the accident happened



during the Action Alliance for University Autonomy’s plan to launch a “New May Fourth Movement” in NTU campus. The third one is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Navy was preparing to hold live-fire military drills on Wednesday off Quanzhou in Fujian province near Taiwan Strai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ake news’ serves to partially organize and reshape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struggle, ‘true’ and ‘false’ are not empirical-founded categories defining the correctness of information. Instead, they are profoundly political categories mobilized by opposing actors to hegemonise the normative grounds of social reality. In this way, ‘fake news’ becomes a floating signifier and is repositioned within different signifying systems as tools of public propaganda.

Keywords: fake news, social realit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許多民主國家歷經與日俱增的假訊息或假新聞流傳的威脅，造成社會混亂不安。這些假訊息多半借著「新聞」的外觀，透過社群媒體如臉書、政治網站、網路論壇到處流竄。然而更讓人更引以為憂的是，假新聞不僅損及個人資訊決策的基礎，更折損民主政治與公眾對社會政治事務的討論及民意形成。

假新聞的出現，往往使一般人放大檢視新聞中的錯誤，誤以為多數媒體都在散布假新聞，使新聞媒體的可信度備受質疑。對於有明確政黨傾向或對議題有明確立場的民眾，更易對媒體產生負面評價，甚至於政治人物可以任意斥責媒體的報導為「假新聞」，作為規避民意監督的藉口 (Erlanger, 2017)。

Leetaru(2017) 追溯假新聞歷史，認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假新聞，當時交戰國運用假消息作為宣傳，但假新聞真正快速躍升，是在美國 2016 年總統大選期間。這波新的假新聞高潮，這些假新聞數量龐大，也成為社群媒體時代最有爭議的公共論述 (Carson, 2017)。

根據美國 Collins 英文詞典定義，「假新聞」為：虛假，通常偽裝成新聞，以聳人聽聞的訊息，傳播報導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2018)¹。維基百科認為假新聞是：美國大眾報業時代黃色新聞的衍生版，或是一種宣傳，並強調使用假新聞背後動機的重要性：「假新聞的目的在誤導他人，以獲取經濟或政治利益而編寫發布的新聞，假新聞通常以聳人聽聞、誇張或明顯虛假的標題來捕捉注意力」(維基百科, 2018)²。

網路時代社群媒體成為假新聞的溫床，假新聞代表網路上同溫層的回聲室 (echo chamber) 效應，也就是網路上意見立場相同的人們比較容易聲息相通，反而阻礙網民去理解多元意見和不同聲音 (Sunstein 2001a, 2001b, 2007)。近年來，美國總統川普和其他政治人物再度改變這個名詞的意涵，將其作為媒體來源的負面標籤（例如指紐約時報和 CNN 為「假新聞」）。假新聞不只是指不實的訊息或報導，而變成貶抑自由派媒體地位的代名詞 (Allcott & Gentzkow, 2017)。

由於社群網路轉傳功能強大，網路缺乏把關和事實查核的機制，因此人們很難分辨訊息真假。例如 2016 年選舉期間，美國發現社群媒體廣傳的假新聞多半來自臉書，而不是主流媒體 (Silverman, 2016)，接觸假新聞的民眾多表示傾向相信 (Silverman & Singer-Vine, 2016)，最常被討論的假新聞以支持川普的為多 (Silverman, 2016)。部分媒體甚至指出，川普當選總統，部分得利於假新聞的影響 (Parkinson, 2016; Read, 2016)。

假新聞的定義裡包含假消息或假資訊的意義，因此 2016 年美國大選結束後，研究紛紛探討假新聞的特質，包括類型、傳送管道、來源，以及虛假訊息 (misinformation) 的特質為何，有學者並把選舉期間出現的假新聞分為十三類，建立資料庫。這些討論偏重的是假新聞所彰顯了什麼背離新聞專業的價值和問題，假新聞竄流又凸顯新媒體無法做到的公共輿論是什麼。

假新聞和謠言有關，不過謠言的歷史源遠流長。謠言一詞在中國最早見於《後漢書杜詩傳》，當時有「詩守南楚，民作謠言」，但這裡的意義是歌謠民謠，有誦讚之意，不是現在的謠言；屈

1 fake news definition, 可參考網址: <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fake-news>

2 fake news 在維基百科, 可參考網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ke_news

原的《離騷》則有「眾女嫉餘之娥眉兮，謠諑謂餘以善吟」，這裡的謠諑就有「造謠」或「空穴來風」之意（何木風，2009）。謠言在西方歷史也悠久，至少超過百年。早年主要是口耳相傳，現在透過網路傳播，很容易出版，可以立刻得到某種可信度，甚至迅速傳給大群公眾。

謠言中最特別的一種是政治謠言，除了美國深受政治謠言之苦，許多國家也是受害者。政治謠言雖然可以查證更正，也可猜測散布謠言的動機為何，但已有研究發現網路謠言效力持久，而且聽者接受後，再多更正也沒有挽回事實的效果 (Berinsky, 2015)。

政治謠言是極特殊的一種假消息形式，有學者定義為「接受一種事實上沒有證明根據的訊息」(Fine & Ellis, 2010)，這類訊息的特殊處在於：一是通常缺乏具體證據，只是一種有保證的信念 (warranted beliefs)；其次，謠言不再只是邊緣的信念，會透過廣泛的社會傳播，獲得影響力 (Keeley, 1999; 轉引自 Berinsky, 2015: 242-243)。因此政治謠言藉著社群媒體和網路傳播，成為頗具殺傷力的工具，謠言可能只是沒有根據的訊息，但更可能全然是假。

研究文獻顯示，政治說服過程中，來源可信度會影響人們的訊息處理。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其陣營使用「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 一詞，並以假新聞斥責特定媒體「造假」。不過政治說服中，另類真實很可能變成「宣稱的事實」(Sustein, 2009)，並透過社群媒體不斷從人對人及社群之間傳播，這類另類事實的「假新聞」，敘事方式為何，帶著什麼證據，為何能讓人相信訊息是可信的？假新聞帶給公共討論什麼扭曲的影響，假新聞和假訊息、集體宣傳之間有何關係 (Allcott & Gentzkow, 2017)？學者 Laclau (1990, 1996, 2005) 的浮動的能指 (floating signifier) 和霸權爭鬥 (hegemony struggle) 的概念，探討語言中抽象的個別符號如何用於隱喻社會中的個別主體，並將個別符號所集合形成的共同體，視為一種論述 (discourse) 或論述形構 (discourse formation)，適合用於本研究的案例分析，本研究將以 Laclau 的論述分析途徑檢視台灣三個假新聞案例的論述、和真實的接合，以及假新聞產生過程中的能指的政治目的為何。

這三個案例具有幾種假新聞類型的論述特色，包括自我稱謂、真實和虛假特質為何，指涉何種霸權爭鬥的論述形構，分析不同新聞來源的報導和強調的重點，有助理解這些假新聞企圖控制的話語權為何，如何指假為真。有助理解政治假新聞政治意圖的異同，發展哪些以假為真的策略，探討真和假新聞脈絡的不同，以作為結論和討論。

貳、研究背景與相關文獻

一、假新聞與政治市場

假新聞常見的一種形式是資訊誤導 (disorientation)，通常會用奇特情節，把其和主文隔離，或把誤導的資訊植入更多訊息中的一部分，如人物、事件或時間空間的錯置，然後利用片段或誤植的訊息來傳播給大眾。這類假新聞可定義為：故意虛假傳播為新聞報導，或模擬紀錄片形式，以達到政治目的 (Bennet & Livingston, 2018: 124)。

美國政治上有多個著名的假新聞案例，例如較早的 2009 年歐巴馬總統的健保改革方案包括對年長者的照顧，但是因為謠言而叫停。傳言提到接受健保方案的長者必須安排時間和政府官員討論「安樂死」等生命終結的選擇，假消息始於前美國副州長 Betsy McCaughey，很快透過保守派媒體傳播開來，很多著名的共和黨政治人物加入唱和，稱為「死亡項目」(death panel)，即政府將藉

著醫療改革，來掌握人們的生死，決定哪些人可以含括在治療項目，哪些人只好等死。這個假消息的傳播迅速有效，導致 2009 年 Pew Center 八月的調查，發現三成民眾對「死亡項目」的謠言信以為真，這個爭議大幅降低歐巴馬健保的可信度，政策最後決定刪除這個項目 (Berinsky, 2015)。

2016 年川普和希拉蕊柯林頓競選總統期間，北卡羅萊納州的披薩門 (Pizza gate) 事件為另一著名案例，主要是選舉期間，社群媒體傳出某家餐廳是希拉蕊及競選總幹事從是兒少性剝削、綁架、販賣兒童的秘密據點，甚至發生一名男子誤信假新聞後，帶槍掃射餐廳 (Siddiqui & Svrluga, 2016)。

選後，川普入主白宮，仍然爆出一名電影製作人 Ami Horowitz 提供福斯新聞台一則瑞典穆斯林難民和移民攻擊事件新聞。Horowitz 聲稱有個深膚色的男人擊警，他拍下汽車燃燒片段，儘管瑞典警方聽說此事，但說不能證實是難民犯罪，但福斯新聞很快播出。川普於第二天利用這則新聞，在佛羅里達州政治集會上發表談話，「你看看昨晚瑞典發生什麼？令人難以置信？」川普及影片來質疑歐洲警方不管難民犯罪的後果作為宣傳。事後，川普承認他的訊息來自 Horowitz 的影片 (Noack, 2017)。但是瑞典警方查出真相後，指責 Horowitz 重剪內容，扭曲警方說法。更糟的是，福斯新聞台播出的內容，並為美國右翼網站 Breitbart 拿去使用，「佐證」瑞典的移民犯罪 (Gramer, 2017)。

其次，在傳播過程或通路中，由特定組織或網站發出假新聞，是否影響假新聞傳播？說服研究向來重視來源可信度，不過來源可信度的理論用於謠言研究，則是較新的概念。假新聞的指控為川普總統帶來新聞媒體和記者角色衝突的討論，某些媒體被指為公共論述的「另類事實」，並被貼上「假新聞」的標籤，已起媒體極度不滿，並引起很大爭議。

假新聞早年的研究偏重假新聞的宣傳和假資訊的策略運用，並據此建立假新聞和來源及案例的資料庫 (Yates, 2016, Zimdars, 2016)，可作為研究假新聞的資源。但是當傳統媒體被貼上「假新聞」的標籤，假新聞研究重心轉到假新聞現象如何出現，以及假新聞生產者和網站為何，和媒體被指的「假新聞」有何不同。不過因為這些研究缺乏對製造假新聞意圖的理論及研究方法，只能有限地回答學院關心的學術問題 (Jankowski, 2018)。

第三是社群媒體傳播假新聞的影響力。Allcott & Gentzkow (2017) 認為 2000 年代的美國選舉，網路新聞剛出來，從言論自由角度看，「假新聞」可能僅是多元意見的呈現，當時關心的研究主題是意見多元，是否因為過濾泡泡造成回聲室效應。美國政治傳播向來認為，選舉時正確的新聞傳播，能提升民眾對民主政治的參與和判斷。但是隨著美國人對社群媒體依賴加深，假消息到處傳佈，惡化平台的信譽，關心重點轉為民眾究竟如何接觸假新聞，接觸比例多寡，以及相信程度為何。

由於社群媒體平台如臉書粉絲頁的科技特性和以往的媒體科技迥然不同，任何內容無需透過第三者就可轉傳，無需查證，也沒有編輯守門作為判斷篩選依據。如果民主政治核心基礎薄弱，容易造成假新聞氾濫。美國在總統大選選後的研究也發現：(1) 社群媒體已是選舉期間重要（但不是主導）的政治新聞和訊息來源 (Allcott & Gentzkow, 2017: 223)；(2) 民眾在選前接觸假新聞網站傳播的假新聞比例很低 (Allcott & Gentzkow, 2017: 227)；(3) 民眾能否分辨假新聞和真新聞的差別，主要和教育程度、年齡以及平常有無使用一般新聞的習慣有關。但因曝露數量極少，因此對投票影響也不大。

假新聞的生命周期為何，有多持久，則為另一研究關注的重點。Kuklinski 等人 (2000) 研究發

現，假新聞所以容易得逞，主要因為多數公民缺少對基本政治事實的了解，有時政治領域的一點暗示，就可以達到傳播效果。但假新聞對民主政治確實具有強大破壞力，不但催毀民主政治的討論功能，尤其民眾信假為真時，更可能拒絕正確訊息。如果政治謠言提供新而有趣的養分時，很多政治假資訊的真假難辨，透過這種政治錯誤認知，反而使得假訊息傳播地更快。

二、假新聞產製與資訊傳播

傳播理論的主流典範相當重視新聞產製、接收和訊息內容的相關分析，另外，假新聞於什麼社會文化和歷史脈絡下的運作，以及和政治體系的關係，也受到廣泛關注。

在假新聞產製方面，由於當代媒體豐富多元，除了報紙、電視、和網路各種平台並存，網路上的 YouTube，維基解密、LiveLeak 內容、網路智庫、激進的網站，都有可能使用新聞格式製造假消息，Twitter 和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網路論壇、WhatsApp 和 Line 這些開放或封閉的社群網路平台，以及有億萬富翁支持的 Breitbart 網站，提出各種議題，並成傳播假新聞的載具 (Gold, 2017)，無論是政治新聞、笑話、或夾敘夾議的假新聞，都容易搭事實的便車，在網路傳播 (Bennett & Livingston, 2018)。因此美國主流媒體報導 2016 年選舉年網路充斥假新聞，Huffington Post 2016 年 11 月也報導，過去幾個月社群媒體已被假消息淹沒 (Masur, 2016)。Allcott 和 Gentzkow (2017) 更說假新聞的製作和風行，主要原因是產製成本低，無需太在意正確性，

假新聞接收則是另一種重要而豐富的研究領域。例如 Allcott 和 Gentzkow (2017) 重視人們對假新聞的注意、記憶和可信等效果問題。Berinsky (2015) 重視政治假消息為何被接受，是否有有效的工具反駁假消息，減少錯誤訊息的擴散風險。另一些研究偏重為何有民眾「相信」假新聞：Allcott 和 Gentzkow (2017) 更說假新聞的製作和風行，原因之一是選民偏好看與其政黨屬性相關的新聞，資訊的有用比正確性更重要。Silverman & Singer-Vine (2016) 和 Silverman (2016) 也發現，最常討論假新聞的選民多半是川普的支持者，因此才會在臉書熱情分享假新聞。

假新聞內容分析，許多學者以傳統媒體的內容分析 (Krippendorff, 2013) 進行文本、出現次數、和趨勢分析。質性研究方面則有論述分析，例如 Farkas 和 Schou (2017) 提出假新聞類型和特色，除了傳統的資訊安全和查核概念外，資訊負荷過多 (Kovach & Rosenstiel 2011)、資訊誤導 (Eysenbach, 2008; Syed-Abdul et al., 2013)、政治上有組織的宣傳 (Aro 2016)、以及偽裝的種族主義宣傳 (Daniels, 2009; Skinner, 2000) 皆是。

美國新聞信任研究機構 First Draft 研究員 Wardle (2017) 就認為「假新聞」遠比外界想像要複雜多，透過對 2003 到 2017 年的假新聞學術論文整理，發現假新聞共有六種類型，包括：(1) 新聞諷刺 (Satire)；(2) 新聞搞笑 (Parody)；(3) 造假 (Fabrication)；(4) 照片操弄 (Manipulation)；(5) 廣告 (Advertising) 和公關 (Public relations)；(6) 宣傳 (Propaganda)。

Wardle (2017) 指出，即使是新聞媒體的報導也經常出現錯誤資訊，特別是誤導的內容、假脈絡、仿冒來源等，可能是記者迫於時間壓力來不及查證，或是因政治立場及被政治人物發言所引導，有時錯誤訊息來自公眾人物刻意引用的假數據。

假新聞如何透過社群媒體的分享而傳播，不但在研究為何某些訊息內容更容易驅動人們密集分享行為。這種透過新聞網絡的密集而大量的傳播，可能和新聞網站原本在網路上有大量的網絡系統有關，新聞媒體會用標題增加點擊 (clickbait headlines) 驅動讀者閱讀，有些人甚至不在乎內容真假，受到標題吸引，就立刻傳送或點擊付費 (paid-per-click) (Kathy, 2017)。另一種傳送原

因是同溫層的社群內部傳送 (Pariser, 2012)。國外研究發現，這種傳送特別在右翼政黨集中也普遍，他們運用網站傳送假訊息主要為策略運用，傳送的也常是有政黨傾向的假訊息，傳送途徑多為保守派媒體，這些假訊息常伴隨真實新聞或事件的紀錄片，想要挑動對手的真實性和安定性。像美國的 Breigart 的假新聞傳送方式即為一例，通常透過保守媒體的生態系傳送有政黨傾向的假新聞，目的在為政黨化妝和粉飾 (Posner, 2016)。

以美國來說，保守右翼擁有其能見度高、流量大、網網相連的媒體生態鏈，這個媒體生態系也和政黨智庫、非營利政治組織、以及許多個人或團體的網站，構成更大的政治網絡。這個複雜的網絡結構，能在網上提出對各種議題的監督、質疑或主張。多項研究發現，網路上這類言論關注氣候變化、移民難民、政府浪費無能、對有錢人課稅，以及其他意圖激化問題的力量，帶有政治掩護和影響選舉的目的而設定各種政治議題 (Mayer, 2016; Skocpol & Hertel-Fernandez, 2016)。顯示美國社會已因為不同政黨和對政治議題的立場，形成激進右翼和其他對立主張的政治斷層，並使得政治緊張和衝突加劇。但是，這些假新聞在網絡流竄，也顯示 Chadwick (2013) 描述網路出現「混合」的政治溝過程與後官僚秩序 (post-bureaucratic order) 的新現象。例如，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右翼媒體網絡在設定議題中發揮支持川普和反對希拉蕊的影響，並能對抗選舉中的主流媒體議題 (Faris et al., 2017)。而境外的俄羅斯駭客、酸民和網路機器人，也都傳播支持特定政黨的虛假信息，為以國內的選舉事務增加境外另一層假新聞的複雜性 (Brustein, 2016)。

三、假新聞與訊息真實

(一) 錯誤訊息和假訊息之別

假新聞或謠言所以能為人們接受或誤信，基本具有兩種特質：(1) 訊息中缺乏對特別的標準證據之說明 (Fine & Ellis, 2010; Allport & Postman, 1947)，並要加上接收者先存的信念或立場。(2) 有些謠言可能逾越信念的邊緣，透過社會傳布，因而獲得影響力 (Berinsky, 2015)。謠言在社會科學裡的研究已超過百年，多半都和政治有關。早年 Allport 和 Postman 的研究發現多半透過口耳相傳，但當今網路已成為謠言溫床，可以立刻得到回饋，經過網路轉傳，甚至得到可信度，可以傳播出去，弄假成真。

在假資訊 (false information) 的研究中，常被採用和討論的名詞有兩個：假訊息 (disinformation) 和錯誤訊息 (misinformation)。許多學者使用這兩個名詞來區分誤導的訊息是刻意或無意的 (Floridi 1996; Skinner & Martin, 2000)。有學者將所有誤導訊息的類型都稱為錯誤訊息，而假訊息是指故意生產和流通這些假訊息 (Fetzer 2004; Karlova 和 Fisher 2013; Keshavarz 2014; Tadjman and Mikelic 2003)，後者的意圖顯然比較強。也有學者以狹義的概念稱「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是指沒有意圖的誤導性內容。錯誤和虛假兩種可以僅用有沒有故意來區別 (Fallis, 2015; Giglietto et al., 2016; Kumar & West, 2016)。

根據上述分類和定義，假訊息 (disinformation) 即可能是一種政治運作，政治團體或個人藉著散播假訊息以影響公眾輿論，或透過網站傳播假新聞，以吸引點擊量 (和廣告收入)。相對來看，社交媒體使用者在不知情下，共享的虛假訊息 (misinformation) 就是一種誤傳。上述的概念可以進一步用於分析「真實」和「虛假」訊息的區別，也可以從「有無意圖」涵蓋假新聞的生產和流通

背後的成因，這種討論可以涵蓋內容本身以及更廣泛的情境脈絡因素。

(二) 假新聞作為政治工具的爭議

美國提出的「假新聞」(fake news)是「另類事實」的看法，讓「假新聞」一詞的概念變得更為模糊，究竟應該從主題、敘事方式、圖文搭配、或標題來判斷，成為假新聞研究的難題。

許多民主國家正在透過模仿新聞形式的社群媒體和政治網站散播更多的假消息。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假消息與(1)極右派政黨與運動在動員支持者反對執政黨與(2)主流新聞夾帶的資訊有關。假消息的傳播可以追溯到許多民主國家越來越多的合法性問題。公民對機構的信心下降，破壞新聞中官方消息的可信度，並向公眾開放其他消息來源，這些來源通常與民族主義（主要是極右派）和外國（通常是俄羅斯）企圖破壞制度合法性並影響執政黨、政府與選舉穩定的策略相關。希拉蕊柯林頓也曾說，她認為「假新聞」應該只有「假」或「真」新聞的問題。她接受「假新聞」的前提是新聞具有誤導性的訊息，而不應該成為政治或是政黨對立衝突的指涉（Clinton, 2016）。

本文擬對「假新聞」的興起採取不同的分析方式，不是進入「虛假」或「真實」的定義和比較，而想從多層面看各方如何給某則訊息定義「真」或「假」，也探討這個定義真假反映了哪些多重代理人的戰場為何想確定什麼是有效或欺騙性的宣稱，本文將嘗試理解「假新聞」作為政治鬥爭一部分的話語能指。我們退後一步，看看對「假新聞」的不同概念如何產生和闡明政治戰場對社會現實。在這方面，我們的目標不是定義正確的假新聞的定義，而是要分析不同的，反對的和衝突的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我們超越了對事物的專注假新聞造成的錯誤信息威脅，而是問：擴散是什麼「假新聞」- 符號意味著什麼？他們做了什麼樣的道德規範的論述？目的是引領何種鬥爭？想把什麼意指帶到前台？

(三) 假新聞論述如何與意義接合

1960年代開始，符號學對人文社會科學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而有所謂「語言學的轉向」。受到這個語言學轉向的影響，Ernesto Laclau 和 Chantal Mouffe（Laclau, 1990, 1996, 2005; Laclau & Mouffe, 2014[1985]）也用語言作為一種隱喻，來分析和理解社會現象。假新聞在網路出現的不穩定意義，可以用後馬克思主義者 Laclau(2005)的「浮動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來形容，也就是說很多政治意見截然相反的使用者，對符號有著根本不同的看法，並用能指作為一種手段，構建不同的政治認同、衝突和對抗。「假新聞」即是當代政治一個更大的霸權鬥爭過程的一部分，也用以界定當代政治的形式、目的和形態(modality)。從政治場域看，「假新聞」已成為一個關鍵時刻霸權爭奪的場域，本文認為「假新聞」已經成為一種政治上深層的概念和策略，目的在去除反對者並構建自己的霸權。

本文的分析採用 Laclau 的浮動的能指和霸權爭鬥的概念，主要因為 Laclau 用語言中抽象的個別符號來隱喻社會中的個別主體，並將個別符號所集合形成的共同體，視為是一種論述(discourse)或論述形構(discourse formation)。在這種隱喻下個別符號與論述形構的關係，即是在描述個人與社會集團或團體的關係。而論述形構與論述形構間的關係，即是在隱喻社會裡集團或團體之間的關係（曾志隆，2002：109）。

對 Laclau 和 Mouffe(2014[1985])來說，如果能指的意義是由不同能指間的相對關係來決定，那麼得首先預設一個符號的共同體的存在，而且這個共同體的成員的增減，都會影響到每個能

指的意義，因為這會影響到不同能指間的相對關係。因此只要在原來句子組成要素之間加上新的字詞，或是減去原有的字詞，那麼這些符號的關係也都會不相同，意義也會有所改變（轉引自李傑穎，2005）。

這個共同體的存在，意味著共同體的成員分享著某種共同特質。依前面索緒爾的觀點，這種特質只能透過差異來凸顯。也就是說共同體內的符號。都必須和某個共同體外的符號「不同」，才可以成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這個「不同」，就是共同體的「他者」。由於它是在共同體之外，因此是不為共同體內的符號所能清楚界定理解的，這也暗示了共同體和「他者」間的界限，其實是模糊不清、似有若無的（轉引自李傑穎，2005）。

Laclau 和 Mofsee 在這裡提出幾個新的概念定義，他們將前述的這個符號共同體稱為「論述」或「論述形構」。而將位於這個共同體內的符號稱之為「環節」（moment）。很明顯的論述（符號共同體）一定是位於一個比共同體還大的空間上，他們稱這個許多論述或共同體所存在的空間叫「論述場域」（discourse field）。論述場域中，必然存在許多不在論述（共同體）內的符號，這些符號就叫「組成成份」。而透過在不同的符號間建立某種關係，以形成一個論述（共同體）的實踐，就叫做「接合」（articulate）。對 Laclau 和 Mofsee 來說，所有的論述都是以建立一個核心，以掌控所有位於「論述場域」的符號，遏止差異湧現出來為目的而建構的。因此雖然依索緒爾的理論，各個能指的意義是浮動的，但是透過論述和接合的操作，在論述場域中會產生某些暫時的穩定的意義。這個暫時性的、具有穩定的意義的論述，就被 Laclau 和 Mofsee 就稱之為「節點」（nodal point）（轉引自李傑穎，2005）。

雖然所有論述都是要透過建立一個節點，以掌控論場域上所有的論述、符號。但是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一個論述（共同體）的形成，一定會產生一個論述（共同體）外的他者，換言之，這即是企圖掌控一切的論述（共同體）所無法掌控的部分。當然論述（共同體）可以透過修正它的波節點，擴大它的邊界，把這個他者吸納進去，但是如此一來還是會再出現一個邊界外的他者。因此任何一個論述（共同體）都不可能完全掌控論述領域的所有符號，而由於他者和節點的關係也就是這個共同體的邊界，因此這個邊界永遠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任何一個共同體都無法完全縫合，完全固定其共同體內的符號的意義（轉引自李傑穎，2005）。

Laclau 和 Mofsee 稱這種論述（共同體）會不停受到他者的暗中破壞，使其成員的完全一致性，無法永遠固定下來的狀況叫做敵意（antagonism）接合與文化霸權的實踐。因此任何一個社會，或社會群體成員的同一性是不可能完全固定的。也就是社會或社會群體並不存在著任何歷史、社會的本質，其意義總是會不停受到「敵意」的暗中破壞。Laclau 和 Mofsee 指出，這個論述意圖吸收論述場域上所有組成成份，如果想將其變成論述內「環節」，永遠不會成功。另一方面雖然社會與集體同一性是暫時建構的，但絕非意味著集體內的個體的意義完全自由流動，因為任何一個個體（或說主體）都是在論述中被建構的。絕對固定意義的不可能，也意味著所有的意義都是透過「接合」（articulate）而產生的。他們認為，在社會分化複雜，政治主體多樣化的當代社會，左派應該設法透過「文化霸權」的建立，「接合」不同場域、不同論述的主體，形成葛蘭西所謂的「歷史集團」，以對抗由壓迫者形成的「權力集團」。他們的論述理論可貴之處，在於強調必須在名詞（諸如民主、權利）的意義上進行鬥爭，以闡揚出各種新的政治認同。」（Best & Kellner，朱元鴻等翻譯，1994：250）。他們也利用「文化霸權」的概念，試圖在多元、不確定的現代社會情境中，建立暫時性的社會和政治認同（轉引自李傑穎，2005）。

以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見解為基礎理論，Laclau 的著作強調意義的政治和偶然維度，認為社會現實是持續霸權鬥爭的產物，而不是先天本質或內在規律。根據 Laclau (1990,1996)，社會現實透過不同時刻表達的實作，以獲得意義。任何特定時刻的意義始終具有一定的關係，只要它的出現能連接到其他時刻（無論是文本還是材料）。論述理論強調論述是偶然的和歷史的結構，隨著時間的推移，透過鬥爭和爭論的產生，並建立差異。在特權有別和意外的情況下，Laclau 採納 Derrida (2016 [1967]) 的論點，即論述有其封閉意思，主要有賴排斥和外部構成的產生。換句話說，意義取決於創造極限和繪製形構的內部人士和外部人士之間如何訂定界限。看起來客觀、中立或自然的結構，因為被認為含有政治因素，導致特定意義的固定，隨著時間推移，爭鬥壓制了其他選擇或替代的途徑。

綜上，Laclau(2014) 的分析策略在於 (1) 仍有社會真實存在，但社會真實是政治不斷鬥爭的產物；(2) 意義有其相連的層面，會因為含有政治因素，在特定時刻有特定的意義，內部和外部人士對其解讀，也各有不同界限。(3) 意義透過不同時刻的構連而建立，可以稱為論述；(4) 論述理論強調相關和歷史構連，是透過長時間的鬥爭和競爭而產生。有些意見被納入，有些意見被排除，因此從內部和外部不同的共同體角度觀看，並不相同。(5) 看起來客觀、中立、自然的結構其實是政治鬥爭在某個時間點凝固的結果。

沒有任何事實沒有能指的意義，也沒有任何能指不在規範我們行為的實踐活動。所以我們說規範性和描述性是兩種命令，但規範性 / 描述性的複合體，是事實和價值互相滲透，而且不可分割。

(Laclau 2014: 127-128)

對 Laclau 而言，上一段話就是指，事實永遠不能與規範分開，只有在規範的基礎上才能出現事實。如果是這種情況，那麼事實總是與規範有關，也意味著社會現實的核心始終和規範息息相關。所謂「浮動能指」，就表示即使是「同一個民主國家」，仍會因為競爭而對霸權結構產生壓力」(Laclau, 2005: 131)。

本研究分析方式，主要是循上述 Laclau 分析策略中所提示的問題，直接檢視被選定的三個案例中初始文本中的相關語詞、語句、論述，視其呈現的社會真實為何，接著將了解這些社會真實和哪些論述接合，哪些意見被排除。最後要看裡面是否指涉何種政治認同、衝突、他者的建構等，最後則分析這些論述的事實和價值如何相互滲透，出現哪些規範 / 描述性的複合體。

至於分析範例的選擇，主要以 Laclau 所提示浮動的能指和霸權爭鬥的概念論述分析途徑，分別檢視三個案例，這三個案例分別為：2018 年 5 月 3 日發生蔡英文洗碗照片事件、2018 年 5 月 5 日新五四運動的自招哥事件、以及 4 月 12 日中國大陸傳出的解放軍要來台灣海峽軍演的假消息進行分析。這三個假新聞都可以看到社群媒體如何進行假新聞操作，不僅展開主導的話語權，賦予政治鬥爭的意義，也可以出政府、或非政府行動者如何扭曹國內或國外事務，激起政治情緒，以達策略運用的結果 (Weedon et al., 2017: 5)。近年假新聞研究視角多都偏重在假新聞產製、傳送和接受，比較未從抗爭者如何掌握話語權以及政治角色如政府部門或政黨如何因應假新聞論述著手。本論文即是嘗試從論述策略的視角，檢視假新聞發生過程中，如何在不同時刻出現不同的語詞和社會真實接合，這些論述策略最後形成什麼規範，對於民主政治秩序和不同政治共同體造成什麼影響。

參、三個案例研究

案例一：蔡英文洗碗的假新聞

今年5月3日聯合報中午12:34登出新聞，「網路最近流傳許多照片，引起名嘴、民眾轉貼，這些照片包含蔡英文吃豆花、吃麵店、自己提包包、蹲在地上洗碗等等，蔡英文因此被批矯情、玩弄悲情牌。有網友在臉書上分享總統蔡英文蹲下洗碗、獨自搭火車、小吃攤吃麵的照片，並訴說著「蔡總統，台灣不需要悲情行銷，請給我們富足和更好的願景」，其中蹲下洗碗的照片，網友指出是穿著一雙數萬元的名牌鞋子，這系列照片短短上傳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有上千次分享。」這段新聞登出網路照片的原始貼圖和網友評論，顯示蔡英文洗碗照片的原始出處。新聞不但登出照片，也摘述網友評論「蔡總統，台灣不需要悲情行銷，請給我們富足和更好的願景」，「網友指出是穿著一雙數萬元的名牌鞋子」。這段話則指出蔡英文和你我的差距，一方面訴說蔡英文的背景，但召喚的是社會大眾，用語改成「我們」的第一人稱。用數萬元名牌鞋子對比全國民眾和她不同。接著聯合報新聞寫道「網友指出，蔡總統是值得他尊敬的人，但真的不需要總統跟著吃苦，社會一點都不需要玩弄歧視貧窮或是製造仇富的分裂遊戲，總統是要帶領民眾一起家財萬貫、吃香喝辣、成功榮耀、快樂幸福、國泰民安、富足安康、兩岸和平等。」這段話語氣轉折，和公共政策的論述接合，提到總統角色是「帶領民眾一起家財萬貫、吃香喝辣、成功榮耀、快樂幸福、國泰民安、富足安康、兩岸和平等。」顯示網友的解讀在於對總統角色有規範期待和範圍，此時論述已轉到第三人稱，暗示在這裡，論述者是關心國事和總統角色的網友，是「他者」，縮小負評，但呼籲總統「不需要總統跟著吃苦，社會一點都不需要玩弄歧視貧窮或是製造仇富的分裂遊戲」，這段話旨在針對全國民眾召喚。「網友還說，總統根本沒有吃苦過，還穿著名牌鞋子蹲在地上洗碗，最後一段為「現在外面吃飯有誰需要去洗碗？」



圖一：網友登出蔡英文洗碗照片和評論 (取自聯合新聞網 2018.5.3)

2018年5月3日中時電子報也登出略短而內容相似度極高的蔡英文洗碗新聞：「有網友在臉書上分享總統蔡英文蹲下洗碗、獨自搭火車、小吃攤吃麵的照片，並訴說著「蔡總統，台灣不需



圖二：網友登出蔡英文吃豆花、吃麵店、自己提包包的照片及評論
 (取自聯合新聞網 2018.5.3)

要悲情行銷，請給我們富足和更好的願景」，其中蹲下洗碗的照片，網友指出是穿著一雙數萬元的名牌鞋子，這系列照片短短上傳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有上千次分享。網友指出，蔡總統是值得他尊敬的人，但真的不需要總統跟著吃苦，社會一點都不需要玩弄歧視貧窮或是製造仇富的分裂遊戲，總統是要帶領民眾一起家財萬貫、吃香喝辣、成功榮耀、快樂幸福、國泰民安、富足安康、兩岸和平等。網友還說，總統根本沒有吃苦過，還穿著名牌鞋子蹲在地上洗碗，現在外面吃飯有誰需要去洗碗？」

但是 2018 年 5 月 3 日網路媒體 ETtoday 於上午 11:15 立刻為蔡英文澄清，用圖說更正「圖：網路上流傳總統蔡英文的洗碗照，其實是她未當選總統前，在黨主席任內行程或行程間的照片。」新聞報導也提到「近日網路流傳幾張總統蔡英文吃豆花、自己提包包、蹲下洗碗等等的照片，甚至批評總統太過矯情。但是，事實上都是「真照片、假圖說」，皆是蔡英文「尚未當選總統」前，在黨主席任內行程或行程間的照片。」並在事實上等字句加了粗黑體，以顯示何為「社會真實」。該報導特別提到，「臉書、網路上，甚至眾多名嘴、意見領袖近日分享轉貼，諸多如總統蔡英文吃豆花、吃麵店、排隊上高鐵或是靠著柱子等火車、自己提包包，甚至是自己蹲在地上洗碗的照片。事實上，這些雖然都是真的照片，但都配上了「假圖說」。只要有隨行蔡英文跑過選舉行程的黨工、同仁，或是記者都清楚，這些照片是在她「尚未當選」總統之前的照片，過去也有諸多媒體報導過相關的訊息」。這篇新聞除了澄清是真照片假圖說外，主要訴求指出，網路上社群媒體流傳的都是不實的說法。

當天下午 2 點 49 分，Nownews 以「蔡英文「假親民」自己提包、蹲下洗碗？原來都是舊照片」為題，新聞提到「例如其中一張蔡英文蹲下洗碗的背影照，就是在 2013 年底某次老人共餐的團體聚餐後所拍攝的；當時用餐完畢後大家都要自己洗碗，蔡英文自然也不例外。」，報導也提到，「對於網路上現在刻意散播照片與「假親民」的言論，民進黨黨部幕僚無奈表示，民眾對於政治人物

有個人好惡是在所難免，但若要弄假成真，這樣的行為就不太好」。顯示照片是真的，圖說是假的，因為時間錯置而變成「假新聞」。

當天的《三立電視新聞台》中午 12:08 登出澄清，標題為「惡意扭曲！蔡英文洗碗提包都是舊照片」，下午《雅虎奇摩》於 12:51 也轉發三立新聞的澄清。《自由時報》5 月 4 日刊出〔即時新聞／綜合報導〕網路近日瘋傳幾張總統蔡英文自己洗碗、靠著柱子等火車等畫面照，被批評虛偽、矯情、玩弄悲情牌訴求；然而事實上，這些照片都是「真照片、假圖說」，是蔡還沒當總統前，擔任黨主席任內的行程照片」。《三立新聞》這篇報導多在回應和澄清「對政治人物有個人好惡在所難免，但弄假成真的行為就不太光明磊落了」。後面則轉引民進黨不具名黨部幕僚的話「黨部幕僚表示，對於政治人物有喜好很正常，行為舉止被討論也在所難免，不過如果弄假成真，就跟網路上的五毛黨沒什麼不同了」。這篇報導不僅在為蔡英文照片的圖說提出澄清和反駁，在價值策略上，也攻擊這種行為「不太光明磊落」、「就跟網路上的五毛黨沒什麼不同」。

在論述上，聯合報和中時電子報因為轉述網友的話，因此會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在論證上，由民進黨和三立電視台則報導時間錯置的圖說，用的是客觀中立的語氣，但使用民進黨匿名消息來源」的聲稱提供論證，並用不道德的價值譴責傳播照片和圖說的網民。不過中時電子報 5 月 5 日仍持續登出網友後續反應新聞「有鄉民對這些說法並不領情，更在 PTT 直言：「學馬英九跟總統府員工一起吃便當很困難嗎？難以下嚥？」等，顯示 Laclau 所提示浮動的能指和霸權爭鬥仍然持續，此時似乎也像 Laclau 所說「事實永遠不能與規範分開，只有在規範的基礎上才能出現事實」。

案例二：新五四運動自招哥假新聞

2018 年 5 月 4 日網路媒體《ETtoday》報導，「台大自主聯盟 5 月 4 日發起新五四運動，抗議教育部拔管，但有部分挺管人士不滿 10 多名反管學生到場上演行動劇、表達訴求，因此爆發言語及肢體衝突，造成反管學生在拉扯中受傷。晚間，受傷學生已前往醫院驗傷，並赴派出所提告」。「當時反管學生在校內椰林大道、傅鐘旁上演行動劇，手持『管中閔純潔騙殺全國』等白布條，以及寫著『故台大法治』的靈位，諷刺台大校方為管中閔護航。不料此舉引發現場挺管群眾不滿，雙方先是隔空叫囂，隨後爆發推擠衝突」。這則新聞是以客觀中立方式報導當天的事件過程。接著，新聞訪問當事人說法，「台大資管系學生潘儒鋒在拉扯中摔倒受傷，4 日晚間到三軍總醫院驗傷，隨後赴派出所提告。潘儒鋒強調，他從頭到尾都沒動手，但卻被人從後拉扯勒住，之後又無預警放手，害他跌倒。潘儒鋒表示，教育部處置或許有瑕疵，但不代表管中閔就完全沒問題，再者學生都有言論自由，他在校內表達意見卻被外人侵害，實在不能忍受，目前已將所有施暴證據及影片提供給警方，提告傷害。至於有網友質疑他曾參與太陽花學運、是民進黨綠衛兵一事，潘也痛批台灣社會習慣黨同伐異，將所有事情二元化，認為非黑即白，他對於這種扣帽子的罵名不能接受」。潘儒鋒的論述是否認這件事的政治因素，論證為「因為 X，所以導致 Y，但希望達到 Z」的方式。因此事情發生的前提是「他從頭到尾都沒動手，但卻被人從後拉扯勒住」，表示他是無辜的：導致 Y 的結果是「已將所有施暴證據及影片提供給警方，提告傷害」，根據這些論證所發展的訴求是「教育部處置或許有瑕疵，但不代表管中閔就完全沒問題，再者學生都有言論自由，他在校內表達意見卻被外人侵害，實在不能忍受」，兩段論述主要把言論自由表達和身體被施暴和「外人」侵害接起來。這裡的論述用了「自己」的第一人稱，和「外人」的第三人及外在者的

稱呼，把自己被人拉扯勒住和他的主張構連了因果關係，也和管中閔案做了連結。網路上的 Disp BBS 也登出「台大反管學生被打赴醫院驗傷」，蘋果日報 5 月 4 日當天 18:49 登出「新五四運動爆衝突 反管學生驗傷將提告」。

但是此事後續發展急轉直下，2018 年 5 月 5 日《聯合報》刊出「昨天台灣大學校園內舉行『新五四運動』，一度爆發推擠衝突，台大潘姓學生疑似在推擠衝突中遭人拉扯倒地受傷，昨天至大安分局羅斯福路派出所提告傷害，警方循線今晚通知 68 歲劉姓男子到案說明，劉男堅稱『沒打』，願意接受司法調查。(省略) 大安分局表示，羅斯福路派出所循線查訪、調閱監視器，在今晚 9 點通知劉男到案說明，將再依影像畫面釐清案情後，依法函送地檢署偵辦。據了解，劉姓男子是前駐韓外交官，退休後住在台大附近，平時就會到台大校園散步，並無參加活動，也不認識潘姓學生，昨天散步到傅鐘前看見潘姓學生與老人、婦人發生爭執、推擠，才會上前拉人，但強調『沒有打人！』，絕無動手，若對方確定提告，願意接受司法調查，還自己清白」。《聯合報》也指出「衝突畫面曝光後，今天有網友質疑潘姓學生「自導自演」，在人潮推擠中自掐脖子又假裝跌倒後站起，潘面對媒體採訪回應，因為身體不適，想要解開鈕扣，且當脆弱的脖子被掐住，本能就會動手保護，否認「自掐」說法」。

5 月 5 日上午，網路平台陸續登出嘲諷潘生的網友評論，彰師大的網友於 7:52 在 Dcard 刊出兩張現場照片，並用圖說註明潘生姓名，註明「掐你的就是你自己啊…」，世新大學網友也說「笑瘋 超好笑 崩潰！！！！ 最後還來個綜藝摔」。另一名臺大網友也說「新 54 運動智商 54 那我看某樓大概不到 20 吧(- v -)」。5 月 5 日網路媒體《上報》以標題「【有片為證】台大反管學生遭勒頸倒地順勢加碼「演很大」，報導「因台大遴選校長而起的新五四運動 4 日在台大舉行，挺、反管兩派的衝突一觸即發。有一位反管的學生潘儒鋒被挺管的男子拉衣勒頸，一路追打，表情看起來相當痛苦，並遭嗆聲「請離開。」但潘儒鋒卻被網友認為是「自導自演」，並酸「他台大戲劇系嗎？」這段報導在質疑在衝突中反管的潘姓學生，影片中掐自己脖子，是自導自演，惹來風波更引來網友怒罵；報導中提到「由影片來看，頭戴黃色鴨舌帽的男子，不斷的從後方拉扯潘儒鋒的衣領，以致勒頸不適。」不過該報導也做了平衡報導「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升也告訴媒體，台大要落實大學自治和自主，必須要維護台大師生在校園內的言論自由、人身安全，台大學生在自己的校園內表達意見，卻遭追打、被施暴，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針對遭挺群群眾施暴一事，潘儒鋒 4 日晚間已到大安分局羅斯福路派出所報案，向掐他脖子的男子、與一名拉扯他衣物的婦人提出傷害、毀損等告訴，員警依規定受理報案。警方表示，目前已掌握被害人提供的相關影像，將調查 2 人真實身分，儘速傳喚 2 人到案說明釐清案情」。

5 月 6 日台視新聞報導「標題：反管生遭掐頸暈 逆轉！網酸「自掐演很大」駁斥自勒脖子 反管生澄清：我想解開扣子 遭反管學生控掐脖 老翁出面還原事發經過 自稱收『死亡警告』反管生：保留法律追訴權」。新聞報導中提到「只是接下來這一幕 卻讓網友看傻眼。自己摸一摸脖子，接著突然倒地，看似喘不過氣，但現場叫罵聲浪沒停，最後潘姓男大生還自己又站起來 走到立場相同的夥伴身旁，表達訴求。影片過程慢動作重播」，社群媒體上網友也對事件熱烈討論「不少網友酸他是影帝，可以提名金馬獎…，也有人替他叫屈，可能是氣不順」這裡開始引用網友說詞，呈現不同觀點。「而在影片中拍到，從背後拉他領子的劉姓老翁，也出面還原事發經過」、「整段衝突影片在網路上掀起論戰，就連潘姓男大生的家人還傳訊說是精彩的演出，讓他覺得很冤枉，透過臉書表示，懶得跟無法溝通的人溝通，對牛彈琴是最無聊的事，強調會相信就相信，甚至要

對他發出死亡警告的網友，保留法律追訴權」。

5月7日《自由時報》刊出「臉書紀錄顯示，今天凌晨2時08分，潘儒鋒在聲明中指出，對於事前發表的錄影、領獎金等論述，「純屬戲言」，強調自己的意思是，「陳抗應錄影保障自身權益以防萬一，若有不測則可作為證據提出訴訟求償」，並對「思慮不周」之處，「在此致歉」。解釋影片提及演很大的回應。5月13日，自由時報的自由評論網刊出自稱潘儒鋒朋友蘇信宇的投書，指這件事「因為部分媒體的斷章取義，將事件操作成『自招』而失焦，在事件沉澱幾天之後，筆者身為潘儒鋒的朋友，在徵求他本人的同意後，透過線上採訪，補充第一手資料後，決定從我所認識的潘儒鋒，談談『新五四運動』。投書提到「筆者詢問，參加「新五四運動」前，是否有什麼計畫與想法？」，潘的解釋是「本人即刻上前以身體為人牆，欲助夥伴脫離，不想遭劉姓老翁扯住衣領，爾後試圖掙脫時腰傷復發，加以先前招頸的不適感，在老翁放手後失去平衡倒地。」此時的說法已經改口，而對臉書貼出「如果我被動手，比較好領年中獎金」的截圖，也解釋「部分媒體，用放大鏡看儒鋒的私人臉書，看到「年終獎金」就見獵心喜大幅報導，至於「炳忠哥」的20萬美金稿費，作為媒體的責任呢？還是背後還有高層下令，點到為止即可，不宜深入追查？」這裡的論述一方面在反駁前面對造假和領錢的指責，一方面也做「他者的建構」、「理念的操作」，並轉移原來的框架設定，作為反駁的論述，並在用其他框架如原來就受傷，或別人更糟的論述作為連結。



圖三：中視新聞 5月4日畫面



圖四：反管的台大潘姓學生（白衣男）遭挺管人士前駐韓外交官劉順達抓住衣領，雙方發生衝突。[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2018年5月13日]

案例三：中共在台灣海峽舉行軍演假新聞

2018年4月12日中國福建海事局先發布公告，「台北時間18日上午8時到午夜12時，將在台灣海峽水域進行實彈射擊軍事演習」。《中央社》晚上已發布新聞，「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晚間受訪表示，國防部已研判這項演習應為共軍年度例行火炮演習，『國軍對於情勢均能嚴密掌握與應處，請國人安心，勿自亂陣腳』」。

《聯合報》隨即於4月13日刊出中國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的新聞，內容為「中共人民日報下屬環球網今天下午刊文指出，共軍18日在台灣海峽舉行實彈射擊軍事演習，主要在對近一段時間台灣的台獨活動發出警告，尤其是「台獨工作者」說法。環球網在下午1時52分刊載評論文章，針對行政院長賴清德的「台獨工作者」說法再度發表評論，並直指此次軍演就是衝此而來」。

4月15日《聯合報》登出國防部反駁新聞，標題為「解放軍18日台海軍演？國防部：假新聞 陸官媒渲染」，新聞報導說「國防部明天將就「共軍4月18日於台灣海峽實彈操演，我方情資掌握與相關因應作為」國防部赴立法院的專案報告強調，「中國大陸軍方在福建石獅地區進行例行訓練，並非針對性演習，然而此次大陸藉官媒、網路、假新聞刻意擴大渲染，同時舉行海上閱兵、戰機實施遠海飛訓等軍事威懾行動，凸顯其對我之『和、戰兩手』策略與『文攻、武嚇』統戰總體企圖，迄今仍未改變，其目的昭然若揭，籲請國人勿受其影響，並隨之起舞」。國防部報告指出，「中國大陸4月12日宣布，在福建石獅附近沿岸劃設禁航區，規劃從事例行性實彈射擊訓練，然大陸官方及媒體將其擴大渲染在台灣海峽舉行軍事演習，刻意製造區域緊張不安情勢，企圖擾亂及動搖我民心士氣」，「根據掌握情資，中國大陸軍演範圍，距離金門及本島最近之台中分為60、175公里，係為福建沿海地區，距離海峽中線68公里」，「未如媒體所述涵蓋金門所屬北碇島。另外，該地係中國大陸當面軍方一般野戰砲兵及防空部隊火砲傳統之射擊區域」。國防部也發表安撫人心的論述，「本島駐防部隊部分，除國軍各雷、截情單位，嚴密監控當面中國大陸軍隊動態，運用機動偵蒐裝備，輔以即時情資查證，支援目標辨識作為，達即時預警之效；空軍部隊及海軍部隊也將加強警戒，以為預應」。並說「國軍絕對有能力、有信心捍衛國家安全及保護人民福祉，請國人放心」。

這個假新聞事件和前面兩個案例屬性相當不同。一方面，4月13日當天，環球網評論也說：「不要以為美國通過一個『台灣旅行法』，就有了撐腰」。4月14日環球時報後續報導強調「解放軍18日將在臺灣海峽進行實彈演習，消息傳至島內，震動臺灣政壇和臺灣社會。台『總統府』急忙貼出『安民告示』稱：『國軍對於情勢均能嚴密掌握與應處，請國人安心，勿自亂陣腳』。為安撫人心，製造『一切盡在掌握中』的表像，臺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13日上演了一個小時的『海上閱兵』聲光秀。但是島內輿論認為當天的氣象條件並不適合搞『海上閱兵』，實際上，出海一小時，靶區都到不了，實彈演練更不可能了」。

軍演論述相互攻防，你來我往，軍演終於在18日展開，軍演結束後，4月18日《東森電視台》播出新聞指出，「中央電視台新聞播出軍演實彈軍演畫面，大陸官方多次釋出飛彈射擊的畫面，不過報導內容卻很低調，只強調在特定海域，沒有提到是台灣海峽，從頭到尾也沒提及台灣，由於外界一直揣測，似乎想低調處理」。東森新聞晚上播出中央電視台拍攝的軍演畫面，但新聞則說，「大陸高層要求要淡化處理18日軍演」。

假資訊和錯資訊的分野在於前者有意圖的放出，這則消息很明顯地屬於一種放出假訊息(disinformation)的政治運作，政治團體或個人藉著散播假訊息以影響公眾輿論。中共透過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和中國福建海事局發布18日軍事演習的消息是真的，但新聞中都強調在「台灣海峽」舉行，環球網把軍演從在靠近台灣的台灣海峽外，指出目的在「在對近一段時間台灣的台獨活動發出警告」，環球網刊載評論文章更說是「針對行政院長賴清德的『台獨工作者』說法再度發表評論，並直指此次軍演就是衝此而來」。國防部以「假新聞」建構論述，很清楚地想把衝突爭議淡化處理，以安定民心，因此報告中充滿「中國大陸軍方在福建石獅地區進行例行訓練，並非針對性演習」。

台灣《旺報》4月12日訪問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競時說，「大陸刻意在最初新聞發佈時，講得不明不白，其實是在利用模稜兩可訊息，刺激臺灣網路群眾反應，趁機搜集大資料，為將來對台用兵時，實施輿論戰及心理戰建立參考資料庫」。中共的宣傳除了第一天從官媒開始，接著

由對台灣事務相關人士中陸續傳播。4月13日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以書面回應軍演問題時已強硬表示：針對418軍演，「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和行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如果把這次答覆對比二天前他在國台辦正式的記者會上的淡淡道出：「賴清德以台灣行政機構負責人的身份，一再公然發表『台獨』言論，危害台海和平穩定，性質非常嚴重，影響極其惡劣」，可以凸顯出13日談話的果斷。接著就是國台辦主任劉結一，4月16日在出席鄭州一場論壇後被媒體攔住時，就直接點名賴清德說「他就是個台獨」，劉並表示：「我們舉行軍演，是為了捍衛我們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次行動」。

台灣的《中國時報》4月19日的報導則說「中共解放軍於2018年4月18日，在距離金門只有六十公里的地點，進行了實彈射擊軍演」4月19日《旺報》說「即使本來就是定位本次軍演只是例行演習，但當國台辦口徑一致的是指向針對『台獨』、以及針對賴清德時，恐怕軍演的政治意義已上升到決策層次的意旨」。這也意味這次中共解放軍軍演論述中，最集中的議題就是警告台獨和行政院長賴清德。

國防部說這個軍演消息是「假新聞」，可能有幾個意義：(1) 打消這個消息的權威感和威脅性；在立法院報告說，這是「中共官媒渲染」，在人稱上會用「其對我之『和、戰兩手』」，或「企圖擾亂及動搖我民心士氣」，又或「為避免虛假消息造成民眾恐慌與不安，在對我方無直接威脅下，國防部秉持不挑釁、不怯敵之指導，維持常態部署及警戒兵力」。此時已有把大陸當作「他者」，並把大陸當局當成原始威脅的來源和軍演資料提供者，並告訴社會大眾，這次軍演攸關台灣的政治力和台獨訴求與言論自由的關係；(2) 建立政府和民眾的連結與認同：國防部的報告雖然給立法委員聆聽，卻與主詞的「我」與「我們」遙相呼應。也和「的使用皆屬於感性的告白與召喚，主要用在對話，也和總統府發言人的「國人」相互呼應，可知政府和國防部在此的策略是建構民眾和政府、國軍的連結，並提出理性和感性的召喚。用來作為和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威脅用語，打造台灣民眾對政府的認同和信任。(3) 在軍演的連結層面，國防部用的論述是雖有威脅，但是先命名這不是台灣海峽的軍演，也不是針對性的，而是例行的軍演。軍演內容是「上閱兵、戰機實施遠海飛訓等」。接著安撫人心，提及「國軍對於情勢均能嚴密掌握與應處，請國人安心，勿自亂陣腳」；以及「一切盡在掌握中」。

因此國防部所指的「假新聞」，包括質疑中國大陸政治機關和媒體的可信度，對方如何誇大及扭曲訊息，如何辨識消息為假，都在國防部報告中提出解釋，也由國防部為「真實」訊息背書等，這些論述形構的策略運用，把中共這次軍演新聞可信度的範圍縮減到只是「一次例行軍演」，「不是在台灣海峽的軍演」，也不是「針對性軍演」等盡量劃上等號，也設法去除軍演將對台灣造成威脅等令民心不安的因素，另一方面，國防部也把軍演和我方軍事準備連結，從武力、安全、預防及有所準備等重要心理認知和情感價值連結，把原來論述的威脅性及對民心認為會對台灣社會、政治、軍事造成影響的懷疑降到最低。

肆、結論與討論

上述理論和實例採用剪接錯置、標題內文扭曲、圖文錯接的手法所造成的「假訊息」或「造謠」，第一則蔡英文洗碗的假新聞主要用圖片操弄方式連結誤導資訊，蔡英文幾張照片為真，但

接合的資訊為假，主要想把事實、情境和價值做連結，且用臉書在網路傳播，造成召喚支持者認同的輿論。第二則假新聞運用「借船出海」的手法，找一個引人注意的新聞事件，進行誤導訊息的造假，結果因為另有影片為證的對比，使得事件變成新聞搞笑，也造成不同媒體各自用事實加上不同的價值解讀該事件。第三則假新聞事件則接近宣傳，該事件是中國官方先以曖昧語氣以官媒做宣傳，鑑於中共三不五時放出軍機繞台的新聞，國防部很快以「假新聞」標籤化這個消息的影響，「假新聞」一詞的運用預設這個軍演帶給不同群體不同想像，尤其「台灣海峽軍演」會影響到不同能指的意義及對應的關係，例如戰爭對安全、混亂對和諧、中共對台獨等。國防部報告的論述旨在減少民眾誤信「謠言」，以降低這個爭議議題對社會的影響。

從 Laclau 的分析架構看到這些假新聞的特色和發展共同之處有：(1) 仍有社會真實存在；(2) 但對社會真實有不同的政治話語解讀，不同共同體有各自的能指和對應的關係；(3) 有不同立場政治論述的持續爭鬥；(4) 事實會和價值互相滲透。三則假新聞顯示，台灣社會遭遇不同類型的假新聞，會因政黨政治認同和意識形態差異，即使假新聞的誤導訊息可以釐清，但仍有不同的權威來源（如立場不同的媒體、政黨、個人）會提出不同的推理和證據，希望召喚各自的共同夥伴獲得支持。本研究因此提出重要發現和討論：

一、社群媒體平台和包括 Line、臉書，網路論壇等社群聚集及頻繁互動的平台，往往是這些假訊息的溫床。由於任何來源的使用者均可使用科技，與更多的使用者連結，使得網路謠言和假訊息更能發揮快速傳播效果，也就是資訊科技確實在假訊息傳播扮演重要角色。

二、涉及意識形態的衝突的假新聞，容易產生衝突對立，也容易各說各話，在各方均想運用各自論證，扣連到想宣稱的主張，並用內在社群和外在社群的論述描述事情，此時不但不易溝通，片面之詞的「釐清」，也未必能達到釐清事實的結果，往往需要提出明顯的事證來論證，可能對「我者」的團體有效，對「他者」則未必有效。

三、上述三個案例雖然都屬政治假新聞，但各有不同特色，也有不同的浮動的能指。蔡英文洗碗的能指已溢出原來的好心好動機之外，變成作秀矯情，甚至直指不會做領導人。第三則假新聞和台灣與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鬥爭有關。不過共同特色都在其帶著民粹的承諾和主張，都在稱謂詞操作中，將對方「客體化」或「他者化」，受訪者目的主要需要藉著自我指涉的「我們」和「他們」召喚認同民眾的支持。

四、新聞媒體的意識形態會讓其加入某些假新聞議題的論述戰場，假新聞確實可能成為意識形態爭鬥的場域。有些假新聞的真相大白，固然有助澄清事實，但有些會刻意和規範的價值連結，不但不能去除假新聞「不實」的訊息，反而可能因為自我辯白或散布另一個假消息，反而製造了另一個新的假新聞。例如有些媒體為了「澄清」，如果安排一個排他性的專訪，反而可能封閉論述的界限，使得公眾無法從開放的訊息中得到真正的真相。

五、三個假新聞案例都出現旨在做政治操控的「澄清」，這中間的政治溝通確實把假資訊當作溝通重點，第一個案例指出時間和圖片錯置的問題，真實和虛假容易對照。第二個案例因為雙方都策略性地呈現部分「真實」，反而將拉扯社會兩造的對「真實」的論述和信任，其中「造假」的動機論，因為事件本身涉及霸權爭鬥，而有不同解讀，使得出現明顯的浮動性能指，轉移「真和假」的釐清，變成以對立的論述實行意識形態的爭論，這種複製政黨意識形態的論述的「溝通」策略，易使真實失焦。第三個案例涉及國家和政治機構的話語權爭奪，雙方均以攻擊的論述指涉對方，已成為一種國際宣傳論述的交鋒。台灣以指責機關「造假」作為策略，

說服台灣民眾「相信」訊息是假；中國大陸把軍演高調稱為「台灣海峽軍演」，試圖把軍演和特定的主張和人事接合，也在製造另一種共識。兩者論述你來我往，並和台灣重要的社會狀況連結，都用重要媒體作為宣傳，創造對己方有利的說法和欲達成的政治意念操作，確實已是國際宣傳的一環。

本研究限制在於只分析三個案例作為探討焦點，實則台灣社會假新聞不少，還有許多案例值得分析。其次，在散播假新聞過程中，社群媒體扮演重要角色，本研究限於篇幅，並未處理這部分。最後，政府政黨和政治人物近年均投入或介入網路的公共論壇，有些為了為公共政策辯護，但也有是為了兩個政黨或統獨糾結不清的意識型態，而形成的爭鬥的論述和變幻不拘的能指。而假新聞成為國際宣傳的一環，是否能有效改變民眾的信念和價值，這方面的探討值得未來持續進行。

臺灣戒嚴時期的「假新聞」：〈南海血書〉案例

Fake News in Martial Law Era Taiwan: “A Blood Letter from Nanhai” as a Case Study

邱家宜 Eve Chiu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現任：財團法人卓越新聞基金會執行長、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傳播史。重要著作有：《文星與 1962 年的「中西文化論戰」：外省來臺知識青年的世代革命》、《戰後初期 (1945-1960) 臺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戰後初期台灣報人群體的多重「感知結構」〉、〈廣播天空的「轉型正義」：以中廣為例的分析〉。

摘要 / Abstract

1978 年 12 月 19 日《中央日報》副刊刊載據稱為逃離越南途中罹難難民阮天仇絕筆信的〈南海血書〉，該信事後證明為署名譯者的朱桂所虛構，當時正是台灣政治反對運動興起階段，〈南海血書〉問世，並透過媒體、學校、機關全面大規模推廣閱讀，「今天不做反共鬥士、明天成為海上難民」成為當時流行的宣傳口號，透過「血書」內容，成功將南越陷共與南越人民對阮文紹政府的反對與抗爭連結在一起，明確影射當時正在迅速發展中的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將會造成與南越相同的後果，以擴大民間恐共心理、削弱政治反對運動的正當性，來維持政權穩固。針對這個台灣新聞史上有名的「假新聞」，本論文將從知識社會學角度探討，當年黨國文宣體制的操作模式如何塑造出這樣一個具體的「社會真實」。

一、前言

「假新聞」(fake news) 這個字眼最近幾年非常火紅，由於刻意製造、迅速散佈於網路的不實消息，實際影響了西方民主國家的重要選舉結果，¹ 使假新聞問題受全球熱議。網際網路可以瞬間跨國流動，去中心化的訊息產出特性，似乎使得越是訊息自由的地區，越容易受到假新聞的侵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那些網際網路被嚴密監控的地區（中國、朝鮮）在政府的屏蔽與控管下，雖不像自由民主國家那樣，受到來自境內或境外（例如俄羅斯、馬其頓 Veles 小鎮）² 的假新聞攻擊，但控制訊息流通的政府本身就在系統性的製造假新聞。

當我們稍微回顧過去，會發現「假新聞」現象並非起自今朝，而是有其淵遠流長歷史。國家或當權者集中化、系統性製造假新聞來控制人民、穩固統治的階段尚未過去；在全球化的網路鏈結基礎上，著眼於國際對抗或個體牟利動機的去中心化虛假訊息的產製與傳播又方興未艾。從知識社會學角度考察，大眾傳播媒體做為傳遞資訊與形塑公眾認知的重要機制，為近世人類歷史上顯著現象。³ 看似每天內容翻新的新聞媒體，其實扮演不斷重複提醒其讀者對國族界線、社會群我關係、自我認同歸屬的參考框架，甚至在社會因衝突紛擾而出現整合認同危機時，發揮修補裂痕、再整合的功能。⁴ 傳播理論家凱瑞 (James Carey) 則跳脫上述的涂爾幹式 (Durkheimian) 功能論觀點，雖然同樣強調媒介的儀式性，但卻是從掌握權力者即掌握媒體話語權的批判性角度來審視媒介的儀式性。⁵

從凱瑞的觀點出發，掌握權力者所具有的話語權，自然也包括對所要散布傳遞之訊息的篩選、詮釋，甚至製造。當權力高度集中，訊息傳遞的方向就會從權力集中的一端流向另一端，這就是在過去媒體訊息產製相對集中的時代，假新聞現象便存在已久的根本原因，而 1978 年年底到 1979 年間發生在台灣「南海血書事件」，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

1 尤其是 2016 年希拉瑞·柯林頓與唐納·川普的競選結果。根據華盛頓郵報引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最新的最新研究顯示，如果除去假新聞因素的影響，柯林頓應會在結果以少於百分之一些微差距落敗的密西根、賓州、威斯康辛州獲得選舉人票，並改寫選舉結果 (Aaron Blake, "A new study suggests fake news might have won Donald Trump the 2016 elec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2018.04.03)。歐陸民主國家中，德國社會面對假新聞相對進退有據 (Simon Shuster, "Russia Has Launched a Fake News War on Europe. Now Germany Is Fighting Back", *Time*, 2017.08.09)，但法國選民受的影響就比較大 (Chloe Farand, "French social media awash with fake news stories from sources 'exposed to Russian influence' ahead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dependent*, 2017.04.22)

2 Samanth Subramanian, "Inside the Macedonian Fake-News Complex", *Wired*, 2017.02.15.

3 例如政治史家 Benedict Anderson 曾經指出，十九世紀以降的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大眾傳播媒體的關係密切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1983).

4 以這種對觀點看待傳播媒介，源自人類學的「社會戲劇」理論。最早提出該理論的 Victor Turner 以破裂 (breach)、危機 (crisis)、重返 (redressive action)、再整合 (reintegration) 來描述當一個社會出現分裂危機時，通常會藉由某些儀式性的行為進行修補裂痕與再整合 (Victor Turner, *Drama, Fields and Metaphors*, pp38-42.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將 Turner 此一承繼自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功能論觀點在媒介研究中發揚光大的 Nick Couldry，則以「媒介儀式」(media Rituals) 來指稱這些具有修復、再整合功能，透過對社會關注事件之大規模媒體聚焦，對社會連結產生再肯認效果的媒介事件 (Nick Couldry,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p.60. Routledge, 2003)。Daniel Dayan 和 Elihu Katz 則以對抗 (contests)、征服 (conquests)、加冕 (coronations) 將具有這類儀式性功能的媒介事件分為三個範疇：奧林匹克運動會是第一種；教宗約翰保祿二世 (Pope John Paul II) 重返故鄉波蘭訪問是第二種；英國王儲查爾斯與黛安娜王妃的婚禮則是第三種 (James Curran and Tamar Liebes,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of Elihu Katz", *Media, Ritual and identity*, ed. by Tamar Liebes and James Curran, pp4-5)。

5 James Carey, "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Routledge, 2009), pp15-17.

二、「南海血書」的出現及其背景

(一)「血書」的出現與社會迴響

1978年12月16日，美國卡特政府宣布1979年1月1日起將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當時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隨即發表聲明譴責美國，宣布台美外交關係中斷，並立刻停止當時正熱烈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⁶三天後的12月19日，《中央日報》副刊刊出一篇文長三千多，名為「南海血書」的文字，⁷這篇署名「阮天仇絕筆（朱桂譯）」的「血書」，描述一群南越難民漂流荒島、食飲難友血肉後飢渴而死，最後一人死前以鮮血在襯衫上書寫，留下恨極共產黨統治遺言的這封「血書」。

此「血書」後來被證實是一文學性虛構文字，但在當時台灣社會卻以其為真實，並掀起了一陣席捲全島的風潮。除《中央日報》在1979年1月10日開始發行單行本，隨即不斷再版重印，全台中、小學也全面印發給學生研讀，並要求撰寫心得。透過學校體系大力操作推動，⁸大多數於1960年代在台灣出生成長、受教育的人，對這封「血書」都印象深刻。直到20多年後，當2001年9月3日《民視異言堂》節目播出「南海血書」、「南海神話」兩個單元時，⁹許多小時候曾經撰寫閱讀心得的台灣觀眾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這封「血書」竟然是虛構的，「血書」的作者「阮天仇」，其實根本不曾存在。

雖然早在1979年6月，當時擔任台北縣蘆洲國中教師，後來成為民進黨重要理論家的林濁水，就已經在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創刊號上，對「血書」的真實性提出犀利的質疑，¹⁰但在當時並未影響「血書」在台灣社會中如火如荼的散佈。

林濁水在這篇〈拙劣的南海寓言 --- 剖析「南海血書」的真相〉中，判斷「血書」為虛構的幾個證據，包括：在飢渴中苦撐四十二天的臨終之人，竟能以螺絲尖這種不吸水物體沾血在不易書寫的襯衫上完成三千字長篇？越文為拼音文字，所需書寫面積比中文更多，寫成此篇內容恐需十件襯衫面積，要用鮮血在髒污的襯衫上如此書寫，會用掉多少血，一個瀕死者會有如此多的己身鮮血可用於書寫嗎？「血書」中對1959-1963年間越南總理吳廷琰當政時期南越社會物質條件的描寫與事實不符，倒像是對當時台灣社會歷史經驗的描述，顯然是要以反對吳廷琰獨裁的南越「民主鬥士」等「野心份子」，來影射台灣當時正在興起中的黨外反對運動，明顯「指桑罵槐」（文中第46頁）。除了「血書」附記中所提到的「血衫」這個重要證物，在舉國閱讀「血書」的風潮中，始終未曾出現；林濁水還發現，「血書」中竟然出現跟許信良在「中壢事件」（詳見後文）後所說的：

6 當時的中央民代選舉並非改選立法院全部的委員成為另一屆次，而是基於維護中華民國主權及於中國大陸地區的「法統」，仍繼續1948年的屆次，稱第一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增補選，保留中國大陸其他各省立委席次（去世者由候補者遞補至無人可遞補為止），只「增補選」台灣地區立委名額。該次選舉為第三次增補選，因台美斷交以及隔年的美麗島事件，而一直延後到將近兩年後的1980年12月6日才舉行。

7 阮天仇，〈南海血書〉，《中央日報》1978.12.19，第十版（中央副刊）。

8 當時台灣的各級學校均「自動自發」要求學生閱讀該「血書」，並以撰寫心得（朱復良，〈「南海血書」的激盪〉，《中央日報》1979.01.09，第六版；中央日報，〈各校紛以「南海血書」作為愛國教材教育廳認意義重大〉，《中央日報》1979.01.12，第四版），改編成舞台劇演出等種種方式來推廣（嵇若昕，〈南海血書感人故事忠孝國中搬上舞台〉，《中央日報》1981.04.27，第九版）。

9 「民視異言堂」從1998年8月推出以來，一直是民視最重要新聞性節目之一。本文所引述的「南海血書」、「南海神話」兩個單元，是由民視記者高人傑、李惠仁所製作。

10 林濁水，〈拙劣的南海寓言 --- 剖析「南海血書」的真相〉，《八十年代》1.1(1979.6): 45-49。

「我們真像他們說的『永遠只有十三歲』」一模一樣的句子。種種巧合，都證明這封神秘「血書」事實上是「要寫給台灣一千七百萬人民看的！」（文中第 47 頁）。

該文對於「阮天仇」所形容，讓其痛恨到能「活著咬他一口，死也甘心。」的「偉大盟邦」的描述，也做了如下詮釋：

因為國民黨散佈謠言說美國人用美鈔資助黨外人士競選，所以阮天仇就說：不要讓「盟邦」
「以大使館為司令台和庇護所，運用大把鈔票，收買野心份子。到處製造事端。」…甚至於以激動的情緒說：「我們的政府行政效率是有點顛預，官吏難免貪汙，人民不像傳說中的美國那麼自由，但絕大多數的越南人民生活仍能在安定中逐漸進步。只是野心份子極少升官發財機會。」（文中第 48 頁）

林濁水認為，綜觀「南海血書」通篇，控訴越共還在其次，最主要的論罪矛頭是指向「民主鬥士」與「偉大盟邦」。「血書」的寓意是：既然南越殷鑑不遠，台灣自救之路就很明白了。只要打倒「民主鬥士」（其實就是黨外人士），打倒「盟邦」（美國），就一切都解決了。（文中 49 頁）他在該文結論中指出：「雖沒有直接證據說它完全是偽造的。但從種種可以推理得到的結論是，它完全是捏造的神話。」林濁水認為，〈南海血書〉最大的目標，是醜化黨外人士。（同上）

（二）作者朱桂的證言

如果說林濁水 1979 年 6 月發表的這篇文章是對「南海血書」真實性的犀利質疑，那 2001 年 9 月 3 日「民視異言堂」播出的「南海血書」、「南海神話」兩個單元，就是對〈南海血書〉歷史之謎的真相還原。這兩個單元的內容後來被剪輯成紀錄片《1979 南海神話》，並獲得 2001 年台灣的「90 年度文建會紀錄影帶獎」佳作獎。

2001 年距離台灣解除戒嚴（1987 年）已經十四年，台灣已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但當年這篇深植人心的〈南海血書〉究竟是真是假仍真相未明。¹¹ 根據製作這個專題的民視記者李惠仁回憶，¹² 當時他與民視同事高人傑一起調查此事，但只有「朱桂」這個名字是唯一的線索。他們於是把當時台北市的電話號碼簿中，所有登記為「朱桂」的電話號碼一一撥打，發現住在虎林街的朱桂，很可能就是他們要找的人。在電話中提出造訪的請求被拒，但兩位積極的記者並不死心，他們跑到朱桂家附近，在市場買了一籃水果，背著攝影器材就直接按鈴求見。

受訪時已經患有帕金森氏症的朱桂，直接了當的回答記者提問，承認「南海血書」是他寫的，

11 其實在「血書」刊出的一年後，由於真實性仍被懷疑，「中央副刊」曾經刊出署名「仲父」的短文，以編者身分表示：「『南海血書』像一枚投擲在油海裡的燃燒彈，與愛國家、愛民族的熱情相起伏，構成一個悲憤壯烈的偉大場面；去年這幾天，要求轉載翻印的電話不知凡幾，而張貼的壁報還不算。身為編者，為了應付這種感情的浪潮，不能不知道得多些，以便回答四面八方的詢問，於是寫信給朱桂先生，把他由基隆請來。朱桂先生說，『南海血書』是一部小說的書名，已寫好久了，在中副發表的這篇『南海血書』乃那部小說的最後一章。所根據的資料都是真實的，寫出來的故事、人物、情節，卻是由這些資料綜合起來，再創造出來的典型，所以它的真實性，側重在文藝方面，因為他是文藝創作；不在新聞方面，因為他不是新聞報導…」依據這篇段文，「中央副刊」其實已經承認〈南海血書〉是「文藝創作」（仲父，〈南海血書〉，《中央日報》1979.12.19，第十版「中央副刊」）。不過中副的說詞反覆，或者說已經造就的「社會真實」太難違逆，在五年多之後《南海血書》單行本仍繼續販售，在該刊登出的「好書介紹」中，依舊說「血書」是由朱桂翻譯阮天仇用自己的血寫在襯衫上的絕筆信而成（嘉彬，〈好書介紹 --- 南海血書〉，《中央日報》1984.10.27，第十版「中央副刊」）。

12 李惠仁後來離開主流電視媒體成為一名獨立調查記者，2011 年以揭發農政單位隱匿禽流感疫情的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獲得卓越新聞獎「電視類調查報導獎」。其他重要的作品包括《睜開左眼》（2009）、《不能戳的秘密》（2011）、《不能戳的秘密 2：國家機器》（2013）、《蘋果的滋味》（2015）、《并：控制》（2018）等。

他說他寫「血書」是「根據當時的情勢」，「那是越南難民所遭遇的，把幾個故事連在一起。」記者問他為何會想到用「阮天仇」這個筆名，朱桂回答：「天怒人怨啊！越南人姓阮的多啊！」¹³當事人現身說法，歷史謎團終於解開。

1979年7月，也就是「南海血書」問世後8個月，朱桂出版了他的文集《歷史圈外》，¹⁴在這本寫實與虛構並置的文集最後，饒有寓意的，以附錄的方式收錄了這篇〈南海血書〉。對照刊登於「中央副刊」的版本，這篇附錄文字雖在文末仍保留「阮天仇絕筆」字樣，但並未如在中副刊登時標明為「朱桂譯」。兩者間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副版本最後的「譯者附記」，並未出現在文集版本中。「譯者附記」是這樣寫的：

內弟有一天到南海打魚，在一個荒島上發現十三具屍骨，和一堆大海螺壳，這份血書就裝在該海螺壳裏。字跡模糊，我只將其大意揣摩著翻譯出來。際此美國對我背信毀約，與共匪偽政權搞「關係正常化」，越南人民的血淚未止，卡特政府今後勢必更難以取信於任何自由國家了。

如果這段「附記」並不是朱桂所寫（因為前述附錄文字並未收入），應可合理假設為中副編輯所加。僅僅一百多字，這個「附記」卻成功的把一篇文學作品偽裝為紀實文獻，將朱桂由作者變成譯者，將「血書」由虛構變成真人真事。

朱桂在2001年受訪時承認「血書」是他的「作品」而非「翻譯」。「阮天仇」這個人物是虛構的，但朱桂則真實生存於近代中國及台灣。根據國史館檔案所保存的一份，包含由朱桂本人所填寫之自述的「總統府人事調查表」記載，¹⁵朱桂於1921年（民國10年）出生於甘肅省平涼縣，1941年8月加入國民黨，1943年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9月進入國民黨中央幹部學校地方自治科就讀，¹⁶1946年7月畢業後「復於廬山參加夏令營，並一度從軍」。¹⁷從其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廬山夏令營的學、經歷可以看出，朱桂的背景可說是血統純正的蔣氏父子子弟兵。

因此，雖然無法確定朱桂登在「中央副刊」的這篇「血書」，究竟是自發性投稿，還是受邀而作，可以確定的是，朱桂當時的身分雖然是一名教師，不是軍人也不是政府官員，但他過去曾跟隨蔣經國辦事，在總統府人事檔案中存有他的個人資料。由這些線索看來，國民黨中央幹部學

13 李惠仁、高人傑，《1979 南海神話》（民視，2001），08:55 - 09:33 處。

14 朱桂，《歷史圈外》（台北：東大圖書，1979.7）。

15 國史館數位文獻資料，卷名「朱桂」，入藏登錄號 129000112652A。

16 原為國民黨黨校的中央幹部學校與中央政治學校，於1946年合併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根據政大官網上的校史資料，中央幹部學校系創立於1944年，較朱桂在資料表中所填寫的1943年還要晚一年。但政大官網亦記載：「中央幹部學校的創立，緣於民國三十二年，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通過的。在此之前，三民主義青年團曾設立青年幹部訓練班於武昌珞珈山，是為中央幹校的前身。」（<http://archive.nccu.edu.tw/history5.htm>），因此朱桂應是在訓練班時期進入該校。朱桂就讀中央幹部學校期間，蔣經國是中央幹部學校的教育長，校長則是蔣中正。

17 從國史館該筆資料看來，朱桂從1947年8月開始在上海擔任中學教師（私立正誼中學），並在1949年1月到台灣的員林中學教書，因此他所說的「一度從軍」，應該只有1946年到1947年間。根據《1979 南海神話》影片中旁白敘述（09:40處），以及李惠仁的轉述，朱桂受訪時曾對記者談到，自己年輕時曾經追隨當時擔任贛南行署專員的蔣經國，在江西「打老虎」。如果此一說法屬實，只可能是他在中央幹校就讀時，就曾經協助過當時擔任中央幹校教育長的蔣經國，因為蔣經國在1945年朱桂從中央幹校畢業之前，就已經離開江西到重慶了（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但他與蔣經國的淵源還有另一個線索，根據朱桂在追悼摯友朱延勳的〈我與延勳〉（收入《歷史圈外》，頁165-206。台北：東大圖書，1979.7）一文中指出，1948年他在上海「參加了上海經濟管制行列」（同前引，頁194）。當時在上海主持這場與孔宋集團正面衝突之經濟管制的，正是蔣經國（蔣經國，〈五百零四小時〉，《蔣經國自述》，頁145-165。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校所培養的朱桂，會成為「血書」的「地下作者」，似乎並非偶然。要進一步證明這點，接下來還得從整個國府政戰系統，在面對當時台灣劇烈變動的內外政治社會情勢，為穩固政權所採取的全面性策略說起。

(三)「內外交迫」下的政治作戰總動員

國府中央遷台後，台灣的在野政治力自 1960《自由中國》雷震案發生後，¹⁸ 沉寂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直到 1970 年代後期，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才又開始浮上檯面。1977 年 11 月 19 日，因桃園縣長選舉過程中國民黨作票，引發支持許信良的大批群眾包圍中壢警分局，並造成一名大學生遭軍警射擊死亡，是為「中壢事件」。「中壢事件」除了是國府統治下，臺灣民眾第一次自發性上街頭抗議，也是之前分散各地，尚未組織起來的「黨外」力量集結的開始，黨外力量集結所形成的「類似政黨」，對當時的國民黨政權造成很大壓力。¹⁹

1978 年的台灣，除了內部政治反對力量逐漸成形，國府還要面對的是美國與中國建交的迫在眉睫。「南海血書」會在 1978 年 12 月 16 日美國卡特政府宣布與中國建交的三天後出現報端，並非偶然，可解讀為國府在面對內外情勢下，整體文宣戰的一部分。具體的證據包括：就中美建交與台美斷交前後，也就是〈南海血書〉問世的前後，台灣當時仍在政治力控制下的三家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正在聯播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監製，「中國電影製片廠」製作的《越高淪亡實錄》紀錄片，三台聯合首播時間，在「血書」問世前的兩周。²⁰ 台北市新聞處隨後也將該紀錄片在新公園（已改稱「二二八紀念公園」）音樂台，以及台北市各社區中，免費放映給民眾觀賞。²¹

12 月 5 日，也就是三台聯播《越高淪亡實錄》的第二天，《聯合報》第七版刊登了一篇署名「尼洛」的〈「越高淪亡實錄」的播映〉，²² 文中指出：

共產黨在它統戰的地區中，絕口不提它要宣傳的共產主義，他要強調的是這個地區的「內部矛盾」，這矛盾不外幾種，如貧富間的矛盾，地域上的矛盾，長官對部屬間的矛盾，政府對民眾中的矛盾等等，把這個地區弄成由內部不和而到內部鬥爭，一方面分散了對付共產黨的注意，另一方面對消了一大部份的有望力量，說得不好聽的，就是「鵲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手法，這個地區「親痛仇快」的事情發生得越多，就是它的統戰越顯出了功效。

這篇評論的重點放在社會內部矛盾衝突，將會導致共產黨勢力擴張，與「血書」中「阮天仇」對南越陷共前，其社會中「民主鬥士」與「野心份子」種種作為的控訴異曲同工，這時〈南海血書〉尚未問世。

18 關於雷震案始末，參見邱家宜，「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台北：世新大學傳播所博士論文，2011.07）第六章「萬山不許一溪奔—雷震」。

19 詹嘉雯，「中壢事件與台灣政治轉型」（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113-115。

20 《越高淪亡實錄》是蒐集世界各國新聞記者在越南、高棉淪陷前後實地拍攝的影片剪輯製作而成。三家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是在 1978 年 12 月 4 日晚間九時至十時，首度聯播由中國電影製片廠製作的《越高淪亡實錄》（〈越高淪亡實錄 電視明天播出〉，《聯合報》1978.12.03，七版）。12 月 17 日三台再度重播，並分別以三種語言（台視閩南語、中視國語、華視客語），在比之前更黃金時段（晚間八點到九點）播出（〈電視台明重播 越高淪亡實錄〉，《聯合報》1978.12.16，七版）。

21 〈四部愛國電影今晚開始輪映〉，《聯合報》1979.01.20，六版。

22 「尼洛」本名李明，政戰學校一期畢業，是王昇的學生（尼洛，〈寫在「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之前〉，《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頁 19-23。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

判斷「血書」是整體文宣戰之一部分的另一個證據，是正當「血書」風潮捲起後不久，隸屬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的《青年戰士報》也開始刊登《南海血淚》系列報導。總共二十六篇報導，從1979年1月21日至2月22日，在該報五版逐日刊登了一個多月，²³並於連載結束五天之後的2月27日，就立刻發行了單行本。²⁴這些描述百餘位搭乘「清風號」漁船逃離越南的難民們受困荒島，被迫吃難友屍身求活的報導，是由該報副總編輯李元平，根據其在澎湖白沙鄉講美村越南難民營的採訪所撰寫。²⁵如果說登在副刊的文章可以是虛構的文學作品，但登在報紙新聞版面的報導，就必須要根據事實。因此「阮天仇」的「血書」所尚未完全滿足的紀實性，便由《南海血淚》的報導來接力完成。

比對當時與李元平一起前往採訪的其他報社記者的報導，²⁶可以發現，李元平的報導不但整體篇幅長達七萬字，且對難民食人肉的過程與細節有更多具體描寫。除了吃人肉的情節讓人印象深刻，更值得玩味的是，李元平在好幾篇報導中，都記載瀕死的難民在臨終前，針對南越陷共所發表的長篇大論。例如，他的報導中敘述第一個在死前主動同意讓難友食其屍身的裴文政，在臨死前對難友說：

我快死了，你們就要吃我所貢獻的肉了，因此請相信我：國際上出賣與被出賣的陰謀詭計我一無所知，但是我懂得：那種怨天尤人最多的人，同時也必然是靠天靠人最多，而靠己最少、責己最少的人。…我便臨死絕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國家註定可以出賣別的國家，有任何國家可以左右別的國家的命運。除非那被出賣的國家、那命運被人左右的國家，他本身內部分崩離析、開門揖盜、引狼入室，凡事奴顏卑膝仰人鼻息，一切為別人之命是從的，這就另當別論。²⁷

在李元平筆下，另一位願意捐獻身體延長難友性命的伍維城在死前說：

- 23 作者李元平是受國防部邀請前往越南難民營參訪的，在同團的記者與藝文界人士中，最早發出「吃人肉」相關消息。1979年1月18日《青年戰士報》3版刊出李元平從澎湖發出的〈越南難民浩劫餘生，逃亡過程充滿血淚〉一文，文中指稱「清風號」倖存難民在1月17日首度透露曾吃死者屍肉求活，並預告該報即將連載相關報導。
- 24 李元平，《南海血淚》（台北：中央日報，1979）。
- 25 澎湖白沙鄉講美村的越南難民營在1977年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簡稱「救總」）成立。1977年6月16日有兩批越南難民漂流至屏東小琉球海域，為了安置難民，救總先是利用澎湖西嶼鄉繼光營區設立「越南難民臨時接待所」，後來進入台灣海域的難民人數越來越多，政府遂委託救總，於1978年12月1日在白沙鄉講美村舊軍營成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劉吉雄，〈例外之地·陌生人〉，《文化研究》第十七期，2013，頁217-224）。
- 26 依據李元平在2015年接受紀錄片導演劉吉雄訪問時的描述：「本來是國防部軍事發言人請了幾個文藝界作家還有新聞界人士，像是司馬中原、朱西甯、蕭颯、中國時報大記者傅崑成幾位，一票人從台北出發就到難民營。」（劉吉雄，〈【難民船上的人】我們的人類啊，最後生死之間的那種抉擇〉，《獨立評論》<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45/article/5061>，2018.03.31 讀取）。同行的《中國時報》記者傅崑成在1979年1月20到1月23日也寫了系列報導，在總標題〈當為鬥士，毋為難民：越南難民訪問錄〉下的四篇報導分別是：一、「只要再有一次機會！」；二、何時能重回可愛的白藤碼頭？；三、工人當家的社會主義天堂；四、哭泣的珊瑚礁（傅崑成，〈當為鬥士，毋為難民：越南難民訪問錄〉，《中國時報》1979.01.21-23，3版）。在第四篇「哭泣的珊瑚礁」的近尾聲中，傅崑成以簡要的筆法描述了難民為求生而食屍肉的情節。不過，後來傅崑成在《1979 南海神話》的受訪片段中，對當時情景的說法是：「我沒有訪問到哪一個人說他吃人肉，我不記得。」（《1979 南海神話》19:40 處）。另一位也同團採訪的《聯合報》記者翁台生，則只在1月19日的《聯合報》三版寫了一篇報導，文中對「吃人肉」情節的表達更為含蓄：「他們祭拜已故難友，而特別懷念其中的十位。因為在他們掙扎於珊瑚礁求生存時，這十位難友在不支去世前，答應用自己身上的肉延續生存者的生命。」（翁台生，〈珊瑚礁上人吃人 驚魂甫定弔亡魂 -- 越南難民·逃奔自由·同舟一命·百劫餘生·四十二天·非人生活·九十七人·絕地喪身〉，《聯合報》1979.01.19，3版）。
- 27 李元平，《南海血淚》（台北：中央日報，1979），頁98-99。

就是因為自己人在大難臨頭的時候，彼此爭得你死我活，無視於大敵當前，才把我們的國家搞丟在共產黨手中，男女老少，冒死逃難，為什麼我們還不覺悟？²⁸

已死之人的遺言應是由生者轉達，荒島既無紙筆，生還者的記憶是否真能將這些長篇字句一一復原不無疑問。而「出賣別的國家」、「國家內部分崩離析」等種種論述，明顯呼應「血書」中所控訴的「偉大盟邦」與「民主鬥士」。

就在該系列文章開始連載的當時，高雄縣黨外老縣長余登發父子因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案被捕，引發了黨外政治人物齊聚抗議的「橋頭事件」。²⁹橋頭事件發生隔日，《聯合報》的「黑白集」刊登不具名評論指出：「最近發生一位南部聞人涉嫌參與叛亂組織案件，這位聞人以『民主鬥士』自居。令人聯想「南海血書」和這篇血淚交織的血書所痛譴的越南『民主鬥士』。」³⁰

在「仿真」的「血書」問世後，憑藉對「清風號」生還者的採訪，李元平曾試圖在他的報導中證明「血書」的真實性，他說：

「南海血淚」連載完畢後，有許多讀者想在文後附錄的「清風號」一百四十六位難民單裏面，尋找「南海血書」的作者阮天仇，可是沒有結果…在這裏可以奉告關心的讀者們：「血淚」是「血淚」，「血書」是「血書」，然而，是「血淚」也罷，是「血書」也罷，都各有其人，也各有其事。發生在南海上的難民漂流悲劇，情節有輕有重，有幸有不幸。並非「血淚」或「血書」便足以道盡。³¹

不過他在2015年接受紀錄片導演劉吉雄訪問時已改口說：「我的報導就跟〈南海血書〉有所區隔。像林濁水有政治意見，他針對的是〈南海血書〉，不是我的《南海血淚》。」³²

(四) 黨報、軍報、老三台與王昇的角色

往前追索當時新聞媒體的報導，可以發現，「清風號」難民船相關消息最早出現在《中央日報》上的時間點，是1978年12月13日，也就是「血書」問世的六天前。當天該報三版使用「合眾國際社」外電，編譯成〈越南難民獲救前在荒島上境況慘絕人寰沒有一家能完全活下來〉，報導中描述一批已經抵達澎湖的越南難民，在獲救前曾受困珊瑚礁42天，也提到有生還者透露曾「吃人肉」。³³

這些情節，後來都出現在朱桂筆下虛構的人物「阮天仇」所描述的自身遭遇中，因此合理的解釋是，朱桂在看了這則外電報導後，發揮文學的想像，寫就了「血書」；李元平則是在「血書」創造的熱潮中，回頭去報導「清風號」難民的遭遇，報導中不時借用已死之人的死前告白，呼應「血書」中對「偉大盟邦」與「民主鬥士」的控訴，讓本是虛構的「血書」，彷彿真有了事實的基礎。

28 李元平，《南海血淚》（台北：中央日報，1979），頁104。

29 「血淚」開始在《青年戰士報》開始連載的同一天（1979.01.21）凌晨，高雄縣的黨外老縣長余登發與其子余瑞言因涉及「吳泰安匪諜案」在八卦寮自宅被便衣上銬帶走，1月22日，包括許信良、施明德、張俊宏、林義雄、黃順興、邱連輝、黃信介、陳菊、陳婉真、胡萬振、何春木、曾心儀等黨外人士，都前往余登發故鄉高雄縣橋頭鄉進行示威抗議聲援余登發父子，是為「橋頭事件」，是繼「中壢事件」後，台灣黨外力量的又一次集結。

30 〈「民主鬥士」〉，《聯合報》1979.01.23，3版「黑白集」。

31 李元平，《南海血淚》（台北：中央日報，1979），頁127。

32 劉吉雄，〈【難民船上的人】我們的人類啊，最後生死之間的那種抉擇〉，《獨立評論》<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45/article/5061>，2018.03.31 讀取。

33 〈越南難民獲救前在荒島上境況慘絕人寰沒有一家能完全活下來〉，《中央日報》1978.12.13，3版。

還原此事經過可以看出，當年透過黨報（《中央日報》）與軍報（《青年戰士報》）的聯手合作，在台灣當時因為台美斷交，許多人擔心台灣前途岌岌可危而充滿焦慮不安的社會氛圍中，成就了此一跨越 1978 年到 1979 年的「南海神話」。

當年這場政治作戰總動員的範圍，還包括三台聯播的連續劇《西貢風雲》。³⁴ 這部由三家電視台聯合製作的三十集連續劇，從 1979 年 7 月 3 日開始在三台周二到周六晚上八點到九點的黃金時段播出。³⁵ 該劇是將〈南海血書〉與《南海血淚》的內容加以擴大延伸，加上「清風號」難民在南越陷共前之生活的題材，以及對南越陷共過程的描寫等等。³⁶ 從〈南海血書〉、《南海血淚》，進而擴大成為《西貢風雲》，在 1978 年到 1979 年間，越南難民潮大量湧向南海周邊地區的國際局勢下，³⁷ 台灣的政治作戰部門有組織、有效率的運用此一局勢，在台灣島內製造出「今天我們不能做一個為自由而奮戰的鬥士，明天我們就會淪為漂流海上的難民」的全民精神動員狀態。³⁸ 而當時總縮此文宣大任的，是當時總政戰部主任王昇。

早在台美斷交、中美建交之前，當時由鄧小平當權的中國，已經開始對台進行「和平統一」策略。提出「三通」訴求，希望盡快「通航、通郵、通商」。蔣經國則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反制，³⁹ 並指示成立「反統戰小組」（又稱「固國小組」），⁴⁰ 由國家安全局、國防部、外交部、警備總部、行政院新聞局、國民黨文工會等單位抽調人員組成，以抗衡中共「對台辦公室」的對台統戰，⁴¹ 依據王昇的說法，該團隊：「是中央黨部祕書長辦公室下面的一個特殊幕僚群…不辦業務、不對外發公文、也不用印信。」⁴² 這個「不留痕跡」的隱形小組，很可能

34 根據當時媒體報導，國民黨黨營的中影公司原本打算將〈南海血書〉故事拍成電影，但後來決定改拍連續劇（〈電視劇「西貢風雲」下月三日三台聯播〉，《聯合報》1979.06.30，7版）。後來〈南海血書〉還是被拍成了電影，出品人為伍玉麟，由柯俊雄、王寶玉主演，片名改為「南海島血書」。《南海血淚》也拍了電影，由蔡揚名導演，王冠雄主演。兩部電影的票房都很差（同註 10，頁 46）。

35 1970 年代，台灣曾出現在晚間黃金時段，三台常態性「聯播」節目的現象。根據當時擔任台視節目部經理的何怡謀指出，1976 年元月開始，國防部總政戰部開始長期徵用三台晚間九點到九點半時段進行聯播，最早播出的節目是總政戰部監製，中國製片廠製作的《寒流》；接下來還有《證言》、《風雨生信心》、《河山春曉》、《煉獄兒女》、《這一家》、《艷陽天》等等。1979 年播《西貢風雲》的時段比起之前，又是更黃金的時段，竟把三台廣告最多、利潤最高的八點檔連續劇時間給徵用了（何怡謀，《台灣電視風雲錄》，頁 226-22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2）。

36 根據《聯合報》在《西貢風雲》播出當天刊出的社論中對該劇內容的描述：「其最後五集固然和『南海血書』相似，映出的是一艘『清風號』如何在船上難民給越共檢查站人員沒收了所有隨身財物之後，駛離西貢，發生故障，飄流了多天擱淺在一個珊瑚島上，經台灣漁船『財富號』救起的劫難故事。但整個主題，則置於八年越戰導致南越淪亡的經過（第一集至第十一集），以及越共侵踞了南越後奴役迫害老百姓的暴行（第十二集至第廿五集）。其前的如阮文紹之被逼解職，陳文香的繼任掙扎，楊文明之終於投降，固然都是真人真事，我們記憶猶新。其後的越共之如何洗劫西貢，勞改下放，迫得人民甘於冒死逃亡，較之報章片段的新聞報導，尤見真切而一貫。」（〈又一頁血的歷史教訓 --- 鄭重推荐三台聯映的「西貢風雲」〉，《聯合報》1979.07.03，2版）

37 當時越南難民船大量湧向南海，成為顯著的國際人道救援問題。就在《中央日報》引述合眾國際社報導「清風號」難民慘況的前幾天，該報另一則報導中也引述美聯社外電指出，有數量多達三百艘的越南難民船隊正駛向泰國與馬來西亞東岸（〈越南難民大逃亡 三百艘船隻結隊 駛向泰馬東海岸〉，《中央日報》1978.12.07，2版）

38 1979 年 1 月 11 日，也就是〈南海血書〉正捲起風潮的時候，當時台灣的行政院長孫運璿在行政院會中宣讀了一份聲明，聲明中提到：「歷史告訴我們，相信共產黨謊言的人，都只落得悲慘的下場。波羅的海三國的被蘇俄併吞，大陸的淪陷，越南的淪亡，都是我們記憶猶新慘痛的教訓。今天我們不能做一個為自由而奮戰的鬥士，明天我們就會淪為漂流海上的難民。」（〈今天不做自由奮鬥鬥士 明日將為漂流海上難民〉，《聯合報》1979.01.12，1版）

39 許雪姬，《臺灣歷史辭典》，頁 64-65。台北：遠流，2004。

40 「固國小組」在 1980 年初改名為「王復國辦公室」，即是知名的「劉少康辦公室」前身（魏萼，〈析論「劉少康辦公室」的歷史意義〉，《海峽評論》227 期，2014.01 <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6615.html> 2018.04.29 讀取）。

41 尼洛，《王昇一險夷原不滯胸中》，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頁 356-357。

42 同上，頁 367。

就是「血書」一系列文宣佈局的幕後推手。

前文提及（參見註 17）「血書」作者朱桂在 1948 年曾參與蔣經國主持的「上海經濟管制」，而當時王昇正是執行經濟管制的主將，⁴³ 因此可以確定具有政戰血統的朱桂，除在中央幹部學校曾經是蔣經國的學生，與蔣經國的愛將王昇也曾經一起工作。而「血書」後續之「血淚」的產出過程中，王昇的愛將朱西甯曾與作者李元平一起前往澎湖難民營參訪（參見註 26），⁴⁴ 朱西甯在〈後事之師 --- 觀「西貢風雲」雜感〉一文中描述了這段參訪過程，文中也把虛構的「血書」當成真實一般的來描述，他在提到「清風號」難民自述吃人肉時說：「放眼無涯的天水相接卻乾渴得急吮剛剛嚙氣者的血管——人到得那種地步而斃，連血液也都稀淡得不成其為血液了，想不到那血小板的匱乏，唯一的用途竟是利于血書……」⁴⁵ 這樣的描寫，顯然已經把「血書」與「血淚」情節交織為一了。

朱西甯後來在 1980 年初發表的〈將軍令〉一文，為王昇是「血書」這一連串文宣主軸之幕後設計者提供了證據：

將軍最有資格來說越南的，將軍曾應吳廷琰邀請，前後赴越十次，協助越南政府建立美國最為反對的政治作戰組織。…將軍指出越南淪亡起因于共黨的分化所受謀害最重。共黨說你是北越人，他是越南人；說你是本土人，他是華僑；你是越南人，他是美國人；你是學生他是警察；你是民主鬥士他是政府特務；你是佛教徒他是天主教徒；…將軍大為慨歎，說出他的名言：「世人只曉得和尚不會做共產黨，不曉得共產黨會做和尚。」這可不令人自然的聯想到今日此間的分裂分子所作所為，說你是本省人他是外省人，你是黨外他是黨內，你是鄉土作家他是御用文人。而幾個挾教會以自重的甚麼牧師甚麼議長，又何嘗不令人錯覺「基督徒不會做共產黨」？⁴⁶

前文中所提王昇對越南陷共原因的分析，明顯與「血書」同一基調。

繼「血書」、「血淚」之後的《西貢風雲》電視劇，由於需徵用三台電視八點檔黃金時段，而徵用電視台時段在當時是由行政院新聞局執行，自然需要有新聞局派駐人員的「固國小組」協助協調。對於所寫的《南海血淚》內容被改編成電視劇，但自己卻完全沒有被徵詢，李元平回憶：「那時候有一個小組，開了很多次會，我的階級太低，沒有資格去參加，那時候做決策的是梅長齡，

43 同上，頁 113-137。

44 朱西甯（1927-1998）是知名軍中作家，1972 年以陸軍上校官階退伍後專事寫作，他曾在〈將軍令〉一文談及與王昇的淵源，對王昇極盡吹捧：「從顧客們指指點點裡，高山仰止的見著四大金剛之一的將軍那正在緩緩昇高著的背影——也就只是那一瞥，將軍一身打縐的卡嘰中山裝，非常平常的清簡澹然，中等身裁，一點也不覺搶眼，或只合公司裡一名清潔工友罷，然而我有一種油然而生的，卻又似無端的肅然。這是我與將軍結緣的老早的一個起頭，現世裡活真活現的神話，可說是仙緣罷，但也就似乎足足預示我與將軍至今三十餘年不易不渝的親與疏…將軍有一種極富煽動性的魅力，…那些看來平凡無奇的課程，到得將軍開講，一樣的也竟是擊楫而誓的慷慨悲歌。那已不止是我單純的有效受教，從而還破除了我學院派的迂闊，讓我發見並信服即使學術傳授，火熱、激情、雄辯、氣勢，都會是那樣的必要而更奏效。將軍確是大開了我輩視界、眼光、和見識；…不想七八年後奉調參謀本部，竟又倖為將軍屬下。怎生是好呢？這只好說是命該我有此福分造化了。…而像我這才不出眾，貌不驚人的平庸之質，蒲柳之姿，若想將軍青睞，那才不知天高地厚呢。好在我也自甘澹泊，單只念及同儕中唯我得識將軍最早，又是神話裡來去的唯我得知將軍最深，則誰還能比得我與將軍如此的至親而又至疏！」（〈將軍令〉，《聯合報》1980.01.23，第十版「聯合副刊」）。

45 朱西甯，〈後事之師 --- 觀「西貢風雲」雜感〉，《聯合報》1979.07.04，12 版（聯合副刊）。

46 朱西甯，〈將軍令〉（下），《聯合報》1980.01.24，第十版「聯合副刊」。

⁴⁷ 還有王先生，就是王昇。」⁴⁸ 李元平口中的「小組」，指的應該就是「固國小組」，而該小組的靈魂人物就是王昇。

如前述朱西甯文中所言，王昇與越南淵源極深。1960年初越南總統吳廷琰訪問中華民國後，王昇被蔣經國派往訪問，停留三個月期間，以對共產黨政治作戰專家的身分，與吳廷琰、阮慶、阮文紹、阮高祺、陳善謙等越南政治高層建立良好關係，⁴⁹ 甚至在1960年底再度組團訪越，並在吳廷琰遇刺後協助越南建立了政戰制度。⁵⁰ 這使得1979年國府政戰文宣體系，之所以會選擇以越南難民的遭遇，做為「內批民主鬥士、外打偉大盟邦」敘事架構的題材，試圖對治島內政治反對運動，並控訴美國外交上的背棄，更有脈絡可循。

透過對越南難民悲慘遭遇或純屬虛構、或參雜真實內容的編寫與呈現，黨報、軍報連篇刊載，加上三台戲劇每晚播出，再配合全國各級學校的閱讀心得寫作比賽、話劇演出等等，讓「今天我們不能做一個為自由而奮戰的鬥士，明天我們就會淪為飄流海上的難民」（參見註38）的政治宣示，經由報紙頭版標題，在當時的台灣社會中，相當成功的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功能，⁵¹ 成功形塑了「社會真實」。當「社會真實」的大廈成功被建造，「血書」中那件染血的襯衫究竟存不存在已不重要，中學教員林濁水合理的質疑也立即淹沒在依循主流敘事框架，汗牛充棟的訊息中。如同《1979 南海神話》中所說：「儘管林濁水在《八十年代》上以比〈南海血書〉更長的文字駁斥血書內容只是國民黨的統治神話，但《八十年代》只發行七期就被全面查禁，而〈南海血書〉則印刷了數百萬本，全台各級學校師生人手一冊，阮天仇的國仇家恨，豈是林濁水一篇文章就可以泯滅。」⁵²

三、從文學的虛構成為社會的真實

（一）「南海血書現象」的群眾心理基礎

隨著網路媒體對全球政治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假新聞」議題的熱度與研究風潮方興未艾，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假新聞」儼然成為全球熱門議題與顯學。雖然在現實使用上仍充滿歧義，但如果從生產者意圖的角度，「假新聞」的定義可以大致理解為：「蓄意假造的資訊、蓄意說服閱聽者相信偏誤或虛假信仰的新聞，或故意誤導讀者的寫作。」把「假資訊」區別於非蓄意造假的「錯誤資訊」。⁵³ 如果根據這個定義，從簡單的事實認定出發，以〈南海血書〉為起點的一連串將該文件視為真實存在的新聞報導、影像呈現，符合「蓄意」、「誤導」的條件，都是「假資訊」、「假新聞」。

如同當代的各種「假新聞」氾濫現象，不能只簡單的以有人蓄意造假、惡意抹黑、騙術詐財

47 梅長齡原為國民黨黨營事業中影公司總經理，1979年間轉任中視總經理，正是《西貢風雲》拍攝與播放期間。

48 同註13，25:01-25:41。

49 同註41，頁309-319。

50 參見國史館檔案「越南政府請我派員協辦軍中福利及政戰研究班教學」，數位典藏號：020-011003-0023

51 議題設定理論由 Max McCombs and Donald Shaw 兩位學者在1972年所提出，他們從研究196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發現，傳播媒體對議題重視的程度會引導民意走向，進而形塑了社會的政治真實（Max McCombs and Donald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Summer, 1972), pp. 176-187.

52 同註13，8:08 - 8:28。

53 Robyn Caplan, Lauren Hanson, and Joan Donovan, *Dead Reckoning: Navigating Content Moderation After “Fake News”* (Data &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 2018), p.9. <https://datasociety.net/output/dead-reckoning/>

等個體道德違失來解釋，而必須考量具壟斷性佔有率的社群媒體，以其運算法透過偏好設定放大極端言論，對使用者所造成的影響等等。如果只簡單以「黨國文宣機器的愚民政策」去看待這個近世台灣歷史上轟動一時的「南海血書現象」，可能無法真正理解這樣一個情節不合理的故事，在當時的台灣社會何以竟能如此觸動人心，讓大多數國民信以為真，並在當時國府政權內外交迫的情勢下，相當程度的強化了台灣民眾對既有政權的認同與向心。史學家李永熾從當時台灣民眾心理狀態的角度，提出了他的詮釋：

退出聯合國的時候，台灣也一批移民潮出來了，大家就往美國跑。接著第二波，所謂的「中美斷交」也就是台美斷交的時候，又有一批，等於說是逃亡潮，也是往美國或是其他地方去跑，所以在這種危機的心理狀況之下，大家就把自己這種心理上的感覺，和當時像〈南海血書〉之類這些東西互相結合在一起，所以裡面的荒誕，裡面這些不合情理的東西，大家都會拋開。⁵⁴

如果不是有這種集體的心理狀態支撐，很難解釋因為在朱桂投稿「中央副刊」前曾經先看過原稿，所以從一開始就知道〈南海血書〉只是父親伏案幾小時後所產出的一篇虛構文章的朱桂的兒子朱大明，在當時所看到的，令他印象深刻、甚至怵目驚心的種種現象：

那時候郊遊烤肉嘛！從台北火車站坐車去十分寮瀑布，你到車站就看到人家發這個東西：「不要再玩了，台灣要滅亡了！」而且是老兵，是真的老兵，而且他是自費刻鋼板油印的，整個抄出來這樣油印，你的感覺會很可怕，中華路天橋上面到處在發這個東西，就是南海血書嘛！不會寫就寫阮天仇。⁵⁵

這是朱大明兒時親眼所見。一篇從時事發揮想像，純屬虛構的文學作品，卻引發一連串實實在在的社會效應，「血書」雖然是假的，但在當時所引發的「血書效應」卻是不折不扣的一種「社會建構的真實」（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二）社會建構的真實

社會學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 1929-2017）指出，在人類社會中被視為「真實」的，有些是已被明確建制化的客觀真實（objective reality），例如語言、宗教；⁵⁶有些則是個體透過社會化過程的內化而成就的「主觀真實」（subjective reality），主觀真實經由社會化過程而形成，除了兒童成長過程中需經歷將個體安置於社會的「初級社會化」（primary socialization），⁵⁷個體還需透過各種「次級社會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以應對其社會生活。⁵⁸每一個社會中的個體，都是透過與他人互動來確認自己的身分、形塑對己身與社會的認知，而不論是在哪個層次的社會化過程中，除了「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例如父母、配偶、家人等對個體具有關鍵影響力，其他「非重要他者」（non-significant others），例如通勤交通工具上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或人們每

54 同註 13，15:54-16:40

55 同上，15:16-15:45。

56 Peter Berg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1966), pp34-46.

57 同上，pp129-137.

58 同上，pp138-147.

天在電車上閱讀的報紙，也發揮著形塑或維繫主觀真實的一定作用。⁵⁹

不像社會的「客觀真實」往往具有強大的固著性，社會的「主觀真實」相對具有可變動性，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透過例行性、甚至儀式性的互動來進行維繫才能持續。⁶⁰ 在這類「主觀真實」的相關討論中，大眾傳播媒體的角色經常被著墨。社會史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關於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知名理論中曾經指出，每日出刊的大眾傳播媒體（當時主要是指紙本印刷的報紙、雜誌）在形成近代民族國家這種「想像共同體」（一種「主觀真實」）時，所發揮的國民共同參與的、儀式性作用。⁶¹ 傳播理論家凱瑞（James Carey）在其媒體相關研究中，也強調傳播媒體的「儀式性」功能更勝於資訊傳播功能。⁶²

凱瑞對「真實」所提出的洞見，使得他的討論特別合適用在分析「南海血書現象」。他是如此描述「真實」與權力的關係：

「真實」是稀有資源，如同所有稀有資源被各方爭奪……權力的基本形式就是如何界定、配置、展現這資源……在現代，「真實」因為近用能力而稀少：僅少數人得以號令決定結果。有人可以說，有人只能聽，有人可以寫，有人只能讀，有人拍電影，有人看電影。⁶³

從權力者掌握訊息內容、掌握世界與社會詮釋權的角度，凱瑞強調傳播的儀式性功能：一種為了達成假想中之和諧世界的功能。在他看來，傳播的儀式性在於：著墨於典範建構與維繫更勝於創新實驗，維護前提更勝於提出主張，重視架構更勝於內容。⁶⁴ 凱瑞從古老的字源中找到傳播（communication）這個字的儀式性意義源頭，他指出，傳播從一開始就與分享（sharing）、參與（participation）、協作（association）、夥伴關係（fellowship）等意義有關。他認為，傳播的儀式性觀點是從維繫社會整合，而非克服地理空間阻隔來理解傳播的社會功能，從此一觀點出發，傳播最重要的功能是為了重現共同信仰，而非傳遞訊息。⁶⁵

讀報如同望彌撒，每天出刊的報紙內容並無新意，重要的是對讀報者某一世界觀的重覆形塑與確認。撰寫或閱讀報紙都是儀式性、戲劇性的行動，呈現讀者眼前的並非純粹的訊息，而是各方勢力的爭鳴與抗衡。例如：一則關於美國金融危機的報導，其實是對抗傳統敵國德國與日本的愛國表現；一則關於女性政治會議的報導，則牽涉支持或反對婦女解放兩造的抗衡。⁶⁶

依據伯格與凱瑞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看法：做為閱聽者每天認識世界與社會的重要媒介，新聞媒體所呈現的「真實」，是一種經由新聞內容產製者與閱讀者互動後所產生的「社會建構的真實」。而具有較大權力的一方，往往主導或決定了真實該如何被建構，也就是決定了新聞媒體會呈現那些內容，以及如何呈現；呈現在新聞媒體上的訊息內容，是各種力量抗衡下的結果，訊息的產製與接受過程所要發揮的最重要功能，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消息傳遞，而是要確保掌握話語權的一方所欲鞏固的世界觀、或對事情的理解框架，可以傳達給接受訊息的一方，並獲得確認。

59 同上，pp149-152.

60 同上，pp147-163.

6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1983).

62 Nick Couldry,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Routledge, 2003), p.19.

63 James Carey, "Reconceiving Mass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Routledge, 2009), pp66-67.

64 同上，p.65.

65 同上，p.15.

66 同上，pp16-17.

如果依據這樣的觀點來解讀「南海血書現象」，會發現在 1970 年代末期，黨國體制依舊掌控各個權力面向的台灣社會中，出現這樣一件現在看起來很荒謬的案例，其實並不奇怪。甚至可以進一步推論，「血書」事件應該只是黨國勢力掌控的媒體機構，所曾經產出的諸多有利統治的「社會真實」中，較為顯著的案例。

(三) 一則「假新聞」如何建構「社會真實」

在〈南海血書〉的案例中，當時依然掌握媒體話語優勢的國民黨統治集團，顯然已經認識到政治反對勢力的挑戰越來越強，但台灣當時絕大多數的新聞媒體對「中壢事件」、「橋頭事件」等對後來台灣政情影響深遠的政治抗爭事件卻幾乎沒有報導。亦即統治集團所認識到的真實，由於媒體話語權向維護執政者方向極度傾斜，相關事件的消息都被刻意掩蓋，所以尚未成為大眾普遍了解的「社會真實」。相反的，透過具有實質權柄的組織性力量（例如「固國小組」），夠透過對黨報、軍報的直接控制，與對其他具有「侍從性格」之民營報紙的間接影響，⁶⁷ 配合當年越南難民潮湧現的外在局勢，成功地在台灣社會中，引導、製造出從 1978 年底一直延續到 1979 年下半年的「南海血書現象」。

相較於台灣島內政治反對運動崛起，讓執政者面臨政權穩固性遭撼動的危機感，當時台灣民間普遍存在的危機感，主要來自台美斷交，擔心美國與中國建交後，可能會放棄自「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簽訂以來，⁶⁸ 以武力保衛台灣於中國統治之外的承諾，擔心台灣很快會被中國併入。這就是前文提到，李永熾所描述的，當時台灣民間很普遍的心理焦慮。〈南海血書〉以及之後隨之而生的一系列論述，在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這種危機感中，被循序漸進、有計畫地端上檯面，並如幕後推動者意料中，甚至程度可能超乎意料的，獲得了社會迴響。透過對難民海上逃亡慘狀的披露，將社會注意力引導向「今天不做為自由而戰鬥士，明天就淪為漂流海上難民」的一整套敘事架構。一方面批判此一敘事中最後放棄南越，未來也可能放棄台灣的「偉大盟邦」美國；一方面以敘事中被指為直接導致南越陷共，反對吳廷炎、阮文紹政權的南越「民主鬥士」們，影射台灣內部政治異議人士，將會讓台灣的下場如同南越，台灣人民的下場一如越南難民，間接達到妖魔化黨外政治運動的效果。

雖然《中央日報》對〈南海血書〉的真偽始終直採取隱晦態度，但在經過《南海血淚》採訪「清風號」難民相關報導的加工加料，以及全台各級學校的心得寫作比賽，透過學校、老師做為學童社會化過程中「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強調與示範，以及假日站在中華路天橋上發〈南海血書〉手抄油印本的老兵等這類「非重要他者」（non-significant others）的不斷提醒，越南「亡國」的血淚教訓，透過對〈南海血書〉的詮釋，轉譯為當時台灣民眾對現況的感受與理解。

整整一年間，「血書」以各種不同版本的變形與分身出現在新聞媒體、學校教材、電影、電視八點檔聯播，以及難以計數的學生閱讀心得寫作、周記感想與作文比賽的內容中，高密度的訊息重複，發揮「三人成虎」、「眾口鑠金」的效果，⁶⁹ 讓一篇原本虛構的文字，毫無疑問的建構

67 關於戒嚴時期台灣報業的侍從性格，參見林麗雲，〈台灣權威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49-1999〉（2000.10，《台灣產業研究》第三期）。

68 是中華民國台灣與美國在 1954 年 12 月 3 日簽訂的以軍事為基礎，並包含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合作的條約，將台灣以國際條約置於美國的保護傘下。

69 伯格在談到維護「主觀真實」的日常社會互動時曾指出，雖然重要他者的意見通常對個人影較大，但：「當十個一

出了影響廣泛，且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社會真實」。正如凱瑞所說，「真實」是稀有資源，通常是由權力者決定其內容；也正如中副曾經針對「血書」熱潮是被製造出來的指控，理直氣壯的反駁表示：

如果事實真的如此，那麼，成千成萬的人爭著閱讀，是「製造」出來的，幾十萬本「南海血書」相繼售罄是「製造」出來的；無論閱讀，無論購買，無論抄寫、翻印、張貼，都伴隨著一個行動，也都是「製造」出來的……一篇轟動的作品，必與時代潮流、民族情感相表裏，要得天時，得地利，得人和才哄得起來，動得起來。⁷⁰

當「三人成虎」的「社會真實」論述，以其強大的自我複製能力，掩蓋了〈南海血書〉其實是一文學性虛構的種種跡象，也掩蓋了當時就已經出現的零星質疑，分享共同情感與焦慮的「願意相信」，會凌駕了真偽辯證的「可以相信」，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結語：媒體話語權反映社會權力結構 --- 「假新聞」的前世今生

本文回顧 1979 年年末開始，在台灣社會中延續至少一整年的「南海血書現象」。在台美斷交、黨外政治力量隱隱騷動的時局中，朱桂一篇以越南難民死前絕筆信形式呈現的文學作品，被《中央日報》副刊以添加「譯者附記」的方式，戲劇性的被假扮成一篇譯自發現於大海螺中的襯衫上，以越南文寫就的「血書」。從「血書」刊登之前不久，由總政戰部監製的《越高淪亡實錄》已經在三台黃金時段聯播過兩次看來，當時擔任總政戰部主任，也就是實際領導「固國小組」的王昇及其團隊，已經確立以越南陷共、難民潮湧入南海周邊國家，做為面對台灣內外變局的文宣敘事題材。並將敘事主軸定調為 --- 不能依賴「偉大盟邦」（決定與台灣斷交的美國）、不能相信「民主鬥士」（正在集結、影響力迅速擴散的黨外政治勢力），否則下場會跟越南一樣。在台美斷交後，害怕成為海上難民的集體心理下，「血書」在台灣社會一度掀起了很大的浪潮，恐懼是統治者控制人民最好的方式，「南海血書現象」充分印證了這點。

中央副刊「加工變造」了朱桂的文章，讓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成了「投擲在油海裡的燃燒彈」（參見註 11），透過學校系統的全面動員，讓學校以及學校裡的老師 --- 對學生來講的「重要他者」，成為傳遞相關訊息的重要管道，在《南海血淚》、《西貢風雲》的後續強化下，平面、電視主流媒體與制式教育體系的聯手，在台灣社會中成功塑造了「不應仰賴美國、不要信任黨外」這個隱然成為社會共識的「主觀真實」。雖然事後證明「血書」根本是虛構的，但此一透過主流媒體與學校系統不斷推動的「次級社會化」過程所形成的「主觀真實」，在當時台灣社會中，卻成為一不折不扣的「社會真實」。

用凱瑞的觀點，掌握政治經濟權力的一方，便掌握說話的權力。當年「南海血書現象」出現的時空環境中，那種透過黨國控制的新聞媒體與教育體系牢牢掌控話語權的情形，在網路普及的今天，似乎已經成為過去。由於只要連上網際網路，幾乎人人都可以上網傳播訊息，過去黎民百姓、芸芸眾生「只能聽、不能說」的問題，在此一「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趨勢下，一去不復返。但弔詭的是，「話語權去中心化」隨之而來的，是「假新聞的去中心化」。過去是由權

般的熟人連續表達了相同的看法，其影響力就會開始超過持相反意見的摯友。」（同註 55，p.152）

70 仲父，〈南海血書〉，《中央日報》1979.12.19，第十版「中央副刊」。

力集中部門系統性的製造目的一致的假新聞，如今「去中心化」的假新聞則可能有各式動機與目的，小到銷售商品、騙取金錢，大至影響選舉、顛覆政權。

但從近年的發展觀察，「去中心化」的想法極可能只是一種假像，因為假新聞之所以能發揮影響，之所以能在茫茫網路世界中發揮倍數加乘效果的影響力，與其能操縱、運用具市場壟斷性的社群媒體 ---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臉書 --- 運算法 (algorithm) 密切相關。像臉書這樣的社群媒體平台，雖不產製內容，卻透過「使用者產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成為最大的訊息製造場，在壟斷性的佔有率下，網路世界中的行動者若欲發揮影響，選擇與其協作容易，選擇違逆其邏輯困難，而只要能掌握大量使用者個資，便能進行訊息操弄，有效影響政治結果，不論訊息內容是真是假。⁷¹ 於是我們又回到凱瑞的古典命題 --- 權力與話語權的相伴相生。從這個角度來看，「南海血書現象」的殷鑑便顯得歷久彌新。

71 臉書運用其 20 億用戶的個資，來媒合賣家與目標消費族群，並從中賺取廣告利益。2016 年 3 月德國政府開始調查對臉書違反資訊保護法以達到不公平壟斷目的指控，同年 10 月，歐盟也開始進行同樣的調查。由於德國消費者聯盟 (VZBV) 提告，2018 年 2 月，柏林地方法院裁定臉書在收集並使用用戶個資時，並沒有向用戶提供足夠的訊息再徵求同意，違反德國的消費者法律 (Alex Hern, "Facebook personal data use and privacy settings ruled illegal by German court", *The Guardian*, 2018.2.12)。像臉書這樣的社群平台從用戶資訊獲取驚人利潤，但對於平台上的內容卻不需負擔任何責任，甚至將用戶個資大規模外洩給服務於特定政治目的的機構，做為選舉操作的依據 (Olivia Solon, "Facebook says Cambridge Analytica may have gained 37m more users' data", *The Guardian*, 2018.4.4)，已經成為為各種目的而生產之假新聞的溫床。

第四場次

- 254 論新媒體之液態解蔽：以1998印尼排華假照片事件為例 / 吳筱玫
- 269 From Red to “Pink”: Propaganda hip-hops, New Media and China’s Soft Power Pursuitcting / Han Li
- 284 Political Smear Campaigns in the Internet Era / Ondřej Klimeš

論新媒體之液態解蔽：以 1998 印尼排華假照片事件為例

On the Liquid Revealing of New Media: A Case Study on the Fake Photos of the 1998 Indonesia Riots

吳筱玫 Wu Hsiaomei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傳播與哲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新媒體研究、數位人文、網路傳播、傳播與哲學。重要著作有：《網路傳播概論》、《傳播科技與文明》、《網路空間與時間文化初探：以 MUD 情境為例》、《網路報之概念流變 (1995-2005)》。

摘要 / Abstract

本研究以 Bauman「液態性」與 Heidegger「解蔽」兩個概念為本，提出新媒體之「液態解蔽」現象，並以 1998 年發生之印尼華裔婦女受暴事件中之假照片為例，論證液態倉儲之派定與聚置特性，如何讓真實進入一個生產、消費與重製的循環，又如何衝擊我們對真實的認知。

研究以相隔 20 年、三個縱斷時期觀察原始文本、主流媒體文本與 Google 搜尋文本間之增生與消逝，去分析固態解蔽與液態解蔽之差異。研究發現，傳統媒體的固態解蔽有著非常一致的倉儲聚置，不隨時間演進而有任何變化，且在資訊處理上尊崇新聞產製原理與常規，讓使用者傾向相信文本的真實性；Google 頁面則陳列完全不同的聚置樣貌，此樣貌隨著不同搜尋時間點而有不同，且倉儲本身時間點總是更靠近搜尋時間點、遠離原件時間點；其所呈現內容則是真假並置，假照片排序更在真事件之前，凡此都說明了新媒體以運算邏輯為本的資訊聚置，讓真實成了可時時協商之事。

研究者認為，液態解蔽讓以物為本的空間政治退居幕後，取而代之的是以串流資訊為本的時間 / 速度政治，這樣的轉變，讓原先掌握出版空間的傳統媒體逐漸式微，而熟知科技運算的主事者與操弄者開始握有發言權。在速度運作之下，傳統新聞室常規不再可行，假新聞、假事件也有了孕育園地，它們經常混充於真相之間，成為共構真實的一部分。

關鍵字：液態解蔽、固態解蔽、聚置、倉儲、速度政治、真實

Over the years scholars have leveraged traditional text-critical methods to study and compare literary texts so as to explore and discuss various aspects of important research questions on literatures.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Buddhist philology tend to invest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ime in their

preliminary processing of the text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then analyze their observations and produce scientifically qualified research.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that lies behind this rather enormous time-investment required to deal with even comparatively minor textual issues is the fact that the traditional phil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relies heavily on ‘human power’ to collate information, analyze results and explain the inferences derived from the analysis. As a result of this burdensome procedure, large scale research projects carried out by individual scholars are rarely seen.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s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s in Taiwan has won international fame. The existing digital resources mostly have great search functions which provide a very efficient way for looking up a required part in a given text within a moment. However, the lack of integration of the existing databases makes the scholars need to spend much time in bringing the materials from different systems together. Furthermore, digital philology, as a branch of digital humanities, with its application to Buddhist materials, is now opening new research horizons in Buddhist studies. With the help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e are now able to apply statistical methods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to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corpora of digitized texts. However, the potenti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ed to this field of research has yet to be recognized, let alone fully developed and introduced as common practice. The performance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digital texts still requires high-level skills in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advanced statistical knowledge, which creates a high barrier for scholars in the humanities who are now attempting to navigate these tools.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文擬從 Zygmunt Bauman 之「液態性」(liquidity) 一詞，去理解新媒體 (new media) 帶來的媒體情境，並就此情境論述液態現代性 (liquid modernity) 下「新聞真實」之可能演化。

根據 Bauman (2000)，當前我們已進入液態社會，此社會本貌與傳統固態社會迥然不同。在固態現代性 (solid modernity) 時期，人們追求的是穩定的勞動、客觀的事實與確切的世界觀，強調秩序、傳統、慣例與規則，總有一個核心目標讓人遵循，絕不輕易變動；相較之下，液態社會事物具流動本質，總是輕盈、易變、移動快速，此時瞬時速度的快感取代了永恆期待，沒有什麼規則是確定的，一切以流行為依歸，即便是流行，也是快速替換，甚至朝生暮死；由於替換太快，人們多半只在意浮光掠影的表象，不再崇尚深刻反思。

近幾年，隨著智慧型手機通行，Bauman 這套觀點獲得學術界廣泛認可，不過他較不關注媒體或科技議題。研究者以為，固態與液態二分，可類比於「空間政治媒體」與「時間 / 速度政治媒體」，前者以物為本，用實體乘載資訊，一旦出版便成為呈堂證供，資訊無法輕易更動；後者則更強調「介面」，介面沒有邊界，每日每時每秒吞吐巨量資訊，產出與修正速度之快，快到難以辨明誰先誰後、誰是誰非 (吳筱玫、李蔡彥，2017)。新媒體正是這個時間政治下的代表物，時間性 (temporality) 與流動性 (mobility) 則成為理解此媒體情境的重要依歸。

而所謂的新媒體，泛指 2005 年 Web 2.0 興起後之媒體應用，是一個由自媒體 (independent media)、線上主流媒體、行動媒體、搜尋引擎與社交平台交融的集合體。基於此集合特性，研究者以 Heidegger (1977) 《對科技的提問》(The questions concerning technology) 中的「聚置」(Ge-stell) 一詞論述之。「聚置」乃現代科技之主要解蔽方案 (a way of revealing)，結合 Bauman 的液態性，形成液態解蔽這個概念，作為理論基底。由於新媒體具時刻變化本質，拉長時間觀察更能釐清此媒體情境，本文選擇以 1998 年印尼排華運動中的假照片為案例，藉三個縱斷時期 (1998, 2008, 2018) 之資料分析，論述過去 20 年從固態現代性到液態現代性的過程裡，「原件」概念產生什麼變化？媒體解蔽方案如何不同？不同媒體做為一種派定流程，如何對新聞資訊進行回收與繁殖？此樣貌對新聞事件之書寫與建構有何影響？

二、理論演繹

(一) 媒體之解蔽：從 Heidegger「對科技的提問」談起

在傳統定義裡，技術 (科技) 被視為達成目的的一種手段，也是人的活動所導致的一個因果過程，Heidegger (1977) 認為此看法無法回答科技本質問題。他主張，科技乃將事物以「使之在場」方式顯現，形成一種產出 (poi ē sis)，讓隱蔽者 (concealment) 不再隱蔽 (unconcealment)。因此，科技本質不是什麼手段、方法或工具，而是一種解蔽方案。

不同科技有著不一樣的解蔽方案，Heidegger 認為，傳統科技引領與自然共生之帶出式解蔽 (bringing-forth revealing)，以祭典採用之銀器為例，用什麼材料、什麼形式、有什麼用途、達到何種功效，總有一套穩定的執行方式，此乃解蔽之黃金年代；至於現代科技下的解蔽，Heidegger 稱為強索式解蔽 (challenging revealing)，特點是將自然做強索開發 (unlocked)，將之轉換 (transformed) 後儲存堆疊 (stored up)，然後進行分配 (distributed)、切換成新事物 (switched

about anew)，如此運作方式被確保，是強索式解蔽之主要特徵，Heidegger以「限定」(setting-upon)一詞闡釋之。

從「強索」、「限定」二詞之使用，可探知 Heidegger 詆毀現代科技。就其觀察，現代科技促使任何事物都要先準備好，以備不時之需，如此被派定之事物有其穩固地位，稱為倉儲物 (the standing-reserve)，而現代科技將整個宇宙存有轉換成沒什麼分別的倉儲物，隨人們選擇加以運用。結果，人總是以派定 (ordered) 為倉儲物的方式，用限定、強索去解蔽實存，將此限定進行集結，便成為 Heidegger 所謂的「聚置」，也就是「解蔽實存的資源」，這裡面沒有一件事與科技有關。強索式解蔽的問題在於，人以為自己是聚置主體，阻斷了解蔽的其他可能性。結果是，這一套流程派定下來，不只強索於自然，更強索於人，人 (強索者) 將人視為倉儲物，強逼人交出所有潛能，讓自己成為聚置一員。Heidegger 認為，聚置的結果是人變成了「人力資源」，失去主體性，不能再面對自己的本性，阻斷了人與存有的原初關係，最終損害到人的本性。

延伸之，不論是新聞或歷史，都可視為科技解蔽下的產物。Heidegger 以歷史為例，一旦人們開始解蔽，便注定 (destined) 以聚置為出場方式，從注定中我們看到現代歷史的本質：它既非單純書寫的客體，也非人類活動的實現。活動要成為歷史，首先要被派定，唯有將此派定做成倉儲物，使之成為分配客體，才能成為可觸及的歷史。結果，我們將歷史等同於那些編年記錄下來的事，也就是編年紀事 (chronicle)。

研究者以為，Heidegger 對科技的提問，適合用來推導當前的媒體情境，做為一種後現代科技，新媒體展現不同於以往的解蔽方式，其運作的倉儲物與派定流程不同，聚置面貌更迥異於傳統媒體，本研究試以「固態解蔽」與「液態解蔽」論述之，前者是現代科技產物，讓強索式解蔽以聚置方式出場，後者則改變了倉儲物的聚置本質。

(二) 傳統媒體與固態解蔽

網路興起以前，傳統媒體的主要解蔽方案為固態聚置，此固態解蔽之源頭，可追溯至 15 世紀以降的印刷革命，McLuhan (1962) 是第一個提到印刷人 (the typographic man) 概念的學者，他巧妙論證印刷與理性主義之淵源，主張人類的心理機制與思考模式，深受印刷空間影響。

在印刷出現以前的手寫時代，資訊傳承靠抄手，負責把文本謄錄在一視覺空間中；每位抄手字跡不同，謄錄方式不一，即便是抄錄同樣內容，也可能因反覆謄錄而產生錯漏，所以手寫時代無定型文本可言。印刷的重大貢獻，就是統一了文本的視覺空間，印刷品乃不斷重製的同一客體，外觀相同、尺寸大小也相同，讓很多標準化動作得以進行，而有「標準化」之心理動力，加上大量傳佈與精確重製，跨地域讀者得以對不同文本進行比較、考據、勘誤，並對不同領域概念進行整合 (Eisenstein, 1983; Ivins, 1969; McLuhan, 1964)。可以說，自印刷革命後，人們善用紙張與油墨 (材料)，將之轉換為定型文本 (形式，主要以書籍展現)、大量印製與傳佈 (用途)，以成就同一、標準化之資訊傳遞與更新 (功效)，便成為印刷空間下的解蔽方案。

標準化的定型文本帶來的是固態的資源聚置，有兩大意涵，一是封閉性，二是完成性，封閉性代表有邊界，完成性則指向一個穩固的終端產品。當媒體政治以印刷空間為本，人們傾向尊崇「有始有終」的敘事與「孤立的美學」(Ong, 1982)，亦即不論書信、文件、錄音帶、影帶，一旦完成付印 (錄)，內容便無從改變，想改變必須等再版。在這樣的規訓機制下，不只是文本外觀統一，文本的知識、觀點也有統一趨勢，人們傾向理性解蔽出一個單一、正確的實存，埋下

早年新聞學追求「客觀真實」的心理基礎。一般文獻總認為，新聞學「客觀性」價值之確立，是二十世紀以後的事（Czitrom, 1982; Schudson, 1978），鮮少人注意到它可能是印刷空間、理性主義、固態聚置交互演化下之果，此成果限定了事件該如何倉儲成新聞、新聞又如何倉儲為歷史的過程。

至於固態解蔽的資源派定，Lévi-Strauss（1972 / 李幼蒸譯，1989）在〈歷史與辯證法〉一文中有段話值得玩味。他以編年紀事為例，指出編年紀事乃一複雜之編碼系統，由兩個最基本的時間符碼組成，一是「年代序列」，二是年代、日期之間的「時間距離」。年代或日期本身不能單獨成為符碼，要讓它產生符碼只有兩種可能：一是某個關鍵史實的「提示」（譬如 911 事件），另一則是經由年代或日期的排列，彰顯事件群組之間的前後關係，此時「在前」的事件總被視為「在後」事件的某個因子，兩者地位不能翻轉，所以時間乃線性不可逆。

至於「時間距離」，泛指同一歷史領域裡事件被記錄的「頻率」，不同頻率形塑出不同意指系統，史前與當代的歷史領域的頻率不同，其歷史符碼就不一樣。問題是，不管記錄多麼頻繁，自稱為通史的歷史，空缺之處仍比充實之處多，再努力的人也無法窮盡，只能選擇地區、時期、人群和人群中的個人，做為還原歷史之標的。White（1973）認為，編年紀事並無開始，亦無結束，它是書寫者在特定時間、空間內經營的一塊歷史場域，將歷史紀錄予以篩選、整理，依其前後關係進行詮釋，成為一可辨識的故事。這種由諸「歷史領域」組成的「非連續體集合」，各領域有其「特殊頻率」和「在前」與「在後」的因果編碼，便注定成為現代性時期解蔽歷史的聚置方案。

整體來看，固態解蔽的資源派定，掌握印刷空間之主流媒體限定了倉儲物的出場方式，由其決定此倉儲物之價值與意義，並在閱聽市場考量下，將資訊進行儲存、分配與轉化。此聚置資源通常是穩定的完成品，一旦在實體載具上揭露、儲存成記憶，便轉化成歷史資料之一環；由於實體物總會隨著時間腐朽，其所在的時間序列是穩定的。又基於其定型文本特性，人們對此資料的產出與取用總有一定標準，所不同者只在產出者與取用者的個人詮釋。

（三）新媒體與液態解蔽

固態解蔽把知識或資訊轉化成一空間產物，倉儲物（如書本、報紙、雜誌）用完成、統一的樣貌派定、儲存、取用與轉化，即便非紙媒的廣播、電視媒體相繼出現，排程開始有了時間面向，也仍是「定時」概念，屬於空間政治的定性（fixity）未遭挑戰，因此在心理機制上，尊崇的仍是一套穩定的規則與流程。

網路發展成熟後，這套原則遭到了徹底破壞，媒體則是最早感受到此破壞的專業，Deuze 挪用 Bauam 的概念，提出「液態新聞」一詞，嘗試解釋媒體產業發生之事。他在 2007 時訪問 Bauman，請其就液態新聞提出看法，或許由於 Bauman 非媒體專長，無法確切錨定液態媒體之樣貌，不過仍提出了一個重要觀念，即液態社會的時間既非循環也非線性，而是點狀的，沒了線性或循環的因果定律，所謂可辨識的故事，將不再是單一、永恆的詮釋（Deuze, 2007）。

Deuze（2008）接著探索液態新聞形成的原因，舉出幾項重要特性。其中，互動性讓使用者可以參與內容產製，亦即公眾有權決定新聞的重要性，並主動參與詮釋，在時間推演之下，讓媒體組織逐漸失去其對新聞資訊呈現之控制；立即性則讓線上媒體輕易修正、改寫，甚至移動已張貼之內容。由於速度實在太快，媒體組織沒有時間遵行組織流程與常規，結果是，傳統定義的新聞界線崩解，所有原理原則不再穩定，隨時都可物換星移（Lu & Zhou, 2016; Karlsson & Strömbäck, 2010）。

液態新聞學者多從新媒體特性著手論述，並未探究科技本質問題，不過他們確切點到新媒體

走的是時間 / 速度政治，其改變的不只是我們的思考方式，而是我們對真實的認知。空間政治下的定型文本具封閉性與完成性，人們心理上傾向尋求一個單一詮釋，相較之下，新媒體的網頁或介面並非穩定載體，沒有實體可言，也沒有「完成」的要求，它頂多就是一場持續進行的對話，具有時時更新的特性（Giger, 2006）。因此，網路上的文件不再是終端產品，它總是在流動中創造、延伸、變異、消逝，當真實可以在不同時間、空間進行快速協商、修訂，在心理動力上，就變成只在乎當下的真實，當下總是頃刻出現與消失，真實自然就具有浮動與微協調的面貌。它既非客觀，也非主觀，而是隨時間 / 速度政治運作展露於世人眼前，結果是，假可以被澄清為真，真也可以被矯造為假，更多時候乃假中有真、真中有假。

液態解蔽成形於 Web 2.0 出現前後，使用者開始有更多管道去解蔽實存，除了方興未艾的自媒體外，更重要的是搜尋引擎與社群平台，兩者對人心與社會帶來之影響已然不是什麼新論點（如 Halavais, 2018; Allcott & Gentzkow, 2017; Alejandro, 2010），重點在於像頁面排序（PageRank）或 Graph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這樣的運算機制，中介於新媒體與使用者之間，它們與立即性、互動性一起共構了液態的聚置方案。

簡言之，液態解蔽乃一由群眾共同參與製造倉儲物，藉科技運算輔助下展現群眾熱度、聲量，以派定資訊價值與意義，並進而在不同平台上儲存、分配、轉化。由於可以不斷替換、重製與延伸，液態資訊可能永久保留，可能不斷變形產出不同版本，也可能轉眼消失，這顯示液態解蔽沒有特定穩固面貌，其倉儲者非真正的物，如何取用將隨著時間點而有所不同，聚置樣貌更視科技推陳出新而日新月異。此時液態解蔽如何影響此新聞之重現？新聞、記憶、歷史彼此關係為何？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議題。

（四）案例：印尼排華假照片事件

1998 年五月，印尼發生排華運動，Wikipedia 稱為「黑色五月暴動」，表面上，那只是印尼史上眾多排華運動的一次，特別之處在於當時的媒體情境，那是一個網路初興，自媒體或獨立個人躍躍欲試，但話語權還掌握在傳統媒體的年代。暴亂發生不久，有印尼華僑寫信請求新加坡《聯合早報》協助報導，於是《聯合早報》運用網路特性開闢了一個「印尼局勢討論區」，供讀者交換意見，順便蒐集線索。

五月下旬，討論區出現華裔婦女受暴文字，未獲主流媒體關注；六月十日，美國《紐約時報》刊載一篇「In Jakarta, Reports of Numerous Rapes of Chinese in Riots」的文字新聞，內容談及人權團體開始蒐集資訊，揭露強暴事件為一有組織之侵害行動，隨後 CNN 在六月二十八日跟進報導「Reports allege organized raping during Indonesian riots」，此時強暴仍屬臆測；七月四日，有讀者在討論區宣稱確有華人婦女慘遭輪姦，引起新加坡主流媒體注意，於此同時，許多印尼華人受到迫害的照片湧入《聯合早報》與《星洲日報》，中間夾雜一批慘不忍睹的姦殺照片，意圖魚目混珠。由於這些照片無從證實，主流媒體態度相對謹慎（鄭昭賢，2016），但「印尼局勢討論區」卻不受此控制，自七月中旬起，開始有人從世界各網站蒐集可能是華裔婦女的受暴證據，以超連結方式導引討論區讀者去看一些慘不忍睹的恐怖照片，共十多張，宣稱來自印尼黃絲帶運動團體。之後，像是滾雪球般，讀者紛紛把這些照片移植到其他網站，照片影響力放大，在華人社群之間交互流竄。直到七月二十六日，討論區編號 116 讀者以考據精神，比對出多數照片的來源網站，證實這些照片早在五月排華運動前就已存在，且許多是與東帝汶獨立運動有關，因此不可能是華裔

婦女受暴的照片；之後，編號 139 讀者進一步認定，即便在東帝汶網站上的照片，也有造假之嫌，理由很多，首先，所有人（加害者與受害者）都看不到臉，且軍服非常之新，軍服上看不到任何軍種、軍階，和標準印尼軍服不符；此外，受害者看不到明顯傷痕（雖然身上確有一大堆血），也沒有真正受虐的「行動」（如受害者被打），在在顯示這是刻意的政治操作，他呼籲大家可以相信受暴事實，但不要把照片為證據，討論區至此才回歸理性。

雖然如此，照片本身已經向外傳散，閱聽人並不知道照片從討論區引發，自然無從知曉 116 與 139 讀者的考據，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臺灣媒體《中國時報》在照片證實為假的後兩天，才開始大幅報導，並宣稱是「現代婦女基金會」提供的「美聯社」照片（彭琳沁，1998）。《聯合報》在八月三日報導，「現代婦女基金會」收到 12 張華裔婦女慘遭性凌虐、縱火燒死、刀刻身體等駭人照片，同時網路出現了報復印尼的言論；之後又說有一作家現身說法，採用的仍是網路流傳的照片；直到八月九日，《聯合報》才刊出照片似為東帝汶所拍攝，呼籲提供五月暴行攝錄影像的訊息。

總體來看，印尼排華運動中的華裔婦女受暴，最可能是一真新聞、假證據的案例。1998 年時，研究者基於研究需要，曾保留部分照片很長一段時間，約在 10 年之後，赫然發現這些照片仍在網路不斷流竄，且成為印尼軍隊暴行的主要證詞。而當時網路使用者能找到的主要資訊，也幾乎都以照片為本，顯見假照片已然編織成為真事件的一環，這證明了尼采的論點：歷史從來就是真實與虛構之混成（吳筱玫，2008）。不過，當時研究者並未考慮新媒體液態性議題，亦即隨著時間的推演，這些證詞面貌將如何轉變？

研究者認為，液態解蔽是關乎時間的，唯有在不同時間點觀察，才能了解它的聚置特性。事實上，在長遠的歷史洪流中，這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事件，事件裡沒有真的「假新聞」，充其量是用了魚目混珠的假照片，但也因為事件本身並不複雜，有助於我們回歸媒體本質的討論。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蒐集 1998、2008、2018 三個時期，關於「1998 年印尼排華假照片」事件之相關歷史資訊進行分析，鑑於三個時期科技狀況不同，資源聚置方式也不同，原始設定可分析資料如表一：

表一：本研究資料幅員

| | 原件：討論區 | 原件：超連結 | 聯合報 | Google | Facebook, Twitter |
|------|--------|--------|-----|--------|-------------------|
| 1998 | ○ | ○ | ○ | X | X |
| 2008 | ○ | X | ○ | ○ | X |
| 2018 | X | X | ○ | ○ | ○ |

來源：研究者整理

其中，1998 年與 2008 年使用舊有資料。在 1998 年時，搜尋還不是使用者基本素養，人們對於事件的了解，習慣仰賴傳統大眾媒體，只是多了互動的「討論區」，假照片正是從新加坡《聯合早報》討論區開始散佈的，由於當時討論區乃純文字，沒有圖片嵌入功能，發佈照片者便以「超連結」方式，提供照片連結網址，導引使用者造訪，這個集合體（聚置方式）構成本研究定義的「原

始文本」。

2008年時，討論區還找得到，超連結紛紛無法連結，原始文本失去其完整性，使用者只能從主流媒體資料庫（聯合知識庫）與 Google 搜尋引擎回顧事件本身，兩者之間的差異，可說明自媒體的興起與主流媒體之式微，讓事件有了更多虛構層面；到了 2018 年，原始文本銷聲匿跡，Google 頁面排序則早與 2008 年大相逕庭，研究者仍以「印尼排華」與「1998」兩個沒有照片指涉的關鍵字進行搜尋，以前 20 筆為範圍加以分析。這些資料顯示著，不同媒體呈現不同的資訊聚置，相互比較有助了解新媒體液態性如何影響我們對真實的理解。

在此同時，研究者也對社群平台 Twitter 和 Facebook（以中文版為主）公開粉絲頁進行相關搜尋，發現社群媒體相關討論甚少，暫時還不是使用者了解事件之主要來源，因此此次研究濾除社群媒體之分析與討論。主要研究問題如下：

- （一）固態媒體之解蔽、聚置方案為何？
- （二）液態社會中，原件概念產生什麼變化？
- （三）新媒體的液態解蔽有何特性？其派定流程如何影響資源聚置？對新聞真實有何影響？

四、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節依三個研究問題分別進行分析與說明。

（一）傳統媒體《聯合報》的固態解蔽

在固態解蔽上，研究者以傳統主流媒體《聯合報》為本，尋找 1998 印尼排華相關資料。由於《聯合報》定時維護其「聯合知識庫」，可輕易找到紙本新聞，研究者不必到報社資料室一一影印，此便利性使《聯合報》成為珍貴研究資源。2008 年時研究者便進行過一次搜尋，自該年五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分別以「印尼排華」、「華裔婦女受暴」、「華裔婦女受虐」、「華裔婦女+照片」等關鍵字進行交叉比對，得到可分析資料共 20 筆（表二）。

表二：《聯合報》紙媒之固態解蔽

| 編號 | 日期 | 版次 | 標題 | 大致內容 | 照片陳述 |
|----|-------|------|-----------------|--|----------------------|
| 1 | 07/25 | 兩岸港澳 | 香港婦女團體抗議印尼排華 | 印尼軍方有組織強暴華人婦女，有未具名華僑目擊。 | 無 |
| 2 | 07/28 | 政治 | 印尼華人還活在強暴劫掠之中 | 國際人權觀察組織研判，五月是一場有組織的暴亂，印尼政府七月才進行調查。 | 無 |
| 3 | 07/28 | 民意論壇 | 拿出我們的經濟實力 | 讀者投書：呼籲台灣政府做一點事。 | 無 |
| 4 | 07/29 | 國際 | 譴責印尼暴行，大馬華人展開抗議 | 馬來西亞一華裔總會呼籲公審姦殺華裔婦女之暴徒。 | 無 |
| 5 | 07/29 | 話題 | 印尼施壓，兩受暴婦人取消來台 | 現代婦女基金會表示，華人婦女持續受迫害，來台尋求診療的兩名受暴婦女在壓力下取消來台。 | 熱心印尼華僑傳來網路照片，十分殘暴血腥。 |

| | | | | | |
|----|-------|------|------------------------------|--|--|
| 6 | 07/29 | 話題 | 印尼排華恫嚇施暴，華婦帶刀自衛 | 雅加達華人領袖表示，排華施暴有一模式，先散發恐嚇傳單，繼而搶劫殺戮。 | 無 |
| 7 | 07/30 | 焦點 | 雷道餘：華裔婦女遭「有計畫的集體輪暴」 | 我駐印尼代表處人員之專訪。他提出官方版數據：168人遭性侵，20人死亡。 | 民權團體展開調查，陸續公開照片，證明此事之嚴重性。 |
| 8 | 08/01 | 話題 | 各界呼籲抵制赴印尼觀光 | 新黨婦女委員會前往印尼駐華代表處抗議 | 無 |
| 9 | 08/01 | 話題 | 印尼排華暴動，主謀是蘇哈托女婿 | 一非政府組織人員指出，普拉波麾下特種部隊執行燒殺劫姦，以製造混亂。 | 照片乃普拉波在東帝汶拍攝，每隔一陣子便流傳，此乃軍方之癖好。 |
| 10 | 08/03 | 聯合副刊 | 性恐怖主義的暴行 | 以印尼華人身分譴責此次有組織之姦殺行動。 | 無 |
| 11 | 08/03 | 社會傳真 | 網路出現報復印尼言論 | 此事件經網路披露引起國人震撼，有人徵求「駭客」徹底破壞印尼政府的電腦系統。 | 現代婦女基金會七月底收到12張華裔婦女慘遭性凌虐、縱火燒死、刀刻身體等駭人照片。 |
| 12 | 08/04 | 文化 | 印尼排華，作家挺身控訴 |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宣稱，將有一作家「現身說法」提出控訴。 | 一澳洲華文作家自網路下載照片傳閱，證實不少暴徒穿著軍服。 |
| 13 | 08/04 | 文化 | 暴行，將文壇推入絕境 | 一新加坡作家表示自逃難的親戚口中得知暴行、描繪受暴狀況，人權組織估計受害者千人以上。 | 無 |
| 14 | 08/06 | 文化 | 世界華人作家昨簽署聯合聲明 | 此次排華是一次有強大的黑手撐腰、有預謀、有組織的系統暴行。 | 無 |
| 15 | 08/06 | 國際 | 印尼華人：請台灣彈性點，放寬難民入境 | 關懷印尼受暴婦女訪查團發現，部分受暴婦女沒有護照，無法走出國門。 | 無 |
| 16 | 08/09 | 國際 | 譴責印尼暴行，全球華人示威 | 大紐約地區三千多名華人在印尼駐紐約總領事館前示威抗議。 | 無 |
| 17 | 08/09 | 國際 | 印尼婦女部長，保證嚴懲暴徒 | 在美召開記者會，保證調查與懲治主事者之決心。 | 一些已公布的照片，是過去在東帝汶所拍攝。 |
| 18 | 08/11 | 聯合副刊 | 影像觀測，受害女性的影像 | 女性基本人權不容忽視。媒體由男性掌握，也許女性擁有一部傻瓜相機是有用的。 | 怵目驚心的照片是偽造的，為何五月暴行無人用攝影器材記錄影像？ |
| 19 | 08/17 | 國際 | 北大學生，今如期示威 | 示威抗議印尼軍之暴行。 | 無 |
| 20 | 08/19 | 國際 | 印尼華裔婦女受暴事件，警察首長令交證據，否則控告散播謠言 | 山迪亞旺神父等非政府組織不肯交出相關資料，遭印尼警方恫嚇。 | 無 |

來源：吳筱政，2008

2018年，研究者以同樣搜尋條件再試一次，得到的結果與2008年一模一樣，這驗證《聯合報》聚置資源之固態性，未曾在過去十年進行加油添醋動作。此時，搜尋空間是穩定的，研究者僅以《聯合報》內容為本，排除《聯合晚報》、《經濟日報》等其他報紙；時間上則有一定時間範圍，時間距離也一樣，在這些條件下，搜尋便有一特定邊界，以此邊界為本，可以找到「定型文本」資料，再就此資料進行詮釋。

在這批資訊中，有兩點值得陳述：其一，1998年時，即便網際網路已經深植人心，其他主流媒體附屬電子報早有定時更新線上新聞之習慣，《聯合報》仍然以紙本為尊，表示在那個固態、液態交錯的年代，主流媒體心理動力上仍傾向肯定固態解蔽之價值。從表二內容便可發現，每篇報導一定有明確消息來源；不確定來源的照片不予刊登，所以頂多只有關於照片的陳述，沒有照片本身；一旦發現照片可能有假，便立刻引用其他消息來源澄清，但報社心態上傾向相信這件事，因此呼籲真的照片現身，這說明當時之新聞真實，仍須依照新聞室常規查證、報導；其二，即便全球化浪潮已銳不可擋，論壇、布告欄前仆後繼，《聯合報》仍固守傳統報導方式，這導致了一個有違全球化的時間差：新加坡《聯合早報》討論區在七月二十六日時，照片就被論證為假，但《聯合報》並不知情，反而是在之後幾天才有較大篇幅報導。

回頭分析固態解蔽之特性，特定時間與空間形塑了邊界，有邊界代表倉儲資訊是有限的，且此有限性總以定型、完成樣貌示人，此珍稀性提升了資訊（知識）在固態現代性時期的價值，而握有傳散、分配倉儲物的媒體，則擁有派定其出場方式之權力。固定的時間與空間範圍，意味著事件總有一個起始點與一個中心點，以《聯合報》報導此事件為例，起始點在七月二十五日，中心點則落在新聞置放於焦點版的七月三十日。而固態解蔽「中心」這個概念，也引領固態新聞學演化出其派定常規，即報導真實、公共利益、兩面並陳與利益迴避。這些常規順利施行，有賴於穩定的「時間距離」，讓新聞室有時間去進行查證與評估，至少在表二，我們仍能看到這個固態解蔽的樣貌。

表二另一反身性小插曲是，研究者發現自己就是用「編年紀事」去處理這些資訊，斤斤計較於資訊之前後關係，因此會推論有「華裔婦女受暴」這個因，導致持續追蹤可能照片這個果，又基於照片可能有假之因，必須再跟進一個果，即給予澄清報導，並試圖廣徵可能的真實攝錄影像。在這一系類因果推論之中，追求新聞真實是背後非常重要的影舞者。這種詮釋方式如此自然，研究者2008年時並未質疑，直到液態解蔽概念成形，才轉變了研究者的想像。

（二）液態社會下的原件

原件（the originals）或原真性（authenticity），一直被視為驗證資訊價值的重要關鍵，不論文學、藝術、新聞、考古、歷史等領域，原件都與真理、精確、獨一無二等概念密不可分（Alejandro, 2010），此價值植基於一個條件，就是我們能辨明此原件之時間與空間。以新聞為例，在以紙本為主的固態年代，我們可以從紙張泛黃的程度，或是紙本上記載的時間與空間資訊，去判定此新聞之原真性，一旦實體物被介面資訊流取代，原件地位就產生了動搖。當然，液態社會並非沒有原件，只是原件可能朝生暮死，或原件上的資訊，轉眼就被重製、搬運到另一網頁，內容和原件很像，甚至一模一樣，使用者難以辨明先後，更確切地說是此辨明變得不重要，時間正如Bauman所言，變成點狀散佈，凡此都衝擊到原件本有的資訊價值。從此，文本的唯物史，將被不斷地生產與消費的流程所替代。

假照片事件源於新加坡《聯合早報》討論區，1998年時，討論區以繁體中文（www.asia1.com.sg/cgi-bin/cweb/g2b.pl?special/indonesia/indonesiaforum.html）與簡體中文（www.zaobao.com/zaobao/special/pages/indonesia.html）兩個版本呈現，當時網路初興，討論區僅能用純文字張貼，因此超連結成了基本解蔽方案，表三節錄與假照片相關之部分資訊。

表三：《聯合早報》原始文本資訊節錄

| 編號 / 時間 | |
|---|---|
| (35) Sun, 19 Jul 1998 23:56:10 | <p>Terrible pictures</p> <p>Courtesy of The Strait News Express</p> <p>http://www.taiwan-strait.com/tupian.html</p> <p>(Go to the above website, then click 010, 01, 02, 03, 04, 06, 07, 08, 09 to see terrible events' pictures, pictures are originally sent by Indonesia - Yellow Ribbon Campaign)</p> <p>WARNING: All of these pictures above are rather distressing, showing the naked bodies of the victims.</p> |
| (56) Wed, 22 Jul 1998 10:11:35 | <p>我是一個中國人。今天，我的朋友那里得到一個網址，是關於印尼暴亂時華人婦女上百人遭到強姦，上面有十幅左右的圖片，真是令人發指。</p> <p>http://members.tripod.com/~moyu11/</p> |
| (105) Fri, 24 Jul 1998 17:42:22 +0800 | <p>FYI: 華盛頓8月7日將組織和平示威活動(http://lateline.muzi.net/).</p> <p>一幅更可怕的照片(7/22/98): http://www.taiwan-strait.com/new01.jpg</p> |
| (116) Sun, 26 Jul 1998 00:10:50 +0700 | <p>Faked rape photos</p> <p>We attach herewith, 2 e-mails to clarify the faked rape photos regarding the rape of Indonesian Huaren women during May riots.</p> <p>We appreciate your effort to help Huaren in Indonesia, but please be careful to somebody who insist to spread faked-information in the Net.</p> <p>1. Hi there</p> <p>For the sake of the truth, regarding your site</p> <p>http://www.taiwan-strait.com/tupian.html,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your photo:</p> <p>02 and 03 are similar with http://www.easttimor.com/html/torture1.html</p> <p>04 and 013 are similar with http://www.easttimor.com/html/torture2.html</p> <p>06 and 07 are similar with http://www.easttimor.com/html/torture3.html</p> <p>08 and 09 are similar with http://www.easttimor.com/html/torture4.html</p> <p>01 and abc are similar with http://www.easttimor.com/html/torture5.html</p> <p>All photos mentioned above ARE NOT RELATED TO THE Jakarta Mei1998 riots.</p> <p>11 out of 12 photos at your site (as per 24 July 1998, 00.00.00 + 7 GMT) are related to the East Timorese torture (your photo of new01 is an exception).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 to spread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recent rapes and tortures to Indonesian Huaren, but please be carefull. (I suspect your new01 is sent by someone who took the photo from one of porno site in the Internet. I'm still investigating the original resource of this photo).</p> <p>2.</p> <p>Somebody tried to mess-up the thing.</p> <p>Photo new01 at http://www.taiwan-strait.com/new01.jpg</p> |

| | |
|--|--|
| | <p>or 1st photo at http://www.huaren.org/atro/rapvic.html was originally from http://www.goregallery.com/mutilate/Dead2.jpg You may contact the webmaster of goregallery to confirm the above. Photo with caption THEY RAPE ! at http://www.huaren.org/atro/ is related to the torture at East Timor. This photo has been around before May Riot. You may check http://www.esoterica.pt/lorosae/torture/ or http://www.easttimor.com</p> |
|--|--|

來源：研究者整理

2008年時，繁體中文版消失，僅剩簡體中文可查詢，但上面所有超連結都已失效，使這個由純文字與超連結照片共構而成的原始文本，失去了完整性；到了2018年，所有相關討論區皆被移除，假照片事件像不曾存在一般，除非有他人曾經保留原件上面的資訊，否則無人再知有此份原件。問題是，即便像研究者保留原件上部份資訊，又如何證實它們是原始文本呢？失去實體載具支撐，它們變成不能被論證原真性的一群倉儲物。

此外，當超連結不再連結，原件也變得跛腳，難以成為呈堂證供，這不代表上面的照片都不見了，在使用者共構之下，它們只是不斷變換倉儲居所，繼續隱身在網路某個角落，做為控訴1998年印尼軍隊暴行的半吊子證據。對使用者而言，在不同的時間點，哪些倉儲物具優先近用權，會以何種方式聚置展示，便成了他對此真實之詮釋基礎；而所謂的優先近用，則往往取決於新媒體的運算機制，這正是液態解蔽之特徵。

(三) 新媒體 Google 的液態解蔽

習慣用 Google 進行搜尋的人，都清楚 Google 頁面排序能搜到的資料，必定與一般主流媒體資料庫不同，這似乎是無庸置疑的，卻鮮少人嘗試辨明這樣的差異有著哪些深遠影響。

以假照片事件為例，研究者進行「聯合知識庫」搜尋時，乃先就事件發生之時間範圍，先設定好時間與空間，再以標題或關鍵字入手，定位出有限資料群共 20 筆，這時候時間與空間具優先性，是搜尋的最先條件；Google 不是這樣的遊戲規則，它乃以關鍵字為本，時間與空間幻化成關鍵字一環，搜尋結果往往萬千筆以上，由於使用者無法一一閱讀，於是排序在前面的資料，便擁有了較大的聲量值，容易被使用者參考。這個搜尋程序上的差異，讓固態解蔽重視的時間與空間，不再具有以往之優先地位，這個差異看似微小，卻不可忽視。

為了證實搜尋本質不同，研究者於 2018 年二月，仿照「聯合知識庫」對 Google 進行同樣動作，即利用 Google 客製化的時程功能，蒐集 1998 年五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之資料，結果只有 8 筆，其中僅 3 筆與印尼排華相關，且表面上寫 1998 年，實際點進去後，全部都是 2010 年以後的資料，這顯示 1998 年資料早已埋沒在速度政治之下一去不返，也證明了，利用固態解蔽手段去取用液態媒體，將無法得到任何資訊。固態媒體讓我們習於追本溯源，新聞一旦過去就成為歷史；新媒體則是當下的媒體，歷史總被拉到最近的時間點去述說，原本線性、因果的時間觀，在新媒體運作下變成點狀、平行的時間分布。

表四：2008年前 Google 之搜尋排序（2007年11月7日）*

| 編號 | 日期 | 來源 | 標題 | 照片之處理 | 內容轉引編號 |
|----|------------|-------------|----------------|-----------------|-------------------|
| 1 | 09/17/2007 | 台灣摩尼BBS | 1998年印尼排華暴動紀錄片 | 超連結至YouTube看影片 | |
| 2 | 10/18/2007 | 香港討論區 | 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 | 超連結至ixco看照片 | 3, 4, 5, 8, 18 |
| 6 | 05/03/2007 | 香港One Forum | 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 | 無 | |
| 7 | 05/31/2006 | 新浪網部落格 | 1998年印尼排華獸行錄 | 超連結至iamchina看照片 | 9, 11, 12, 16, 19 |
| 10 | 不明 | 不明 | 印尼暴亂 -- 無恥的印尼人 | 黑體文字+九張照片集錦 | |
| 20 | 02/25/2007 | 香港互聯網 | 印尼排華獸行錄 | 超連結至不同網站看影片、照片 | |

* 二十個連結中，編號 13、14、15 三個連結內容不相關，編號 17 需要密碼無法成功連結；「內容轉引編號」指該編號雖為不同網頁，但與前編號之文件內容完全相同，如編號 3 就轉引自編號 2 網站。

來源：吳筱玫，2008

既然液態解蔽本性不同，此不同有何實質衝擊？2008年時，研究者發現在 Google 運算機制下所分析的前 20 筆資料，竟是 6 筆同樣內容互相轉貼之果，且其中 16 筆都是直接張貼或超連結這些假照片（表四），從而論證在群眾書寫與重構之下，如果使用者不細心考究，假照片將成為真實事件之一環。2018年，當研究者回顧這批資料時，卻有了些不同想法。從表四可以發現，原始文本不見蹤跡，主要來源是討論區與部落格，時間點清一色非常靠近搜尋日，重點是標題非常雷同，與研究者輸入之關鍵字契合，這意味著美其名是群眾的書寫，實際上卻是 Google 運作機制決定了聚置面貌。也就是說，在液態解蔽時代，運算機制具絕對優先性，使用者必須以此機制為本爭奪出場空間，標題、關鍵字和時間點則是取得出場門票的重要關鍵，至於假被編織為真的一部分，則是這一連串運作之下的暫時性面貌。

表五列出 2018 年用同樣手法搜得的資料，結果與 2008 年完全不同，正可以說明液態解蔽之暫時性。首先，我們看到 Wikipedia 出現在第一筆，意味著固態解蔽對真實的追求仍然存在，總有一塊穩定空間必須倉儲類似正史的資訊；其次，主流媒體現身，不再是部落格、討論區天下，來源變得多樣；再者，時間點雖仍靠近搜尋時間，但已較為多元，依然沒有原始資料；最後，有恐怖照片者排序依然在前面，但澄清照片為假的訊息也不少。這意味著，又經過十年的沉澱，使用者看到的是不同的事件面貌：2008 年會相信照片為真，2018 年則有資源足以判定照片為假，這又說明真實可隨時協商的浮動性。當時間點不斷向搜尋之當下靠近，歷史記憶似乎又成了新聞，只是在假照片神出鬼沒之下，這些新聞事件更像是「傳說」。

表五：2018年時 Google 之搜尋排序（2018年2月26日）#

| 編號 | 日期 | 來源 | 標題 | 照片之處理 | 內容轉引 編號 |
|----|------------|--------------------------|--|---------------------------|------------|
| 1 | 持續更新 | Wikipedia | 黑色五月暴動 | 印尼官方照片 | |
| 2 | 11/04/2011 | 大紀元 | 【歷史今日】中共輸出革命惡果 印尼排華舉世震驚（慎入） | 13張網路照片， 多半為假 | 3 |
| 5 | 不明 | Hothk | 慎入！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 | 數十張恐怖假照 片 | |
| 6 | 09/19/2016 | 關鍵評論網 | 1998年印尼排華暴動後：有人為 洩恨傳假照片給報社，也有逃難 商人成為特派記者 | 主流媒體照片， 無假照片 | |
| 7 | 不明 | 成功大學 | 98年印尼排華動亂始末與蘇哈托 執政前後華人社會之變遷 | pdf論文，無照 片 | |
| 8 | 05/03/2007 | Rokok Indonesia 的 部落格 | 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 | 純文字書寫，無 照片 | |
| 9 | 09/22/2008 | Mobile01 | 1998年印尼排華大暴動? | 提問想了解此事 件，無照片 | |
| 11 | 05/16/2014 | Ettoday | 恐怖巧合！越南、馬來西亞、印 尼排華暴動都在513 | 無假照片 | |
| 12 | 11/29/2011 | 人民報 | 中國人應該明白的事：1998年5月 印尼排華暴亂 | 純文字，無照片 | |
| 13 | 08/09/2017 | 歡亨網 | 塵封19年!! 1998印尼排華暴動照片 曝光--美媒終於肯公開了 | 照片來自VCG視 覺中國，無恐怖 照片 | 18 |
| 14 | 04/10/2012 | Youtube | 1998印尼暴動（節錄） | 影片 | |
| 17 | 05/13/2017 | 聯合新聞網 | 印尼98排華19年 走過傷痛記取歷 史 | 無恐怖照片 | |
| 19 | 12/01/2016 | 風傳媒 | 「黑色五月」排華事件會重演嗎？ 印尼又掀反華人首長示威 | 無恐怖照片 | |
| 20 | 05/05/2016 | 壹讀 | 印尼排華事件的影響有哪些 | 有恐怖照片，難 辨真偽 | |

編號 4 無法連結，編號 10、15、16 非相關內容。

來源：研究者整理

2008年與2018年比較，正印證了 Google 倉儲之液態性，由於運算規則時時可變，網頁資訊更是朝生暮死，這導致所有倉儲、聚置都以短暫的、流動樣貌示人。結果，不只是人如 Heidegger 所言，成了討好運算的人力資源，就連時間與空間，也都成了運算資源之一部分，不再是準確、客觀的參照。這裡面，時間點又決定了空間序列，表四、表五都顯示，愈新的時間點愈有可能出場，時時更新才能確保倉儲物讓人看見、取用。因此，液態解蔽走的是時間 / 速度政治，掌握時間與速度者，就能掌握權力，此權力涵蓋協商真實的樣貌。

所謂掌握時間與速度，又以掌握新媒體運算機制為基本要件，在這樣的解蔽方案下，傳統主流媒體失去其揮灑空間，所謂的常規，往往跟不上資訊產出速度，大家只能追著時間跑。此液態性有其深遠影響，在心理機制上，使用者不再還原一個特定的事件面貌，真實成為可隨時協商之

液態聚置，並可頻繁改寫。須知所謂真、假二分，其實是空間政治的產物，在時間／速度政治運作下，假新聞出沒於各社群平台，是再平凡不過的一件事，但這不代表人們對真實沒有需求，畢竟固態的心理動力傳承已久，不是那麼容易頃刻消失，以本案例為例，比較可能傳遞真實資訊的Wikipedia，就成了還原事件本貌的主要來源。

五、結語

研究者試圖以對「液態解蔽」的想像，去論述新媒體的科技本質。研究者認為，印刷以降的紙本媒體及其後續影音載具，走的是定型文本下的空間政治，因為物有邊界、有一定的空間時間範圍，「源頭」、「中心」、「完成」等觀念被彰顯，人們在心理動力上，傾向追尋穩定、精確的標準與常規，此乃固態現代性的主要解蔽方案。網路、手機等新媒體發展成熟之後，乘載資訊的物被串流資訊所取代，文本不再是定型產品，而是以巨量、即時、零碎、待續方式供使用者取用，且可以隨時增生與消逝。此時時空邊界都不見了，能掌握的只有時間與速度，由於速度永遠向「當下」靠近，在心理機制上，「源頭」、「中心」、「完成」便不具以往權威地位。在這個液態的時間／速度政治中，又以科技運算機制扮演最關鍵的角色，創造、撰寫這些機制並令其普遍通行的主事者，將成為最大的權力收割者，其次才是運用、操弄這些機制的使用者，也就是所謂的科技菁英，而那些每天守著數字、跟著數字上下決定採用哪些資訊的媒體，便和單純使用者一樣，成了時間／速度政治下的末流，終究被資訊所宰制。

液態解蔽讓既有的原理原則不再穩定，固態時期「真相只有一個」這個信念，在液態社會變得可以協商，當然這不是否決真實的存在，而是真實被投入一個隨時生產、消費與重製的循環，在這種快速輪替中，假新聞、假事件就有了展演園地。以本研究案例來看，經過二十年，印尼華裔婦女受暴的假照片仍然出沒於網路，且頁面排序都在前端，這顯示在網路上清除「假」資訊非常困難，能做到的只是讓真與假的資訊並置。究其原因，在於目前篩選資訊的機制是科技運算本身，不是傳統具新聞價值判斷的人，除非掌握這些運算邏輯的搜尋引擎或社群平台，願意教導科技進行價值判斷，這或許是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From Red to “Pink”: Propaganda hip-hops, New Media and China’s Soft Power Pursuit

從紅到「粉紅」：「嘻哈」宣傳，社交媒體以及中國的「軟實力」訴求

韓莉 Han Li

美國羅德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東亞文學博士。現任：美國羅德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敘事理論以及傳媒及電影研究。在羅德學院任職期間一直擔任中文學科組的負責人，也是學校亞洲研究、性別研究以及電影研究委員會的成員。韓莉於 2015 年獲得 Asianetwork Annual Conference Amolozza Award。韓莉現為 2019 年亞洲研究學會東南年會的 Program Chair。

Abstract

A series of short videos from a mysterious Studio on Fuxing (rejuvenation) Road have accumulated millions of hits and invited heated discussions both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Since its debut with the video “How Are Leaders Made” in October 2013 to its most recent release celebrat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a, the studio has released more than a dozen videos covering topics ranging from the state policy,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s to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ravels. With its name alluding to Xi’s slogan calling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tudio and its productions speak volume of the party’s continuous efforts in re-defining its propaganda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This paper first situates the release of these “neo-Communist hip-hops” in the party’s dual publicity campaign – while Beijing mercilessly clamps down on dissidents (especially on social media), it is also actively re-inventing its propaganda apparatus to appeal to a young, mobile and global audience. This paper then conducts a close reading of respective videos on the legitimacy of Xi’s regency, China’s 13th Five-Year Plan, China-US relation and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OBOR) initiative, and examine the tactful mixing of pop culture elements and political messages. By exploring the dynamics between the videos, the platforms and politics, this paper seeks to demonstrate how these refreshed-looking PR productions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illusiveness of China’s continuous pursuit of soft power outreach.

研討會論文，非正式出版品。未經同意，請勿引用。

Please note: Conference papers are not formal publications. Please do not cite them without permission.

Introduction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fake) news and social media as well as their ramifications for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e critical examination. Interestingly, long before Donald Trump’s election campaign, scholars noticed that a new media propaganda campaign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consolidation of power. Soon after Xi Jinping took office in 2012, a series of short videos from a mysterious Fuxing (rejuvenation or restoration) Road Studio 復興路上 generated an astonishing amount of hits that invited vehement discussion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¹ From its debut video, “How Leaders Are Made” 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 in October 2013,² to its recent release celebrat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a (July 2017), the studio has released a good number of short videos on various media platforms addressing topics ranging from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eadership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PRC) state policy to Xi’s various diplomatic visits. The videos often feature uplifting tunes, catchy lyrics, cartoon characters on some occasions, and overall attractive aesthetic appeal. Such productions also signify a stark contrast from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CP propaganda, often noted for its clumsy and didactic approach. With its name alluding to Xi’s slogan calling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the studio and its recent portfolio of productions speak volumes of the party’s continuous efforts in re-defining its propagandistic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as well as Beijing’s quest to tap into youth culture in order to appeal to millennial cadr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mbiguity of soft power reception in China and situates the release of these “neo-Communist hip-hopera(s)” in the party’s dual propaganda campaign. While Beijing mercilessly clamps down on domestic dissidents (especially on social media) and dispel foreign cultural infiltration, it is also simultaneously and actively re-inventing its propaganda apparatus to appeal to a younger, highly mobile and global audience.³ The paper then conducts a close reading of selected videos on CCP legitimacy (especially, Xi’s regency), China’s developmental planning,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nd its efforts to enhance domestic cohesion, while examining the tactful mixing of pop culture elements and political messaging. By exploring the dynamics between the videos, platforms and ideologie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hese refreshed-looking PR products showcase both the effectiveness and elusiveness of China’s continuous soft power pursuit.

1 Contrary to the popularity of these videos, ver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Fuxing Road Studio that produced these videos. The name is read to refer either to Xi Jinping’s slogan on the nation’s restoration, or to the studio’s physical location on the Fuxing Road in Beijing, an avenue densely packed with government office building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tudio remains a mystery as it never provides credits for its crew. Yet, given its unambiguously pro-party message, its state-sponsored background is almost universally accepted. See Ma Yue, “Zhizuo chu “Shisan wu zhi ge” de “Fuxing lushang gongzuoshi” jiuqing shi yijia zenyang de zuzhi 製作出十三五之歌的復興路上工作室究竟是一家什麼樣的組織 [What Kind Organization is the Restoration Road Studio that Produced ‘the Song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Jiemian*, 1 Nov. 2015,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422847.html>.

2 The title of this video is clearly borrowed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novel,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3 Gerry Shih and Aritz Parra, “Chinese Propaganda Machine Places Hopes in Cartoon Rappers,” *Associated Press*, Mar. 6, 2016,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ba9fe2fca5f54bbf999e92366881921e/chinese-propaganda-machine-places-hopes-cartoon-rappers>.

The Ambivalence of Soft Power and Cultural Diplomacy in China

Soft power, coined by political scientist Joseph Nye in the 1980s, is defined as the ability to shape the preferences of others through appeal and attraction.⁴ In contrast with traditional hard (or coercive) power, soft power is noncoercive and relies upon the “attractiveness of a country’s culture, political ideals, and policies” for power of persuasion.⁵ The idea of “soft power” has been enthusiastically embraced by Chinese political officials over the past decade in accompanying the country’s quest to reposition itself in the global cultural-economic landscape while emerging as a rising global power.⁶ Soft power in this view is a means by which China can simultaneously achieve a ‘peaceful rise’ while allaying international skepticism and potential fear mongering. In 2011 as Xi Jinping was preparing to take power, the CCP’s 17th Central Committee already declared it a national imperative to “build our country into a socialist cultural superpower 文化大國.” In 2013 at the National Propaganda Convention Xi called to “be innovative about the foreign publicity campaign” and “to create new ideas, new categories and new narratives that can be appreciat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⁷ And in 2014 Xi reiterated that in order to enhance an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of the “Chinese Dream,” China needs to “to enhance the country’s soft power, to tell good Chinese stories and conduct better foreign publicity work 提升我國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外宣傳.”⁸ With Xi’s repeated references to the concept at a number of high profile meetings and significant public occasions, “soft power” has become an embedded concept in the CCP’s official lexicon. It is also quite clear that China’s soft power quest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trategic restructuring of propaganda strategy and practices, including inventing new narratives of and about China.

Along with the elevated discourse on increasing Chinese soft pow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massive “soft power” campaigns to influence global perceptions about China. Such efforts involve a number of elements, including hosting ‘mega-events’ (such as the 2008 Beijing Summer Olympics and the 2010 Shanghai World Expo), systematically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abroad (such as establish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worldwide), developing a stronger international media presence (such as launching billboard advertisements of China in Manhattan’s Times Square (discussed below), and pursuing foreign policies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country’s image as both a peaceful and responsible power.⁹ Compared to those one-time events,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4 First raised in 1990 in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the concept was further developed in Nye’s 2004 book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The concept is now widely used in discuss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x

5 Ibid.

6 Kingsley Edney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has been embraced by the Chinese leadership even more than in its intellectual home of the US. See “Building National Cohesion and Domestic Legitimacy: A Regime Security Approach to Soft Power in China.” *Politics: 2015 Vol 35*(3-4), 259–272.

7 “Xi Jinping: Envision big, control the main direction, focus on major events: strive to make the propaganda work better”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August 21, 2013,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821/c64094-22636876.html>.

8 “Xi Jinping delivered important speech at CCP foreign affairs meeting in Beijing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November 30, 2014, <http://cpc.people.com.cn/n/2014/1130/c64094-26119225.html>

9 Please Zhang Wanfa’s article “Has Beijing Started to Bare Its Teeth? China’s Tapping of Soft Power Revisited”, *Asian Perspective* 36.4 (2012): 623–626 and J. F. Blanchard and F. Lu’s “Thinking hard about soft power: A review and critique

partially due to the PRC’s enlarging global footprint spanning the past decade. Standing at the front of China’s global PR campaign, Confucius Institutes (modelled after foreign equivalents such as Germany’s Goethe-Institutes) are funded, staffed, and supervised by Hanban, a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y with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randed as educational institutes with a pedagogical focus on introduc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believed to be charged with diffusing pro-China ideologies and promoting China’s favorable image globally.¹⁰ In recent year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foreign education have led to serious concerns over controversial issues such as academic freedom, industrial espionage, the surveillance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citizens abroad, and the incremental and subtle advancement of a politicized pro-China worldview.”¹¹

While Nye’s original formulation of soft power mainly theorizes about a country’s foreign interactions, many scholars have noted that that in China soft power also maintains an extremely close relevance to domestic politics. Critics point out that Beijing faces a range of existential threats to “regime security” including challenges to the CCP’s core legitimacy, damning criticisms of governmental corruption, ongoing domestic instability and territorial-sovereignty issues (including the periodic insurgent attacks in Xinjiang, discontent in Tibet,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Hong Kong and de facto independence in Taiwan). In each instance, serious domestic weaknesses are exposed that potentially undermine China’s soft power strategy.¹² As Edney and Marr convincingly argue, in China soft power is not limited to only international image building but also has the potential to help the CCP solve an internal security predicament by enhancing regime legitimacy and national cohesion.¹³

Ye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efforts on exerting soft power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re conducted simultaneously with fending off the foreign soft power influences on various fronts, especially with the country’s youth.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norms and democratic values, often channeled through their economic power,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are viewed by the CCP as particularly pressing challenge for China. Therefore, while us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to promote a pro-China worldview, the CCP also call upon the millennials and students to resist what it perceives as 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 and pernicious Western cultural infiltration. Just last year, for instance, Xi called for “stepping up the ideology driv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¹⁴ In addition, Beijing also deliberately

of the literature on china and soft power, *Asian Perspective*, 36.4, 565-589 for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China’s soft power efforts. The other articles in the *Asian Perspective* special issue on China’s soft power also provide both substantial information and illuminating perspectives.

10 David Feith, “China’s Beachhead in American Schools,” May 26, 2014, <https://www.wsj.com/articles/david-feith-chinas-beachhead-in-u-s-schools-1401124980>

11 Ethan Epstein, “How China Infiltrated U.S. Classrooms,” January 17, 2018,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8/01/16/how-china-infiltrated-us-classrooms-216327> and Jennifer Hubbert, “Ambiguous States: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ese Soft Power in the U.S. Classroom,” *PoLAR*, Volume 37, Issue 2 (2014): 329-349 provide in-depth look into the history, expansion and controversy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12 Kingsley Edney,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Propaganda: International Power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hes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and his article “Building National Cohesion and Domestic Legitimacy” explain thoroughly the domestic challenges that Beijing is facing.

13 Michael Barr, “Nation Branding as Nation Building: China’s Image Campaign,” *East Asia* 29 (2012):82.

14 Te-Ping Chen, “China Steps Up Ideology Drive on College Campuses,” Sept. 25,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teps-up-ideology-drive-on-college-campuses-1506250801>

intervened “to resist the cultural infiltration of foreign hostile forces.” A highly alarming case was China’s censorship on peer-reviewed academic journals, particularly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P) incident.¹⁵ In August 201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P) removed over three hundred ‘politically sensitive’ articles from its prestigious journal, *The China Quarterly* after Chinese government censors threatened to block access to the website. Even though CUP later reinstated the articles, the move was met with outrage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beyond. Scholars and political pundits criticiz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its unprecedented extension of its heavy-handed censorship into foreign-language academia. CUP was also heavily criticized for acquiescing to the demands.¹⁶ At the same time, outside academia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control access to various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cracking down on online discontent and entertainment that strays beyond the narrowing bounds of an ideological acceptability. Chinese analysts and other elites believe that policies to increase China’s 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can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destabilizing cultural infiltration. Yet, these moves of state power inevitably harm Beijing’s own effort to promote a peaceful image.

Therefore, it is really against this complex Chinese soft power campaign that the Fuxing Road Studio videos should be examined. The majority of these videos are produced using English narration and/or English subtitles, clearly targeting the global audience and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educated Chinese millennials.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videos speak volumes of how the once-hidebound party PR apparatus has sought to revitalize its role amid challenges to its traditional authority as the world gets more mobile and more digitally connected. Sitt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tate ideology, pop cultural aesthetic and new media, this modernizing push shows how the Chinese party-state taps youth culture to hook millennial cadres by “updating its image for the social-media generation.”¹⁷

Demystifying Chinese Politics and Economy

As Nye defines, national soft power rests primarily on three resources: the country’s culture (in places where it is attractive to others); its political values (where the country lives up to these valu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ts foreign policies (when other nations see the country as a legitimate and moral authority).¹⁸ And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new PR video campaign unfolds around these three dimensions.

The groundbreaking video from Fuxing Road Studio was “How Leaders Are Made” uploaded in October 2013 and instantly becoming a viral sensation.¹⁹ Available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15 Please see Nicholas Loubere and Ivan Franceschini, “Beyond the Great Paywall: A Lesson from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na Incident,” 22 August, 2017, <http://www.chinoiresie.info/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hina-incident/> and Anita Chan, “China’s Foray into Academia beyond Its Borders,” 04 Sep, 2017, <http://www.chinoiresie.info/china-foray-into-academia-beyond-borders/> and Elizabeth Redde, “China’s ‘Long Arm,’” January 3, 2018,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8/01/03/scholars-and-politicians-raise-concerns-about-chinese-governments-influence-over> for reported increasing concerns about Chinese government influence over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U.S.

16 Around the same time of the CUP incident, *Springer Nature* censored some of its content in response to demands from Chinese export agencies. In addition to foreign academic publications in China, reports reveal that the CCP had ordered foreign-funded universities in China to install party units and grant decision-making powers to a party official.

17 Chun Han Wo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Extreme Makeover,” May 12,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xi-jinpings-extreme-makeover-1463069291>

18 Nye, 2004

19 Due to the nature of internet spreading, it is impossible to actually count the hits these videos received. The report and video

the 5-minute video uses cartoon images to compare the ways that lea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are selected. The video was groundbreaking in many ways, but particularly since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hinese president appeared in a cartoon image in a state-endorsed media. While the video seems to be an innocuous, fact-based introduction of differing political systems, the structure, narrative strategy and subtle, even hidden messaging merit careful examination.

First, it probably comes without surprise why the video juxtaposes the leadership selection method in China with that of the US and UK. America’s republican democracy and Britain’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with parliamentary-style cabinet remain cornerstones of republican governance. Thus, these two countries for various reasons are conventionally considered as the two of the most prominent examples of modern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e Fuxing video cleverly superimposes the head photo of then the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n a cartoon body while the narration states that the important criteria to become the U.S. president is having a “glib tongue,” “extraordinary stamina,” “and most importantly, “an unending flow of greenbacks” rather than demonstrated political achievement and established leadership credentials. The unmistakable joking tone, in the name of giving the video a lighthearted feeling, inevitably undermines the gravitas associated with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The introduction further compares electing the U.S. president (referred to a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Idol”) to the popular television talent show “American Idol,” further suggesting that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re merely popularity contests that have devolved into a nationwide entertainment carnival. In the same vein, the election of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is also compared to coronation of Susan Boyle, the middle-aged Scottish housewife whose became an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sensation in 2009 when she sang “I Dreamed a Dream” from *Les Miserables* on “Britain’s Got Talent.”

Interestingly, the Fuxio Road production narration takes a dramatically different approach when introducing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First, the narrator states that Chinese president is the leader of the ruling party, just like in the British case, conveniently omitting the fact that U.K. system features multiple parties while China a one-party state. Then,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systems, when introducing the Chinese presidency criteria, the emphasis is put on qualifications, competence, and experience. The narration claims that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 top leader like Xi is democratically open to anyone who is “excellent at what they do” (be it a college student, factory hand, technician, journalist, or teacher) leaving out Xi’s legendary princeling background.²⁰ Foregrounding a series of numbers that footnoted Xi’s ascendancy (for instance, he experienced 16 major job transfers and governed a combined population of over 150 million over 40 plus years), the video asserts that Xi’s presidency is solidly merit-based and experimentally-approved. Visually, the video appropriates a video-game design, making the message more visually straightforward and intuitive. As the cartooned young Xi Jinping leaps upwards in Super Mario style, audiences are inclined to be persuaded that his promotion is the result of a meritorious journey that saw him pass different levels of performance

in Chun Han Wong’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Extreme Makeover” offered an estimation of the hits that some videos got on Youku/YouTube.

20 I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that none of the characters used for the sample professions are female.

tests along the way.

After discussing the Chinese presidency, the video also introduces CCP’s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PSC), whose seven current members are also for the first time characterized in cartoon style. Attention to clothing details were paid as each of them is wearing different style clothing, ranging from a T-shirt to a sport jacket, to shirt and tie, to a casual vest. Compared to their images in almost identical, formal suits (especially in official media portrayals), the “relaxing, humorous, people-friendly image” defies the impression of stoicism, rigidity and uniformity that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high level CCP authorities.²¹ Eventually, accompanying the image of a fast expanding chart of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rom 1979-2011, the narration makes a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CCP leadership a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hence (ap)proving CCP’s legitimacy. Audiences also notice that instead of hiding the looming problems accompanying such explo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video preemptively raises 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statistic frauds due to excessive pursuit of GDP growth, while calling for increased governmental supervision. The take-home message is that every country should have its own path “as long as people are satisfied.” Throughout the video, the meritocratic screening principle and the performance legitimacy logic echoes the deeply-rooted Confucian meritocratic idea of “picking the worthy.” The assertion that different ways could all be legitimate not only reiterates the Confucian idea of “different but harmonious” but also seeks to undermine the discourse endorsing a Eurocentric mode of modernity and democracy.²² Although discussing a most sensitive political subject matter, the video deliberately makes itself de-officialized and causal, and seeking to use the power of language and narrative strategy to exert psychological persuasion.²³

If “How Leaders Are Made” seeks to de-code the CCP’s leadership system, then “*Shi san wu*,” a song about China’s 13th Five Year Plan, attempts to explain how national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are made. The video was released through state-run Xinhua New Agency’s Twitter account on October 2015. The choice of the platform implies that the content is specifically meant for an English-speaking international audience. The video features a traveling band of four American-accented animated characters on a Volkswagen bus gleefully singing and chit-chatting about China’s “*shi san wu*.” Similar to the title of “How Leaders Are Made,” China’s “Five Year Plan” bears a strong legacy of Soviet influence and socialist originality, which is yet again unmentioned in the video. The video comprises dazzling images and gratingly upbeat music. Even though the images used at some point could be (remotely) associated with the lyrical message, most of the time those images are abstract, isolated and out-of-context.²⁴ The

21 James Areddy, “Viral Chinese Cartoon Explains How to Become President,” Oct 17, 2013, <https://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3/10/17/viral-chinese-cartoon-explains-how-to-become-president/>

22 In June 2013 at a TED talk in Edinburgh, Scotland, Chinese venture capitalist named Eric X. Li gave a 20-minute talk “A tale of two political systems,” defending China’s one-party political system. The next year he gave a similar talk at NYU, lecturing “Why China’s One-Party Rule is better at Reform than Multi-Party Democracies.” Li praised the one-party state for its “adaptability, meritocracy, and legitimacy” and the key points of Li’s talks are striking similar to that of “the Leaders” video. Please see “When a TED talk is a propaganda tool,” 08.11.2013, https://www.salon.com/2013/08/11/ted_talk_is_propaganda_tool_for_chinese_communist_partner/

23 Shen Ping, “View point: Behind the Video How Leaders Are Made” 觀點：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視頻背後, Oct 19th, 2013,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_watch/2013/10/131019_view_chinaleader_video.

24 For example, when discussing who makes all the plans, the lyrics say “government ministers and think tank minds” and “party leadership contributing finds.” Along with these lyrics are cartoon images of Alberta Einstein, a glowing light bulb

pastiche of these grotesque images, accented by fast transitioning frames, mainly serve as an important visual stimuli. With limited substantial information offered regard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number “135,” intensified in various fonts, sizes, backgrounds, animation effects, and its Mandarin production “*shi san wu*” is reiterated a total of 28 times within a three minute span.²⁵ As David Ludden points out, rather than cognitive appeal, these videos seek effectiveness through the peripheral route - the psychologically persuasive means that resort to emotional appeals and sensory stimuli.²⁶ The catchy tune, high-tempo rap and choir singing creates an Involuntary Musical Imagery (INMI; or “earworm”) experience to make the audience remember “*shi san wu*” and even the Chinese official media jokingly calls it a “brainwashing mighty song.”²⁷

The slickly produced videos discussed here feature educational fast food on the PRC’s statecraft mechanism. For domestic viewers, the videos attempt to reinforce both the party’s legitimacy through emphasizing economic reform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s well as the CCP’s leadership role. For international viewers, these “neo-Communist hip-hoperas” seek to demystify the 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dels and make China understandable, and, hopefully, likeable.²⁸ The cartoon characters design elevates the heaviness “seriousness” of the subject and short video length are conducive for social media spread. Tactfully mixing pop culture, new media formats and party’s messages, these refreshed looking productions demonstrate that Chinese propaganda organs have been exploring innovative ways to transmit the latest raft of party slogans to a young, dynamic and global audience.

and a close-up of an eye, which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the idea of intellect, mind or illumination. These examples are only occasional in the video. Most of the time, images such as a rubber duck, disembodied lips, Mannequins, teddy bear heads, a mix-tape, a disco ball has no obvious relation with the meaning of the lyrics.

- 25 Apparently the mystery of studio caused all kinds of speculations and curiosities. Soon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shi san wu*” video, the Xinhua net (CCP’s mouthpiece) features an interview with some member of the studio crew and revealed more about their background. Be it real or fake, the action of putting forth the interview shows that the propaganda office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people’s reactions towards these new propaganda products. It is quite interesting that the interviewees of the Studio said they insisted on using the Chinese phrase “*shi san wu*” instead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The briefness of the original phrase might be one reason for this choice.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seems like the video wants to showcase that this mode of making developmental plan is a unique Chinese way that not only should it not be pigeonholed into any Western taxonomies, but also the West should know it by its real, authentic name. The crew also revealed in this interview that the song composed for this video is “Funk style” (a music genre that is rhythmic, danceable through a mixture of soul, jazz, and rhythm and blues) and the colorful, grotesque pastiche meant to be “nostalgic Pop Art” style. See “A mighty song warms up *shi san wu*, refreshing netizens’ understanding of Main Melody” Oct. 29, 2015, 神曲暖場“十三五”刷新網民對主旋律認知”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5/10-29/7595985.shtml>, and Xinhua News Agency, “Who’s behind the ‘*Shi san wu*’ video and things you most want to know,” November 2, 2015,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5-11/02/c_134775962.htm.
- 26 David Ludden, “The Rapper and the Policy Wonk: Rebrand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rough Music Video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utheast Conference of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in January 2017.
- 27 INMI describes the experience whereby a short section of music spontaneously, repetitively sound in the absence of an external source. Beaman, C. P., and Williams, T. I. (2010). “Earworms (stuck song syndrome):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intrusive thought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1(4), 637-653. The “brainwashing mighty song” was quoted in BBC’s report of this video, see Mi Yun, “the pop song ‘*shi san wu*’ shows China’s new PR attempts,” 十三五之歌流行，中國外宣新嘗試， Oct. 28th, 2015,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10/151028_13th_five_year_plan_video
- 28 In addition to this “*shi san wu*” video, another English-language video titled “the Real Kung fu of Chinese Economy” (released April, 2016) also uses cartoon video to explain the new strategies that China is using to deal with the “new normal.” The video employs Daoist ideas such as “retreat to move forward” “Perseverance ensure success” “learn when to move and when to wait” to explain the slowing dow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a euphemism and call for “perseverance” for future success.

Friends or Foe? Softening the China Threat

If the two videos on China's leadership and economy seeks to account for "China's rise," then the "Following Xi Dada" video series seem to tackle the follow-up issue "what China's rise means for the world." Reducing the feeling of "China threat"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cited reasons for Beijing wanting to increase its soft power. As Li Ma puts it, "soft power is "primarily utilized to refute the 'China threat' thesis, facilita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domestic socio-economic reality, and persuade the outside world to accept and support China's rise."²⁹ Gary Rawnsley also notes that China's soft power strategy has been prompted by the emergence of a 'China threat' discourse in the West and therefore China's soft power can be seen as "not only reactive, but defensive."³⁰ In 2013 the propaganda group rebranded Xi Jinping as "Xi Dada" 習大大 (Big Uncle Xi) and created a series of short videos titled "Following Big Uncle Xi Around" 跟着習大大走 that accompany Xi's diplomatic visits 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attendance international meetings. The first video in this series came up in 2013 before Xi Jinping attended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Known as the "Asian Davos," BFA hosts forums for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academic leaders in Asia with the purpose of countering the Western-centered development model and world order. This animated video features a warm male voice introducing Xi's purpose and activities at BFA, underlining China's commitment to Asia. The vision statement that "China will accelerate its harmonious cooperation and co-existenc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areas" preview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and the Silk Road Fund, crucial elements for achiev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in Asia. It is also in this video that "Xi-style" (branded as "firm, warm and affectionate" was as first officially introduced by an official media outlet.³¹ The family member-like title as well as the warm and "down-to-earth" image humanizes Xi as he wages an intense battle against dissidents within the party and clamps down on numerous civil society factions.³² In addition to this video that foregrounds China's geopolitical interests in Asia, the next one in the series, "Following Big Daddy Xi to the Bandung Conference" 跟着習大大走之萬隆篇 commemorate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considered the major gathering of Asian and African leaders when was held for the first time 60 years ago in Indonesia. Appropriating historical black-and-white film footage from the previous conference, the video seeks to invoke the shared memories of the "humiliated past" of China and Africa and advocates that the two must go together in order to go far.³³

29 Li Ma, "Soft Power in Chinese Discourse: Popularity and Prospect," in Li Ma, ed., *Soft Power: China's Emerging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31.

30 Gary Rawnsley, "Approaches to 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Volume 18.2, 2012: 126.

31 Fu Shan, "The cartoon video on Xi Jinping's appearance in is another" 习近平博鳌动画视频：复兴路上工作室又一力作" March 25, 2015,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4791

32 While branding Xi Jinping as "Xi Dada" is vehemently welcomed by the "Little Pink" (discussed in conclusion part) in China, a video titled "Who is Xi Dada?" means to demonstrated how "popular" Xi as a leader is among young foreigners students. In this video,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various counties share their love for "Xi Dada." Please see Emily Rauhala, "China's President Xi is 'so cute,' says world's creepiest propaganda video" September 23,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5/09/23/chinas-president-xi-is-so-cute-says-worlds-creepiest-propaganda-video/?utm_term=.6601dfe8f461

33 Before Xi's visit to Pakistan, a video "Following Xi Dada: before his visit to Pakistan" was also released. But this video is more of a documentary style clip of the life of Pakistan students in China.

But the most telling examples are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employed in the video “Following Xi Dada to Russia” 跟着習大大走之俄羅斯篇 (May 2015) and “Following Xi Dada to the US” 跟着習大大走之美國篇 (September 2015), each timely released prior to Xi’s diplomatic visits to each country. China’s post-Cold W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two superpowers remains crucial to ensur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global interests. The video on Russia begins with montages of spring scenes with colorful blooming tulips, relaxed crowds in the park and energetic, active young people engaged in recreation. Accompanied by joyful music, this opening establishes a lighthearted and uplifting tone for the rest of the message. The montage of Russian restaurants, business interests and cultural event posters suggests the presence of Russia in Beijing’s urban life and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main part of the video features snippet interviews of people of mixed ages and genders sharing their impressions of Russia and Putin. Among the responses, naïve answers from kindergarten children (“My world map puzzle has Russia”) and the candid, if not superficial ones from teenagers (“full of beautiful girls” “blonde, green-eyed, long-legged” all try to make the interviews sound genuine, authentic, and disarming. The interviewees’ impressions of Russia include references to cultural symbols such as vodka, rye bread, Tchaikovsky, to the Patriotic War, the 2016 World Cup and the Yota smartphone. These carefully arranged responses praise Russia’s time honored musical, literary, architectural tradition as well as its modern da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he 60-something Beijing woman speaking fluent Russian alludes to a comrade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during the socialist time, while the young men’s fond recollection of Russia’s influence on their daily lifestyle speaks volumes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day. The interviewees’ “message for Putin” is especially meaningful, as the masses’ attitudes towards Putin can also be read as indicator of Chinese people’s opinion of “strong man leadership.” The ladies at senior choir club comment on Putin’s handsomeness, coupled by the lighthearted laughter in the background that seems to be a casual comment and thus makes the interview seem less formal or planned. Yet, suggestions to “build a Moscow-Beijing speed train,” “waive the visa,” “lower natural gas prices,” “simplify the procedures for mutual visitations” and “facilitate entrepreneurial investment in Russia” all point to the core interests in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Claiming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lways beholding good intentions towards its neighbors,” the video concludes with the choir club singing “Katyusha” in Russian, a melancholy song combining patriotism and romanticism that remains quite favored in China. The music soon seamlessly converges with a masculine Russian tenor, forming a harmoniously duality.

The video excels in its deliberate planning as well as the very efforts to conceal this deliberation. For example, even though none of the interviewees are identified in the video, their social class statuses were clearly indicated through each person’s clothing, accent, and surroundings. Even their comments are crafted to be most appropriate for their social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One could easily see that the interviewees range from college student, office clerk, neighborhood grannies, to retired intellectuals and a business executive. This careful selection achieves the effect that people from all different fronts of China came forward to voice their connection and sentiments about Russia. The video also excels in its artificial spontaneity that is rhythmically inserted in the video to alleviate the potential contrived-ness of the interviews. Therefore, the subtle but powerful messages are conveyed in a seemingly de-formalized style.

If the Russian video mostly featuring Chinese people one-sidedly speaking about their social-cultural connection with Russia, then “When China Met Carolina” features Americans commenting on what the video claims as the China-US economic mutual enrichments. Compared to the anonymity in the Russia video, the Americans speaking in the video are all identified as local authorities, business owners, company heads and employees in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 conveying an authenticity and truthfulness to their testimonies. Over acoustic guitar music the video begins with beautiful shots of working class in China and America and a fast-transitioning view of urban and industrial landscapes with cargo, factories, inventories and construction sites. The first two American interviews raise two seemingly separate points. First, the Secretary of South Carolina’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eclares that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 are based on family values. Second, an American businessman claims that if China wants to hold on to the foreign market, its companies have to go to that market and learn that market. The video then cuts to a Latino clerk (a member usually perceived to be a disadvantaged minority most vulnerable to economic recession) who preemptively voices one of the greatest fear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that a Chinese company who purchased the American company will either “bring their people in and exclude us” or “move the manufacturing to China.” But “thanks to Jeff,” this employee’s nightmare didn’t happen.³⁴ The homey atmosphere and the close ups of the smile on her and her grandchildren’s faces suggesting that the Chinese investments are benefiting the US economy at both the micro and macro levels.

From there the video switches the perspective to the Chinese side. First, the self-introduction of Jeff Chee, Founder and CEO of TDC Cutting Tools Inc, and owner of Greenfield Industries, is worth noting. Adopting an English first name and modifying the spelling of his last name from Qi to Chee for easy pronunciation, this mid-aged Chinese CEO states that his English name was given by an American teacher during his college time and he is now using this name around the world. This statement echoes the theme of the video –that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re mutually beneficial. “Jeff” benefited from the English training and American education, which is part of his new identity and he is now using this refashioned, internationalized identity to expand his business globally. Cross-cutting with Jeff’s interview are image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mployees’ effective cooperation in the factor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video features the story of Jimmy Lee, the Chinese owner of Tides & Times Group, a lumber and log shipper headquartered in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Facing concerns that the Chinese will “steal” the jobs or move the production line to China, the second half of the video provides another convincing reason that “Made-in-USA” products are valued higher in the market. This reason, at the price of self-deprecatingly admitting the inferiority of Chinese manufactures, seeks to assure everyday Americans that the manufacturing line will remain in the US and thereby alleviate any potential anxiety.³⁵

As analysis shows, both parts in this “China meets Carolina” video were sophisticatedly scripted.

34 Top-eastern Group,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twist drills from Dalian, China, bought Greenfield in 2009 and saved it from bankruptcy. Since then the company’s employees also doubled.

35 Zheping Huang, “Working for a Chinese boss is great, ordinary Americans explain in this slick new pro-China video,” September 21, 2015, <https://qz.com/506651/working-for-a-chinese-boss-is-great-ordinary-americans-explain-in-this-slick-new-pro-china-video/>

In addition to directly answering the most concerning questions, the narrative subtly displaces business maneuver with familial interaction. Stating that people in China and America share similar family values, the video implicitly concludes that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values leads to long term gains for both sides. Moreover, the “performance legitimacy” logic seen in the “Leaders” video is appropriated again in this video, expect this time it is the American employees stating that “as long as you keep the economy going, it does not matter who is the boss.” As Nye argues that soft power strategy is intended to make the country’s hard power look less threatening to its neighbors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video clearly seeks to counteract the “China-threat” discourse.³⁶

Advocating the “Chinese Dream”

In addition to its international soft power outreach, national cohesion and domestic security are also areas targeted by China’s soft power campaign. The domestic soft power campaign is intimately related Xi’s core ideology as encapsulated by the “Chinese Dream 中國夢.”³⁷ Officially pronounced in November 2012,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Dream” combines a discourse of national strength and prosperity while advocating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great Chinese nation.

In December 2013, a Fuxin Road Studio video titl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with You along the Way” 中國共產黨與你一起在路上 spread throughout social media. The video is narrated in English with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subtitles, clearly targeting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udiences. In this video promoting the idea of “Chinese Dream,” common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farmers, factory workers, small business owners, retirees, children, dancers, bar-tenders all speak of their small dream for “a pretty wife,” “starting a small diner,” “good harvest,” “more pension,” and “bluer skies, cleaner water.” Following these expressed dreams, the video concludes with the assertion that the people’s dreams are CCP goals. The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historic site of the CCP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a deep male voice claims that “80 million CCP members are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on their road chasing their dreams.”

The video is considered by foreign media as “the party’s latest, slickest attempt to explain itself to the broader world.”³⁸ Two aspects are extremely striking about this video. Firstly, in 2011 when Xi’s predecessor Hu Jintao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a 60-second piece called “People” was played over the mega screens in New York’s Times Square. As China’s first national image film, this video highlights

36 Another area where Beijing invested heavily for propaganda purposes i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e most influential videos in this regard include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with the English word “how” serving as a pun for the Chinese word “hao” (good) and where a group of children of different colors and nationalities rap about the benefits of the initiative). In addition, the “Belt and Road Bedtime Stories” series features an American journalist father who explains in extremely accessible language w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ntails. Rather than mentioning anything about how this largest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mega-projects in modern history would serve China’s push to re-shape the global trading network and enable China take a more influential role in global affairs, the video focuses on how BRI will “break barriers” and “bring joint prosperities” to the world.

37 Callahan, W.A,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 China: The Negative Soft Power of the China Dream,” *Politics* 35 (3-4), 2015: 216–229.

38 Heather Timmons and Gang Yang, “A mysterious video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Chinese Dream to the world,” January 01, 2014, <https://qz.com/162694/this-mysterious-video-attempts-to-explain-the-chinese-dream-to-the-world/>

prominent Chinese figures (with their names written in English next to them) from various scenes of Chinese society (including culture, art, sport, science, business, entertainment, agriculture, space travel etc.) standing and smiling at the camera. As “one of the most ambitious and highly publicized attempts to enhance the image of China in American minds since the 2008 Olympics,” the film received tepid and highly ambivalent feedback.³⁹ While Chinese domestic audiences see the video as a demonstr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decades and a source of national pride, Western critics contend that the demonstration of China’s “material strengths” might not assuage American concerns over a rising China and hereby cause a negative impression among Americans.⁴⁰ Further, even though the on-screen talent featured in the film are pinnacles of their fields and household names in China, very few of them (other than Yao Ming and Lang Lang) are likely to be identifiable by American viewers. Plus the elitist overtone also likely distances Chinese audiences from being able to relate to them.⁴¹ In this sense, some American critics considered this advertisement “a major flop.”⁴² With this historical lesson in mind, the featuring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video is clearly a deliberate choice to make the film’s message relatable to the masses.

Secondly, this strategy adopted in “CCP Is with You along the Way” video bears an uncanny and astonishing similarity to Hillary Clinton’s video (during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released in April, 2015. Clinton’s campaign rollout video features personal stories of common Americans of various racial, ethnic, sexual, and marital backgrounds stating they are getting ready to start something new. Among them, Hillary Clinton brands herself as a grandmother rather than a politician, and trumpets herself as ready to start something new for the “people.” As critics pointed out, compared to her self-centered, statements-filled campaign video from her previous White House bid, this video humanized her and make her eminently relatable to voters. Predating Clinton’s video by two years, the CCP video is certainly not a copycat, but this only makes the similarities more striking. The changes to both the US and China videos suggest that the top-down, didactic and “distanced” mode of propaganda has given way to more inductive, interpersonal, and subtle form of persuasion.

However, the problem of the “Along the Way” video lies exactly with its use of common people as representatives. The video begins with what Barr terms as “tourism promotion” plus “investment promotions” that displayed Chinese monuments and traditions as well as the metropolitan skyline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s to signify Chinese tradition and modern development.⁴³ The miracles, as stated in the video, are credited to the collective strength and ingenuity of 1.3 billion Chinese people. From there, the video states that “on the road chasing our dreams, the 80 million party members are with you

39 This national image film campaign includes a 17-minutes documentary and a 60-second and 15-second ad. The 60-second ran 300 times a day across six giant screens in Times Square in New York for one month, and the 15-second version of this video was aired on several international news networks over a multi-week period. See Barr, 2012. For the video, please see: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1/01/18/pro-china-ad-makes-broadway-debut/>.

40 Christopher Heselton, “The PRC and PR: Baffling Messages in Times Square?” January 24, 2011, <http://www.thechinabeat.org/?m=201101>

41 Barr, 2012, 87-88.

42 Heselton, 2011. Despite the poor reception of this video, the big screens at Time Square later were used again for exhibiting promotional videos of Chinese culture.

43 Barr, 2012, 87-88.

along the way.” This inevitably leaves viewers wondering how that logic was achieved. The fallacy is in the fundamental ideological (in)compatibility of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Roman Szporluk convincingly demonstrates the competing history of nationalism and Marxism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in the modern era since the former called for allegiance to the nation as opposed to social class. Despite that, the CCP’s discourse now constructs its legitimacy with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predicament still persists in this video, which clearly resorts to national pride by invoking all kinds of geo-cultural symbols. Yet, nowhere are the party’s values clearly stated nor are meaningful connections made with the audience. To artificially deliver the connection, at the end of the video a red seal of the CCP flag is mixed with the other traditional symbols over a flashing image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onuments, a site that ambiguously blurs the boundaries of party, state and nation.

Interestingly, a similar issue is essentially repeated in “Who Am I” 我是誰, a video commemorating the CCP’s 95th anniversary. The video utilizes a first person narrator, voicing over images such as a young female teacher turning off the classroom lights before leaving, a woman sweeping the street at dawn, a doctor dosing off after an exhausting surgery, and a police officer directing traffic in heavy rain. At the end of the video, these “I”s declare their identity as CCP members, claiming that “we are always with you.” The narrative and logical inconsistency lies in that the video once again displaces professional dedication and contributions with party ideology, suggesting that these ordinary people were only able to do these “extraordinary” things because of their party member identity.

Conclusion

As scholars and critics have observed, the new media in digital era has substantially changed both the game of global politics. Traces of such contestation are evident in recent global events such as ongoing controversies associated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the 2017 Brexit vote, and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t and nationalist political parties across Europe. Further, the lines between cyber-nationalism and digital activism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blurry. Videos examined here showcase Beijing’s awareness of the new game as well as its efforts to refashion propaganda content and style to better reach targeted audiences. As shown above, the propaganda videos clearly, but subtly seek to justify and reinforce the CCP’s legitimacy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y seek to demystify the CCP leadership mechanism, account for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downplay the “China threat” discourse and try to “harmonize”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major world powers. These videos seeks to humanize national leaders traditionally distanced from the masses and make such leaders appear to be relatable by crafting their individual charisma. The videos also discard the old-fashion and straightforward teaching mode, while turning to new media to embody “soft diplomatic strategies.”⁴⁴ One of the reasons David Shambaugh asserts that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hinders* its soft power is that China’s propaganda work “remains clumsy, rhetorical, propagandistic, and relatively unsophisticated.”⁴⁵ These videos demonstrate changes in the CCP’s soft power strategies and collectively provide a strong

44 Zheping Huang, 2015.

45 David Shambaugh, “China’s Soft-Power Push: The Search for Respec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5: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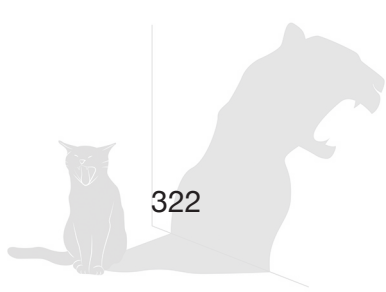
rebuttal to Shambaugh's criticism.

However, beneath this surface effect, the changes observed in these videos do not necessarily resolve the discrepancies in China's soft power campaign. Nye's "soft power" is a multi-faceted, multi-layered, all comprehensive campaign that goes far beyond state-initiated efforts. In the US context, in addition to Washington, companies, foundations, universities, churches, and other American civil society institutions actively promote and spread U.S. values and help attracting partners and supporter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state-sponsored and even state-produced soft power devices examined here reveal only top-down patriotic initiatives. But do such efforts achieve the goals they seek to reach? What other non-state parties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participate in this redefined cultural campaign?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re still unfolding and merit future consideration. However, even a cursory look into a "bottom-up" rap video and the "Little Pink" cyber-nationalism associated with it might show how the "red" has blazed into a shade of pink.

In 2016 a video "This is China" from CD REV, a Chengdu rap group quickly racked up tens of thousands of likes and shares after it was posted on a Weibo account. In this video, the young group raps fluently in English about the grand achievements, while acknowledging issues such as pollution, food safety, development imbalance, and social disparity that come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The acclamation for national pride may not be anything new for soft power outreach. However, the outcry attacking the foreign media's prejudice against China and vows to let the world hear the real voice of the country demonstrates a clear awareness to seize the discourse power.

CD REV can be categorized as a patriotic young Chinese group vocal about their strong affections for their motherland. As this group's popularity is explosively growing, they were also collectively (im) famously nicknamed "Little Pinks." The "Little Pinks," who often use the internet as a battleground for patriotism, focusing on pop culture to whip up and received highly controversial interpretations. On the one hand, some regard the "Little Pinks" as modern-day Red Guards, and their cyber nationalism as irrational and superficial mopping. However, the state has recognized this new generation of nationalists and rendered the status of "Little Pinks" as a badge of honor.⁴⁶ Although many intellectual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Little Pinks" has become appropriated by different groups with competing agendas, the endorsement from the Chinese state for the "Little Pinks" phenomena presents a window into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new media, popular nationalism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guiding public opinion. In this perspective, dynamic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 and negotiations become a prism through which China's pluralized soft power arsenal can be examined.

46 Please see the following articles for examination into the "Little Pink" phenomenon: Rongbin Han, "Defending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nline: China's "Voluntary Fifty-cent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Cambridge Vol. 224, (Dec 2015): 1006-1025; Kecheng Fang and Maria Repnikova, "Demystifying "Little Pink": Th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a gendered label for nationalistic activists in China," *New Media & Society*, 9 Oct 2017: 1-24. Shaohua Guo, "Occupying" the Internet: State media and the reinvention of official culture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vol. 3, 1 (2018): 19-33.



Political Smear Campaigns in the Internet Era

網絡時代的政治抹黑行動

Ondřej Klimeš 林昂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捷克查理士大學亞洲歷史與文化博士。曾任：布拉格查理士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現任：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的研究員，同時也是該所設置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臺北中心現任執行長。研究主題包括當代新疆政治、維吾爾民族運動、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操作及宣傳等。

Abstract

False accusations and public defamation were often used techniques to eliminate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Maoist China, for instance during “struggle sessions” of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1957–1959)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In the new millennium, burgeoning internet and new media have enabl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employ various actors to use similar manipulations in innovative ways. Such agent are the government “internet commentators”, also known as the “Fifty-Cent Party,” who disseminat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seudonymous and deceptive posts per year, thereby distracting the public and shifting the discussion from controversial issues to affirmative topics by praising the party, its accomplishments, and other symbols of the regime. Another known examples are smear attacks on Chinese journalists, political activists, and other proponents of civil rights based abroad, who have been increasingly subjected to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campaigns” since 2012, when articles and doctored photos are publicized online and circulated via email groups, falsely accusing them for instance of illicit sexual behavior, prostitution and offering sexual escort services, spying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embezzling political dissidents’ funds. The attackers have also disabled their targets’ IP addresses by DDoS attacks, defamed them through fake social media accounts, and harassed them by automated anonymous phone calls, phishing, or account hacking. This paper examines in closer detail how the smear campaigns have been used by the regime and its sympathizers against their political oppon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first term of the Xi Jinping era (2012 – 2017). It contributes to the broader discussion of how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arty-state us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liminate political criticism and enhance its control of public opinion and discursive space.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 Jinping, media, civil rights, smear campaign

研討會論文，非正式出版品。未經同意，請勿引用。

Please note: Conference papers are not formal publications. Please do not cite them without permission.

Introduction

Since 2016, the results of manipulated popular votes and elec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the US, Franc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other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have prompted an upsurge of attention paid to disinformation, fake news, media manipulation, and related hybrid tactics used by various actors to influence domestic public opinion, elections, or decisions by policy makers. Throughout past months, the interested public, security agencies, researchers, and media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trying to uncover the actors who use disinformation, the ways they do so, what aims do they pursue, and how can the targeted groups prevent the effects. The problem's relevance is exemplified also by the fact that the term "fake news", defined as "false, often sensation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ed under the guise of news reporting", was named the most used word of the year for 2017 by the Collins Dictionary after it experienced a 365% yearly increase in use (The Guardian 2017). Truthfulness and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re clearly some of the essential criteria to be examined when looking at re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era, as disinformation and the similar hybrid tactics can obviously be abused to the extent of severely undermining the fundamentals of socio-political order.

Control of media, education, culture, and other processes is one of the vital strategies also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where citizens' perception is one of the key variables condition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 number of recent studies of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in the PRC illustrate that the party manages to remain at the helm firstly due to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legitim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covering material interests of the population, implementing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s, providing public goods, embracing of political values conducive to preserving power (nationalism and traditionalism), and co-optation of elites. Altogether, these tactics generate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regime (Dickson 2016). Other studies attribute the resilience of China's authoritarian regime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vernance (Nathan 2003) and to the party's ability to manage or adapt to the ongoing domestic transformations and global trends (Heath 2014, Wright 2015).

Secondly, the CPC's survival is conditioned by repression of political opposition. Although applied more selectively than in the past, repression has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under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since its assumption of power in 2012 (Dickson 2016, 31–95). The current leadership builds firstly on "traditional" low-tech solutions to the dissent problem, which include promulgation of restrictive laws and regulations, elimination or arrests, detentions, sentencing, or human surveillance of dissidents, physical disrup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tactics (Chase and Mulvenon 2002, 49–63).

Secondly, since the late 1990s the burgeoning internet and new media have enabled the CPC to expand its high-tech measures of political repression. Substantial research has dealt with the various passive means through which the authorities seek to control and censor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Chase and Mulvenon 2002, 63–84; MacKinnon 2012, 31–74; King et al., 2013; Roberts 2018). Although the public sphere has emerged in part inadvertently as a result of the party's internet policies (Lei 2018), the party manages to stay in firm charge of media, the internet, and other ideational realms (Repnikova 2017, Cao et. al. 2014).

This paper summarizes some of the active high-tech disinformation and manipulation measures used by the authorities in the Xi era to eliminate political opponents. It focuses on smear campaigns

and character assassinations waged on the internet and through other new media against civil society, for instance activists, lawyers, journalists o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mear has been broadly defined as “an effort to manipulate opinion by promulgating an overblown, scandalous, and damaging narrative”, which aims at destroying ideas by ruining people who are most effective at communicating them (Attkinson 2017). In the present case, smear campaigns and character assassinations are understood as an effort exerted by the authorities to manipulat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opinion about the CPC’s political opponents by promulgating overblown, scandalous, and damaging narratives, which are completely or partially false, in order to destroy ideas that are potentially politically-destabilizing with possible mass-mobilization implications. The presented overview of recent smears is situated within a broader context of the Xi leadership’s governance.

Early digital era disinformation

The current active high tech techniques used by the Xi leadership to discredit political dissenters build on strategies employed by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One early study (Chase and Mulvenon 2002) of how the CPC used the newly emerged internet to eliminate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1990s and early 2000s outline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1) *Denial* involves negating critical views by official propaganda. Internet enables setting up websites supportive of Beijing’s official line and denying the accounts of Chinese rights abuses alleged by internation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se propaganda outlets focus on the most controversial topics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Chinese regime and its critics and contain government document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including articles from the state-run media and legislation. Apt examples are the websites China Human Rights (www.humanrights-china.org) and China’s Taiwan (<http://eng.taiwan.cn/>).

2) *Passive disinformation* often reacts to specific ongoing controversies. The study exemplifies this technique by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Falungong in late 1990s, whe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established a propagandistic website denouncing cults and exposing their harmful activities.

3) *Active disinformation* involves so-called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by *smear campaigns* aiming at public disgracing of the target person in order to incapacitate his potential for group mobilization. Falungong members reported receiving fake emails from legitimate addresses, which were spreading prefabricated articles allegedly authored by Li Hongzhi, the leader of the Falungong. The authorities have also used the internet and human agents to spread rumors aiming to confuse and fragment the dissident community. These happened in the form of accusations posted on virtual bulletin boards and chat rooms, and mainly hyped false accusations that dissidents are paid agents of China’s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These slander campaigns have been judged as successful by the dissident community, because they managed to create substantial inner discord within the dissident community.

Furthermore, the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technique was found to be often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forms of harassment via the internet or new media. For instance, one victim from 1998 related that public security officers used the names of fellow dissidents to page him and leave return numbers that

were non-existent or were of hotels, karaoke bars, and hospitals. Security officials also flooded his fax machine with large numbers of blank pages. Another harassment technique was flooding email addresses by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emails, making it impossible to use the internet for communication. A similar strategy is flooding web pages with requests from non-existent IP addresses, which prevents other users from accessing the site (Chase and Mulvenon 2002, 84–86).

The Xi era smears

The first term of the Xi leadership (2012–2017) has brought forth a severe crackdown on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ies, as well as on civil rights defenders, such as journalists, lawyers, and activists. Moreover, under Xi the CPC has made further progress in employing the internet and other cybernetic means to maintain the regime’s security. One recent research into active high-tech measures has also shown, for instance, that the Chinese regime employs so-called reverse censorship, i.e. solicits online commentators, known as the “Fifty-Cent Party” (*wumao dang*), or relies on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engage in online discussions. In these efforts, the regime adopts two main complementary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dissenting views and potential for collective action. One is the 50c’s *refraining from controversial issues, i.e. abstaining from placing posts supporting, or from censoring posts critical of, the regime, its leaders, or their policies*. The other is the active measure of stopping discussions with collective action potential by censorship and by distracting the audience and diverting the discussion to a different topic, which is favorable for the authorities (King 2017).

In the Xi era, another frequently used disinformation and manipulation strategy are smear campaigns and character assassinations targeting political critics and dissenters. An exemplary case is that of Murong Xuecun, an outspoken influential critical writer who became a target of a smear campaign in August 2014. A series of articles titled “The Past and Present Life of Murong Xuecun” was published on several influential overseas websites and accused Murong of serious offenses and immoral behavior, such as child molesting, sexual misconduct, home battery or even plotting to blow up the Beijing airport. Links to these articles were also distributed via Twitter and retweeted more than 1000 times. The smears were likely written by a single team with fervently nationalist attitudes, and articles of similar style and content had been used earlier that year to dishonor other Chinese dissidents (Murong Xuecun 2014).

Smear campaigns also target naturalized foreign nationals of Chinese origin, often in combination with harassment via phone or email and cyberattacks on personal websites and email addresses.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case is that of Zang Xihong (also known under her pseudonym Sheng Xue), a Chinese journalist who moved to Canada after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She had been a correspondent for Radio Free Asia and a democracy activist, who received several prizes for her writing. Since 2006 and intensifying since after 2012, she has been subjected to an online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campaign” through false stories accusing her of numerous sexual liaisons, prostitution, spying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mbezzling political dissidents’ funds, and even intimidating a person with cancer. These articles have been posted on multiple websites and distributed through mailing lists. Sheng Xue and her husband have been subscribed to email groups that they could not unsubscribe from, which made them involuntarily receive these smear materials. Doctored photos of her and fake advertisements for escort

services under her name have been widely circulated, and her website has been subjected to distributed-denial-of-service (DDoS) attacks (Siu 2016). Similar harassment and smear campaign has been waged against Wen Yunchao, a reporter and blogger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Wen’s case included DDoS attacks, phishing, hacking, and exposing private information about his family (Wang 2016).

A smear campaign was staged also against Lam Wing-kee, one of the five Hong Kong citizens involved in politically sensitive book business who had been kidnapp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in late 2015. Upon his release back to Hong Kong in June 2016, Lam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where he described the details of his kidnapping and detention, including being forced to make a “confession” to his “crimes”, which was then broadcast on Chinese television. After the press conference, his girlfriend, ex-colleagues, and various officials labeled him a liar with the obvious aim to refute his claims (Sala and Timmons 2016).

Another hybrid disinformation technique are forced and publicized “confessions”. This technique is a recent innovation of public self-criticism, which frequently featured i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Maoist era, where it was regarded as a repentance for alleged political “sins” (e.g. Bao and Chelminski 1976). This psychological technique combines intimidation, blackmail, ideological reeducation, public disgrace, mass manipulation, lynching, and exemplary warning. Often, self-criticisms were part of mass “struggle” sessions which resulted in violence or death of the “victim”.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llows the authorities to significantly boost its disinformation impact. The “confessions” are broadcast on state TV, but are also preserved on official websites and disseminated by aggregators and other online media. From July 2013 to April 2018, at least 45 televised “confessions” have been made, some of them by foreign nationals trapped in the PRC security apparatus. Research and reporting has shown that these statements are routinely forced and extracted through threats, torture, and fear, and that they are meticulously rehearsed and staged. The “confessions” are used as a propaganda technique targeting domestic audiences and featuring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 main disinformation strategy of the “confessions” is the so-called 3Ds, i.e. *deny* criticism of China about the conditions of the detainee, *denounce* the actions of oneself, an organization, or a country, and *defend* the CPC’s and other authorities’ actions (Safeguard Defenders 2018).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cases was that of Gao Yu, an influential journalist and public intellectual. A veteran critic of the regime, she had been detained and imprisoned for several times since June 1989. On none of these occasions, she had never confessed to any crimes. Now in her 70s, she was arrested again in April 2014 ahead of the sensitive Tiananmen massacre anniversary and made a televised “confession” shortly after the detention. She was sentenced to seven years for “illegally leaking state secrets to foreigners” in April 2015, the basis of her “crime” being sharing a sensitive document to a foreign journalist at a moment when it had been already published online. Gao Yu made a second televised “confession” in November 2015, hours after which she had been granted medical parole. In another words, the regime conditioned her parole by her publicly confessing to prefabricated crimes.

Another case is the trial of influential Uyghur public intellectual and activist Ilham Tohti. Ilham, who is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Central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in Beijing, had long been a critic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in Xinjiang and a founder of a web medium, which brought reporting and analysis

of various Xinjiang issues (Uyghur Online – 维吾尔在线; www.Uyghurbiz.net). After being detained several times and harassed by the authorities, Ilham was finally detained in January 2014 and imprisoned for life in September 2014 on charges of “separatism”. Confessions of three students of Ilham’s, in which they “testify” against him, were used in the hearings during his trial and broadcast by the state television. The students stated that Ilham had allegedly pressured them into working for his website and hyping up ethnic tensions. One of the students said that Ilham threatened him, saying “if you make me angry, I will drag you to the desert and bury you. No one will find you. Then I thought that this person is not like a teacher, he is like a gangster” (Safeguard Defenders 2018, 33). However, it was reported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 students had ever mentioned anything negative about Ilham and that family members of the students expressed doubts over authenticity of their statements. Therefore, as with other televised “confessions” extorted by the authorities in the Xi era, there is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students’ statements were obtained under duress (Wong 2014). These three “confessions” are special because their primary aim was to discredit Ilham Tohti, not the “confessing witnesses”.

Effects of the smear campaigns and other implications

In sum, general traits of smear campaigns and character assassinations have been previously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Smear campaigns usually happen in a moment when a critical personage or a political enemy starts gaining supporters in China or abroad, simultaneously with more repressive or offensive measures, such as arrest or cyberattacks.

2) Attention is diverted from the contentious issue by targeting the person of the critic, not the factual content of the criticism.

3) Family of the critic is often involved, either by being silenced or by being coerc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mpaign.

4) Sexually or intimately scandalous issues are often brought up, as sex-related charge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destroy a person’s reputation.

5) Public “confession” and self-criticism is often extorted under duress (the above traits identified by Sala and Timmons 2016).

6) Smear campaigns gain credibility by incorporating bits of truthful information, which are woven into otherwise false or misleading message (Murong 2014).

Similarly to the context of the early digital er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current smear campaigns under the Xi leadership have been regarded as rather successful.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assess their influence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targeted political opponent, it is beyond any doubt that they often manage to inflict psychological pressure upon him/her. One victim relates: “At first, I only laughed at the slander. But as the lies spread more widely on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it began to feel serious. I value my reputation, and countless innocent Chinese people have had their good names destroyed this way. The authors [of the defaming articles] know very well that when the same lies are repe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they become widely perceived as truth” (Murong Xuecun 2014).

The smear campaigns as used in the PRC thus have a potentially strong deteriorating effect both on



the victim and on the audience, in a similar way which was observed in a democratic media environment: “Once relegated to grocery store tabloids, smears now figure prominently in almost every mainstream news publication... Smear become embedded in the fabric of our everyday existence.” Unlike the often slow and costly character assassinations of the past relying on traditional media, today “some of the most damaging smears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 little more than an idea and an internet connection” (Attkinson 2017). However, the particular ways and extent in which the CPC employs the PRC state agencies or other co-opted actors to launch smear campaigns and other disinformation strategies remain an insufficiently understood phenomenon, which merit complex future examination by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is brief overview, in any case, shows that in the digital era, smear campaigns, fake news, media manipulation, and other related hybrid tactics remain a potent tool u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uthorities to eliminate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to shap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to its advantage. The emergence of new media and technologies has, therefore, enabled the Xi regime an extensive use of disinformation to consolidate its power monopoly. In the context of simultaneous acceleration of more repressive tactics of the Xi era, such the wide-scale crackdown on civil society within the PRC or imprisoning family members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proponents living abroad, it will remain of interest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observe the CPC’s enhanced use of new media and technologies to consolidate its power monopoly.

籌備委員會 Organizing Committee

籌備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

王鴻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余敏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吳筱玫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林 昂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
 林聖芬 國立清華大學副校長
 曾淑賢 國家圖書館館長
 路丹妮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
 戴彼得 國家圖書館延攬研究學者
 蘇 蘅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Organizing Committee

Wang Hung-tai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Yu Min-ling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cademia Sinica
 Wu Hsiaomei Professor,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ndřej Klimeš Research Fellow,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Lin Sheng-Fen Senior Vice Chancellor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seng Shu-hsien Director-gener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áňa Dluhošová Research Fellow,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Peter B. Ditmanso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Su Heng Professor,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工作人員 Staff

秘書組 耿立群 蔡慶郎 吳柏岳 戴德倫 (Darren Davies)
 議事組 嚴曉珮 陳栩梅 楊宜霖
 接待組 黃文德 張圍東 費心琴 吳億萱 洪俊豪 吳漪琳
 新聞組 廖 箴 宋月明
 事務組 繁運豐 邱鴻鈞 鄭誠泰 林明宏 吳育昇 陳森豐
 莊有富 孫世基 李麗玲 劉桂雲
 財務組 張俐雲 才家蓉 詹瓊霞 張孝誠
 *工作人員姓名以出現一次為原則。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操控媒體：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國際學術研討會 / [戴彼得 (Peter B. Ditmanson) 等撰文] ;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編輯 . -- 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18.06
面；公分
ISBN 978-957-678-647-1 (平裝)
1. 媒體 2. 中國新聞史 3. 文集
890.92 107008194

**操控媒體：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
國際學術研討會**

| | | |
|------|--|--|
| 發行人 | | 曾淑賢 |
| 出版人 | | 國家圖書館 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 02-23619132代表號 http://www.ncl.edu.tw |
| 編輯 | |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 |
| 設計印刷 | | 國家科技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358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95號2樓 02-22235805 |
| 出版日期 | | 2018年6月 |

**Manipulating the Media:
News and “Fake News”
in China since Early Modern Times**

| | | |
|------------------|--|--|
| Issuer | | Shu-hsien Tseng |
| Publisher |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20 Zhongshan South Road, Taipei 10001, Taiwan, R.O.C. +886-2-23619132 http://www.ncl.edu.tw |
| Editor | | Liaison Divisi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 Printing | | National Technology Printing Co., Ltd. 2F., No.95, Jian 1st Rd., Zh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5, Taiwan, R.O.C. +886-2-22235805 |
| Publication Date | | June, 2018 |

ISBN: 978-957-678-647-1

GPN: 1010700737